

書叢育教民公

育教民公國德

著克索可
譯民覺黃 榮澍金

者編主
五雲王
翹 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育教民公

育教民公國德

著克索可

者編主
五雲王
懋 章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32688)

公民教育叢書 德國公民教育一冊

Modern Germany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Pauli Kosok

譯述者 黃金 謝雲 榮民

主編者 王雲 王雲 五

發行人 王雲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有所權版 *
* 究必印翻 *

五六二上

徐

(本書校對者 劉紹勳 陳秉全)

榮

編者序

廣義的說來，我們這次研究這八個近代的國家，共同的目標是要從客觀的立場考察公民教育的制度，肯定這幾個國家中公民訓練在大致上的趨向，和指出公民教育再進一步的發展和控制的可能。在這幾個國家當中，有兩國——意大利與俄羅斯——正在各種新式公民忠誠的組織上，作驚人的實驗。德國、英國、美國和法國都是強有力的近代國家以及發展各種公民團結的很好代表。瑞士和奧大利——匈牙利正好代表在不同的，互相衝突的種族與宗教中，調整出一種對中央政權的忠誠時，所經驗到的種種困難。

這個叢書包括以下各冊：

蘇俄的公民訓練 芝家哥大學俄國語言及俄國制度教授哈爾帕爾 (Samuel N. Harper) 著。

大不列顛 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教授高斯 (John M. Gaus) 著。

哈普斯堡君主政體的分解 前匈京大學教授奧柏林學院政治學教授家齊 (Oscar Jaszi) 著。

法西斯黨人的造成 哥倫比亞大學宗教教授虛納德 (Herbert W. Schneider) 哥倫比亞大學歷史

教員可羅夫 (Shepard B. Clough) 合著。

近代的德意志 紐約市 郎埃崙大學 (Long Island University) 教授可索克 (Paul Kosok) 著。

瑞士的公民訓練 蘇奧模學院 (Swarthmore College) 政治學教授 布祿克斯 (Robert C. Brooks) 著。
法蘭西 哥倫比亞大學 歷史教授 海依斯 (C. J. H. Hayes) 著。(這是哥大「戰後法蘭西的研究」叢刊之一，因為與本叢書中各部有密切關係，故附帶列入。)

美國教科書中的公民態度 芝加哥大學 歷史教授 皮愛爾斯 (B. L. Pierce) 著。

杜克——杜克的研究 (The Duk-Duks) 紐約市亨德學院 (Hunter College) 政治學教授 維伯爾 (Elizabeth Weber) 著。

公民的造成 芝加哥大學 政治學教授 穆利安 (C. E. Merriam) 著。

在這些研究中，我們沒有給作者指定狹義的範圍，各書作者所討論到的範圍，非常廣泛；可是有下列兩種默契：(一) 最低限度，在每本書中應包括對於政治的團結在社會上的根據的研討；(二) 各種公民教育的機構，都應該得到相當的討論。至在觀點上，著手的方法上，和計劃的進行上一定難免諸多差異。各個研究者的興趣，經驗，和環境，當然也各有不同。

對於這些研究，我們可以提出以下幾個問題：在國家的精神當中，各種社會上的集團佔什麼地位？為達到我們這次研究的目標，有什麼經濟團體的態度（例如商業份子的態度，農業團體的態度或勞工的態度）是值得我們考慮的？各種族團體對本問題中的政治團體的關係如何？這些種族團體究竟傾向於使國體統一抑或傾向於使國體分裂？各種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猶太教徒，在各該社會中的地位如何？他們與政治單元的忠誠發

生什麼關係？各種區域的團體在政治單元中的地位如何？他們在發展上是否另有特殊的方向抑或與上述別種團體有連帶關係？這些各不相讓的忠誠彼此間的關係如何？

我們不能假定在這些團體當中有任何團體對政府在大致上有特別的好感或特別的厭惡；這次分析的目標也不是要對任何團體建立一種不變的興趣或依戀，而是要指出現有政治單元和政治權威的社會構成。到底有一種抽象的忠誠否——無論是否政治的——還是一個疑問。政治上的忠誠，要靠具體的利益而定，而且時常因有已經不能適應現狀的遺留和未曾實現的志願而改變。團結是各種勢力衝突所造成的結果，或因現有各種勢力的均衡而產生。這些因素隨時可發生變動，而均衡則或可仍舊，或略變更，或至整個推翻。最要緊的是各種利益的調整，任何一種的特有的形式與性質，都無關重要。

被分析的公民教育機構當中，有學校，有政府中公務人員的地位，有政黨的地位，以及各愛國團體的功能。或者從另一種觀點看，我們可以分別敘述：風習在造成公民的團結上的功用；政治的象徵主義（symbolism）的地位；語言、文學和報紙與公民教育的關係；地方在建立一種政治的忠誠所佔的地位。最後，我們希望能夠把反抗國內或國外政府而與其他團體競爭的各種團體忠誠，加以有效的分析。

在這些團體或因素中，有許多重複的地方。我們可以將最後列舉的任何一種或全體，應用到最初列舉的任何一種或全體上去。例如正式學校系統可以——而且正在——利用語言、文學、象徵主義，或對地方的依戀，或是利用各種重要的風習。但象徵和風習便是——而且在事實上真是——重複的。假如真要實現牠們的功能，這些

因素更非重複不可。語言和對地方的依戀，也可以——而且真正——交織在一起。

在被研究的各國中，我們都要追溯和比較他們所用的方法。結果當然不會得到一種準確的測量，但總可以給我們追溯到各城市中各種方式和模型的綱領，不過我們希望這種綱領的清晰程度，足以表明從政治的統制所發生的幾種重要情境，同時還可以引起對公民教育更求發展的迫人思索的問題。

我們可以說在討論產生政治團結的歷程時，一定要同時顧到在同樣社會中對其他團體的各種忠誠。這裏所描寫的方法當中，有許多是各種互相競爭的團體所共有，從牠們的交互關係中，無論是合作或是競爭——我們可以看得更明白。宗教團體，經濟團體，種族團體，文化團體，以及其他任何團體的態度，對政府謀鞏固政治上忠誠的工作性質和效果都有深刻的影響；只有一切關聯的和附帶的因素同時都顧到，我們纔算得窺全豹。

這些方法的應用，不一定是有意識的，雖然這裏我們所說起來的好像都是。這些工具的應用，往往沒有經過當事者任何人的有意識的計劃。在這種情形之下，與其這些方法為我們所欲用，勿寧說為我們所發現。但無論如何，牠們不特存在，而且正在工作。

這八種或九種方法，僅是廣義的團結勢力大致的分類。這種分類並不當作政治信仰的團結歷程在教和學的心理上的精確分析。要做到這一層，我們必須先將目標分析清楚。此外，我們還先須有條有理的研究好應用目標的方法。這些在我們所要討論的任何國家中，都未曾做到。

對公民團結的研究，我們所能得到的資料，在各國中恐怕再也沒有比現代的德國更豐富的了。可索克 (Pa-

ni Kosok) 教授所著的這本書，係根據他六年來研究德國政治上的忠誠所得的結果而成。他專任德國搜集材料約有二年之多，其餘的時間用來預備和修改原稿。這次研究的基礎，是拉斯威爾 (Lasswell) 博士所砌成的。他在一九二四年間曾作過一次初步的調查，且曾幫助整理這材料，至成現時的形式。

可索克教授的研究，和本叢書中其他作者稍有不同。他特別注重在政治團結系統中的各種經濟因素，同時又特別重視共產主義公民教育的發展與其他團體中同樣團結歷程的區別，從這一個觀點看，可索克所描寫的德國的制度很可以與哈爾帕爾 (Harper) 的蘇俄的公民訓練同時參閱。在哈氏書中，對於蘇俄發展公民教育的苦心和努力，有詳盡的分析與描寫。在德國，我們可以看到互相競爭的各種公民教育系統——民主的，法西斯的，共產主義的——同時並行，在現有政治制度的範圍外爭得地位和在同樣的社會中爭佔優勢。在三種主要團體而有兩種立志要推翻現有政治制度的狀態中，做成國家的團結與忠誠的工作。顯有許多困難，可索克所要描寫的，正是這種衝突。還有金斯堡 (Ginsburg) 所作的特別切題的一章，是討論幾個各不相讓的團體為做成和操縱一種有勢力的象徵的掙扎（第十六章。）

著者序

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已經勝利了。一九一九年以後纔成立的短命議會式政體，已經隨著法西斯的勝利而終結。現時的獨裁政體雖然可以算是德國歷史發展中的一個新階段，但同時也可以說是議會政體時代各方面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且這種勢力，在戰前德國的社會中就已經有了根基。這種勢力發展的特徵，是加緊注重對國家政府的忠誠，這就是說，一切其他的忠誠，都愈要遷就這種最高的中心忠誠。研究造成現時法西斯獨裁政體的各種勢力，也就是研究以往曾經增減國家的和公民的忠誠之各種勢力。本書的宗旨，就是要作這樣一個研究的嘗試。我們的步驟，不僅是將戰後時代所用的公民訓練方法作一橫剖面的分析，而且同時要細察公民的與國家的訓練的概念和內容在歷史上的起源與發展。爲達到這個目的計，我們對於利用公民訓練所抵抗的各種反公民，反國家的勢力，也須同時加以分析。

這次研究是根據著者在德國居留兩年半搜集來的資料。此外，對於本問題的理解和附加的材料，有許多採自著者以前在德國居留兩年寫成而尙未發表的舊稿，名叫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的德國革命。材料多搜自德國各圖書館，其中最有用的當推柏林的普魯士邦立圖書館、紐約的公共圖書館，也供給不少資料。其餘的材料，係從與各團體職員的接觸中直接得來，他們爲這事，都能不惜犧牲時間。這樣得來的材料，還靠與德國各階級公

民私人的談話來補充。對於這些人，著者要表示很誠懇的謝意。

本書原稿是用德文寫的，規模也比現時出版的較大。以後的情勢，使著者有改用英文發表，將原稿縮小，和根據美國讀者的觀點重新修改的必要。結果只好根據原來的材料，重新寫作，簡直等於另著一本新書。更因篇幅的限制，又將英文稿中各章再行縮短。結果有許多煩瑣的事實，不能不刪去。這使本書中許多結論，具有一種為原來所沒有的訓示的性質。有幾章必須完全刪去：如關於體育運動的團體，慈善的機關，德國婦女的地位和德國的家庭、音樂、文學等討論，以及對於公民訓練問題本身一種理論的和歷史的分析。著者希望最近可以將這些材料，單獨發表。參考書目錄中只列舉曾經參考的各種書籍和小冊的一小部份。有許多重要的著作都不能一一舉出，同時要決定那本書應在被舉之列，又是一件極困難的事。

在將本書改成英文文本的工作中，著者幸而得紐約市立大學金斯堡 (Isidor Ginsburg) 先生的合作。他不但毫不吝惜的犧牲自己的時間，而且將自己的研究擱置一邊來助這書的完成。他對於德國歷史和德國事情的透澈了解，和他的超人的分析能力，對著者幫助很大。關於這次研究所牽涉到的各種理論上問題以及材料的組織和發表的方法，著者都曾與他詳細討論過，一切常經很劇烈而有好效果的討論，著者都很欣快的記在心頭；本書之所以有今日的面目，全靠這些討論。在這些討論當中，有許多是按照事既定大綱而進行，在談話間隨時作筆記。由此可說本書是完全由合作得來的成績。可是因為這些討論的結果總難完全一致，著者有時不免要負參加個人解釋的責任。

除了慷慨的合作以外，金斯堡先生還寫了很透澈的一章論國家的象徵主義，在該章中他對於這個複雜的問題，另用一種新的觀點來討論。

著者還要感謝角登教授 (Philip D. Jordan)，他曾遍讀原稿一過，並加以批評；各德斯基先生 (Rubin Gotsky) 曾經幫助著者完成第八、第九章的原稿，並會對全書加以批評，著者也非常感謝。哥倫比亞大學的海依斯教授 (Carlton J. H. Hayes) 給本書不少的鼓勵，以後還不憚煩的，細察全稿一遍，至深可感。對本書的主編人摩利安教授 (C. E. Merriam) 的不斷指導和長期忍耐，著者也表示謝忱。拉斯威爾教授 (Harold D. Lasswell) 是草擬原來計劃的人，他仔細察看全稿以後還給著者不少有價值的建議，又助著者作最後的編校。對民斯君 (Leonard Mins) 的許多批評和建議，著者也深為感激。

我還要感謝內人，她在研究和文字上的幫助，在整個工作中也是不可缺少的。

引言

本書共分三編。第一編論述造成公民的或反公民的心理的一切客觀的社會和經濟狀況，連帶談到各種被認為足以減少不忠誠或增強忠誠的經濟方略。第二編敘述現時政府的性質和現政府要用來教人民忠誠的各種組織。第三編分論政府以外與本題有關的各種組織和各種份子。我們以後可以看到，這些組織在牠們自己的活動中，往往和政府合作。

第一編中所用的方法是一種歷史的分析，詳述在公民的忠誠的發展中，各種社會的和經濟的階級所佔的地位。從德國社會的階級性和德國公民訓練的性質看來，這種分析是不可少的。從這種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兩種主要階級：上層或統治的階級——貴族與資產階級——和下層或被統治的階級——農業與工業中的無產者。還有介乎這兩種人之間的，城市和鄉間的中產階級，（註一）人數不少，地位也很重要，我們還得分開來討論。每種階級當中還顯出各樣不同的等級，雖然因為篇幅的限制，我們對於這種區分，往往不能詳加討論。也許在實際生活中，各階級中小等級的劃分不至於像本書所表現的那樣顯著。不過本書所描寫的各種階級的差別並沒有過當。主要的階級——甚至於一個階級中的小等級——的分界，各階級中你自己大致都承認，而且都嚴守這種階級的界限。因為這些區別不僅是經濟的，還牽涉到德國整個社會的構成。（註二）在軍隊中，在警察當中，

在各機關裏，在各學校裏，在教會裏，在運動團體裏，以至於在少年運動和其他社會文化的團體活動裏，我們都可以感覺到這種區別。事實上我們很難找出一種不帶階級性的活動。這種階級的區別給德國人的生活一種特異的色彩，爲他國人所意想不到。最重要的，就是這種區別誰也不加否認。一個人畢生中的地位不但完全因所屬階級而定，而且他在日常生活中總離不了階級的感覺。火車、地道電車、醫院、葬儀、以及澡堂，都公開的掛著頭等、貳等、叁等的牌子。

比較其他一切都更重要的，就是這種階級的區分很嚴。從低一級要跳到高一級去極不容易。這種變遷是有的，可是非常慢，必須經過長久的期間。這使德國社會的分級幾乎是固定的，一半像印度階級 *caste* 一樣。所有這些因素我們都必須記在心頭，因爲對德國公民訓練的性質，有深切的關係。

(註一)『中產階級』一個名辭，意義與德文的 *Mittelstand* 和法文的 *petite bourgeoisie* 相同，與英文通常所謂 *middle class*

不一樣。後者包括大資產階級，而前者則純係指小規模的有產階級。關於中產階級的性質和構成，參看本書第三章。
(註二)參看下列各書：

Paul Mombert "Die Tatsachen der Klassenbildung," *Schmollers Jahrbuch, Jahrgang* 第九三頁至第一二二頁;
Georg Albrecht, *Die sozialen Klassen* (1926); Karl Kau sky, "Klasseninteresse, Sonderinteresse, Gemeininteresse," (*Neu: Zeit XXI*) 第一四〇頁;
August Pieper, *Berufsgedanke und Berufsstand im Wirtschaftsleben.*

目錄

第一編	主要的社會與經濟的分界	一
第一章	資產階級	一
第二章	工業中的無產階級	一四
第三章	中產階級	二八
第四章	擁有地產的貴族	三九
第五章	農業界中的無產者	五三
第六章	農民	六三

第二編 政府……………七三

第七章 政黨……………七三

第八章 行政人員……………九八

第九章 軍隊……………一一八

第十章 學校……………一四四

第三編 政府以外的組織和份子……………一八五

第十一章 教會……………一八五

第十二章 青年運動……………二〇四

第十三章	地方主義與區域主義·····	二二二
第十四章	日耳曼人與非日耳曼人·····	二四四
第十五章	報紙無線電與電影·····	二六二
第十六章	國家的象徵主義 (Isidor Ginsburg 原著)·····	二八九
第十七章	結論·····	三二二

德國公民教育

第一編 主要的社會與經濟的分界

第一章 資產階級

在各種社會階級中，我們要首先提出資產階級來討論，因為所謂「公民」和「公民的」訓練的概念，係從這種階級產生的。我們現在先試說明早期資產階級的各種社會和經濟狀況如何產出公民的概念，這概念如何使資產階級不得不反對封建式的國體而贊助君主專制國體的發展。其次我們要說明資產階級的繼續發展如何與專制國體中的封建份子衝突，漸漸將政府變成資產階級的政府。最後，我們要指出資產階級如何利用政府來直接推進他們的經濟利益和壓止一切破壞現有社會制度的嘗試。（註一）

在分析資產階級的利益時，我們將工業的資產階級，商業的資產階級與財政的資產階級分開，雖然在最近幾十年間，這三種資產階級已經有逐漸化而為一的趨勢。這三種人共有的基本條件是私人財產，所謂私人財產，係與封建式的財產和社會主義化的財產公有相對而言。資產階級的擴張與發展的次要條件以生產與市場

問題作中心。生產的增加，一定要靠充分的資本，價賤的人工，和價廉的原料。此外，還要靠廣大的市場，使產品賣出去能獲得最高的利潤。只要生產的增加與商務的增加同時並進，工業的資產階級與商業的資產階級利益是一致的。可是這兩種人的利益有時會發生衝突。例如對於關稅，工業界要保護本國的出品，而保護式的關稅卻是國際貿易的障礙。只要生產和商務的發達同時增加投資的新機會，則財政上的資產階級——銀行界——的利益當然也和工商業界的利益一致。

資產階級對封建社會早期的掙扎，就是要造成一個可以使私人財產安全，資本自由累積，不受封建式的統治者支配的局面。（註二）為達到這個目的起見，他們不得不與專制式的君主聯結，建立一個君主權力在一切貴族之上的國體。專制政體，於是變成資產階級用來削去封建式的統治者的政權，和建立一個公民和經濟制度的工具。十八世紀末年德意志的君主多數贊助商業的發展，同時一方面削減貴族的權力，一方面又不給資產階級政權，這是人所共見的事實。

在這時期中，資產階級扶助君主政體來和封建式的財產制度與國外的競爭奮鬥。在他們公民的概念中，對專制君主的擁護當然是一主要部份。資產階級雖然沒有政權，在政治上他們卻和君主站在一邊，同時君主也贊助他們經濟的發展。在他們自己當中大家雖以公民自視，但在君主面前他們都甘居臣庶的地位。

藉了政府的贊助，十八世紀末葉德意志的資產階級漸漸擺脫前兩世紀的厄運，表現出一種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復興，同時君主們對於經濟事業的統制，又漸加注意；於是這兩種勢力便發生衝突。工業的繁榮使政府

賦稅的收入增加，而賦稅又爲王公們在宮庭中奢華的消費與維持軍隊和政府機關所必需，頻年爭戰——尤其是大弗來得烈（Frederic the Great）的征戰——的耗費，使工商業賦稅的擔負愈加重，結果使整個君主政體的經濟政策，變成資產階級發展的一個大障礙。（註三）同時新式工業生產方法從英國傳入，中古式的行會專利辦法有礙新工業的發展。還有貴族對於土地的專有權，也妨礙資產階級勢力的擴張。

資產階級逐漸自立，在法國革命爆發以後更加明顯，當法國軍隊進佔德意志時，他們常得到資產階級的友視。這種將法國資產階級作爲同志的感覺，更因法人在德地對於資產階級的許多改進而加強。這種改革或是拿破崙直接發起，或是拿破崙勝利的結果，如邊境關稅的裁減，混亂而且苛刻的賦稅一部份的廢除，貴族享有土地特權的取消，和許多行會專利辦法的裁撤等等。工商業更因得了大陸封鎖政策的幫助，發展極迅速。（註四）

拿破崙在德意志的統治繼續下去，德意志的資產階級對較強的法國資產階級漸漸失去十九世紀頭十年間的好感。引起這種態度的改變的主要經濟因素是拿破崙的取求無厭，賦稅逐漸增加，資產階級漸不堪這種擔負。此外，拿破崙在法國所設對外來貨品的保護稅則，在德意志工業化的地方——萊茵河流域和薩克遜尼（Saxony）一帶——影響很壞。大陸封鎖政策雖然對一部份的工業有利，對別部份的影響很不好。（北部的海運事業，就是一例。）加以拿破崙末期的政策，漸漸趨向於犧牲農工的利益來謀與德意志的貴族接近，這又是使一般人對他的統治不滿的一個原因。德意志的資產階級本來不像法國的那樣發達，有許多在法國資產階級認爲不可少的辦法，在德意志的需求並不爲大，引用到德意志以後，在當地並不感必要，這更足以使德意志的資產階級

對法國發生反感。從此德意志的資產階級轉過來和本邦的君主聯絡，認本邦的君主為愛國與爭取德意志自由的領袖。這種的地位，德意志各邦的君主以前從來沒有享受過，一到拿破崙倒臺以後便很快地又失掉了。

在這種反感的期間中，資產階級慢慢的離開在他們本身歷史演進中的第一個階段——承認專制君主的權威，並利用專制君主來與封建勢力對抗。他們現在漸漸進入第二個階段，認為君主專政政體對他們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三方面都不利，轉而反抗專制政體。他們所需要的是對專制君主政體的一種制裁。資產階級發展，使君主逐漸受他們操縱。直到一九一八年，政府中的封建份子全被剷除，共和政體亦同時成立。（註五）這種變遷的原因，當然是德意志資產階級的慢而穩定的發展，這種發展更因法國人的侵犯而速度突增。另一個原因是從「光明時期」一直到法國革命時期。法國資產階級給予德意志資產階級的思想上的激動。經濟的以及思想的因素，很明顯的改變了公民『Staatsbürgerlich』的含義，從十八世紀反封建，擁護專制的概念，變為十九世紀的反封建，反專制的概念。（註六）

這種運動所引起的理想與步驟在這裏為篇幅所限，不能詳述。整個德意志各期政治上的成熟和各期經濟的發展與各種地理和社會的狀況，往往由互相抵觸而打成一片。德意志資產階級勢力本來比較薄弱。法國的資產階級和拿破崙對他們的壓逼已經使他們當中一部份人要暫借專制政體的庇護，而與專制政體的關係，只能慢慢的擺脫。最重要的，就是這時期的資產階級在當時政體之下，他們的經濟需求也能得到一部份的滿足。專制政府當然不輕易放棄政治的權利，但為自固起見，在經濟上常給資產階級通融辦法。因為建在農業上的專制政

府是可以扶助商業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中的最強份子——的發展，和本身的利益並沒有衝突。

各邦中最初施行這種政策的是普魯士。施行的步驟是：第一、取消國內的關稅；第二、原有煩瑣賦稅制度的改革；第三、關稅的劃一與減低；最後，關稅聯盟（Zollverein）的成立。（註七）這種關稅的聯合，以後變成在專制政體中資產階級的一種大經濟勢力。（註八）

全德意志各邦專制政府施行這種經濟政策，當然減少資產階級的公民概念中反對君主專制的成份，這就是一八八四年革命時，資產階級不願盡力推翻君主政體的原因。同時工業中的無產階級出現，在英國和法國勞資間的惡感漸露，資產階級更不能和政府太過不去。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雖然在事實上算失敗，但資產階級的公民概念中擁護政府和反對政府的成份，還是不斷的衝突。一方面德意志資產階級的政治理想——一個統一的民主政體——始終未能實現，另一方面「關稅聯盟」的發展和一八五〇年以後的經濟繁榮，使資產階級的發展速度突增。德意志的資產階級在北德聯邦和德帝國成立的前後，得到了離他們政治經濟的目標最近的成就。雖然從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的十年間資產階級（國家自由黨）曾一度反抗卑斯麥的政策，但這次反抗的事實，更表明資產階級和在一八四八年時一樣的不願太與專制政體作對。

在資產階級看來，北德聯邦和以後德意志帝國的成立都是「關稅聯盟」發展的自然結果。新帝國除了給他們各種經濟上的權利以外，還使他們政治上的願望，得到一部份的償足。從一八六七到一八七七的十年間，關

於經濟方面的立法，多半是「關稅聯盟」中關於經濟的法規的繼續和擴充。（註九）

自從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帝國成立以後，資產階級的公民訓練再也不將反對封建份子作目標。用德文來說，就是公民的訓練再也不是反對政府（Staatsverneinend）而很明顯的是擁護政府（Staatsbehaltend）。縱然有一部份人不願和政府中的封建份子妥協，可是各方面的發展，已足使大部份的資產階級歸依在帝國勢力範圍之下了。

在本書的範圍內，我們當然不能詳細分析政府如何被資產階級利用來推進自己的利益。帝國和各邦的關於經濟與財政的立法，都以使資本能夠得到最快的和最自由的增積為目標。為使德國工業能和英國出品競爭起見，政府設各種方法使生產增加。工業的集中，得政府的贊助，是很明顯的事實。政府本身就是萊茵流域威斯特利亞（Rheinisch-Westphalian）煤業理事會的一份子。從各種工業學校的設立和對各種科學會社精神上和經費上的贊助，政府對於工業的技術和科學的發展，貢獻也不少。資產階級和政府間的經濟接觸，藉商會作媒介。（註一〇）這種現象在拿破崙時就存在。一八四〇到一八五〇的十年間，普魯士全邦各地的商會，都是半官式的組織。（註一一）其他的媒介有政府中的商部，和種種地方的和國家的關於經濟的委員會以及各種官吏。

在德國的對外關係中，大致上也實行這種政策。從一八七九年關稅上的妥協起，德國資產階級勢力的發展，不斷的從工業產品入口稅的增加表現出來。（註一二）這當然不但增加本國出品在國內的市場，而且可以使資本的累積加快。殖民地的攫取，為的也是同樣的目標，雖然德國殖民地實際上的經濟價值並不重大。此外，資產階

級在外國的利益，更隨着政府所訂商務條約而推進。一八七九年以後所訂條約，頗有犧牲農民的利益來作增進資產階級權利代價的趨勢。在卡布理維（Capriivi）一八九二年和一八九四年所訂的條約中，這種趨勢尤為明顯。全世界各處德國領事館，更為德國出品採集關於各地市場的消息。商業航務得了政府的資助，也在一個短期間內完成。政府同時又建立一個有力的海軍，使商業界在海外的利益，得到切實的保護。（註二三）一九〇〇年以後逐漸發生的反英外交政策，也純為資產階級的利益而起；因為英國的資產階級年代較久，實力較強，是德國資產階級發展的障礙。實際上我們可以說直到一九一四年，整個德意志帝國的外交政策，所代表的是資產階級在國際上的利益，而不是貴族們的利益。在德國方面看來，世界大戰不是德皇的戰爭，不是『少年貴族派』（Junikors）的戰爭，也不是軍人的戰爭；他們都是附和的，或者說被利用的更為適當，被資產階級利用來想達到他們經濟上的目標。

將這些事實和我們的主題——公民訓練——連接起來，我們可以看出資產階級中一大部份與半專制式的君主政體密相勾結。他們對政府的公民的忠誠，實在是堅決到最高的限度。不特如此，他們還設各種方法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來聯絡社會上的中下階級。在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四年當中，資產階級對於公民訓練的概念，與政府所提倡的對國家盡忠的概念幾乎完全相符；簡單的說一句，就是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愛國和階級的權利完全一致。所謂公民訓練，無非是將資產階級所需要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觀念，傳授給其他民衆。

在這時期的末葉，公民訓練的內容，另外經過許多改變。原因是帝國主義的發展，殖民地 and 海外市場的獲得，

商業的擴充，資本的流出，海陸軍的增加，以及附帶的宣揚德國文化的使命。資產階級的這類新需要，變成他們的公民和國家概念的主要部份。還不只此，資產階級所佔地位的重要使這種概念不久傳遍了民間，到歐戰開始的時候，全國民衆，都一致爲一個國家的理想（內包含帝國主義的概念）奮鬥。

資產階級既然和原有政府有那樣密切的關係，歐戰的結果對他們的影響當然也很重大。自從一九一八年德國在經濟上和軍事上倒臺，和政治革命跟着發生以後，資產階級的地位與前大不相同。他們的經濟力大受打擊。寶貴的原料和資本，都隨着領土的被割佔而喪失；殖民地被佔，國外投資也被沒收，商船被人分贓，連貨品在國外的專利權也失去效力，德國的國外市場完全失掉了，還要擔負重大的賠款和受協約國對工業上的制裁。（註一四）除此之外，資產階級的帝國已經消滅了，勞動階級的革命份子還想要推翻臨時的社會黨政府而建立一個確實要廢除私有財產的蘇維埃政府。資產階級的前途，看來好像是沒有希望了。（註一五）

然而這正是一個轉機；這種局面，適足以引起資產階級的努力來恢復他們以前的地位和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勢力。（註一六）所有的力量都集中起來從『少年貴族派』（Junkerium）到社會民主黨都一齊起來壓止革命的發動和保護私有財產的基本因素。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間的冬季，全德國資產階級的報紙都高唱『擁護全國大會——反對無產階級獨裁』的口號。

遏止了內部各處左派份子的騷動以後，資產階級設法恢復以前的地位——對新建共和政府的把持。社會主義者雖然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的變故中曾經證實與資產階級一齊保護原有社會制度是極有價值

的同志，資產階級仍然反對新的事態。原因有好幾種：第一由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和天主教中心黨所構成的新政黨的領袖維馬混合政府（Wainar Coalition）多少是在資產階級以前的仇敵——社會民主黨——的掌握中。雖然在大戰和革命當中，社會民主黨已經證明他們無意要破壞資本主義，但資產階級對他們還存在着畏懼，最少是怕革命的勞工階級的勢力，會逼着社會民主黨將一部份基本的工業社會化。此外，他們還恐怕自己的經濟地位，會因對工業和私有財產徵收重稅或對工廠中工人的權利的增進而受損失。可是當他們看出政府對資產階級經濟生活的改造，並沒有過問，他們對共和政府的信仰又再增加。其實資產階級不久還發覺他們不但能夠恢復以前對政府的控制，而且這種勢力的運用，比以前還要直接。因為君主政體中的半封建份子的累贅，已經被掃除淨盡，政府中最有勢力的份子，就是資產階級。他們利用這新政府來改進他們對外的關係。第一步，他們推維馬混合政府出來簽訂和約，自己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不負何責任。他們使政府重新開展以往國際上經濟和政治的關係，自己同時設法取得原料和恢復以前的市場。（註一七）他們更促成各種國外借款，一直到現在還未終止。最後，他們還利用政府的力量來減低對協約國的賠款。

在國內方面，革命後歷屆政府對資產階級也有很多的好處。牠們曾經爲工業設立各種公債；（註一八）曾經資助新商業航務的發展；商界在外國和被佔各地所受的損失，也相當的得到償補；會不斷的鼓勵工業，商業，以及銀行事業的集中，做成完全國甚至全世界的規模；曾在各大學和各政府機關中，鼓勵關於商業的研究；（註一九）會保持工業產品入口的稅則，近十年間繼續增加關稅藉以提高物價和維持國內的市場；曾經將通貨穩定，並相

當的重整國債，此外，歷屆政府還設了許多辦法來減低勞工的工價；在政府的和私人的工業中，以前法定的每天八小時工作的限制，事實上已被他們廢除；他們還曾經在工潮中強制執行調解；曾經贊助工業的「合理化」。他們更在徵收賦稅的方法中，使資產階級的擔負一部份移到其他階級身上。（註二〇）

戰後德國的政府除被資產階級利用來做了這許多事情外，還有些基本的因素使德國不能得到完全的經濟復興；實際上德國的社會自從一九二四以來，幾無日不在危機之中。這種非常時期危急性的重大，幾乎使全國各階級失卻對共和政體的信仰。結果資產階級，對於何種政府在經濟的發展，和對其他民衆的操縱上能予他們以最大的幫助，曾作不少嚴重的討論。德國的資產階級以往雖然對共和政體懷疑，還沒有感覺到法西斯主義的需要；最近幾年間贊成法西斯主義的人漸多。建立一種沒有君主形式的法西斯獨裁政體的運動，漸次擴大。無論對內對外，這種獨裁政體似乎最少能使資產階級中一部份的地位更穩固。可是整個資產階級還沒有全數出來主張法西斯獨裁，因為他們懷疑當勞工階級中革命份子正在激增的時候，這種獨裁政體能否很成功的建立起來，又恐這種獨裁政體的成立，或許會暫時使國內工業的發展停頓，但在另一方面看，經濟的不景氣象，和過激份子的增加使資產階級不得不趨向一種較有力，較近於獨裁式的對全國經濟和政治生活的統制。奧登堡（Hindenburg）的獨裁式的法令和柏賓（Von Papen）的少數政府，都是往這方向走的重要步驟。

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戰後時期的公民訓練，更是擁護資產階級的財產，資產階級的社會，和資產階級的政府的訓練。這是基本的條件。至於政體是君主專制，是有限的專制，是共和，還是法西斯式的獨裁，都是次要的事。

政體的性質，全看歷史上的需要而定。若是在民主政體中資產階級能夠操縱社會，他們便趨向民主主義。只要環境需要獨裁政體，他們可以放棄在公民的概念中民治的成份而代以法西斯獨裁的觀念。他們可以將愛國心與對共和政府的忠誠分開，轉將愛國心與法西斯西式獨裁的觀念連在一起。這一點他們一部份已經做到，還可以繼續往下做去。這種獨裁政體的成立是否『合法的』或『非法的』由推翻原有政府而成立；這種政體還是保存共和的形式或是虛設一個君主：這完全是政治上需要的問題。至於他們能否使全體民衆擁護這種政體，使這種獨裁變成一種穩定的，爲大家所公認的政府方式，那就當然是將來纔能決定的事。

(註一)參看 *Grundrisse der Sozialökonomik*, vol. IX¹ and vol. IX² (1924) 這兩卷內有關於社會上各階級各等級的重點研究。

(註二)要看詳細的討論，參考下列各書：

Oskar Schwebel, *Deutsches Bürgertum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m Jahre 1808* (1883)；

Heinrich Johann Sieveking, *Grundzüge der neuer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m 17.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1923)；

Gustave Huard, *La Révolution de la Bourgeoisie Allemande* (1919)；

Werner Sombart,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1924)；

Werner Sombart, *Der Bourgeois.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s modernen Wirtschaftsmenschen* (1923)。

(註三)參看 Werner Sombart *德意志獨裁政體*、*Krieg und Kapitalismus* (1913)。

(註四)參看 Robert Höninger, *Die Kontinental Sperre und ihre Einwirkung auf Deutschland* (1907)。

- (註五) 所謂資產階級的第三期(以後再詳細論述)的特徵,是一種藉法西斯式的獨裁來破壞原來為資產階級自己所造成的議會式的民治主義的舊式。
- (註六) 關於資產階級實際上的發展,參看各種標準的著作如 Werner Sombart 的 *Deutsche Wirtschaft im neunzehnten* (1913); Sartorius von Waltershausen 的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1815—1914* (1920); W. Wygodzinski 的 *Wandlungen der deutschen Volkswirtschaft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1912); Wilhelm Mayer 的 *100 Jahre deutsche Wirtschaft* (1815—1914)。
- (註七) 參看 Wilhelm Gerloff 著 *Die deutsche Zoll- und Handelspolitik von der Gründung des Zollvereins bis zum Frieden von Versailles*; Weber 著 *Der Deutsche Zollverein*; Hermann von Fostenberg—Packisch 著 *Di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Zollvereins* (1879); 另外參看 Heinrich Dietzel, "List's Nationales System und die national wirtschaftspolitik,"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forschung* XXXV 第三六六頁四—七頁。
- (註八) 關稅聯盟在大部份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與現有政體的聯絡上非常重要,因為這給當時德意志資產階級的公民概念一種顯明的色彩。
- (註九) 欲知其詳,參看 Karl Lamprecht 著 *Deutsche Geschichte*; 與 William Harbutt Dawson, 著 *The German Empire and the Unity Movement*。
- (註一〇) 參看 Friederich Schornernus, *Die freien Interessenverbände für Handel und Industrie und ihr Einfluß auf die Gesetzgebung und Verwaltung*。
- (註一一) 參看 Richard Zeyss, 著 *Die Entstehung der Handelskammern und die Industrie am Niederrhein während der französischen Herrschaft* (1907); 另外參看 Herens, *Die deutschen Handelskammern als*

Glied der Verwaltung; ihre Geschichte, ihr Wesen und ihre Zukunft.

(註一二) 與本問題有直接關係的德國關稅詳細歷史，在任何德國近代史書中都可以找到。

(註一三) Rudolf Wittmer, 著 Deutschlands Taten Zur See; die deutsche Beteiligung Zur See von ihren Uraufängen bis zum Weltkrieg (1915), 第一六頁至第一七頁中提出從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九七年間二十件德國艦隊被

用來保護海外德國財產的事件。

(註一四) 參看 Hans Bachmann,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Vor und nach dem Weltkrieg (1921).

(註一五) 參看 Moritz Julius Bonn, 著德國本國 Die Krise des deutschen Kapitalismus, 與 Das Schicksal des deutschen Kapitalismus (1930).

(註一六) 參看 Erich Eyck, 著 Des deutschen Bürgerturns Schicksalsstunde (1919).

Erwin Steinizer, 著 Bürgerturn und Revolution (1919).

(註一七) 將會促成連接幾次商務條約，第一次是與俄國簽訂的 Rapallo 條約。

(註一八) 見 Rudolf Dalberg, Deutsche Währungs- und Kreditpolitik 1923-1926; Sahn 著 Staatsliche Kredit politik

(見 Recht und Staat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Vol. LVII (1927). 的一部份。政府強制成立礦業章程

(註一九) 設立 Institut für Konjunkturforschung, 作爲 Wirtschaftsministerium 的一部份。所有德國礦業都受統制。

(註二〇) 參看 Kurt Singer, 著 Staat und Wirtschaft seit dem Waffenstillstand (1924). 參看 Heintich Lechtape, 著 Die 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在魏政府監獄中成立一物礦業章程。參看 Die deutschen Arbeitgeberverbände, ihre volkswirtschaftliche Funktion und ihre soziologischen Grundlagen (1928).

第二章 工業中的無產階級

資產階級創造公民訓練的概念來作反抗封建式貴族的利器，我們在前一章裏已經說明。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葉資產階級所注重的是公民的權利方面；他們要從半封建半專制的政體中，爭取公民的權利。以後的注重點漸漸從權利方面轉移到義務方面，要使中等以下的階級遵守公民對資產階級的政府應盡的義務。現時的公民訓練，大部份係為中下階級而設，尤其重要的對象，就是工業中的無產階級。

工業中的無產階級在名稱上便和資產階級的公民概念正相反，因為資產階級公民概念的根據是享有私人產業作收入來源的權利，而顧名思義，無產階級本來就沒有產業。可是從另一方面看，靠工資來生活的無產者的存在，是資產階級和我們現時整個工業社會存在的基本條件。這種無產階級雖然在社會上佔一重要地位；在名義上和資產階級享有同樣的權利，應盡同樣的義務，但事實上他們的經濟狀況，絕不容許他們執行這種權利。這種名義和實際地位的矛盾使無產階級成為空有其名的公民；關於這種階級公民訓練的問題，因此也不能不找一種私有財產以外的對象來作中心，纔能使無產階級竭誠擁護原有的政府和社會。培養公民對國家的忠誠的問題，遂成為如何使無產階級感覺到在現狀下他們能夠安居樂業的問題。這當然要靠穩定的職業和工資。

除了用各種方法使工業中的無產階級擁護原有政府以外，防止財產公有觀念的傳播，也是一件重要的事。

工業中的無產者對生產的工具不能享有，他們自然容易受生產工具由社會公有觀念的影響。生產工具由社會公有的含義，就是廢除私有財產，也就是取消現有資本主義的政體。因此在公民訓練的歷程中，除了積極的使工業中的無產階級對政府發生好感以外，消極的防止社會主義的思想，也是很重要的一部份。

在一八七一年以前，工業中的無產階級人數比較不多，雖然經過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七〇年這十年間工業的發展，他們的地位已經日益重要。可是從我們這次研究的立場上看，這個時期特別有興趣，因為德國勞工階級的一部份就在這時期內開始感受社會主義的影響。（註一）在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中所宣佈的社會主義學說，指出廢除資產階級的政府和資產階級的社會，建立一種新社會制度的需要。此外，他們還直接號召勞工階級起來為這種新社會奮鬥。這種學說的注重點，全在工業中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利益衝突，將無產階級的經濟利益，與推翻原有社會，以建立社會主義，連在一起。

兩個勞工的組織先後成立：一個受馬克斯 (Marx) 和安格爾士 (Engels) 的影響，注重革命成份；另一個受沙爾 (Lassalle) 的影響，主張一部份工作可以在現有政體中設法實現。這兩種組織對宣傳工作很努力，結果牠們不久都在勞工界的較活動份子當中，佔得一個穩固的地位。在德國統一以後——尤其是經過一八七三年的危機以後——這兩種社會主義的組織進展很快。一八七五年，牠們聯合起來組成社會民主黨。到了一九一四年，自稱已得全國民衆三分之一作後援。

一種有力的社會主義運動，就在這時期中產生。這種運動對政府最初是敵視，以後竟在空前的國家主義的

掙扎中，擁護以前敵視的政府。(註二) 培養無產階級當中對國家的忠誠問題其實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防止本來不信社會主義的工人接受社會主義的理論，第二方面是清除社會主義運動中反政府的成份。換句話說，就是如何將這種運動從革命的，變成改進黨的。因為附從社會主義者的工作數目日增，第一方面，不如第二方面易奏成效。可是社會主義者本身卻漸漸和德國政府接近。這是怎樣造成的呢？

當社會主義在一八七〇至一八八〇年間開始發展時，不但在理論上和原有政體不能相容，而且自己聲明和一八七一年法國的社會革命運動一致。卑斯麥看到這種運動的危險，設法要使牠消滅。他一方面盡力取締社會民主黨和該黨做成的各種自由工會，同時用社會立法來博得工人對原有政府的好感。(註三) 父惠主義 (paternalism) 雖然防止不了社會主義的發展，卻足以防止拿不定主意的工人趨向社會主義，這無形中減低了已經附從社會民主黨的工人中革命份子的勢力。這種辦法使無產階級與政府間發生從來沒有過的經濟和政治上的接觸，這種接觸的效力，我們可以從以後無產階級對政府的態度中看出來。

此外，政府還設法用調解的方式來防止僱主和工人的糾紛，但這種辦法不得大多數民衆的贊同。

僱主自己的活動，比政府的調解還有效。僱主們最初雖然反對和工人訂立工資的協定，他們以後漸漸感覺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糾紛和簽訂長期的工資協定，可使生產較有規律，可使將來計劃較有把握。

一種比較直接的防止工人受社會民主黨和工會操縱的方法是創立或贊助注重基本的國家統一和僱主與工人間共同利益的工業團體。這類團體中比較重要的有天主中心黨所組織的各種基督教工會。(註四) 赫盧

——鄧克爾 (Hirsch-Duncker) 所組織其經濟和社會計劃與基督教工會相似的工會，(註五) 也很重要。

創立工業團體的問題則發生的時候，社會主義者曾表示重大的恐慌。他們恐怕這類組織要使勞工們的興趣集中在工資的增加上，和在現有社會制度中經濟地位的改進上，而不願對現有制度作大規模革命的奮鬥。可是到一八七五年兩個社會主義的團體組成社會民主黨之後，他們決定扶助這類工業團體的發展，利用這類團體來做社會主義的訓練的根據。此外，他們還贊助工人用罷工來作改良現狀的利器，因為一切工人和僱主間的紛爭，都可加強工人的自信心和階級意識。一八七八年對自由工會和社會民主黨的取締，反使這種革命的概念在工會中得以保存。當一八九〇年反社會主義的法律過了限期，各自自由工會改組的時候，關於工會的概念，看來還帶有革命的色彩。一直到後十年間這類工會的性質纔很明顯的改變，因為那時隨着德國工業的發展，工人可以沾著一部份的餘利了。(註六)

在各種自由工會當中，這類改變從好幾方面表現出來。牠們自己當中在思想上和改革上都漸漸有與比較激烈的社會民主黨脫離的傾向。這種團體繼續的反對用罷工來達到革命目標的政策，後來連比較大規模的純屬經濟性質的罷工，也不贊同。

各團體單獨用所謂工資協定來避免罷工的嘗試漸多。一八七二年印刷工人，就試用這種方法，定期為三年，會引起社會主義者強烈的反對。社會主義者認這種舉動為階級間的合作，會使工人不願再作革命的奮鬥而在思想上和現有制度妥協。可是其他工會紛紛仿行這種工資協定的辦法。一八九〇年各工會恢復以後，一般工人

不顧社會民主黨的反對，都採用這種政策。到了一九一四年，這種辦法，已成爲定規了。

消費合作原是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七〇年間胡伯爾（Huber）非發爾（Peiffer）和蘇爾齊·德烈虛（Schulze-Delitzsch）領導下的合作運動中的一部份。這種合作團體，起先純粹是中產階級的組織。一部份因爲社會民主黨與自由工會被取締的關係，到一八八〇至一八九〇年間在薩克遜尼地方乃有完全爲工人的消費合作團體出現。這類工人的合作團體最初隸屬於蘇爾齊·德烈虛（Schulze-Delitzsch）合作組織內，後來被指爲傾向於社會主義而受排斥在一九〇二年間有九十八個團體脫離中央組織。第二年他們自己另外合組一團體名叫德國消費合作中央總會（Zentralverband deutscher Konsumvereine）這種組織和自由工會有密切的關係。在一九一三年間，他們還合組救濟會。這總會的發展很快，至歐戰爆發時會員人數在一百萬以上。除此之外，還有些工人的合作團體仍然隸屬於蘇爾齊·德烈虛組織的工會聯合會（Allgemeiner Verband）中。這種工人合作團體本來的目標是要幫助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作經濟上的奮鬥，尤其是在罷工期內作公會的後援，可是受了勞工運動其他方面所發展一種普遍特性的影響，牠們漸漸變成一種組織，專事低價將貨品賣給工人們，助他們在實際上得到工資增加的好處，使他們對現有狀態較爲滿意。

總括起來。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十年間德國資本主義的客觀狀態使勞工階級中較有技能和較善於組織的一部份可以提高或最少能維持本身的經濟地位。普通一般經濟狀態的良好，足以阻撓社會民主黨和自由工會以前的革命宣傳的效力。（註七）社會主義化的工會，也漸改變已往的態度，慢慢的變成與一向根據現有社會經

濟制度來活動的非社會主義工會一樣了。(註八)

歐戰的爆發，證明工人階級中的「公民訓練」已經成功。全國看來是一致的。所有工人團體，一致擁護祖國，(註九)可是少數堅持他們對革命理想信仰的工人，又再開始活動。在這種活動中，他們更得着時勢的幫助，因為歐戰繼續下去，一般工人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劣。在各工會當中，以金屬工人的團體最強，最明顯的表現出勞工階級的不滿。在大戰期內金屬工業是主要的工業，金屬工人的精神，關係經濟、政治、和軍事二方面至大。金屬工人的團體中「反對」的趨勢在大戰的初期就已經形成。(註一〇)可是他們的目標，還未十分明顯。對戰爭不滿意所引起的結果，一大部份僅是一種和平主義，就是只希望戰爭停止，不一定要推翻原有的政體。這類「反對」的份子和獨立社會黨會有密切的關係。此外，還有人數不多而很活動的斯巴達卡斯(Spartacus)團體，他們一向與布爾薩維基(Bolsheviki)有密切的聯絡，所倡口號是「將帝國主義的戰爭變成內戰。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獨裁政體。」他們要和平，不是當時歐洲各國政府間的和平，而是勞工階級推翻這些政府以後的和平。這部份人雖屬少數，卻是唯一出來明白主張推翻原有體制的。他們可以算是現時共產黨的先驅。

「反對」派在大戰中曾鼓動起幾次罷工風潮，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九一八年正月初旬的那一次。這回牽涉全國，罷工人數在百萬以上。柏林中央罷工委員會提出幾個政治上的條件，但不是革命的性質。政府得了社會民主黨和自由工會領袖的協助，將這些工潮壓下去，許多罷工工人被遣到前線去。同時魯頓道夫(Ludendorff)一九一八年春季進攻的準備，和大戰初期的勝利使一般人希望德國可以得到勝利的和平，進攻的最後失敗，和

着德國軍隊因協約國軍隊連續進逼的後退，遂將最後戰利的希望打消。經濟、政治和社會上的分解同時發生，所有擁護政府的政黨，從社會民主黨到極端的國家主義黨都竭力要挽回頹局而終歸無效。社會民主黨中領袖，爲防止這種崩潰起見，甚至在革命的前數星期出來主張維持君主政體。

自由工會的領袖自然和社會民主黨一致力使工人保持和平。至一九一八年秋間當軍事的潰敗無法避免，工人的過激化進展很快時，僱主們開始懼怕有革命的危險，這場革命不僅是政治的，而且是社會的和經濟的。德國工業界要人雷差博士（Dr. Reichert）描寫當時的狀況如下：

實際上在十月初間局勢就已經很明顯。問題是工業怎樣可以得到挽救？還有怎樣可以從將要牽涉到各方面經濟生活的社會化，國家公有，和快要爆發的革命中，救拔僱主們？看來只有勞工階級佔勢力。從這種事實得來的結論是：因爲目前一般不安定的狀態和國家與政府權力的衰落，工業界可以聯絡的唯一有力份子當爲工人，就是工會。（註一一）

在這種狀態之下，工業界很明白的要和工會領袖——尤其是自由工會的——成立一種協定。這些工會既有和原有政體還有相當聯絡，一種給工人們相當的權利使他們與工業界合作的協定，自然不難成立。這類協定中最重要部份是僱主承認工會爲代表工人的組織，但不純正的（Yellow）組織要除外；僱主們對工會的組織不加妨礙；成立工資的協定；僱主和工人間發生糾紛時，工人不得罷工，僱主不得將工人解僱，由雙方推舉同樣人數組織調解委員會負責調停；工作介紹機關由僱主與工人雙方共同辦理。（註一二）

工會首領和社會民主黨的努力終歸無效，革命最後還是爆發。在每個城鎮、或村莊中，以及在軍隊中，先後成立工人和軍人的評議會來執行政府的職務。工人中的革命份子——斯巴達卡斯(Spartacists)派——和獨立社會黨的左翼，想利用這些評議會來作建設一個與蘇俄相仿的無產獨裁政體的工具。社會民主黨看到這些評議會的危險性，同時自信甚得人心，立將大多數評議會收歸掌握，將牠們變作沒有多大害處的組織，將牠們以前獲得的政權，移歸臨時政府。臨時政府中一切行政上的職能，仍由舊有人員經手辦理。用這種辦法對付本來在社會民主黨或中產階級份子手裏的評議會，自然成功；但對付在過激份子手中的評議會，有時就會遇着反抗。在過激派手中的評議會，有幾次曾設法成立一個無產階級的獨裁政體，可是這種嘗試，都被臨時政府得了資產階級和反動軍隊的幫助平止了。

和壓止過激份子建立蘇維埃式政府的工作並行的，還用各種經濟的和社會的辦法來安定工人。無論是政府中的公務員或是工業中的職工，一齊實行每天八小時工作的規定。爲防止罷工起見，政府正式承認僱主聯合會和各工會所會同商定的（工人協會）(Arbeitsgemeinschaft)政府、工會、和社會民主黨的報紙都一致主張新政府成立以後，一切罷工都與工人的利益有害。卻與反革命份子有利。在遣散退伍的士兵時，也竭力避免各國在同樣情形下所經過的危機，在最短的時間中，將幾百萬的退伍兵一齊擠回收容他們不下的工業中去。

一部份因爲繼續被封鎖的關係，經濟狀況一天比一天壞。新政府並沒有設法消滅資本主義，最低限度連主要工業的社會化也做不到；他們反而取締各種工人和軍人的評議會，壓逼鼓吹，或實行革命的人，同時又宣佈召

開不但包括一切資產階級份子，而且事實上要被這些份子把持的全國大會（National Assembly）。全國大會的召集，激起政治上和經濟上罷工的爆發，所要求的條件是工業由社會公管，和無產階級獨裁政體的成立。允許主要工業社會化的法律雖經通過，可是任何工業都未實行社會化，還有工人們對管理工廠和礦業的要求，促成有名的工作委員會法（Works-Council Law）。根據這項法律的規定，每工廠成立一個工作委員會，會員由工人選舉。這種委員會與戰前強逼式的工作委員會比較，唯一的優點就是有任免工人的權力。就是在這種委員會中，權力也不完全靠法律的地位，而一大部份要靠工人的魄力與進取性。

各次發動的被壓止，使革命運動失去很多重要的首領，許多革命的組織都被解散。此外，工作委員會的成立和社會化的可能，使工人們希望總有一天社會主義會得到實現，不像俄國那樣用暴力，而是用一種和平手段而博得的。和約簽字以後，封鎖政策跟着在一九一九年取消，食料的狀況較前進步，國內通貨膨脹與其他因素合在一起，做成一時的繁榮。

在這時期中工業界的經濟和政治勢力也同時增強。工業界努力增加的證據之一，是僱主們拒絕繼續他們在一九一八年間爲自存計，不得不接受的工人協會（Arbeitsgemeinschaften）到了一九二二年，他們的勢力，足夠取消這類協定，每天八小時工作的規定，在各工業和政府的機關中，也漸漸被人破壞了。

可是通貨膨脹起先雖然對生產的復興和職業機會的增加大有幫助，但膨脹得太快不久便發生不好的影響。在一九二三年十月間危機已達極點，共產黨和社會黨左翼的政府在薩克遜尼地方成立。這次事變雖被政府

軍隊壓止了，勞工階級中的革命精神因此廣播。在一九二四年五月的選舉中，共產黨所得票數竟增到四百萬。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冬間金融復歸穩定，道威斯計劃（Dawes Plan）的實施，再加上工業的合理化又引起普遍的經濟危機，這次危機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終止。真正的工資和戰前的程度比較可算很低，而物價卻很高。雖然工資在次年間略有增加，可是還沒有到戰前的程度。同時工業的合理化從一九二四年春季起實行，引起嚴重的和長久的失業。這種失業狀態的危急，在德國史中可算空前的第一次。失業的人數的增加不已，直到一九三二年一月，失業工人多至六百萬以上。

另外一種使人對目前政體失去信仰的因素是每天工作八小時的規定，在多數工業中已成虛文。這項法律原被視為一九一八年革命的一種重要的成績。勞工速度的加快，原為一九二四年以後工業合理化程序中的一部份，也是增強一般對現有政體消極態度的一種因素。戰後危機的嚴重與持久，加以改進的無望，使許多工人對目前政府改良現狀的能力失去信仰。這種對現有制度信仰的消失，使共產黨得利用時機來將工人們消極的態度變為積極的要推翻現制建立無產獨裁政體的運動。他們在自由工會中從事活動，將本來沒有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成一「反對」派。這種勢力的存在，表示勞工階級中已經有一部份人脫離現政府的關係而改向國際革命的勞工階級與蘇俄方面聯絡。

在另一部份工人當中，這種不滿還沒有達到那樣高的程度。還有信仰法西斯主義的勞工團體，也極端反對現時狀況和現政府的形式而希望有一種改變。可是他們所希望的不是資產階級國家政府的廢除而是政治形

式的改變。有組織的工人雖然多數對自己現時經濟和社會的狀況不滿，但沒有達到思想上脫離現體制的程度。一個原因是有些工人的經濟地位比較優良，成爲工人中的貴族階級；另一個原因是平時政府、資產階級、工會領袖、各政黨、教會、報紙、文化團體、和運動團體等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給予工人們的影響太深，這種影響的目標，是要在勞工階級中培養公民忠於國家的精神。

在今日的德國中，許多改良的辦法仍然有效。各種社會保險制度直到現時還存在。因爲一九二四年以來大規模的失業使一般人感覺到不滿，政府最初頒發失業的救濟金，後來改用失業保險制度，這種辦法一直沿用到現在。政府經費支拙的結果，減去不少國家失業的保險和其他失業的救濟。這又足以減弱無產階級對現有政府的忠誠。

除了這種辦法以外，資產階級、政府和各工會領袖對利用罷工來擾亂經濟生活的防止政策，日益強硬。在一九一四年以後的形態中，任何罷工的爆發，都是勞工階級中革命份子勢力加強的表示。防止罷工的方法如工資協定等，前面已經說過，這裏不再贅述。金融穩定以後，對勞資糾紛強制的調解漸見諸實行。（註一三）有好幾次工人堅決反對這種調解委員會的判斷，以至激起所謂「非法」的罷工，反抗的對象不僅是調解委員會的判斷，連他們自己工會的領袖，也在被反對之列。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各種組織和法令，在德國漸漸發展成一個網狀的形態來對抗戰後日益強烈的不良的經濟趨勢。這種政策能否成功，根本上要看現有政體是否能超脫工人們現時的困厄。純粹經濟上的不滿意不一

定就引起反政府和反資產階級的心理，這一點我們已經表示過；可是在戰後的德國中整個經濟上和政治上形勢的緊張，足使每經過一次經濟危機，革命份子反對現有政體的力量加強一次。原有對經濟狀態的不滿其僅僅量的增加，就足使多數工人心理中發生質的變化。這種質的變化的表示，就是本來不強的國家情感的減弱，和已經存在的革命精神的加強，直到這種革命力量變成一種舉足輕重的勢力。這種反應，我們從共產黨和法西斯黨勢力的消長中，相當的可以看出來。

(註一)關於社會主義的歷史，參看 Franz Mehring 的標準作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共四卷，一九二一年第四次版)。

(註二)關於德國社會黨工會的歷史，參看各種標準著作如 Siegfried Nestriepke, 的 *Die Gewerkschaftsbewegung*, 三卷 (1919-23); Zweigs, 的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reien Gewerkschaften*; Theodor Cassan 的 *Die Gewerkschaftsbewegung, ihre Soziologie und ihre Kampf* (1926). 最後一種爲「左派」社會民主黨員所作，提出許多問題來討論，從我們這次研究的觀點看來很重要。此外參看 Jacob Reindl 的 *Di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ewegung. Koalitionsrecht und Koalitionen der Arbeiter seit der Reichsgewerbeordnung 1869* (1923).

(註三)在一個談話中，Dawson 這樣表示他的政策：『我的意思是要收買勞工階級，或者可以說，將他們拉過來使他們覺得政府是一種社會的組織，爲他們而存在，關心他們的福利。』見 Dawson 著 *Modern Germany*, II, 349)

(註四)參看 Müller 的 *Die christliche Gewerkschaftsbewegung Deutschlands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Bergarbeiter- und Textilarbeiterorganisationen*; 此外參看 *25 Jahre christlicher Gewerkschaftsbewegung (1899-1924)* (基督派工會所刊行)

(註五)參看 Gustav Hartmann, 的 *Fünfzig Jahre deutsche Gewerksvereine (Hirsch-Duncker) 1868-1918 (1920)*.

關於『公司的工會』參看 Karl Jorwerck 的 Die wirtschaftsfriedliche Arbeiterbewegung Deutschlands in ihrem Werden und in ihrem kampfium Anerken-nung (1927); Opolant 的 Die wirtschaftsfriedliche Arbeiterbewegung Deutschlands: Werden, Wesen und Wollen der gelben Organisationen.

(註六)關於這種事情發生的力量與形式的分析參看 Mausa Zarehi 的 Die ökonomische Kausalität des Sozialpatriotismus; Cassan (書名見前)此外也參看 Paul Frölich 給 Rosa Luxemburg 的 Gesammelte Werke 所作的引言見第三卷第一頁至九十頁。一九三〇年。

(註七)參看第八章。

(註八)我們不要忽略了勞工階級中一大部份就是沒有技術沒有組織的份子——得不着德國工商業發展所引起的經濟繁榮多少好處。他們雖然大致上沒有聯絡，可是變成社會民主黨左翼的根據。這派的領袖是 Rosa Luxemburg 與 Karl Liebknecht 後者是共產黨的創始人。

(註九)見 Walter Kiegel 著 Die Soziale Hilfsarbeit der deutschen reinen Gewerkschaften während des ersten Kriegsjahres (1917); Paul Umbreit 著 Die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 im Weltkrieg (1917); August Winnig 著 Die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 im Kriege (1917)。

(註一〇)關於這項『反對派』的發展參看 Richard Müller 著 Vom Kaiserreich zur Republik,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ären Arbeiterbewegung (1924); 此外也參看 Emil Barth 著 Aus der Werkstatt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1919) 兩個著者都是『反對派』的主要組織人。

(註一一)採自德意志鋼鐵工業聯合會秘書 Reichert 博士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在 Essen 的演講詞。見 Nestriepke 書中 (書名見前)第二卷第四十六頁。

(註一二)見 Hoff 著 Der Aufbau der Arbeitsgemeinschaft (1920)

(註一三) 專爲解決勞工糾紛的法庭，漸次成立，分佈成網狀。參看 Tadesohn 與 Pottorf 著 *Rechtssprechung des Arbeitsechts* 1924-1925; E. Nilsbach 著 *Deutsches Arbeitsrecht*; W. Silber-schmidt 著 *Das deutsche Arbeitsrecht* (1923); Walter Kaskel 著 *Das neue Arbeitsrecht* (1920)。

第二章 中產階級 (Mittelstand)

介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中間，有可以統稱作中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各種社會等級。這種階級包括無產階級的上層，資產階級的下層，以及一大部份地方、邦和聯邦的官吏。因為他們所處地位的關係，這種人可以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仇視不至過於明顯。

中產階級本來包含各種社會和經濟上的等級，工業革命以後，更增加了幾種性質和原有份子不同的新階層。我們可以將他們分類如下：

A. 舊有的中產階級

1. 手工藝匠。
2. 小規模的商人和小鋪掌。
3. 城鎮和鄉村中的業主。(農民在第七章中另外討論。)
4. 獨立的專業者。
5. 靠租金或養老金過活的人。

B. 新興的中產階級

1. 非獨立的專業者。
2. 國家、邦、和地方的公務人員。
3. 各種在辦公室中工作的書記等。
4. 工人頭目或工資較高的工人。

5. 靠租金或養老過活的人。

第一種人在外表上的獨立性，為第二種人所不及，第二種究竟不過是僱員或收入較豐的工人，舊有中產階級反映着建築在小規模的生產和地方經濟生活上的舊式社會；新興的中產階級純粹係現代大規模工業發展的產品。手工業為舊有城鎮內中產階級的精華，以前曾組成有力的行會（guilds）。他們看來好像享有經濟上的獨立，與工業中的無產階級不同；雖然他們在經濟上往往還比不上工業中的無產階級。他們的利益有些和大的商業的相同——如低利息的貸款，賤價的原料，低廉的工資等。在這些利益上他們和無產階級發生衝突，自視與資產階級一致。可是他們所着重的不是大資本的累積和自己商務的大擴充，而只要自己經濟上能夠自給。這又使他們和大商業衝突，因為大商業從大規模生產的競爭中，有摧殘手工業的趨勢。因此各行手工業為經濟獨立而奮鬥的目的，便在維持舊有經濟生存的完整，藉以保有在社會上介乎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間的地位。

小鋪掌的經濟和社會的地位與手工業的相似。他們也竭力在愈來愈不容易得到經濟上安全的世界中，求得經濟安全的地位。舊式的專業份子——許多律師、醫生和牙醫，都屬於這一類——的事業以個人為單位。他們

所受的教育較高，因此他們的聲望，也在普通一般中產階級之上。

房業主是另一種重要的中產階級。他們和上述的各種人不同的地方是他們不從事於生產的活動，只靠房業所得的收入來維持生活。在德國城市中的不動產，不集中在大公司的手中，普通擁有小量資本的人，常倚靠一種發達完善的貸款辦法購置房業，得到很少的收入就覺得自足。（註一）所以這種應當歸入中產階級而不應當歸在資產階級內。

收地租的人（Rentiers）在大戰以前頗居重要的份子。他們也同樣的靠產業的收入來生活。他們收入的數量和在社會上的地位，也使他們歸入中產階級之列。

所謂新興的中產階級連經濟獨立的形式都沒有。在這種階級中以做辦公室中書記工作的人數為最多。最近十年間他們人數增加的速度，比工業中的無產階級還要快。這類僱員與工業中的無產者有好幾點區別。他們通常多出身於中產階級，或工資較高，能供給子弟比較優良教育的勞工階級的家庭。此外，他們算是「純綉子」（white collar）的份子，因此他們的生活在社會上也比較優越，與勞力的工人顯然不同。因係中產階級份子，他們感覺到社會和經濟方面有較好的上進的機會。他們對僱主和自己間的差別的感覺，沒有勞工們那樣敏銳，大致上對僱主比較忠實。在大戰以前，他們的經濟地位常比勞工階級勝一籌。大戰以後中產階級的「無產化」進展得很快，結果使這種人大多數的地位衰落，縱然不比勞工階級更壞，最少也和勞工階級差不多了。

拿破崙時代德意志對行會生產限制的取消，曾給手工業一個重大的打擊。（註二）反動時代對這方面沒有

改變，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手工業份子也有一部份參加。「手工業大會」(General Congress of Crafts-men) 在七月十五日 (Allgemeiner Handwerker- und Gewerbekongress) 舉行，地點在曼因河上的法蘭克福特城 (Frankfurt am Main)。在他們的要求中，有一項是要對機器徵收重稅。

革命失敗以後，普魯士當局爲安定手工業起見，叫他們派代表出席舉行一個會議。結果產生一八四九年十一月九日的手工業改革法，把他們許多的要求，都包括在內。(註三)這項法律的功效雖然不大，因爲適值經濟繁榮的時期，手工業在革命勢力瓦解後幾十年間，對政府漸漸發生好感。

德國一八七一年以後大規模生產的猛進，大有促成舊式中產階級的崩潰的趨勢。爲防止德國社會快要分成兩種階級的趨勢起見，政府試行恢復行會制度中的一部份藉以幫助手工業。根據一八六九年的法律，行會只能算作私人的組織，結果牠們的發展很慢。(註四)可是情勢因受了藝匠們自組團體的催逼而改變，各種改善的辦法在一八八一年通過。行會又變爲「公法的團體」(Öffentlich-rechtliche Körperschaften) 牠們獲得相當的法律上的權利；牠們可以組織本行中裁解的法庭；各行會還可以組織成一個系統。最末，他們還有權通過關於學徒制度的規約。三年以後有幾種不隸屬於行會的僱主不得收受學徒。在一八八七年的新規程中，行會的勢力更增強了許多。

再後，在一個地方若是本行中大多數份子通過強逼參加行會，所有藝匠必須作行會會員。這種辦法一直到現在還未改變，同時由各行會合組手工業會 (Chambers of Artisans)，性質與商會和農會相似。

除此以外，還有其他增強手工業經濟地位的辦法，最重要的是手工業合作團體的成立。（註五）這種合作社的鼻祖是自從一八四九年以後，一向在這一方面很活動的蘇爾齊德烈虛當一八八三年蘇氏逝世時，合作總聯合會（General Federation of Cooperatives）共有三、六八八團體會員，個人會員總計約一、二〇〇、〇〇〇人，營業資本達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營業數目在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以上。（註六）

直到一八八三年政府對這種合作事業還沒有直接的幫助。一八九八年普魯士政府組織中央合作銀行，供給各合作社利息很微的貸款。但合作總聯合會的首領，一向遵守騷氏（Schulze-Delitzsch.）的主義——一切以自助為原則，不受政府的援助不和普魯士中央銀行合作。同時有許多藝匠——尤其是較貧窮的——正需要低利息的借款，願意接受政府的幫助，於是脫離原有的團體，另外組織德意志手工業合作中央聯合會（註七）（Hauptverband deutscher Gewerlicher Genossenschaften）普魯士銀行又拉了許多手工業會入股，藉以增強自己的地位。（註八）

藉上述各種辦法，藝匠和政府兩方面都能夠暫時延遲手工業的崩潰。雖然各種方法不一定隨時能夠辦到，在一八七一到一九一四年間手工業藝匠的數目還不至於大減。因為大規模的工業在一方面固然摧殘了不少手工業，但在另一方面卻替小規模的生產增加了不少活動的地盤。小規模的生產，往往是大工業成功的一種輔助。還有藝匠親身的視導與訓練，可以造就許多學徒，學成後能在大工業中做技術的工作。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所有這些因素，大有使手工業在經濟上覺得滿意的趨勢，這種對現狀的滿足，成為手工業對現有社會制度和現

有政府忠誠的根本。可是手工業卻逐漸失去了在經濟上的獨立地位，慢慢要受商業資本的支配了。（註九）

小商人和小鋪掌們在這時期內的遭遇，沒有手工業那樣壞，因為零碎買賣集中的進展，不如工業的進步那樣快。（註一〇）可是大百貨商店的發達，使小鋪掌們時時刻刻的在焦急。連鎖商店（Chain stores 譯者按即開許多商店經營同樣貨物而受總店管理者）的關係並不重要。小鋪掌們反抗的對象，主要的是百貨商店，反抗的結果，全德各邦政府多向百貨商店徵收捐稅。一九〇九年六月七日通過的一條聯邦法律給政府以節制百貨商店營業活動的權限。同時小鋪掌對批發商人的倚賴，使他們失去獨立性的危險更加嚴重。於是小鋪掌也和手工業的命運一樣，被扯入商業資本勢力範圍之下，受商業資本操縱。零售商，試組合作團體來對抗，但收效很少。

房主的地位所受危害，不如手工業和小鋪掌那樣大。（註一一）因為多數房屋會經作借款的抵押品，所以房主們變成要倚賴銀行的資本。多數房主隸屬於各種不動產的會社，合組成德意志城市房地產主中央聯合會（Zentralverband der städtischen Haus- und Grundbesitzervereine Deutschlands）此外，房主們還有地產業權利不動產借款保護會（Schutzverband für Grundbesitz und Realkredit）的組織。

專業份子的經濟地位。雖然還沒有衰落的傾向，生產狀況的改變也足使他們的獨立性減少，倚靠政府或大商業的成份增多。

中產階級自視為社會中的愛國份子。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社會和經濟的制度一有變遷，他們在社會上頗為優越的地位，比資產階級的地位，還容易遇到減低甚至破壞的危險。他們覺得自己成一特殊團體，（一個『無

階級」的團體，不但社會的地位比普通一般工人高，有的連經濟的地位也較普通工人優越。造成這種趨勢的一種影響，是中產階級——尤其是舊有的——能夠永遠維持下去，所吸收的新份子很少是從下層階級出身。一個工廠中的工人要擢進這種階級中很不容易。他們與統治階級在一起，自命為德意志文化的主要保護人，不但在各國的嫉視中保護德國文化，還要使其不至因勞工階級中「不愛國」的國際社會主義份子勢力的增強而喪失。這種自視，為在一般民衆之上享有特殊的權利，負有特殊使命的感覺，就是中產階級有力的和狂烈的愛國心之根源。

大戰期內勝利好像就在目前，使他們的愛國心更加強烈。他們和政府的關係，在經濟上的依賴和組織上的接觸兩方面都比較以前更密切。合作團體和各種手工業的組織都變成半官式的團體，接受供給戰爭用品的合作。他們腦中從來沒有想到有戰敗的可能，因為他們對德國將來的信仰心是不能動搖的。德國每得一次勝利，他們的信仰心便加強一點。

戰事的慘敗與革命的爆發，毫不容情的打破了他們的幻想。中產階級大部份一時不知所措。整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系統，以及德意志文化上的成績，好像都要一齊崩潰。

新政府設法最小要獲得中產階級消極的援助。(註二三)牠並沒有擾亂到中產階級所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反而保護舊有中產階級存在的根據，(私有財產的權利)和維持歐戰而式微的整個中產階級的經濟組織制度。新政府更進一步想使中產階級份子贊助全國大會，反對工人建立蘇維埃獨裁政體。這些工作，就大體上

說算是成功。在新興中產階級中，行政人員固默認新政府，因為新政府與舊日帝國政府一樣的支發公務員的新金。在辦公室中做文書工作的人與工人的接觸較前密切。公務員和做文書工作人員所組織的工會發達得很快，漸漸加入社會黨，基督教和何虛鄂克爾（民主黨的）的工會團體中，於是又增加了擁護新政府的勢力。

可是通貨膨脹使舊有的中產階級受重大的損失。依靠租金或養老金過活的人，收入本來不多而且數目也有一定，幾乎全體被淘汰。房租的規定還是與戰前的數目差不多，在通貨膨脹期內房東們連維持生活也非常困難，往往要兼做其他工作纔能過活。因為通貨繼續膨脹，鋪掌們不能用從顧客手中收來的跌價的紙幣來補充貨物。手工業購買原料所費本錢，也往往超過他們售出產品的收入。此外，在帝國時代辛苦經營而來的整個中產階級的合作事業，完全失去效用。新興中產階級——中產階級中的非獨立份子——所受損失較少，因為他們和工人一樣，薪金的數目隨往馬克價的低落而增長。

在通貨膨脹期中，舊有中產階級縱然沒有整個失去中產階級的地位，也有一大部份瓦解了。（註二三）這當然使他們和政府發生劇烈的衝突，他們對政府的抨擊，是犧牲中產階級來替勞工謀利益。在前章中我們曾經說過，通貨膨脹在德國的工業中做成一種人為的繁榮，使在街上流落的失業工人能恢復工作，因而防止過激主義的傳播。政府願意犧牲缺乏組織和實力的中產階級來安定工人。這到底是否故意，就我們的問題而論，卻不關重要。要緊的是通貨膨脹真正會做成這樣的結果。我們現在就可以明白中產階級對政府的厭惡為何這樣深，以及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三日的選舉中為何開始擁護法西斯黨。

直到通貨膨脹停止以後，中產階級纔能認清他們的地位。在一九二四年末，他們發現自己的資本，只有戰前十分之一。（註一四）可是新經穩定的金融，成爲舊有中產階級局邦的經濟復興的根據。同時合作事業的改組，給他們一種更特殊的中產性。一九一四年以前成立而在大戰中逐增勢力的整個行會和手工業團體制度，繼續存在。他們和全國合作事業聯合會在一起組織成一個總聯會叫作德意志全國手工業聯合會（Reichsverband des deutschen Handwerks）在大戰和通貨膨脹期內曾大受損失的房業主，在金融穩定後所得好處還比手工業爲多。房租的規定在通貨膨脹期內低到荒謬的程度，現時得了政府的允許，漸漸提高到超過戰前的水平線了。

舊有中產階級雖然暫時得到些好處，但目前危機的嚴重，使他們的經濟地位感到空前的大危險。中產階級中各等級，愈來愈要仰靠商業和銀行的資本，這種歷程，他們無論如何反抗，好像總無法避免。

新興的中產階級完全依靠資本和政府；他們無非是受薪金的僱員。因爲地位的關係，他們所受這次危機的損失和勞工階級的情形一樣。可是因爲他們的組織較薄弱，他們反抗的能力還不如勞工。他們不但反對社會聲勢的損失，同時還反抗他們本身「無產化」趨勢的進展。他們對現有議會式政府的信仰減低很快，可是又不願承認自己在社會上與勞工平等來作共謀解放的根據，而堅持要恢復他們在社會上優越的地位。

因此新興和舊有兩種中產階級都不傾向共產黨，而傾向提議要引導他們擺脫「共和的束縛」回到他們希望中的樂土去恢復在社會上的優越地位的法西斯黨，因爲法西斯黨答應給他們一個新世界，一個沒有國際

社會主義，沒有勞工高於一切的現象，和沒有猶太人的世界。(註一五)

法西斯運動中熱度超過沸點的國家主義，大部份係對『無產化』思想上的價補，用國家主義的語調表現出來。這種對自己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反抗是否能夠限於現有國體的範圍內，又他們地位逐漸的無產化是否會使他們加入無產的反叛，要等將來纔能決定。

(註一) Mittelstandsjahrbuch, 1927.

(註二) 關於手工業的歷史，參考下列各書：

Goldeschnidt, Die deutsche Handwerkerbewegung bis zum Sieg der Gewerbefreiheit (1916);

Bernhard Lehnert, Das deutsche Handwerk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1926);

Günzel, Die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Handwerkerorganisationen seit der Mitte der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註三) 參看 Hugo Wendel 著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Freedom in Prussia, 1845-1849 (1918).

(註四) 見 Werner Sombart 著 Gewerbesen 第二卷 (1929).

(註五) 參看 Robert Denner 著 Das deutsche Genossenschaftswesen.

(註六) 見 Ernst Grünfeld 著 "Das Genossenschaftswesen des städtischen Mittelstandes" (in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und ihre Führer (1925) Vol. VIII(181 ff)

(註七) 見 Wilhelm Kulemann 著 Die Genossenschaftsbewegung, 第二卷 (1922-25).

(註八) 作普通參考，見 Hugenberg 著 Bank-und Kreditwirtschaft des deutschen Mittelstandes.

(註九) 參看 Alfred Striemer 著 Zum Kampfe um die wirtschaftliche Selbständigkeit der Klein-und Mittelbe

triebe(1914).

(註一〇)參看 Johannes Wernicke, 著 Warenhaus, Industrie und Mittelstand (1911); 荷 Biermer 著 Die Mitte

Standsbewegung und das Warenhaus.

(註一一)參看 Alfred Baron 著 Der Haus- und Grundbesitzer in Preussens Städten einst und jetzt (1911).

(註一二)參看 Thomas 著 Was bringt die sozialistische Republik dem Handwerker?

(註一三)參看 Die Verelendung des Mittelstandes, herausgegeben vom Bayerischen Statistischen Landesamt;

荷 Heinrich Beyhien 著 Die Lage des gewerblichen Mittelstandes (1922).

(註一四)見 (Ernst Grünfeld (書文見前) P.200.

(註一五)關於中等階級與法西斯黨的關係參看第八章。

第四章 擁有地產的貴族

大規模的田產多數隸屬於貴族，佔全德意志可以種植的地總面積百分之二十以上，在埃爾比河（Elbe）以東，竟達百分之四十以上。（註一）貴族們所擁有地產的實在數量，比這種數目還要大，因為很多大地主將他們地產的一部份劃成小塊，分租給附近農民。（註二）

從歷史上看，擁有地產的貴族原係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份子，一向是和資產階級實現公民理想的奮鬥，處在相對地位的一種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勢力。封建主義不知有所謂公民；只知有主奴和君臣的分別。資產階級所反抗的就是這種經濟的和社會的制度，他們想將資產階級的社會來替代這種制度。因此自從資產階級起來以後，封建式的貴族地主曾經不斷的竭力反對整個資產階級的經濟制度和附帶的各種公民的概念。

資產階級最初利用專制的政體來推進自身利益，專制主義成立以後，貴族也同樣利用專制政府來保護自己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地位。在這時期中，貴族依附政府的一個大原因是政府中，還有封建的份子，使貴族地主們能夠保留許多封建的，資本主義以前的特殊權利。因此貴族們對政府的依附是「非公民」的性質，他們和政府的關係，無非是封建式的統治階級利用政府來行使統治其他民衆的權力。

除此以外，貴族地主們封建的靈魂，還沾染了資本主義的色彩。十八十九兩世紀是從封建的農業生產漸次

變成農業的資本主義的時期，這種歷程，在十八世紀以前就已經開始，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完結。貴族地主最少在他們經濟的地位上開始變成『公民』，這就是說，貴族地主們變成資本主義的經濟中的一部份。處在公民的地位，他們當然要發展『公民』的概念。因此在這時期，一直到二十世紀，貴族地主們的地位和態度上有兩種矛盾的成份，一種是封建的反對公民的；另一種是資產階級的，贊成公民的。

可是兩種成份都含有統治階級擁護政府的態度。在一八七〇年以前資產階級還是較弱小的份子時，貴族是在專制或半專制政體中的統治階級。一八七〇年以後，工業資本主義發達，貴族地主的產業也向資本主義方面發展，他們便變成和城市中資產階級並立的共同統治階級。這種地位一直維持到現在，雖然在一九一八年以後貴族們被剝奪去許多社會的和經濟的特殊權利。

在十七、十八兩世紀間貴族和政府的關係自然很密切。在這期間內貴族——尤其是德意志東部的——紛紛擴充他們的地產，農民大受損失，幾乎到了變成田奴或半田奴的地步。（註三）可是他們雖然這樣剝削農民，自己所負債務愈來愈重。一部份的原因是德意志一般貴族想模仿比較他們富有的法國貴胄的奢侈生活。到大弗烈得力（*Frederick the Great*）的時候，有些貴族已經窮到要出賣地產。

大弗烈得力施行所謂「地產組合」（*Landschaften*）（註四）目的就是要應付這種狀態。當時這種狀態，因戰事與外力的侵入而愈甚。在每一區中，貴族的一切產業集合起來組織一種借貸的合作事業，整個團體對合作所借的債務負責。這樣每個私人產業的信用都可以增加。同時又禁止出賣地產的一部份來償債，藉以防止

大地產的分解。可是購買新地不在禁止之列。

和這種辦法有密切關係的，是「產業世襲的制度。」（Fideikommiss）這包括在承繼遺產時有一定條件的地產，在承受時就規定不許出賣。這項地產，多屬於較高級的貴族。十九世紀間，資產階級設各種方法想取消這項辦法，可是這種辦法一直沿用到現在，而且這類地產的數量還不斷的增加。（註五）

這種辦法，顯然是要使貴族地主們集中起來，使資產階級不至於破壞他們的經濟地位。這使貴族們成立一條聯合的經濟戰線，反抗資產階級藉地產的吸收來侵入貴族的地盤。得了政府的幫助，普魯士貴族的經濟地位更加鞏固，實在比德國西部和南部的貴族強得多，在從封建式的經濟到資產階級的經濟的轉變中，他們的產業還得保存。這當然也不是普魯士王室所預料到的。從王室的觀點看來，最要緊的是維持半封建式的貴族來作半封建式政府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的藩障；因為普魯士的資產階級，還沒有發達到可以作君主政體主要根基的程度。

法國革命的勢力和拿破崙對德意志的征服自然要影響到德意志貴族的整個地位，因為拿破崙每征服一個地方，將農奴都改爲自由的農民。法國革命的影響在德意志西部與南部比較直接，比較強烈，同時這些地方的經濟生活狀況也比較進步，因此地產往往被農民分買。在東普魯士因為沒有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農民解放的實際結果反爲使貴族的地位加強。農民雖然已經從一八〇八年和一八一一年的命令中得到解放，貴族的反對和勢力，竟強逼政府指派一個由貴族組成的委員會來修改這項命令。貴族們居然能將整個問題攔起，直到拿破

崙傾覆，反動派得勝在一八一六年間委員會繼公布最後的命令，將農民的解放，變成增強貴族地位的手段。

一八一六年解放農民的命令（所謂 *Bauernbefreiung*）正式認可，一八〇八年和一八一一年給予農民以自由公民的地位。可是只有耕地超過某種面積的農民能夠繼續享有原來田地的一部份；同時為獲得這幅土地的享有權，他們還得繳納款項或將他物代替款項至數年之久。一向耕地不到規定面積的農奴田地盡被貴族沒收，變成一種新階級——沒有田地的農業無產階級。（註六）解放農民法令結果使普魯士貴族所得土地在，二五、〇〇〇、〇〇〇英畝（*acres*）以上。（註七）同時貴族們又霸佔現有的公地。這種轉變的結果，貴族們可以利用自由受僱的勞工來實行以資本主義作根據的大規模生產。這種新的生活狀況，漸漸在貴族當中養成資本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在一百年間改變了他們對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對政府概念的態度。

這種從封建的生產方式到農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轉變，更因國內外市場的開發而加快速度。農民田地更多被大地主資本主義的經濟所吸收。在這種吸收的歷程中，貴族們更得一種半官半私的貸款制度的幫助。據著名經濟學家余靈氏（*Sering*）的估計，普魯士的大地主從一八一六年到一八五九年間收買土地約在一六〇〇、〇〇〇英畝以上。

農業的技術，在這時期中進展很快。（註八）在前一世紀裏德國多數大學已經開設「農業」的科目，可是主要的目標在訓練官有農場的管理人員。第一個訓練私產農藝技士的農業專科學校，至一八〇六年纔由戴謬（*Albrecht Thaer*）在普魯士創立名叫王家農學院（*Königliche Akademische Lehranstalt*）志在改進生

產的農業會社的發達。亦與農業教育的廣播有密切的關係。一七六二年第一個會社在德靈濟亞 (Thuringia) 地方成立，不久同樣的團體，在各邦先後繼起。

我們已經說過，農民的解放造成一種倚靠替大地主工作來謀生的農業無產階級。在大地產附近居住的農民，也可僱來做額外工作。貴族地主爲要不感勞工缺乏，曾用兩種方法；第一是一八一〇年的「僕役法」(Gesinnungsordnung) 這種法令一直到一九一八年以前還是有效。所規定的按年訂立合同辦法，使田中的工人不能隨意離職，但僱主們卻可以任意破壞這項合同；第二是一八五〇年禁止工人罷工的法律，工人一切的組織都被認爲非法。最末，還有前世紀沿行下來的田莊地方政府制度 (Gutsbezirk)，給地主們以各種對管轄本區居民的權力。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時期內，貴族不但可以任意支配一種自由的勞工，(註九) 毫不顧其福利，而且還享有半封建式的對勞工的管理權，使勞工在地位和心理上都是一種附屬品。這樣做成一種不受外力的侵犯和戰爭的影響的半封建式的貴族地主，在和平狀態之下變成農業資本主義者，隨時可以操縱政府，造成上述在歷史上特殊的局面。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表示貴族雖然能夠繼續把持政府，但不能不對資產階級讓步。貴族不願失去代表他們利益的政府，或減弱政府的勢力，對德國統一的呼籲不感興趣。從經濟的觀點看，普魯士貴族對政治上的統一沒有特別的興趣，因爲他們與國內各方面的經濟關係不很密切。所有的共同利益，已經得關稅聯盟作保障。可是特

別因為普魯士的聲望日高，將要變成德意志的首領，他們對統一終於接受。又一八七〇至一八八〇十年間德國的農業只能勉強支持現狀，以農業為根據的貴族地主，不得不向政府請求保護，這足使他們更易於接受統一。美國和俄國輸入的食料，在德市場中爭將價錢減低來擴充銷路，（註二〇）使貴族們知道自己經濟的繁榮，以後要靠德國國境的四週建立一種經濟的防禦；這非得資產階級幫助，是辦不到的。這種情形一直到現在還不變，會使貴族在資產階級勢力日增的政府中，與資產階級發生密切的聯絡。此外，資產階級勢力日增的政府不只要注意維持德國農業的繁榮，而且還要保持農業上的自給能力作軍事的準備。（註二一）

德意志工業的發展，使逃到城市去的田工數目大增。為補救農業界勞工的缺乏，政府准許波蘭的農工按季入境。一九一四年間受僱的波蘭田工約有五十萬。此外，一九一一年保守黨（農業界的政黨）在普魯士議會中提出一個議案，曾經通過。普魯士政府即據以贊助大農業主獲得充份賤價的田工。（註二二）

正在貴族從政府的手中得不少好處的時候，資產階級的勢力隨着工業的發展而增強，對貴族在經濟上特殊的權利開始抨擊。卑斯麥下臺後，卡里維（Caprivi）繼任國務總理。卡氏得了國家自由黨的贊助，締結各種商務條約，完成一八九二年的稅則，犧牲農業的利益來增進工業的利益。農業界對這種漠視他們利益的辦法，異常憤激，結果在一八九三年成立農業協會（Bund der Landwirte）在這種共同動作影響之下，普魯士政府在一八九四年創立一種農會（Chambers of agriculture）這種辦法，經各邦先後仿行。這種農會係半官式的組織，目的是與現有的農業經濟社（Landes-Ökonomie-Kollegium）合作，對農業的幫助有很大的權限。（註二三）

一大部份是因爲農業協會努力的結果，一九〇二年的稅則被通過，農產品的關稅因而增加。這樣資產階級與貴族地主間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均衡得以恢復，兩種階級的利益都算獲得保障。眼看著社會主義發展的迅速，這種均衡的成立，實在是一種必需。（註一四）

可是這種資產階級與貴族間較前密切的聯絡，僅係一種互相關係的表示，這種關係自從一八七〇年以後就逐漸發展，一直到現在還繼續不斷。自從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間農業的危機發生以後，德國的貴族感覺到將農業的餘利來作工業、商業和銀行的投資，比較用來擴充田產獲利還大；同時資產階級中一部份人收買大地產，希望博得德皇的封誥，擢進貴族的行列；因此資產階級與貴族間的經濟關係愈加密切。（註一五）資產階級這種對社會地位上的野心，還可以從貴族男子與富商女子聯婚人數的增加表現出來。

一個增進這兩種階級間聯絡的有力因素，是大地產要做資本主義化的經營具有經濟上的需要。貸款和押款爲進行農業生產所必需，這種款項，當然要靠銀行界供給，銀行界對貴族地主經濟上命運的控制，也因此增加。（註一六）這些將貴族地主引進資產階級的經濟系統來的勢力，同時在貴族當中養成比較帶資產階級性的對於國家的概念，使他們也漸漸願意推進資產階級所主張的公民訓練。可是這種改變並沒有打破他們自覺高貴的心理，他們還是堅持要保存社會上和經濟上的特殊權利。

農業界對一九一四年的戰事特別關心，他們希望戰勝和他們作農產品競爭的俄國。此外，他們還希望藉佔據波蘭和波羅的海的海岸各國的一部份增加農業的生產，加強和外國競爭的力量，和加強在國內對資產階級的地

位。此外，因為軍隊的管理全操於貴族手中，貴族在政治上的權力和聲望的存在與增加當然要靠戰事的成功。大戰期內農業界的經濟地位在大體還好。雖然農產品入口的稅則暫時停止，但國外來源的缺乏大增本國食料的需求。甚至政府統制物價以後，餘利還是增加。此外，勞工的供給，因有各種保障不至於缺乏，田工不得離開耕地去加入工資較高的軍械工廠。還有大批戰時的俘虜，也聽憑農業界支配。（註一七）

革命爆發以後，貴族地主也和資產階級一樣，因勞工和軍士們紛紛組織評議會想要接收政府，而一時不知所措。他們最大的恐慌，是怕這些評議會要利用政治勢力來沒收他們的產業。可是當他們看見社會民主黨能夠成為新政府的領袖，反對這項評議會的勢力，他們覺得獲得一個出乎意外，而有用的戰友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但是他們看到農工不滿，評議會的觀念已經深入鄉村民衆的腦中，又設法在這種運動中得一立足的根據。為達到這項目的起見，他們佯作改變態度，正如下文所說：

「以往被指為反動大本營的農業協會，現在決意進入新時代來了。他們不特擁護任何能夠保障法律和秩序，能夠供給食料，與維持目前和平的政府（社會民主黨的政府當然也在內。）而且還擁護田工們政治上的權利，農民和田工所組織的評議會，以及婦女參政。」（註一八）

被遣散的軍隊，雖然一大部份在軍人評議會統制之下，但貴族們處在軍官的地位，還可以指揮一部份的隊伍，甚至可以組織新的義勇軍。他們將這項軍隊，聽憑社會民主黨政府差遣，政府即利用之來壓制過激份子。貴族中主要部份贊成召集全國大會的運動。他們覺得這樣可以產生一個不但能夠防止革命潮流，而且最少能夠暫

時保障他們的利益的政府。可是軍官和貴族當中態度比較倔強的份子卻反對和新成立的議會政體發生任何關係，並設法立刻廢除這種新政府。他們這種嘗試，釀成一九二〇年結果終歸失敗的苛帕氏的異動。（Kapp Putsch）

貴族處在農業資本家的地位，基本的經濟需要並沒有受到共和政府的攻擊。一切私有地產都受新政府的保護。（註一九）和平的結果使政府對食料價目的統制漸漸廢除。此外，在通貨膨脹期內，貴族和農民一齊擺脫一切債務的擔負。所有這些因素，都足使他們擁護在經濟觀點上一切仍舊的政體。

一九二四年的通貨復歸穩定，給大農業主和小農民一個打擊。（註二〇）這時有好幾件事情看來很明顯。第一、德國農業因為土地和器具的不濟，不能和外來的穀類競爭。現款極缺，利息極高，大農業主和小農民都需要短期貸款來接濟下一季，和需要長期貸款來革新器具與改組產業，建立獲利的根基。（註二一）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發行幾種農業貸款，大半為大農業主所吸收。（註二二）可是農業主卻因此負重債，在幾年以內，德國的農業界，不論地產規模大小，都擔負著比戰前還重的債務。

這種情形使大農業主採用兩重的政策。一方面要減低生產的費用，他們開始仿行工業中所謂「合理化」的辦法，就是多用機械，少用人工。在這一方面他們還得了政府給農業界購買機械的特別貸款的幫助。此外，他們開始用少數長期的技術人材和工藝匠來替代多數的勞工，只在播種和收穫期內增添比較上缺乏技術訓練的工人來幫忙。我們要知道這種「合理化」的辦法，在多數農民是無法仿行的，因為他們的地產少，用不起機械，不

能減少人工。因此在普遍的農業危機中，大農業主所遭受的損失比小農民較少，因為他們能夠減輕生產的需費來應付較低的物價。

一九二四年以後農業界曾經採行的另一種政策是設法增加農產品入口的稅則來提高農產品的物價。
(註二三) 爲達到這個目的計，他們不得不和素所深惡的共和政府妥協，因爲只有用政府的力量纔能夠改變稅率。這種陣線的改變，實現於一九二六年當德國國家主義黨（農業界的政黨）參加在德意志民黨（大商業界的政黨）領導下的混合政府的時候。

除此之外，他們經濟的組織尤其是農業協會（現名國家農業協會）在最近十年間發達得很快。這種組織藉聯邦和各邦政府中半官式的農會之力，與政府發生更密切的關係。(註二四)他們對當時的政體——議會式的共和——的態度，因此也和資產階級差不多。

不過他們雖然繼續享受各種經濟上的利益，有幾種基本的因素，阻礙他們完全的經濟復興。在事實上德國的農業也和德國的工業一樣，從一九二四年起就一直在危機中，結果貴族對於一個較宜於實施經濟計劃的法西斯獨裁政府的希望，比資產階級更爲殷切。至此，貴族在經濟的範圍內既與資產階級打成一片，他們關於公民的概念，和資產階級便愈來愈相同，這種概念，就是盡忠於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和資本主義的政府，這是最根本的，至於政府的形式，不過是一個怎樣纔方便的問題罷了。

(註一) 下表係根據 *Statistisches Jahrbuch des Deutschen Reiches* 製成，說明在一九二五年間德國土地的分配。

地產性質	英畝數	地產數目	總數百分比	總畝數百分比
最小的 (Parzellenbauer)	1 $\frac{1}{2}$ -5	3,027,431	59.4	6.2
小的 (Kleinbauer)	5-12 $\frac{1}{2}$	894,454	17.6	11.4
中等的 (Mittelbauer)	12 $\frac{1}{2}$ -50	956,155	18.7	35.8
大的 (Grossbauer)	50-250	199,825	3.9	26.4
大地產 (Gutsbesitzer)	250以上	18,668	0.4	20.2

享有權分配的不平均，事實上比這裏的統計還甚，因為這種統計只根據所經營的田地，不管是租的還是自有的。百分之十二·四的土地是零整租來的。一六部份係農民向大地主租來耕種。

(註一) 見 Walter Schitt 著 "Die Agrargesetzgebung der europäischen Staaten vor und nach dem Kriege"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cialforschung, vol. LIV (1925)).

(註三) 見 Gustav Aubin 著 Zur Geschichte des gutherrlich-bäuerlichen Verhältnisses in Ostpreussen von der Gründung des Ordensstaates bis zur Steinischen Reform (1910).

(註四) 參看 M. Tscherninsky 的有關的文章 Les Landshafteu et leurs opérations de crédit hypothécaire en Allemagne 1770-1920 (1922).

(註五) 見 Wily Wygodzinski 著 Agrarwesen und Agrarpolitik (1920), I, 80; 此外參看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中國於 "Fideikommiss" 一章。

(註六) 參看 Karl Grünberg 著 Die Bauernbefreiung. 第11卷 (1893-94); Georg Knapp 著 Die Bauern befreiung und der Ursprung der Landarbeiter (1887); Johannes Ziekursch 著 Hundert Jahre schlesische Agrar-

Bichte, Vom Hubertusfrieden bis zum Abschluss der Bauernbefreiung (1915).

(註七) 見 Schiff (書名見前) 第一百十一頁。

(註八) 見 Joseph Rybak 著 Die Steigerung der Produktivität der deutschen Landwirtschaft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1905).

(註九) 所謂自由,不但指他們係「自由」的公民,而且指他們已經脫去和土地的關係。

(註一〇) 關於從農業的觀點看,關稅發展的略史,參看 Gerber 著 Deutschlands Zoll- und Handelspolitik seit Einleitung der Zoll- und Handelspolitik durch Bismarck im Jahre 1879.

(註一一) 見 Karl Marchionini 著 Geschichte der Landwirtschaft(1925), PP. 126—27. 農民不期而然的得了政府這種辦法的好處,這是使農民中一部份人和大農業界與政府發生聯絡的重要經濟的因素。此外,可參看 Fritz Beckmann, 著 Einfuhrscheinsysteme. Kritische Betrachtung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Getreideinfuhrscheine; 和 Max Schippel 著 Die Deutsche Zuckerindustrie und ihre Subventionierten.

(註一二) 欲知其詳,參看 William Harbutt Dawson 著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Germany (1918) 第118—121頁。

(註一三) 參看 Wittig 著 Die Landwirtschaftskammern nach dem Gesetz vom 30. Juni 1894 (1895); 與 Obery 著 Über die Organisation und Zuständigkeit der Preussischen Landwirtschaftskammern.

(註一四) 關於戰前德國農業問題的各方面,參看 Band der Landwirte, Agrarisches Handbuch (有好幾種版) (Goheln 著 Agrarpolitisches Handbuch (採自由派的立場)) Curt Bürger 著 Die Agrardemagogie (1911) 最後一種是對農業立一個激烈的攻擊,內有許多有興趣的引證。

(註一五) 參 Erich Jordan 著 Die Entstehung der konservativen Partei und die preussischen Agrarverhältnisse

von 1848 所說這種歷程，在一八七〇年以前的期間內，已經發展到相當程度。

(註一六) 見 Altmann 著 "Der landwirtschaftliche Kredit im deutschen Reich" (in Deutsche Landwirtschaftsgesellschaft, pp. 90-124); Altmann, Denkschrift zum 25 jährigen Bestehen des Landwirtschaftlichen Kreditvereins im Königreiche Sachsen. Mit einem Überblick über die Organisation des ländlichen Bodenkredits in Deutschland.

(註一七) 見 Geschäftsbericht des deutschen Landarbeiter Verbands für die Jahre 1914 bis 1919, P. 29

(註一八) 見 Hamburger Nachrichten 一八一八年十二月八日。

(註一九) Gutsbezirke 到一九二六年經由普魯士政府下令廢除。Fideikommiss 現時還存在。

(註二〇) 戰後關於農業危機的論文，小冊，甚至書籍，陸續出現。參見 Max Sering 著 Die deutsche Wirtschaftskrisis (1926)；W. von Altmann 著 Die Krisis in der Landwirtschaft und Mittel zu ihrer Behebung (1924)；Fritz Beckmann 著 Die weltwirt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der deutschen Landwirtschaft und ihre wirtschaftliche Lage 1919-1926(1926)；Deutsche Landwirtschaftsgesellschaft Heft 332, Mittel und Wege zur Besserung der Wirtschaftslage in Arbeiten der deutschen Landwirtschaft (1925)；Gerhard Albrecht 著 Zur Krisis der Landwirtschaft (1924) 附年報雜誌 德國中央 年報 Vierteljahrshefte zur Konjunkturforschung 中央雜誌

(註二一) 見 Herbert Mahnke 著 Das Entstehen der Kreditnot in der deutschen Landwirtschaft beim Übergang von der Inflation zur Stabilisierung,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Kreditbedarfs (1926).

(註二二) 參見 Vierteljahrshefte zur Konjunkturforschung, Sonderheft 3；"Die Agrarkredite"；另外參見 Fritz Beckmann 著 "Kreditpolitik und Kreditlage der deutschen Landwirtschaft seit der Währungsstabilis-

erung" (in Die Kreditwirtschaft, Vol. I (1927).

(註二三) 上面已經說過，對農產品的稅則在一九一四年曾經暫時停止。從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間稅則中有好幾項漸漸又恢復。

可是這還不能滿足農業界的利益。關於戰後德國的關稅問題，參看 Max Sering 著 Agrarkrisen und Agrarzölle

(1925)； Fritz Beckmann 著 Agrarkrise und Agrarzölle (1925)， Kurt Ritter 著 Zum Problem der

Agrarzölle in Deutschland (1924)， Friederich Aerobe 著 Zur Frage der Agrarzölle (1925)。

(註二四) 據 Reichslandbund 的記錄，該組織當時有會員二二〇〇〇人以上被選舉或委派在各地地方，邦或聯邦政府機關裏服務。

第五章 農業界中的無產者

農業界中的無產者是一種一無所有的階級，在社會上經濟生活的地位和工業界中的無產階級相同。在十九世紀初葉農民解放以前，沒有現在所謂農業的勞工階級。在鄉村中藉工作來博得工資的只有藝匠，他們除了種地以外，還替地主做手藝的工作。可是十九世紀初葉農民的解放，使普魯士一大部份農民獲得自由，與歷代耕種下來的土地脫離關係。封建時代的農奴，雖沒有個人的自由，但照習慣享有自己土地的權利；現在卻變為在資本主義下只有個人的自由，而沒有土地的志願的勞工。（註一）

這種變遷在經濟上的解釋是：農業發展到變成一種資本主義的經營以後，地主們在需要時僱用工人比長期靠着的一種農奴來工作獲利更大。在德意志的西部與南部農奴解放的方式不一樣，因為那裏的地主覺得對自己最有利的辦法，是由解放後的農奴出錢來贖回自己應做的工作。在普魯士，麥克倫堡（Mecklenburg）和樂佛爾（Hanover）的一部份，因為貴族和君主政體的地位都比較強固，加以經濟生活不很進步，所以解放後的農奴的土地，一大部份都為上層階級所得，遂至產生一種沒有土地的農業界中的新勞工階級。在後一百年間農業無產者，不但數目不斷的增加，而且一代一代做成一種新的勞工，永遠沒有希望變成獨立的，享有地產的農民。細察這類農業中的勞工，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在經濟地位和對僱主的關係方面各有不同。第一，有所謂「自

由」的農工，他們的報酬大部份是現成的工資，附帶得些農業品。與自由農工有密切關係的是「季工」，他們的報酬是現金和膳食。這些論季工作的工人或者是小農民，或者是城市中的居民，在冬季裏另有職業，不過靠夏季工作所得來維持一部份的生活。他們來自國內各地，工作的地點多數在德國東北部韓樂佛爾或萊茵流域的大地產上。還有從國外來的季工，多數是波蘭人，每年夏季過境來工作，秋後即回本國。共和政府曾對這項外來的工人人數加以限制，每年不得過十萬人。

僱農（Deputatsarbeiter）又是另一種農業的工人。他們除了獲得現成的工資以外，僱主還給他們地方居住。這使他們對地主的倚靠性更大。這種人在德國各處有大地產的地方，都可以找到。

租農（Institute）是一種不很普通的農工。這種工人除向地主租用幾英畝地以外，還附帶租用房屋和倉庫。他們的生活一部份靠耕種租地所得來維持，一大部份時間在地主的田產上工作。可是田產並不由地主直接管理，地主將田產整批的賃給一個承辦人經營大規模的生產，由承辦人僱用租農來工作。這種制度在盧來斯威治，好斯坦（Schleswig-Holstein）和麥克倫堡最通行。還有一種性質和租農差不多的農工，向地主租用房屋和田地，用勞力來替代租金。這種人名叫「海爾靈治」（Heuerlinge）在威斯發利亞（Westphalia）地方最普遍。

享有極小規模地產的農民，係有地產與無地產兩種農民的中間人。因為他們所有的地不夠自給，他們一部份時間要在大地主的田中工作，充當季工。他們居多要依靠鄰近的大地主，因為他們必須賣地移居纔能改換僱

主或改變職業。

除此之外，凡有大規模或中等規模田產的地方，總有一種對開的階級。他們雖然是農業無產階級的一部份，卻和自由的，無地產的工人不同；主要的區別是他們算作僱主家庭中的一員所受，報酬的一部份是食宿。（註二）這種人往往是鄰近農民的子弟，將來希望承襲父兄的田產。其餘的有些一生要替別人做工，或漂泊到城市裏，變成工業中的無產者。

這樣我們可以看出農業界的無產者雖然與城市裏工業界的無產者同是一種依靠工資來生活的階級，但具有許多和城市勞工不同的特性，使他們的地位和人生觀都與工業界的無產者有點不一樣。第一、農業的勞工有一部份自己本來有點小地產，或有希望承受小規模地產的遺傳，可以供給自己生活的一部份。其次，他們的報酬不完全是現金，一部份係食宿或農產品。這些人在行動上當然沒有純粹的無產者那樣自由。此外，在他們與僱主的關係中，還保有許多資本主義以前的成份。

可是我們不要只看見這種差別而忽略了工業和農業兩種無產階級相同的地方。影響到農業無產階級公民的忠誠的因素，與影響到工業無產階級的，同是工資，工作時間，和工作狀況。（註三）

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政府對農業勞工的工資沒有可靠的統計。但個別的估計，表示在德意志帝國時代，工資有穩定的增加。（註四）可是這種增加，並不是由農工自己奮鬥得來，而是城市中工資增加的結果。這種不勞而獲的增加，使農工中昏惰份子對現狀感到滿足。同時因為農工的工資與工業中工人的工資相比，時常落後，使農工

中較有魄力份子漂泊到城市裏或外國去。

使多數農工感到不滿意的，還要算工作時間和工作狀況。關於這方面工人全任僱主支配一切。工資、工作時間、和工作狀況，通常都在全年合同裏規定，工人不能隨便違背。此外，在普魯士的農工當中，結社和罷工都在被禁之列。違反者要受罰款或監禁的處分。

農業無產者所遭受的不良居住狀況，也是他們不滿意的最大原因之一。我們可以引前德皇威廉二世的話爲證。據馬志昂尼 (Marchionini) 徵引 *Geschichte der Landwirtschaft* 第一八一頁中的記載，當威廉二世接收西普魯士卡次南 (Oschinen) 地方王家產業時，他曾說：「卡次南美麗的馬廐和工人們居住的地方比起來簡直是皇宮一般。我們要設法使工人的住家，不至比豬欄更壞。」房屋的普通狀況雖然曾經改進，但這僅是特別的性質，不生普遍的影響。工人們對僱主，僱主的眷屬，以及管家，都要表示尊敬。對工人施行體罰的事件並不少見，工人們只能忍受。因爲工資太低，工人的妻室和子女往往要幫同工作。藉田莊地方政府的制度，(Gutsbezirke) (註五) 僱主對工人的生活可以作嚴密的統制。在這種制度之下，地主幾乎是一區的行政長官，使他們能夠保持一部份封建時代的特殊權利。

這樣在大地產中的農工便成了有名無實的公民，不但沒有真正公民的權利，而且在社會和經濟的地位上還帶有過去封建時代的痕迹。他們在理論上享有公民的全權，而在實際上不特沒有產業而且連結約的自由，以及身體的自由和自治的權利都沒有。

從這種情形看來，我們可以料到農業的無產者一定會和工業的無產者一樣聯合起來作共同的努力，不但要改良自己的經濟狀況，而且還要推進產業社會公有的概念，對現有政體，採取明顯的敵視態度。可是在事實上這種情形卻不多見。第一，這種人當中較有魄力對現狀較不滿意的份子，都到城市裏變成工業的勞動者。（註六）據奈寧（Berins）氏估計，從一八八五年到一九〇五年約有一、八〇〇、〇〇〇人（多數為農工）從東普魯士、西普魯士、波曼蘭尼亞（Pomerania）、波山（Posen）和西來西亞（Silesia）各省往外移居。（註七）第二，農業的無產者縱然希望獲得地產，他們心目中只希望得到和大地產四週農莊相似的田產，他們卻不願將大地產瓜分，因為瓜分大地產的結果每人僅分得一小塊，既沒有房舍，又沒有機械，結果是毫無用處。現有要求瓜分大地產的，只有瘠地的小農戶，因為他們希望擴充原有的田地。與工業弟兄們希望接收工廠一樣亦希望接收大地產的觀念，在農工們看來覺得過於激烈，因為德國的農工在過去和現在都是社會中文化程度最低的一個等級。此外，他們還常在僱主的監視之下，僱主可以用教會、學校、法庭、和地方官等勢力來控制他們的日常生活。

可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前農工們會從事改進自己狀況，已有明證。據戰前做組織工會工作的人報告，有地的農工漸多響應他們的宣傳，不過一來因為農工們的膽子小，二來因為他們缺乏實際政治活動和組織的經驗，再加上僱主們敵視的態度，以故地方的農工團體雖然頗易成立，但活動諸多困難。（註八）在大戰期內，鄉村民衆所有的改進，農工們僅分得一小部份。食料的急需使政府訂立各種法規來防止農工離職，並逼他們接受現有的工資和工作狀況，違者以軍法從事。農工們對這種辦法當然不滿意，因為他們——尤其是在小地產上工作的，——

很可以跑到附近城市裏去軍事工業中獲得較高的工資，將田中工作交給妻子們料理。（註九）雖然他們不像城鎮裏的勞工一樣受食品缺乏的痛苦，他們也和一般人一樣不滿戰事好像愈來愈無意義。因此他們都歡迎戰事結束。他們雖然對革命並不踴躍參加，但對答應改善他們狀況的新政府，保提善意的中立。（註一〇）

新政府立刻撤消半封建的僕役法，藉以博得農工們的擁護。可是社會黨的政府因為要靠反動派貴族的軍事勢力來壓制革命工人的異動，乃對於更重要的，使農工全任貴族支配的田莊地方政府制度，反不能廢除。這種制度，實際上到一九二七年正月纔取消。不過，政府對一九一八年春天由社會黨和基督教農業工會聯合提出的各項次要的條件，完全接受。稍後，因為工作委員會法的結果，在大地產中成立工人的委員會。所有這些因素，都足以使農工階級變成在鄉間明白擁護新建共和政府的一種勢力。各處的農工，紛紛加入社會黨或基督派的工會，希望藉此可以改良自己的經濟狀況。社會黨的德意志農工聯合會（Deutsche Landarbeiterverband）在一九一三年間會員人數有一九、〇七七，到一九一六年減至七、一六七，在一九一九年又增加到六二四、九三五。（註一一）基督派的中央農工聯合會（Zentralverband der Landarbeiter）的會員數目在一九一三年間為三、一七七；一九一五年間為一、九〇四；在一九一九年間為五五、七五三；在一九二一年間（四月）為一五〇、〇〇〇（註一二）

有組織的農工，隨着人數的增加而漸漸認識自己的力量，開始提出改良工資和工作狀況的要求。受了革命情勢的壓逼大地主只得對這種要求表示應允。同時城市裏工人進展非常迅速的過激化漸漸波及鄉間。可是政

府已經表示對過激主義並不贊可；實際上大家都知道政府還用全力壓制城市中的騷動。得了政府這種政策作後盾，貴族地主得以恢復一部份的權力，對農工們的攻擊，立刻設法應付。這種衝突在一九二三年間曾引起德國東部幾次大罷工。一半因為政府採取敵視態度，一半因為工會領袖不表同情，幾次罷工都終歸失敗。

罷工失敗的結果，使農工的力量開始低落。農業工會會員人數減少的速率，正和以前激增的速率一樣。到一九二七年，社會黨的工會人數只剩一五〇、〇〇〇，基督派的工會人數也同樣的減少。農工們對政府和工會可以改良他們現狀的希望大受動搖。在理論上雖然還可以用罷工來作利器，但實際上毫無效果。為防止罷工風潮再爆發起見，工會領袖對於罷工訂立各種規程，使工人們幾乎無法鼓動罷工。到了一九二四年政府施行強制調解的辦法以後，罷工在法律上變為不可能。還有，革命以後成立的工作委員會對增進工人利益的效用不大，僅能激起他們對生產的興趣，那是很明顯的。

工人團體的力量瓦解以後，貴族地主們於是開始減低工資，工作的狀況也有回復戰前狀態的趨勢。就大體上看，政府為農工階級謀福利的工作比較為社會上任何階級的都少。無論在那一方面，農工總是最後被政府注意到的階級。

這種態度的成因，是在德國社會的結構中，農工階級在各種階級裏面所佔的地位最為無足輕重。這種不良地位的造成，也有許多因素。雖然農工階級的人數不算少，可是他們都散居各處，分成許多小單位，在政治和經濟上任何組織都感困難。還有，這種階級在社會中的文化程度可算最低，最缺乏進取心，最不易受到足以激起革命

精神的近代生活和近代思想。

這並不是說農工們曾經是或現在是反動的。一九一八年革命爆發以後他們當中大多數擁護新政府，特別是擁護社會民主黨。可是他們並沒有任何明確的革命目標，他們不過希望新政府能夠提高他們的地位。社會民主黨一方面利用這種擁護，同時自信能夠壓制過激的趨勢。（這竟釀成一九二三年農人罷工。）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派的工會，都曾經是使農工和現有政體發生聯絡的媒介。他們全賴保持一種和平的政策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培養出一種對國家政府的忠誠，和對他們所隸屬的社會黨和中心黨的忠誠一樣。換句話說，這兩個政黨，曾經硬將無產者的怨恨，轉向對黨國的忠心使他們不至集中力量來變成一種擾亂的，反政府的勢力。

可是普遍的農業危機，在近年中也曾給農工們一種刺激。大地產的「合理化」使工人們的位置漸被機械佔去，工作從全年的變成按季的，顯露出農業中第一次尖銳化的失業。因為工業也同樣的在恐怖的失業危機之中，農工們又不能改行到城裏或國外去。農工的經濟地位從來要受工業中工人經濟地位的影響，這次工業中長期的危機，當然要波及農工的經濟地位。結果使農工當中很明顯的流露出反對現政府的精神。法西斯黨的宣傳能發生效力，就是一種明證。更明顯的就是一九三〇年間德國東部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發生了好幾次「非法」的罷工。農工們不願社會民主黨的農工聯合會的規定而隨便罷工。足見叛變的精神已經正在醞釀中了。

換句話說，跟着德國國家政潮的高漲而起的長期經濟危機，終使農工們難再忍受，農工的頭腦，漸漸充滿政治問題，予共產黨和法西斯黨以利用他們的極好機會。他們也和德國其他民衆一樣，正感到內心中的衝突；傳統

的國家文化思想引導他們往一個方向去，經濟的力量又驅迫他們往另一方向走。現時德國社會中普遍的危機如果繼續下去，這種內心的衝突一定有加無已。這當然不特要減低他們對現政府，現政體和現社會的忠誠，同時還要使他們趨向於謀破壞現政府現社會的勢力。

(註一) 參看 Georg Knapp 的標準著作 Die Bauernbetrieue und der Ursprung der Landarbeiter (1887); 或參看 著者所作的 Die Landarbeiter in Knechtschaft und Freiheit (1909); 此外參看 Freiherr von der Goltz 著 Die ländliche Arbeiter-Klasse und der preussische Staat (1893)。

(註二) 參看 A. Konnecke 著 Rechtsgeschichte des Gesinde in West und Süddeutschland (1912)。

(註三) 參看 Alexander von Lengerke 著 Die ländliche Arbeiterfrage, Beantwortet durch die bei der Königlichen Landes-Oeconomie-Collegium aus allen Gegenden der Preussischen Monarchie eingegangenen Berichte landwirtschaftlichen Vereine über die Materielle Zustände der arbeitenden Classen auf dem platten Lande (Berlin, 1849); 此外參看 Die Lage der ländlichen Arbeiter im deutschen Reich. Bericht an den vom Kongress deutscher Landwirthe niedergesetzte Kommission zur Ermittlung der Lage der ländlichen Arbeiter in deutschen Reich (Berlin, 1875)。另一種關於勞工狀況的書而詳細的研究是 Die Verhältnisse der Landarbeiter in Deutschland 共三卷，在一八九二年間由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 刊行，作為 Schriften 的第五十三至第五十五卷。

(註四) 參看 Valer Asmis 著 Zur Entwicklung der Landarbeiterlöhne in Preussen (1919)。

(註五) 欲知其詳參看第四章

(註六) 見 A. Rieger 著 Die Landflucht und ihre Bekämpfung unter besond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ländlichen

Arbeiterfrage (1914).

(註十) August Skeitweit 著 "Gutsherrschaft und Landarbeiter in Ostdeutschland" (in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35 Jahrg., N. F., 第 311 頁)

(註十一) 見 Geschäftsbericht des deutschen Landarbeiter Verbandes für 1912 bis 1913.

(註十二) 見 Geschäftsbericht des deutschen Landarbeiter Verbandes für die Jahre 1914 bis 1919, pp. 29-32;

此外，參看 Wjgodzinski 著 Die Landarbeiterfrage in Deutschland (1917); 葛 Gerlach 著 Die Landarbeiterverhältnisse in Ostpreussen 1913-1922.

(註一〇) 關於大戰後德國農業問題，參看 Hermann Kranold 著 Was bringt die sozialistische Republik dem Landarbeiter? S. Rosenfeld 著 Das neue Landarbeiterrecht (1919); Wilhelm 著 Die Fragen des Gesinde-rechts nach Aufhebung der Ausnahme-gesetze (1920); Friederich Aeroboe 著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der Lohnungsmethoden in der deutschen Landwirtschaft (1920); Walter Pross 著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Interessierung des Landarbeiters am Betrieb des Arbeitgebers" (in Landwirtschaftliche Jahrbücher, (1927), 185-244); Friederich Aeroboe 著 Die ländliche Arbeiterfrage nach dem Weltkrieg (1922); J. Anbühl 著 Landflucht, ihre Ursachen und Folgen (1920).

(註一一) 見 O. von Dietze 著 Die ostdeutschen Landarbeiterverhältnisse seit der Revolution (1922), pp. 28-29.

(註一二) 參看 Dietze, (參見前節) 第 115 頁。

第六章 農民

我們已經說過，現代自由農民的存在，全靠資產階級的興起，和跟着封建式社會經濟制度的瓦解。（註一）十九世紀前半農民的解放，廢除了一大部份封建時代農奴和主人間的關係，漸漸將貴族地主們封建式的生產變成一種農業的資本主義。可是從另一方面看，這種改變使多數農民成爲一種自由的農民階級，一切生產還是根據資本主義以前的方式。因爲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本集中的生產——在田地僅夠維持自己生存的好幾百萬農民當中，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在土地方面成立了資產階級式的私人產業制度以後，德國各地產生了一個大的農業中產階級。他們的興趣和心理，大致和城市中的舊有中產階級相同，就是保守的，甚至反動的。（註二）他們的理想是保持自己的產業，和進行一種可以自給，但不用費心來集中餘利，作進一步經營的生產。換句話說，我們通常認集中贏餘以繼續發展和擴充爲資本主義的特色，在他們看來僅屬次要。

爲維持固有狀態起見，農民當然要反對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民不斷的仇視吸收其產業的貴族地主，從十七十八世紀一直繼續到十九世紀的一大部份。這時貴族已變成資本主義化，用購買，沒收抵押品和其他方法來吸收鄰近農民的田地。在德國的西部與南部當中，解放農民時會有不少大地產被用來抵還債務，在這些地方，比較上很少上述仇視的情形；縱然有，也無非是德國南部與西部的農民對普魯士的貴族地主的仇視。

這種對貴族地主的仇視到十九世紀末葉便漸漸減少，因為資本主義的農業在一八七〇年以後就不再吸收農民的田地。德國工業在國內外迅速的發展打開一條投資的新路，同時俄國與美國的農業品和本國出品競爭，使本國出品贏利大減。為自衛計，小農民和大農業主不得不聯合起來，大地主更可以出來當保障農業利益的領袖。

這樣從資產階級和貴族的立場上看，有田產的農民便成了抵禦在工業中心進展極快的社會主義勢力的堡壘。同時因為歷屆政府——共和政府也在內——都保障私有財產，農民最少是被動的站在資產階級政府一邊。

經濟的因素，在這種人生觀中的地位很顯著，但農民對政治生活和政治問題的態度，卻還不大明顯。農民對於計劃一個政治的程序，建立一個農民的政黨方面的努力，收效還不及城市中的中產階級。在大體上那一個政黨的農業計劃看來對他們有利，他們便附從那一個政黨。

田產的多少，對農民公民的態度有直接影響。(註三)按田產的多少分類，農民中有：(1)大農民(Grossbauer)；(2)中農民(Mittelbauer)；(3)小農民(Kleinbauer)；(4)最小的農民(Parzellenbauer)。(註四)

許多大農民的活動，完全資本主義化，他們的興趣，當然也和擁有大地產的貴族差不多。最地道的是享有中等或比中等較小規模地產的農民，他們佔地產人總數百分之三六·三。他們所有的地，耕種田地總面積百分之四七·二。可是農民的數目，以地產最少的那一種（第四種）為最多，雖然他們所有的地，僅佔全面積的一小部

份。這類農民多數在德國的西部與南部。他們的地產（第三種的農民有時也有這種情形）往往少到幾乎不能維持生活。他們想多得點田地，可是他們的願望還沒有堅強到要沒收大地產的程度。因為他們都有恆產，使他們一切活動都在社會的範圍以內，所有要求不至超出私人產業在法律上的界限。同時因為他們還要靠工業或農業中替人工作所得工資來維持生活，所以他們的興趣，有時又與無產階級相似。他們是有田產的農民和工業與農業中的無產階級的中間人。這種參雜的性質使他們對現有政府的忠誠，不如其他農民那樣可靠。

人口過多，在十九世紀間也許是曾經引起德國鄉村民衆中紛擾的因素，可是過剩的人口，一大部份被正在發展的德國工業所吸收，或受了美國經濟機會的吸引而離去本國。這兩層的保險足以使農民中較有魄力，或較不易滿足的份子減少，因而使保守主義更加強固。

一八七九年折衷稅則和其他對農業品稅則的通過，使農民覺得政府正在保護他們經濟上的利益。不過農人的贏餘，常靠將牲口出賣給鄰村或鄰鎮，而新稅則對牲口的保護，不如對穀類那樣週到。

許多農民爲在需要時能用最低利息獲得貸款，減輕機械的費用，和加強自己在市場的勢力起見，遂羣起組織合作社。（註五）第一個合作社保雷福生（Friederich Raiffeisen）所創立；到一八三三年各獨立合作社組一個總會，叫作「Reichsverband deutscher landwirtschaftlicher Genossenschaften」，受政府法律上和財政上的一些幫助。

此外，各種農業會社，農業學校，農業展覽或競賽會等，都給小農業一種鼓勵。這類事業，常得地方省以至邦政

府的贊助。

就大體上說，農民在大戰前的心理是很明顯的擁護政府。（註六）他們覺得自己是公民，因為他們是有產的階級。城市中的小業主和小製造家雖然時常受着資本集中的威嚇。因而與上層資產階級的公民概念發生衝突，但農民在這方面所遭受的痛苦並不大。因此從政府的觀點看來，農民可以算是民衆中最穩定，最可靠的份子。

在大戰期內多數地主的景況都經過改進。國外食品的供給一大部份已被斷絕，德國幾乎全靠本國的農人。雖然政府對物價和供給的分量都有規定，但不能防止大規模的私買私賣，農民因此獲利很大。許多農民的經濟狀況，因而大獲改進。可是大戰繼續下去，工業出品缺乏，連戰時的俘虜一起用了勞工還不敷分配，死傷人數極多，以及士氣頹喪，遂使一般人對戰事，發生反感。

結果在君主政體傾覆，共和成立的時候，農民願意服從新政府；因為他們希望這樣便得到和平。農民的評議會先後成立，這類評議會一部份受社會黨的領導，一部份受假裝願意接受現有狀態的大農業主的領導。可是這類評議會的地位並不重要，除了在巴發利亞（Bavaria）的蘇維埃共和時期內，農民評議會的領袖甘道發爾（Gandorfer）宣言這項評議會擁護蘇維埃政體以外，並沒有什麼重要的工作。（註七）蘇維埃政體被推翻以後，農民評議會的地位，又變為無足輕重，只在農業區中被利用來作反動的組織。

雖然農民對共和政府沒有特別好感——尤其是當共和政府在一向與農民不相得的社會黨領導之下的時候——可是戰後一般經濟的發展使他們被動的擁護新政府。實際上不得農民的容許，新政府不易渡過戰後

的危急關頭。農民對新政府這樣的容忍，全係新政府藉繼續保障私有財產而博得的。此外，在大戰期內就開始的通貨膨脹，不特繼續下去，而且愈來愈甚，使農民能夠用虛幣來清償一切債務，他們乘機將虛幣變成各種物產，購置新農具，改造房屋，添置傢具，以及替還沒有生下來的兒女購置品物。

一九二四年通貨重歸穩定，農民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由人工所造成的繁榮，根本被破壞。此外，通貨的穩定好像復引起在一八七〇年以前已漸發展，在德意志帝國期內暫時停止的趨勢。這就是指農業大資本發達，使小農業漸受摧殘的傾向。這種變遷要曆時數十年，現在當然還未達大規模的發展。

我們要將這些基本的勢力加以分析，看牠們收效如何。最根本的，是小規模生產的效率。我們曾經說過，大地的生產效率，曾經增加不少。可是在小地產，這種可能性卻不大，尤其是第四種的農民。德國戰後整個的農業危機，也和全世界一樣，雖然大地主能夠安然渡過，小農民卻大不利。

通貨重歸穩定以後，較有效率的生產法，曾經戰後金融比較穩定的各國後立即採用，獨德國一時尙難施行。全世界的農業危機，戰後不久就發生，但在德國因為通貨膨脹而展緩；到這時突然爆發，全部影響，集在農民身上。德國的農民忽然覺得通貨穩定以後貸款非常困難，而且利息極高。同時農產品價錢的低落，使他們無法償還債項，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和各銀行不得不將貸款的期限展緩，或竟變作長期借款。德國的農業在通貨膨脹期內剛解除一切債務的束縛，現時不能不重新借債。實際上他們這時候擔負的債項，比戰前還要多。此外，因為新貸款的利息比一九一四年以前高得多，每英畝地實際上的利息擔負，較以前還重。

這種通貨膨脹以後的困難，更因賦稅的情形而加重。賠款的問題，最初經道威斯計劃（Dawes Plan）後來又經楊氏計劃（Young Plan）的規定，加以要使金融穩定，德國政府不能不增加賦稅的收入。此外，農民再也不能將毫無價值的紙幣來納稅，非繳納金幣不可。農民到這時候便覺得政府對他們經濟上的困厄不特毫無補救辦法，還要徵收苛重而不公平的賦稅來加重他們的痛苦。政府對於賦稅的徵收，往往非常嚴厲，有時甚至拍賣農民的牛來抵償欠稅。

大地主多數能渡過這個難關。小地主在這種長期的農業危機中，多支持不住。還有靠在鄰近工業中心工作的收入來維持生活的農民，更因工業中也有大規模的失業恐慌而無所依靠。

政府對農民的態度，受兩種矛盾的動機所支配。（註八）在大農業與金融界勢力範圍之下，政府對如何防止小農民被農業資本發展的摧殘，毫不關心。在另一方面，為維持這種階級對現社會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統制起見，政府又很願意培養一種有勢力而充足的農民來與工業中無產階級的過激主義相抗衡。

政府給農業的幫助，一大部份對大地主和地產規模較大的農民當然有好處。政府的貸款，多被這種人吸收。借款給小農民，結果反為增加他們的擔負。改進農業機械的利益，也只能及於地產較多的農民。可是受了農業危機的催逼，國會在一九二七年通過一個議案，就是此後國會所有通過用來改進農業科學和技術的款項，主要的用途，應為幫助中等或小規模的農民。政府履行這個議案到什麼程度，現時還沒證實。

農會中農民代表的人數，一九一五年以後曾經增添。小農業主對大農業主經濟上的倚靠日甚，結果使農會

完全被大業主所把持。

我們曾經提過，農民們以前曾經設法組織合作社來改進他們的現狀，這項組織還得有政府的幫助。大戰後這種辦法還照舊；在一九二八年年底，農業合作的組織共有三九、九四六個。中心團體一共有四個。（註九）這類合作社在經費上得有政府很大的幫助，在維持農民經濟的地位上，這算一個重要的機關。可是牠們大致直接被較富有的農民，間接被銀行所操縱。

此外，農民還合組各種農民團體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可是這種團體，帶有很明顯的政治派別，我們簡直可以說牠們是各政黨用來對農民獲得較穩固的操縱的組織。農民中一大部份是貴族地主的政治和經濟機關，叫做全國農協會（Reichslandbund）的份子。這些農民團體，也許多地方反使農民中的差別更加明顯。（註一〇）農民參加各種組織使他們受現有社會制度的束縛，一切不滿足的表现，都受法律範圍的限制。

小農民由此危機所受的損失最大，但他們經濟的崩潰並不是自動發生的。小農民雖然受了大地產「合理化」的影響，他們還可以靠加緊工作來和大地主競爭。他們可以增加工作的時間，和多利用點眷屬的勞力。還有，他們只顧養活自己一家，為市場而生產僅屬次要。眼看著工業也在同樣的危機中，他們設畫各種方法要保持自己的地產，因為地產一失去，他們就立刻要變成一文不名，流落到城市裏失業者的行列中了。

總結起來，我們可以說農民對現有政府的忠誠，就只從經濟的觀點看來也是一件極複雜的事。因為他們自己已有私產他們當然擁護以私有財產作根據的國體與社會。在另一方面看，一九二四年以後長期的農業危機，很

明顯的已經開始危害到他們經濟上的安全。因償債失去地產的農民數目較以往增多。所有這些情形，結果使農民很快失去對現有政體的信仰，漸漸對牠發生惡感。這種情形使多數農民擁護答應扶助農民，而同時不被壞現有社會制度的法西斯運動。可是整個經濟危機的壓逼，不曾使農民擁護共產黨，雖然共產黨也表示不使小農民的產業社會化。只有在無產階級的利益佔勢力的第四種農民當中，我們可以找出反政府的情感。大戰和戰後的發展所給農民的境況，是在一八七〇年以前所想不到。這要很強烈的影響到他們對政府的態度，那是很明顯的事實。這種發展將來是否會助長反政府的態度，全靠好幾種因素來決定，最重要的，就是傾向於剝奪他們的私產，使他們變成農業或工業中的無產階級的危機。

(註一)關於農民的歷史，除上兩章所舉標準著作外，參看 Heimrich Gerdes 著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auernstandes* (1910)；和 Adolf Bartels 著 *Der Bauer in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 (1900)。

(註二)關於農民的心理，參看 Gerhard Albrecht 著 “Das deutsche Bauerntum im Zeitalter des Kapitalismus” (in *Grundrisse der Sozialökonomik*, IX, 35-69)；與 A. L'Houet 著 *Zur Psychologie des Bauerntums* (1920)。

(註三)參看 Max Sering 著 *Die Verteilung des Grundbesitzes und die Abwanderung vom Lande* (1910)。

(註四)詳細數目見 Reichszentrale für Heimdienst, *Gewerbe und Landwirtschaft im Spiegel der letzten Betriebszählung*, Richtlinie Nr.150 (July, 1927), 第七頁。

(註五)關於合作事業的材料，一大部份詳見第四章所舉著作中，此外，可參看 Otto Gennep 著 *Das deutsche landwirtschaftliche Genossenschaftswesen* (1925)。

(註六)參看 Erich Kaup 與 Richard Mühlner 合著的 *Die volks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von gross- u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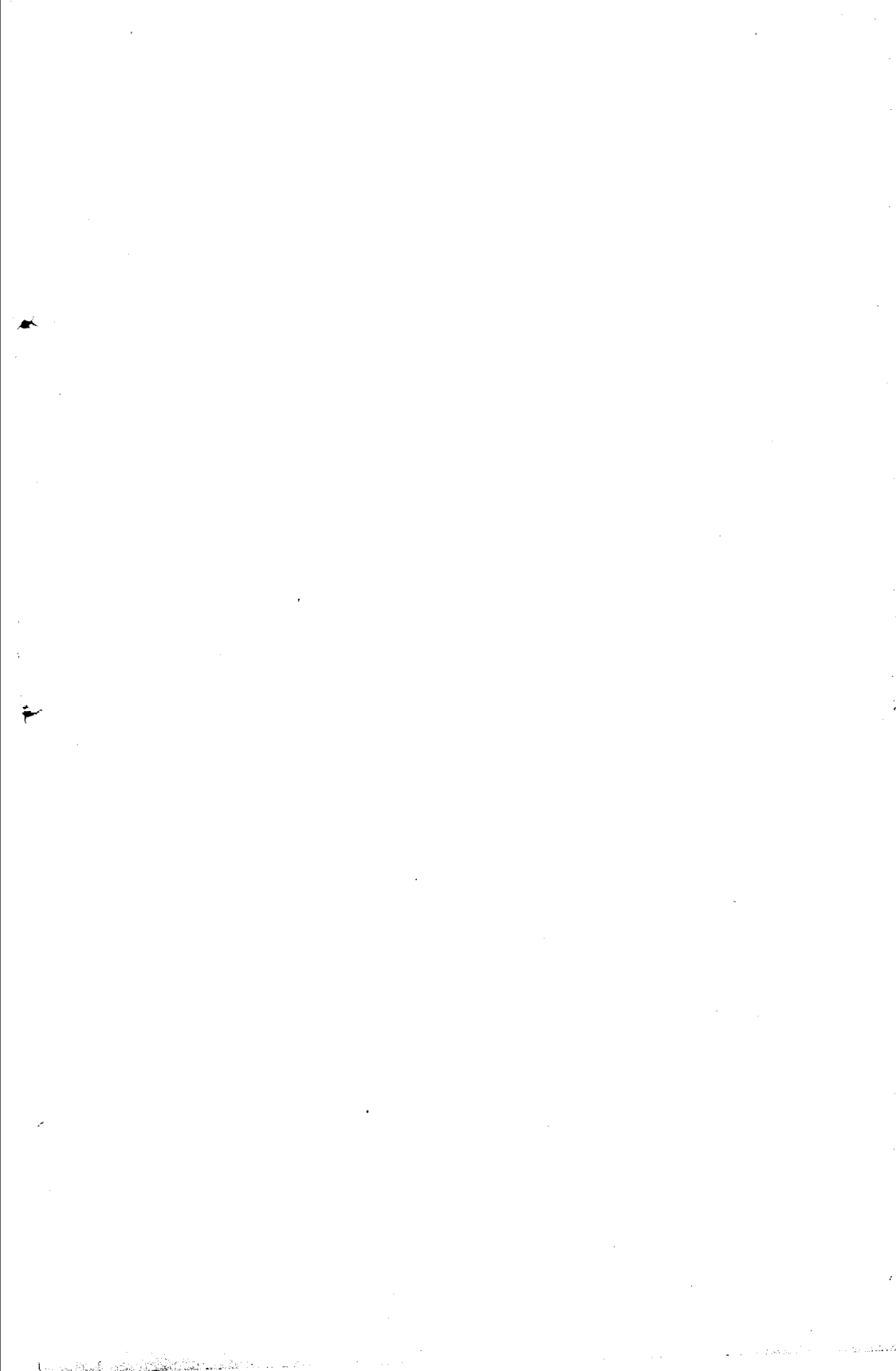
Kleinbetrieb in der Landwirtschaft (1913), 或 Karl Bernhard von Dertzen 著 Wie erhalten wir unseren Bauernstand? (1914).

(註十) 參看 Wilhelm Mattes 著 Die bayrischen Bauernräte (1921).

(註八) 參看 Karl Schmidt 著 "Bauernschutzpolitik" (in Grundrisse der Sozialökonomik, IX² (1927), 1-32).

(註九) 參看 Otto gennes (書名見前) 第三三頁至三四頁。

(註一〇) 參看 Eugen Varga 著 Materialien über den Stand der Bauernbewegung in den wichtigsten Ländern (1925).



第二編 政府

第七章 政黨

當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帝國誕生時，國內共有三個主要政黨，分別代表貴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一八七一年以後政治上和社會上的爭鬥，全係這三個政黨的交互關係和牠們對政府的關係所造成。（註二）可是這些主要的政治勢力，以後不只從這三個政黨中表現出來。各階級中不同等級的衝突，傳統的風氣，宗教，和文化上的差異再引起一種分化的歷程，結果使原有各黨復分成不同的黨派，其他新政黨先後成立。當國家自由黨與卑斯麥妥協時，黨中的左翼明白脫離本黨，另成一比較激烈的團體，設法保持卑斯麥時代以前的進步風氣。此外，保守黨中承認卑斯麥新成立的帝國的一部份也脫離原有團體而成立一個擁護卑斯麥的政黨。天主教徒在德國原屬少數，大部份聚居在德國的南部和西部；德國最有勢力的一邦是普魯士，而普魯士是信奉新教的。爲與普魯士新教的專制勢力對抗起見，天主教徒組織一個政黨名叫天主教中心黨。這黨的性質和自由黨與保守黨都不一樣，他們的重心是國內城市和鄉間的中產階級。最末，還有其他小政黨，如波蘭人，丹麥人，阿塞士省人，等組織，大致上代表文化和種族的差異。

這些政黨所以能夠發達的原因，全靠有議會的存在；建立在普及選舉權之上的議會所以能夠存在，全靠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間歐洲國際上的和平，使次要的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差異得以充份的表現出來，各自組織政黨。這些政黨，除了社會民主黨以外，都有一種共同的根據——資產階級的社會。當社會黨攻擊私有財產時，他們一齊起來自衛，這就是很明確的證據。

一八七六年德意志施行普及選舉以後，因為統治階級只佔全體民衆的少數；代表統治階級的政黨，一定要得到大多數民衆的擁護。為達到這項目的起見，他們不得不用各種方法來保持自己階級的利益。連貴族的保守黨也只好用極不貴族的方法來向民衆中非貴族份子宣傳，藉以保護貴族地主們的利益。各政黨都向中下階級表示自己已是『國家』和『民衆』的保護人。（註二）他們還藉無數的理由來博得中下階級的同情，利用現有國家、文化、鄉土、社會，或宗教性質的風氣或成見。結果代表上級社會的政黨，雖然僅受少數人的指揮，而附從擁護的人卻包含各種階級的份子。在向民衆的宣傳工作中，他們往往借助於報紙和現有的社會文化組織。這些組織，變成間接幫助各政黨加強對民衆的操縱的勢力。

社會民主黨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當各政黨都承認或重視社會中國家和資產階級的成份的時候，社會民主黨歷史的開始，即在否認——或好像要否認這些成份。最初彼認為是帝國的一種恫嚇，後來竟成了資產階級的國家和社會的保障。造成這種態度上的變遷的社會和經濟勢力，我們在『工業中的無產階級』一章中已經討論過，現在只要指出這種發展在

政治上的表現就夠了。(註三)

社會民主黨的根源，有一種可以追溯到來樂克特 (Liebknecht) 和比貝爾 (Bebel) 要根據馬克斯和翁格爾革命的原則將工業中的勞動者組織起來的嘗試，這是北德聯邦國會中唯一反對爲普法戰爭發行公債的政黨。這黨的另一種根源是拉沙爾 (Ferdinand Lassalle) 和他的德意志工人聯合會 (German Workers' Association)。拉沙爾氏的主張與馬克斯略有不同，他願意在現有政體的範圍內謀勞工階級的解放，希望畢竟可以改善原有政體。一八七五年這兩種社會主義的團體在哥達 (Gotha) 地方聯合會議，結果成立一種妥協。他們在原則上雖然鼓吹廢除資產階級，和注重國際勞工階級的團結，但他們對現有政體卻之明白的態度。(註四)

從一八七八年到一八九〇年政府對社會民主黨的壓制，結果反加強革命的成份，因爲一經壓制，活動的進行就不能不取非法的方式。可是他們的組織和活動雖被取締，社會民主黨還能夠在國會中選代表。這種辦法的用意，是希望一方面可以防止社會民主黨在工人當中的宣傳，一方面可以使他們從一個堅決要破壞資產階級社會的黨派，變成一個在議會中的「反對黨」。在現有社會制度的範圍內工作。這種政策，當然使社會民主黨漸變成一種議會中的政黨，但對他們發展的妨礙，僅是暫時的。一八七七年間社會民主黨所得選舉票數佔全數百分之九·一，到一八八一年雖降低至百分之六·一，可是到一八八七年又增加至百分之二〇·一。一八九〇年該黨得到法律的承認，票數因而突增。在一八九〇年選舉中，所得票數幾乎加倍，突然增加到佔全數百分之一九

·八以後每一次選舉，除了一九〇七年愛國精神最緊張的那一次以外，社會黨的票數都有增加。到了一九二二年，社會民主黨票數佔全數百分之三四·八，國會中代表達一二人，已變成帝國中最大的政黨了。

可是社會民主黨的革命性，同時逐漸消失，我們已經說過，德國驚人的經濟發展，和市場的征服——尤其是在一八九〇年以後——使勞工階級中有組織的份子，在經濟上確實得了許多好處。在這時期內從許多社會黨黨員看來，似乎再也不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了。此外，社會黨已獲得法律上的根據，而且又是唯一的反對黨，附從的人中，有許多對社會主義的目標僅有學理上的興趣。這些份子將社會民主黨當作民主黨，不作社會黨看，以為這黨勢力的增加，結果可以除去半專制式君主政體中一部份不良的軍國主義的色彩。在這些份子看來，社會主義的革命目標是無關重要的。黨內許多份子漸漸離開了革命的理想，加以歐洲列強間的和平能夠繼續保持，看來似乎再也不能發生一種足以做成革命的情勢。成立一個社會黨獨裁政體，已經沒有問題是不可能的；甚至連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式的共和政體，一般人還覺得不必要。（註五）

在這種情形之下，從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〇年這十年間爆發出著名的在貝因斯坦（Bernstein）領導下的『改組派』（Revisionists）與黨內其他份子的爭執。貝因斯坦公開的嘲笑革命的觀念。『目的不算什麼，運動最要緊』是貝氏的口號。『改組派』的理論與實施雖然屢次被否決，貝氏的主義，深入黨中，一方面繼續原有革命的程序，一方面卻漸漸承認現有政體。在南部有幾邦當中，黨內領袖開始對政府的預算投票，和政府與非社會主義的政黨漸漸接近。在一九一二年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和民治派的『自由精神黨』（Freisinnige

(Partei) 作選舉的協定，藉以增加在國會中代表的人數。更重要的，就是社會黨竟投票贊成國家軍事的預算，理論上的根據是藉此可以把新賦稅從勞工階級身上移到資產階級身上。在國際的事件中如一九〇五年俄國的革命，和各次摩洛哥的事變 (Moroccan crises) 許多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明白表示如遇祖國被他人攻擊時，他們要站在那一邊。關於右翼對德國殖民地的態度，在樂士克 (Nolke) 關於殖民地政策的名著中，有很明白的表示。

大戰的爆發，更很明白的表示黨中領袖大多數離開該黨的本旨有多遠。國會中社會民主黨的黨員贊成發行戰債，反對的僅佔少數。該黨還附和對德皇「我再也不知有黨，我只知有德國人」的呼籲。戰事繼續下去，不特黨中的愛國心增加——尤其是領袖當中——而且全黨和各自由工會也漸漸與政府機關發生密切的關係。革命的斯巴達卡斯 (Spartacus) 團體以及反對社會民主黨擁護政府的辦法而脫離該黨的獨立社會民主黨所鼓勵的罷工，政府藉社會民主黨的幫助加以壓止。甚至當一九一八年十月德軍從法國境被逼後退，帝國政府正在動搖的時候，社會黨的領袖阿爾拔 (Ebert) 雖然要求德皇退位，還不肯出來主張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共和政體。

最爲一般人所驚異的，就是直到德皇逃往荷蘭，工人和軍士的評議會要接收德國政府的時候，社會民主黨方纔出來主張建立這樣的一個共和政體。這種動作，並非因爲他們推翻半專制式君主政體的鬭爭已達最高點，純係爲防範蘇維埃獨裁政體在德國境內成立。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們設法把持大多數這類評議會，使這些評議

會擁護由社會民主黨和暫時由獨立社會黨加入組成的臨時政府。遇有被革命份子把持的工人或軍人評議會，他們便要取締，有時還借助於舊日君主政府時代的軍隊。直至他們自己行伍間也頓呈不滿的現象，社會黨的領袖纔答應勞工們將主要的工業社會化，可是並不認真實行這種政策。實際上他們還壓制各處要求將主要工業社會化的罷工。最後全國大會要起草共和國的憲法時，社會民主黨出乎意料之外的在會中獲得多數，而很願意的和民主黨與天主中心黨共組新政府。

社會民主黨在擁護共和與共和所根據的現有社會制度的人中，可算是最堅決的份子之一，實際上他們所作的事，很少表示他們是社會主義的信徒，而表示他們是國家政府的良好公民的地方到不少。（註六）他們曾經保護國家政府，不特與多少承認現有國體和社會制度的右派對抗，還和極左的現有國體和現有社會的死敵——共產黨對抗。在事實上我們可以說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和自由工會的領袖對於防止德國變成共產化的工作，做得比任何政黨都要多些。

社會民主黨雖然承認現有社會在根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他們相信從參加政府的工作中可以改變政體和社會的性質，他們以為現有政體已經不是「純粹」資產階級的政體，又因他們與自由工會的參加，這政體已變成一種社會的共和政體，勞工們的權利都得到保障。他們還以為用和平的議會的辦法自然會將政體變成社會主義的政體；他們對政府的關係愈密切，則社會主義的成功愈快。因此他們當中的一個領袖曾這樣說：（註七）『我覺得在我們的一切活動中，我們都表現出對這種政體具有一種為現時一切其他社會團體所比不

上的愛護。」

這種對政府的參加使他們不但在一九一九年和民主黨與天主中心黨共組維馬混合政府，還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年加入包括代表大工業的民黨的「大混合政府」(Large Coalition)。此外，當他們不參加政府的期間內，他們從不做和政府對抗的工作，他們往往還表示一種友善的中立的精神。他們在宣傳中當然很激烈的反對國家社會黨（法西斯主義者），可是如遇必要時，他們——或他們當中的一部份——是否會和國社黨成立一個可行的協定藉以在他們所謂「社會的政體」中保持一個地位，還是一個疑問。這一點現時在黨的戰略上雖然不可能，但這種政策與他們社會政體的概念以及他們對政府的關係是不發生衝突的。

民主黨 (The Democratic Party)

民主黨從一九三〇年起即改名國家黨 (State Party) 是進步民黨 (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 在共和時代的後身。進步民黨是十九世紀間自由黨的左翼和保持一八四八年革命遺留下來的比較進步（甚至於共和）風氣份子的組織。在大戰以前，民主黨所代表的是較進步的智識階級和商人，這些人大致要保持佛蘭克福大會 (Frankfurt Assembly) 的理想，不肯全部承認卑斯麥的帝國，否認帝國為德意志統一的最後一步。他們主張往民治方面走的改革，甚至在一九二二年間如社會民主黨成立選舉協定，希望用法律手續來完成這種改革。

革命爆發以後，進步民黨改組，收容了國家自由黨的左翼，改稱民主黨。他們以共和政體作根據，要將資產階

級和中產階級中較進步的份子組織起來，使在一九一九年全國大會中社會黨的得票不能佔多數。他們同時又努力擁護共和，反對反動的團體。得有著名的報紙如 *Frankfurter Zeitung*, *Berlinger Tageblatt*, 和 *Vossische Zeitung* 等作後盾，他們去出席維馬大會的選舉中所得票數佔全數百分之十八，幾與天主中心黨所得的相等，約當社會民主黨票數的一半。

該黨對維馬憲法的完成，甚為努力。還參加維馬混合政府，與天主中心黨的一翼，同時代表社會中的資產階級。結果凡爾賽條約的簽訂與議和後第一年政府的一切政策，全歸他們負責。他們雖然因此失去許多民衆的同情；加以他們本來為反抗社會黨而成立的，現在反與社會黨合作，對中產階級方面更不討好。結果在一九二〇年的選舉中，他們所得票數較前減少了一半。一方面希望保持固有的自由原則，一方面又怕失去人心，他們一向不能遵循一種確定的政策。他們的實力漸次減少，雖然在一九三〇年改組為國家黨以後，國會中代表人數終於減到二十人。（註八）他們宣傳對國家政府與對共和的忠誠，而注重於民治與自由方面。不過他們以前為維馬混合政府中的一份子，所擁有勢力的地位已經消失，現時僅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政黨。他們的衰落，可以算是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對自由與共和觀念漸次薄弱的反映。

天主教中心黨 (The Catholic Centre Party)

我們已經說過，天主教中心黨，係由民衆中天主教份子所組織，想在新教佔勢力的政體中，保護天主教徒的利益。（註九）因為他們有天主教會幾百年來的經驗可以借鏡，天主中心黨在組織方面，在全德國的政黨當中，可

以算作最嚴密的一個。他們的紀律和效率，不是從半軍事式的方法得來，而是從天主教會宗教上團結的號召所得的結果。就是說，紀律不出自黨中，而出自非政治質性的教會。從教會與政府兩方面藉注重人民的結合 (Volksgemeinschaft) 設法培養一種社會上和宗教上團結的感覺。同時黨的根據又不僅是教會的本身，還有附屬於教會的各種組織。

中心黨的附從者多數在德國南部與西部的天主教地帶。他們的根據是城市或鄉間的中產階級。萊茵流域的資產階級一向就在該黨範圍內，德國的工業化更使他們在工業中的無產階級當中得到一個立足地。德國社會中日見增加的社會和經濟的鬭爭，對中心黨當然也有影響。天主教的工人漸漸脫離本黨的領導。此外，天主教農民的子弟跑到各工業中心去謀生，受了其他政黨的影響也不少。我們可以注意在一八七四年間，天主教中心黨所得票數，佔全體百分之二七·九，到一九一二年減至百分之一六·四，失去的票數，多被社會民主黨吸收。

在大戰期內天主教中心黨和其他政黨一樣，竭力謀使戰事得著勝利的結局。可是戰事的延長，看來德國得不到勝利，他們又建議為國家主義份子所猛烈抨擊的著名和平方略。革命爆發以後中心黨不久從黨員中勞工份子推出幾個人來當領袖，改名「基督教民黨」(Christian People's Party)。出來擁護共和與全國大會。他們不難做到這一步，因為他們一向代表德國西南部反對卑斯麥統一全德政策的份子。此外，因為他們係屬宗教的性質，他們覺得政府的形式僅是次要的，承認共和與承認君主政體同樣容易。在爾齊貝格爾 (Erzberger) 領導之下，他們和民主黨與社會民主黨一齊助成維馬混合政府。巴發利亞 (Bavarian) 邦內中心黨較為保守而

眼光較狹小的份子因爲對參加新政府有所不滿，就脫離本黨另組巴邦民黨 (Bavarian People's Party) 他們對宗教的問題仍與天主教中心黨合作，但對某種經濟和政府的問題卻保持着獨立的地位。

中心黨因歷次參加混合政府，又因國內經濟危機的延續，遂使附從這兩個帶宗教色彩的政黨的人數都見減少。結果中心黨在一九一九年得全票數百分之二八·九——比一九一三年加多，到一九三二年兩黨合計纔得全票數百分之十五，開有史以來最低的紀錄。可是他們的損失還沒有在政府中其他政黨那樣大。一半因爲他們的組織比較嚴密；與天主教會的關係又極密切。他們在民衆中的根據雖然逐漸消失，但他們的政治地位卻比戰前還要穩固，因爲他們可以較直接，較有效的影響國家的政策。他們的領袖勃倫寧 (Brining) 被任爲國務總理，所給予他們的權勢，實在是他們以前從來沒有過的。此外，處在一個中立黨的地位，他們常可以參加各種混合政府，無論是包括社會民主黨的維馬混合政府，或是包括國家主義黨的混合政府，他們同時還可以在混合政府各黨當中成一種調節的勢力，雖然中心黨與法西斯派間的重要衝突在於文化，將來這兩種成立混合政府並非不可能的，尤其是就法西斯派也有容納議會的可能性而言，還有中心黨現時雖然擁護議會式的共和，他們的政治哲學並不限於任何政府形式。在附從者當中，他們永遠保持國家和民衆團結的觀念。他們藉此在現有資產階級的政體與社會中，設法妥協一切階級的鬭爭。

德意志民黨 (The German People's Party)

德意志民黨在大戰以前原名國家自由黨 (National Liberal Party) 一向是代表德國大商業的政黨。

(註一〇) 他們源起於十九世紀初年進步的議論與理想的結晶。因為他們所代表的是大商業，他們一向為資產階級的權利而掙扎，成為公民權利與國家統一的中心人物。因限於篇幅，我們不能分析這個政黨在思想，或「觀念型」上的發展。(註一一) 我們只能說，國家自由黨自從和卑斯麥妥協以後，變成帝國的臺柱之一，處在這種地位，他們當然關心公民的理想，多着重於發展中下兩階級對於公民的和國家的責任概念。在大戰期內，他們特別注重這種態度，因為他們主張延長戰事至獲得最後勝利為止，使德國工業可以得到新的領土，新的市場，和經濟發展上較大的自由。

一九一八年革命爆發以後，國家自由黨全失信仰。黨內發生分裂，左翼參加新民主黨的組織。其餘份子改組為德意志民黨，參加維馬大會的選舉，得全票數百分之四·四。(一九一二年國家自由黨票數佔全體百分之十·三·六) 他們政治的程序，介乎民主黨與德意志國家主義黨之間。他們同意於民主黨程序的一大部份，同時對政府的形式不表示明確的立場，但較傾向於君主政體。一般人不滿於共和政府的政策，結果使民黨在一九二〇年的選舉中所得票數大增，受損失最多的是民主黨。後幾年的發展，到雷爾 (The Ruhr) 地方被佔而達極點。德國的經濟生活幾頻於瓦解。民黨於是一改以前對共和的態度，為能夠比較直接的控制政府起見，他們決意在斯達來斯曼 (Stresemann) 領導之下，參加由中心黨，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組織成維馬混合政府，成立所謂「大混合政府」 (Large Coalition)。這種參加共和混合政府的策略一直到現在還沿用，這使民黨不能不放棄對君主政體的同情而擁護共和政體。他們的領袖斯達來斯曼 博士建立一種外交政策，設法使德國的工業在國內

外都能盡量得到利益。這個政黨不像法西斯黨那樣靠着對於熱烈愛國的號召，而靠外交談判的政策。換句話說，就是他們暫時採取一種和平的帝國主義的政策。因為德國的經濟危機有增無已，民黨也漸失人心，直到一九三二年七月的選舉中，他們在國會裏的代表減至七人，票數只佔全體百分之一強。他們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選舉中稍現復興的現象，在國會中佔到十一席。

德意志國家主義民黨 (The German Nationalist People's Party)

這黨代表保守和反動的勢力，即共和成立以前保守黨的後身。(註二)他們的起源，是要保護普魯士保守派貴族的利益，使不至受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攻擊。雖然是一個政黨，他們向來反對議會式的政府，寧願藉控制普魯士軍隊和行政人員，來行使他們政治上的權力。帝國實施普遍選舉以後，保守派無論如何不願意，也不得不求其他階級的擁護。在鄉村中他們可以藉口代表農業的「保守和健全」的利益來與都市中工業界和過激的勞工階級對抗。他們因在經濟上和社會上得操縱農業中的工人和要倚賴大地主的農民，所以在農業區域中更有勢力。集中他們的政治力量在農民間的最好工具，是在一八九三年成立來與資產階級勢力對抗的農會 (Land-abund) 在城鎮中他們可以倚靠行政人員的一部份，因為這些人員也和貴族一樣，慣於不受議會的干涉在政府中行使權威。他們還可以求新教教士們的贊助，還有依戀着已往的好日子的舊有中產階級，他們總忘不了舊時的特殊權利和舊日的風氣，覺得現在因有城市中新興的中產階級而被埋沒；這種人也是保守派的附從者。在工業的勞工階級當中，保守派可以得到兩種份子的擁護。第一種是從鄉間剛出來的工人，他們還脫不了保守的

觀念。第二種是反對資產階級而同時沒有左傾到往社會主義方面走的份子，他們也很容易受保守黨的吸引。保守黨雖然沒有認真設法來組織工會，他們曾經將德國北部的店員組織起來，成爲“*Deutschnationale Handlungsgehilfenverband*”。

貴族地主漸變成農業資本階級以後，保守黨也漸與國家自由黨比較接近。可是保守黨仍然堅持他們舊有的政治哲學。他們覺得自己是唯一政黨足以代表「上帝，君主，和祖國」代表君主政體，代表貴族在社會和政治上的特權，以及代表受各種「近代」觀念所危害的舊有光榮的德國風氣政黨。他們所代表的不是對德意志的愛國心而是對普魯士的愛護；不是公民而是臣民；不是民族的自治而是君主的獨裁；不是公民的智慧的自由活動而是軍民的紀律化；不是議會式的政府而是由行政長官專權的政體；不是宗教信仰自由，而是擁護專制政體的國家教會；不是自由和合理而是權威與風氣。

這樣的愛國觀念，當然要使他們和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政府處在強烈的反對的地位，他們一切政治和社會上的特權，看來都似乎有被掃除淨盡的危險。可是他們改組爲德意志國家主義民黨，設法聯絡舊日的信徒。在一九一九年間他們雖然贊同召開全國大會來防止布爾薩維克主義，但他們所主張的是君主政體的恢復。這使他們失去衆望，可是一般人對新共和政府內政和外交的策略的不滿，又使許多人趨向主張君主政體的國家主義派，希望可以恢復過去的好日子。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的選舉中，國家主義派的票數較一九一九年增加了不止一倍，與農會（*Landbund*）一起共得全票數百分之二二·一。

他們的成功以及對增高農產品入口稅率的急需最後使他們在政治理想上不能不妥協他們加入政府，與民黨和天主中心黨合組政府。雖然在政治上主張君主政體，他們在經濟的病症，需要共和的醫治。可是從那時候起，他們就大失人心。理由很明顯：他們對各次混合政府的參加，對德國經濟生活毫無裨益，危機還是有加無已。他們在野時曾經攻擊過楊氏計劃，上臺後又對該計劃表示一部份的贊同，更使許多對他們熱烈附從的人都失去本來的信仰。還有，他們恢復君主政體的計劃，也足使他們失去人心。

到了一九三〇年，國家主義黨失去附從者的大半數，與幾個小反動團體湊合起來所得票數還不夠全數百分之十。以前擁護國家主義黨的人多數改向法西斯黨，因為法西斯黨答應給他們一個較好的世界。國家主義黨可以受現有政府形式的引誘，而法西斯黨則要打破現有不良政府的形式。因為一九三二年國會中的僵局，國家主義黨在柏頻氏 (von Papen) 領導之下，獲得一個非常扼要的地位，他們就利用這個地位來操縱政府。

國家社會德意志勞工黨 (法西斯黨) (The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Labor Party)

戰後德國政黨中最有趣的一個是國家社會德意志勞工黨 (National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通常稱作「純粹」(Nazis) (註一三) 該黨為通貨膨脹期內軍官和中產階級所組織，於一九二三年在悶燦克 (Munich) 地方發生過未成熟而常被他人譏笑的「啤酒堂事變」(Beer Hall Revolt) 中，曾遭受一次挫折。可是在一九三二年七月的選舉中又大為活躍，得票幾乎有一千四百萬，在國會中佔二三〇席。在同年十一月的選舉中，國社黨的票數失去二百萬。這種轉變一方面固然可以表示他們得人心的最高點已經過去，但他

們仍舊是全德國單獨最有努力的一黨。

國社黨的興起和發展的迅速，是戰後德國的危機和資產階級用平常的辦法來解決失敗的表示。在這時期內資產階級的勢力和對其餘民衆的影響，大受損失。革命發生和議會式的政府成立以後，資產階級對政府的直接控制較前更要靠民衆的擁護，和議會的聯絡。資產階級的政黨，特別要和社會民主黨與自由工會分權，有時不免要向他们讓步。這一層他們已經辦到。他們覺得需要社會民主黨的贊助纔能使勞工階級依附現有政體，因為在社會黨的後面還隱藏着共產黨的真正危險，共產黨的程序，不是復興德國的資本主義而是推翻資本主義。因為共產黨的勢力日增，信徒達數百萬，藉蘇俄的鼓勵與供給，已成爲現有政體的確切危害。此外，一向爲資產階級的堡壘的城市和鄉間中產階級所受危機的損失，與無產階級所遭遇的不相上下，甚至比無產階級的遭遇更壞。這些份子漸漸表露出崩潰或革命的現象，隨時有被共產黨革命思想吸收的危險。最末，德國資產階級本身也正是在經濟的掙扎之中，正想維持和改進他們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不得不將生產的費用減輕；而工資或薪金，都是生產需費中的要項。一方面有自己目前的經濟問題，一方面中下等階級又有挺而走險反抗現有統治的政黨和現有政體的表现，資產階級乃不能不獲得對現有政府較直接的控制，藉以恢復自己以往的地位。在事實上他們還希望得到獨裁的權力，使他們能夠利用勞工階級來鞏固他們在世界資本主義中的地位。有了獨裁的權限，他們就可以壓制共產黨，藉以避免再向社會民主黨讓步。以前他們對社會民主黨的讓步，有許多是爲懼怕共產黨而發的。

資級看到在一個現代工業化的國體中，不得相當民衆的擁護，獨裁斷不可能。這種民衆的擁護，國社黨可以供給。國社黨和其他資產階級的政黨正相反，他們不但怕中下階級反叛的精神的增加，反而利用這種精神來作心理上的著手點。有了國家社會德意志工黨的名義，他們可以利用勞工中大多數反對資本主義的心理，設法將對德國資本主義的惡感移到「外國」的或「猶太」的資本主義上去。實際上在法西斯的運動中，外國人和猶太人都是妖魔。從法西斯的觀點看來，他們是德國衰落的主要原因。外國的資本家在「國際的猶太銀行家」領導之下，一向想破壞德國。現在更利用賠款計劃，要使德國永遠不能翻身。可是國社黨攻擊的對象不限於「猶太的」和「外國的」資本家，連「猶太的」和「外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也在攻擊之列。這類「猶太的」與「外國的」馬克思主義國際要使德國的勞工階級走入歧途，國社黨的目標，是要將「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的使命傳到勞工階級去，介紹這種社會主義的人不是共產黨而是在希特勒(Adolf Hitler)領導下的國社黨。這究竟是什麼意思，他們從來沒有明白解釋過。他們利用一般人對議會或政治的不滿，建議成立一種獨裁的政體，不是無產階級的獨裁，而是國社黨在希特勒領導下的獨裁。實際上他們還利用許多通行的革命口號來推進他們的政治目的。

國社黨雖然很能得到勞工階級的擁戴，他們較大的成功，還是在城市和鄉間的中產階級方面。這些份子受經濟危機的打擊，與無產階級所受的一樣重大，間或較無產階級所受的更大，對現有狀況，正感覺到一種敏銳的反叛意識。他們對右派政黨的信仰已經消失，右派在大致上節節和現有政府妥協，僅保持着反對派的門面，一遇

真正危機就立刻要塌臺。國家主義黨和民黨雖然對道威斯和楊氏的賠款計劃屢次表示不滿，但終於要承認這項辦法。這些中產階級份子想得一個領袖，一個能指引他們脫離現有困苦的領袖。一部份人曾經對共產黨表同情，可是大多數人與現有政體在「觀念型」上的關係太密切，一時不易發生這樣激烈的改變。他們不知道自己所需要的究竟是什麼。他們與曾經養成一種反叛的精神，與曾經接受共產主義而從共產主義中獲得革命的哲學和方法的勞工，有所不同。預備反叛的中產階級份子沒有革命的哲學。

城鎮中的舊有中產階級和農民仍舊保持私人產業的理想。新興的中產階級經濟地位漸次變成與無產階級的相同，但在大體也反對共產黨的哲學，因為他們不願失去和勞工階級的唯一差別——較優越的社會地位。他們要有一個新的世界，但不是一個勞工階級高於一切的世界。可是他們雖然堅持這種社會上的成見，他們當中漸次瓦解的現象使他們不能不有所動作。這種情形對於現有國體安全上的危險，資產階級和國社黨都看得真切。國社黨答應這些預備反叛的份子一個使他們可以恢復他們經濟上的權利的新世界，使他們不至於左傾。此外，國社黨還答應飽管困苦的農民以土地的增加和賦稅與利息的裁減。他們對中產階級方面的解釋也和對勞工階級的相似，說中產階級的經濟困苦，全係協約國對德國的壓逼，猶太的國際銀行家在國內外的陰謀，以及猶太的，非德意志的，和不忠誠的國際馬克斯主義的理論所做成。

他們要廢除現有效率不高的議會制度而代以國社黨在希特勒領導下的獨裁。這種「德意志」的獨裁，可以解決國內外一切問題，他們稱作「第三帝國」的獨裁，因為這種政體，要復興中古時代和一九一八年被「猶

太的馬克斯主義推翻的兩個德意志帝國的國家光榮，這種政體的根據是能負責的軍隊、警察，以及行政人員。國社黨還建議——雖然內容很空泛——將來的政體要採取一種各界合組的方式。根據這種概念，現有社會的分界不但繼續存在，而且還要愈加堅固。議會及其形式上民治的概念，必須廢除，代以一種顧問式的經濟團體，包括各經濟組織的代表。這種經濟團體雖然免不了要受資產階級的操縱，可是還能夠使中下級社會歸附這種獨裁政體，同時還可以「使他們各守本份。」因為國社黨深知在一個現代工業化的國體中，一定要將中產階級——尤其是下層的——拉到行政的活動方面去纔有獨裁的可能。他們哲學的這一方面，是特別說給中產階級聽的，不足為勞工階級道，因為這足以使中產階級覺得在這樣的一個政體中，他們的社會和經濟的特殊權利不但可以回復，而且可以得到保障。

可是國社黨並不表示任何明白計劃出來的經濟或政治上的制度。這是當然的，因為國社黨的主要目標是要使中下階級不至於革命。要達到這目的，他們為博得人心計，無論什麼，可以答應任何階級。他們利用有力的演講，搖旗吶喊，遊行等，來掩飾他們在思想上的混亂，對於如何實行各種建議的辦法，他們自己也弄不清，可是這種含糊的地方，並不阻礙他們工作，這樣含糊不但可以掩蓋他們思想上的混亂，而且特別可以吸收一般想藉一種政治上的浪漫主義來逃出現有困苦的中產階級份子。

可是法西斯黨近幾年來像流星一般快的發展，和他們在一九三二年選舉中驚人的成功，早震動了法西斯黨財政上的後盾人。他們不願意發生足使德國在國際上經濟地位降落的政治紛亂，因此在選舉以後，他們強

迫法西斯的領袖希特拉宣布法西斯黨建立第三帝國的工作，暫時決在議會式政府的輪廓裏施行。希特拉和他的附從者在一九三一年春天決定接受聯邦政府強施於法西斯黨和共產黨的限制時，也特別重視這種態度。這當然要引起對法西斯黨革命口號過於認真的份子的反對，結果一部份不穩份子被逐出黨，其中有些轉入共產黨。共產黨將來是否能孚衆望，全看他們自己用革命的標語來號召中下級社會藉以消除他們反動的手段如何。因為法西斯黨現時很顯明的正在做一種冒險的工作，他們戰略，只有在資產階級對政府和社會思想上的控制薄弱到要借敵人的口號來維持自己的勢力時，纔用得着。

共產黨 (The Communist Party)

共產黨的發展，是無產階級對戰後德國根深蒂固的危機所生的一種反響，正和法西斯的組織是資產階級對這種危機的反響一樣。這兩個政黨是不相容的，一個完全成功，另一個必遭破壞。兩黨間的爭鬪，漸漸要佔德國政治舞臺的中心。兩黨間共產黨的資格比較老，雖在戰後成立，但在戰前已有先驅。我們已經說過，在帝國時代社會民主黨漸次變成一個擁護現有政體的組織，黨中左翼爲保持革命的理想計，在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和來比樂克 (Karl Liebknecht) 領導之下，逐漸團結起來。在大戰期內，這些左翼份子脫離社會民主黨，另組一個叫作斯巴達 (Spartacus group) 的團體，他們與各國的革命團體合作 (布爾薩維克派也在內) 歡迎一九一七年十月的布爾薩維克革命，這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德國的革命不久就跟着爆發。在一九一八年九月舉行的會議中，將這種理想正式採用作一種政策。斯巴達派的口號是「將帝國主義者的戰爭變成內戰。」

可是德國革命爆發以後，斯巴達派的人數太少，組織又不良，不能把持政府。實際上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纔正式組成共產黨。他們設法強迫在大戰期內成立以後參與籌設臨時政府的獨立社會民主黨使牠明白站在革命的立場，但沒有做到。一九一九年正月在柏林起事失敗的結果，他們失去了兩個得力的領袖盧森堡與來比樂克。再經在畢內門（Bremen）、雷爾（Tuhr）、勃倫斯域克（Brunswick）等地方起事失敗以後，勢力更弱。而以慕尼黑（Munich）、蘇維埃共和的傾覆，對共產黨的打擊尤為重大。可是德國在大戰以後，一般經濟的狀況足以助長革命的趨勢，結果在一九二〇年間獨立社會黨一大部分加入共產黨，共產黨於是成爲工業中勞動階級的一個有組織的民衆運動。他們的勢力在通貨膨脹的後期進展得很快。共產黨對自己的勢力過於重視，至僅把薩克遜尼地方的一部份，便想引起全德國的革命；結果未能實現。在一九二四年五月的選舉中，共產黨得票數約四百萬，佔全數百分之十二至十三。金融穩定和繁榮暫時恢復，使他們的票數大減，到一九二四年九月的選舉，他們所得票數僅佔全體百分之九，一九二六年間經濟的危機又重新緊張起來，一直繼續到現在，共產黨的勢力又再增長。到了一九三〇年，他們得票在四百五十萬以上，佔全數百分之十三。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間，他們的票數竟達六百萬，佔全數百分之十七。

德國共產黨的程序和共產黨國際的一樣，德國共產黨不過是國際的一部份。他們主張破壞現有的國體，現有的社會，以及現有的一切行政機關；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體，採用無產階級獨裁制度。可是這種政體不是永久的，到一個無階級的共產社會產生以後便會消滅。同時這種歷程也不只在德國實現，而是全世界革命的一部

份。共產黨忠誠的對像是國際的革命勞工階級，尤其是第一個勞工獲得勢力正在實現共產黨的理想，的國家——蘇俄。他們將蘇俄看作祖國。他們並不忽視語言和文化上的差別，不過要將這種差別作為次要的。據他們的意見，國家和國家的文化，一定要與資產階級的社會和資產階級的政府分開，像蘇俄那樣辦法。在蘇聯中每一個民族團體都能夠自有文化。同時這些團體的經濟和政治的生活，一致受代表各民族的中央組織所指揮。可是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只有在無產階級統治下纔能完成。他們抨擊凡爾賽條約和協約國對德國的壓逼，但揚言勞工階級所受這種壓逼的痛苦最大，德國的解放，只有從勞工們自己在德國和歐洲各地——縱非全世界——完成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方能達到。他們一方面遵行共產黨的普通程序，一方面又參加國會的選舉，不過他們認為這種參加只有從宣傳的觀點看來有價值。他們在國會中的活動，完全根據這個觀點，他們參加議會的活動，為的是要宣揚議會制度的缺點。

共產黨將來的力量如何，要看德國將來的經濟發展，還要看他們組織下層階級內和渙散的中產階級內不滿足份子的能力，他們不但已經建立了一個組織嚴密和很活動的黨，還有許多附屬的團體。他們想藉這些組織來使勞工們附和粹純政治方式以外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想。擁護共產黨的，最主要的當然是工業中的勞動者，尤其是大工廠和鑛裏的工人。他們也曾設法在農業的工人當中謀一根據地，可是收效不大。他們還會設法鼓勵較貧苦而正受農業危機的壓逼的農民以及經濟地位往往與工業中的勞動階級差不多的中產階級。為擴張他們的勢力計，他們的努力一大部份用在反對法西斯黨與社會民主黨方面。他們對社會民主黨的惡感特別深刻，

認社會民主黨為國際社會主義原則的叛徒。不過他們的掙扎主要的是對國社黨以及與國社黨一起的組織，因為這些份子是在資產階級中最奮進而最危險的代表。實際上我們可以說，德國內部將來的爭鬪，要以這兩黨作中心。他們名為政黨，其實代表兩種不相容的社會形式，一個保護資產階級，一個為無產階級奮鬥。

- (註一)關於德國政黨的普通參考，可看 Wilhelm Mommsen 與 G. Franz 合編 Die deutschen Parteiprogramme 1918-1930(1931); Felix Salomon 編 Die neuen Parteiprogramme mit den jetzten der alten Parteien (1919); Walter Sulzbach 著 Die Grundlagen der politischen Parteibildung (1921); Herbert Sulan 著 "Zur Soziologie des modernen Parteiensystem's" (編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forschung, LV (1926年)六一頁至一四〇頁) Hermann Rehm 著 Deutschlands politische Parteien (1912); Friederich Naumann 著 Die politischen Parteien (1913); D. Hesnard 著 Les Partis Politiques en Allemagne (1923); Hermann Heller 著 Die politischen Ideenkreise der Gegenwart (1926); Ludwig Frank 著 Die bürgerlichen Partei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 (1911); Rudolf Bartel 著 Lehrbuch der Demagogik (1906); Ludwig Bergsträsser 著 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in Deutschland (1923); W. Thomas 著 Hohenzollern-Monarchie (1927); I. Rosenbaum 著 Bervi und Herkunft der Abgeordneten 1847-1919 (1923); Gustav Reptan 著 Das System der politischen Korruption (1927); E. Eichhorn 著 Parteien und Klassen im Spiegel der Reichstagswahlen (1925); Walter Lambach 著 Die Herrschaft der 500 (1926).
- (註二)這種政策最後竟使許多政黨將名字更改。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間許多政黨自稱『民黨』藉以保持黨徒的信仰。『Volk』一個名辭內含有『民族』與『國家』兩種意義)例如保守黨變作『德意志國家主義民黨』國家自由黨變成『德意志民黨』天主中心黨變成『基督教民黨』。

(註三)關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發展與問題的著作很多。本書引用的有下列數種：Franz Mehring 著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共四冊（第十一次版，一九二一年）；Walther Groll 著 *Die Entwicklung der Ansichten über soziale Reform i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15)；Paul Osthold 著 *Das Verhältnis des Marxistischen Sozialismus zum deutschen Staatsgedanken im Weltkrieg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seiner Entwicklung in der Vorkriegszeit* (1926)；L. Radlof 著 *Vaterland und Sozialdemokratie* (1915)；Gustav Noske 著 *Kolonialpolitik und Sozialdemokratie* (1914)；Herrmann Heller 著 *Sozialismus und Nation* (1925)；Konrad Hänisch 著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1916)；Friedrich Lenz 著 *Staat und Marxismus*，二冊 (1921-23)；Scheidemann 著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und der Krieg*；Paul Lensch 著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1915)；H. M. Calmann 著 *Die Finanzpolitik der S.P.D., 1867-1914* (1922)；Arthur Dix 著 *Sozialdemokratie, Militarismus, und Kolonialpolitik* (1924)；Charles Adler 著 *La décomposition politique du socialisme allemand, 1914-1919* (1919)；Werner Sombart 著 *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 (1924)；Stegfried Marc 著 *Marxistische Staatsbejahung* (1925)；Eduard Bernstein 著 *Von der Sekte zur Partei* (1911)；Robert Michels 著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Partei mit Gliedschaft und soziale Zusammensetzung*（見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第十二卷第一册第五一頁）；Ernst Drahn 著 *“Die Sozialdemokratie”*（見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第四大版，七卷（一九二五年））

(註四)馬克斯對哥達的妥協計劃曾作嚴厲的批評。可是他的批評被社會民主黨所壓制；參看馬克斯著的 *Randglossen zum Programm der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1922) 由 Viva 出版。

(註五)在事實上當盧森堡在一九一〇年普魯士的選舉競爭中提議將建立共和的計劃放在政綱裏時，她不但受黨中右派和中立派

份子強烈的反對，而且連她的同志 Franz Mehring 也覺得這種提議是做不到的。

(註六) 大戰後時期中，社會民主黨內部的構成，曾有明顯的變化。許多大工業中心的工人，都從社會民主黨轉向共產黨方面去。他們藉吸收小工業中心的工人和中產階級的下層份子來補償這種損失。

(註七) 參看 Richard Seidel 著 “Staatsverneinung - Staatsbejahung” (載 Arbeit 一九二六年十月第六三三頁)。

(註八) 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選舉中，他們的代表降至二人。

(註九) 參照 Karl Baehem 著 Vorgeschichte, Geschichte und Politik der deutschen Zentrumspartei, (共八册)

(1927-1931); Ludwig Bergsträsser 著 Der politische Katholizismus, Dokumente seiner Entwicklung 1册 (1921-23); J. Meerfeld 著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1915); Karl Heidemann 著 Bismarcks,

Sozialpolitik und die Zentrumspartei 1881-1884 (1930); Martin Spahn 著 Das deutsche Zentrum (1907);

Peter Maslowski 著 Was ist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Klerikalismus und Proletariat (1925); Josef

Joos 著 Die politische Ideenwelt des Zentrums (1928); Georg Schreiber 著 Zentrum und deutsche

Politik (1924)

(註一〇) 參照 Oskar Stille 著 Die politischen Parteien in Deutschland. 第二卷 Der Liberalismus (1911);

Oskar Klein-Hattungen 著 Di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Liberalismus (1911); Otto Westphal 著

Die Welt und Staatsauffassung der deutschen Liberalismus (1919); Hermann Goldschmidt 著 Ster-

ben und Werden des liberalen Bürgertums (1919); Heinrich Beythien 著 Der gewerbliche Mittelstand

und die deutsche Volkspartei (1921); Eduard Dingeldey 著 Kampf und Politik der deutschen Volks-

partei (1931) 此外，可參閱德意志民黨刊行的 Flugschriften。

(註一一) 關於造成這種思想的經濟勢力，參看本書第二章。

(註一二) 參看 Oskar Stöckl 著 Die politischen Parteien in Deutschland 卷一 Die Konservativen (1908)；

Kuno Westarp 著 Die Regierung des Prinzen Max von Baden und die konservative Partei (1921)；

此外可參閱 Flugschriften der deutschnationalen Volkspartei，自從一九一八年以來已經刊行三百冊以上內詳

載德意志國家主義黨政策。

(註一三) 參看 Artur Dinter 著 Ursprung, Ziel und Weg der deutschvölkischen Freiheitsbewegung (1924)

Alfred Rosenberg 著 Wesen, Grundsätze und Ziel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1930)；Weigand von Miltenberg 著 Adolf Hitler；Wilhelm III (1931)；Wilhelm Frick 著 Die Nati-

onalsozialisten im Reichstag 1924—28 (1928)；Karl Trotsman 著 Hitler und Bonn (1931)；Alfons Wied

著 Hitler und das Christentum (1931)；Lewis Wynn 著 Hitler (1931)；Emil Langyel 著 Hitler

(1932)；Nordicus (菲奧特) Hitlerism. The Iron Fist in Germany (1931)；Ernst Ottwolk 著 Deutschland

erwacht！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32)；Margarete Wiener 著 Vo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Wirtschaftsprogramm (1931)；Theodor Heuss 著 Hitlers Weg (1932)；Adolf Hitler 著 Mein Kampf (19 1)；

Erich Czech-Jochberg 著 Hitler, eine deutsche Bewegung (1930)。

第八章 行政人員

說明了德國政府的性質和政府一方面對議會的關係，一方面對行政人員和軍隊的關係以後，我們必須詳論行政人員與軍隊在德國國家主義以及公民的忠誠的發展中。所佔地位的重要。因為行政人員與軍隊同是一向爲上級社會用來對民衆直接行使威權的工具。行政人員雖沒有軍隊在外表上的吸引力，對民衆思想上的號召力也不如軍隊那樣大，但他們在使社會中各級份子有興趣上與思想上歸依現有政體，也和軍隊一樣是一種有效的媒介——現時他們的效力恐怕比軍隊還要大。他們不但能安然渡過各次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叛變，而且每經過一次危機，他們的勢力更增加一點。德國的歷史發展，也和其他各國一樣好像表示一種組織嚴密的行政人員，在社會上各種團體中可以算爲最不易毀滅的份子。在各次危機中行政人員所以能夠將資產階級的政體繼續支持，和他們這種比較上不容易毀滅的特性很有關係。因此行政人員對民衆的公民的和國家的心理，也有很大的影響。

從最初有行政人員的時候起，行政機構的發展對資產階級和專制主義的發展都很有關係。（註一）他們代表專制政體中的資產階級份子，沒有他們，專制政體不能存在。在資產階級起來以前，各處封建的統治者也曾委派教士或貴冑來管理自己的領土，不過這類工作是沒有系統的，從來沒有成爲一種行政的機構。人員的任用不

但全憑統治者一時的高興，而且很少長久，多是暫時的性質。尤其重要的，就是任事的人多從貴族或教士階級出身，在政治上毫不足靠。

資產階級的地位在十六世紀的初葉日趨重要，變化因而發生。各地封建式的統治者紛紛要擺脫附庸的牽累，改用永久的，具有專門技術的智識的官吏來幫助他們在領土內的行政，這便是永久的和集中的行政機構的胚胎。官吏往往由資產階級中選任，一半是要使貴冑的權力不致太強，一半因為資產階級對有效率的商業的管理，已有相當的訓練和經驗，可以應用到專制政體的行政方面去。

十六世紀的末葉資產階級逐漸衰落，多數重要的行政位置，又落到貴族的手中。同時貴族的子弟也開始進大學去求得行政工作上所必需的智識。在下一世紀間貴族們竟能強迫統治者不任用平民來充高級的官吏。此外，他們還得操縱君主所派地方和省的官吏，造成一個貴族的勢力範圍，來對抗君主專制政體的集權趨勢和資產階級侵入政府的地盤。

十八世紀初葉君主們又隨着經濟生活的恢復而增強對付貴族的勢力。普魯士設置各種具有非常權限的大員，成爲抵抗貴族們在政府中根深蒂固的朋黨的一大幫助。這些大員或是外國人，或爲王室軍隊中的可靠份子。普魯士的行政機械，奠基於弗來得力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時代。一七二三年威廉將各大員和他自己私產的管理委員會聯合起來，組成一個財政、軍事，及王室產業總管理處（General-Ober-Finanz-Krieg- und Domänen-Direktorium），代表專制君主的中央行政權威，對財政、警察、軍隊，以及君主私有產業有

行政全權。在君主召集的會議中，管理處人員遲到一小時以上的，罰款一百「姑爾頓」(Gulden)，不到的罰俸半年。官員私人不得營經濟事業。違反這類條例的處重懲，如係上項委員會中人員，有時竟受體罰。受賄的（無論是款項或是禮物）立即撤職。官員的遴選用考試制，連在大學中得有學位的都須經過考試。高級政府人員，多派往本省以外工作，使他們能全力執行王命，不至為私事所羈絆，同時還可以打破當時極強烈的畛域觀念。薪俸大，致很低，實際上「替普魯士王工作」一語，變成幾乎沒有報酬的表示。地方行政的低級位置，由曾具多少經驗，而無實職的軍官充當。這種新的集權的公務人員，或由軍隊出身，或為資產階級子弟，略諳商業管理，農事，製造等技術。他們代表新軍國的精神，變作做成專制和集權政體的媒介。這種行政人員，就是威廉所說的「我一吹嘯，他們就得跳舞，否則就算我活見鬼！」同時漸次利用各大學使以所謂財政學科 (Cameralist studies) 來訓練資產階級與貴族，以備充當政府官員。所謂財政學科，即政治，經濟，以及行政問題的概論。

大弗來得力帝對行政機關方面，除了政策偏重貴族，不重資產階級以外，沒有重要的變更。他建議將他的行政人員的一切權利與職責，作為他正在下令修訂的普通法典中的一部份。法典還沒有修完他就身死，但受了法國革命的催迫，終於一七九四年完成。第二卷第十項中，有「關於服務政府人員的權利與責任」(註二)的規定。法國革命對德意志的影響，終使行政人員以及其中資產階級份子的地位愈加強固。經過斯坦 (Stein) 和哈登堡 (Hardenberg) 的改革，行政人員曾經改組，權限更集中，人數也經擴充，許多高級的位置都開放給資產階級。這樣吸收資產階級較進步的份子，使他們能夠參與專制政體中行政的工作，藉以減少當時設立代議制政

府的要求。同時市自治政府的設立，做成許多『間接』的官吏 (mittelbare Beamte)。這些人也自命爲普魯士行政人員的一部份，可是他們和「直接」的邦政府的官吏不同，大多數由地方投票選舉出來，雖然選舉權還沒有普及。此外，城市中產生出一種名譽官吏的制度，市政府得指派任何有投票權的人充當不受薪金的公務員。許多人想獲得被派充名譽公務員的機會，因爲這對個人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以及社會的聲望上都有很大的好處。這兩種市政府的特性，一直保持到現在，足使市政府官員與民衆的接觸較爲密切。

巴發利亞一邦所受法國革命影響，比普魯士所受的較爲直接。巴邦總理蒙格拉士 (Montgelas) 在一八〇五年間公布著名的邦法 (Landespragmatik)，將整個行政人員的系統按照拿破崙建立的方式加以改組，到現時巴邦行政系統，均以此爲根據。

反動期內資產階級在行政人員中的勢力雖稍減，改組後比以前更強。此外，在十九世紀前半中，行政人員漸漸變成一種非人的機構，雖受君主的指揮，但漸變成一種機械的功能，不用君主分心去管。到一八一五年以後，普魯士對公務員的權利與責任，實行有系統的規定。一八一七年明令將公務員按地位與收入分成等級，這種分法至今還是公務分等的根據，所不同的，就是以後每一類中又再分成等級。在後十年間關於養老金，任期的長度，考試，保險等事項，都經明文規定。這項規定成爲以後一切發展的根據。不受一八五〇年普邦憲法與一八七一年聯邦憲法的影響。

十九世紀的前半中，有一部份資產階級與中產階級要求設立議會式的政府，但行政界間接的吸收一部份

資產階級份子，足以減弱資產階級反對現有政府的力量。政府藉郵政的擴充，各邦鐵路的發展與專利，以及其他政府的投資來增強經濟活動，更吸收了許多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份子。實際上在國內最大的經濟事業中，有一部份係政府的投資。結果使許多人本來可以在私人的公司裏供職，因而幫助資產階級反抗半專制式的政府，現時反變成政府行政機構中的人員。這減弱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獨立的驅動力，同時又增強政府在政治上與思想上的力量。

德國的統一，和貴族與資產階級間的妥協給這兩種階級以共同的利益，使他們一致的要將行政人員當爲維持現有政制的柱石。社會主義的發展，更使貴族與資產階級同時覺得現有政體要靠行政人員與軍隊兩種大勢力來支持，使社會黨在議會中不能佔得大多數。

同時德意志帝國的成立，產生出一種新的聯邦官吏，網佈在各邦原有官吏之上，一切職責與權限都在一八七三年的法律中規定。在後數十年間因爲帝國與各邦行政事項的擴充，行政人員的數目大增。政府漸次經營鐵路，運河，電報，電話等事業，同時又繼續開發各處的森林與礦產，各市復推行公用事業市有的政策。此外，社會立法的增加也需用人員作執行的工作。這種人員數目的增加，以官辦經濟事業方面比實際行政（如稅務，外交，內政，警察）等方面爲較多，還有，低級人員數目的增加比高級人員較快，尤其是在官辦經濟事業中。因爲這種人多數從中下級社會出身，政府後來決定新任政府職務的人，不一定能得到正式官吏的地位，享受養老金，終身任期，社會地位等好處。結果政府職員中有一部份——尤其是鐵路和郵局中的僱員——只能算爲「政府的職工」，同

時做書記錄事等工作的，只能算「政府的僱員。」這可以使行政人員保持一種優越的，獨享的感覺，因為只有中上級社會份子能夠加入他們的行列，大多數中下級份子無法問津。這種驚人的大批政府人員，在一九一三年數達百萬以上，幾十萬被政府僱用的工人還不在內。全數被政府任用的人約有一百五十萬，海陸軍不計。

從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看來，行政人員一向很重要，尤其是在十九世紀的後半以後。第一、中下級行政人員和高級行政人員中的一部份，一向多從中產階級出身，實際上行政人員的一大部份，通常被歸入中產階級裏。從多數中產階級份子的立場看，當政府人員是一種良好的職業，因為在經濟上安穩，在社會上又有地位。這是無形中使小資產階級自視為政府中一部份的主要因素。因為這不特使行政人員本身與政府直接發生關係，連他們的眷屬和親朋在精神上也和政府發生關係。本身當公務員，或有親朋當公務員，都可以提高一個人在社會上和心理上的地位，比一般下級份子較高一籌。因此維護和遵守行政人員的風氣，以這種人為最力。他們對德國行政機構比任何國家較優的感覺，在各階級中算為最強。

在農民當中，行政人員的地位不像在中產階級方面那樣重要。農民的子弟只有少數能夠希望當低級公務員。從農民看來，地方，邦和國家的行政人員，與軍隊同是政府權力的代表。

在十九世紀新興的工業中無產者看來，行政人員在政治上的意義和軍隊一樣，同是貴族與資產階級政府權威的具體表現。

行政人員的存在與活動，在無產階級中所引起的反應有消極的與積極的兩方面。具有愛國的情感，同時對

統治階級的仇視不太深刻的份子，其愛國心可以因行政人員的權力與活動而增強。這種忠心的增強，係因政府任用許多勞動階級出身的人充當低級官吏或職工，因此大一部份人當中，獲得公務員或「政府職工」位置的機會，助長他們對政府的好感。在政府中得一職位，可以使畢生的事業有著落，還可以得到養老金。充當政府的職工，比受僱於私人組織較穩定。此外，當了政府的僱員，可以使個人感覺到在社會上的地位，比在受私人組織僱用的較為優越。這在小地方更為顯著。

在另一方面，從社會民主黨影響之下的工人看來，行政人員不過是他們所反對的半專制式政府的一種具體的表現。惟是行政人員雖然有許多地方連非社會黨的勞工份子也對他們深惡痛恨，但是認行政人員為任何政府所必需的觀念，就是在社黨會份子中也有相當的根基。社會黨對行政人員的敵對態度，原由於他們對德國政體的敵對態度而來，最後竟被化而默認現有政府的行政機構為一種必需的行政團體。原有對行政人員的反對，都從各種建議中發洩出來。他們建議將行政的機構撥歸國會與各邦議會統治，藉以除去他們的「軍國主義」和「官僚的精神」。實際上社會民主黨離開原有革命的理論愈遠，便愈不顧馬克斯和翁格爾氏關於必須破壞政府機構的話，同時行政職責的重要愈來愈大。結果在大戰爆發時社會黨便很容易的承認行政人員為國家政府的一部份，必須受着保護。

強有力的行政人員，有許多地方對農業中的無產者的影響，和對工業中的無產者一樣。從農工方面看來，行政人員是具有無上權力的政府的一種表現，一種無上而無法反抗的權威。在大戰以前，普魯士東部操縱下級政

府官吏的地主，往往自己即是地方的法官兼行政長官。結果是在農民的心目中，政府與地主有很密切的關係。因此行政人員也就是一種壓逼他們的機器。行政人員的威力，從他們看來比從工業中的勞動者看來還要大。農民低劣的文化程度和對政治的興趣與常識的缺乏，做成一種在各方面無法除去的阻力當前而毫無希望的態度；不能造成反抗行政制度的精神，所有的不滿，都是對接觸到的個別官吏的仇恨。在戰前社會民主黨曾經得到一部份農民的擁戴，可是為社會黨本身對行政人員就沒有一種明確的態度，農工中他們的信徒對行政人員地位的觀念當然更含糊。

分析完了行政人員對中下級社會的影響以後，我們必須說明上級社會如何將行政人員做成這樣忠實，這樣有用的利器，替他們維持駕馭其他民衆的權力。因為我們很明白的看得出來，這個龐大行政機構的社會結構，紀律，效率，誠實，可靠和普通的精，當然對全體民衆關於公民和國家的意識，有重大的影響。

第一、政府歷來專吸收在社會中所處地位本來忠於政府的份子來充當官吏。可是行政人員數目的增加和漸漸必需容納下級和中下級的份子，使這一點漸次不易辦到。我們已經述過，政府設法藉拒絕一大部份僱員享受官吏的權利來防止這種發展的危險。可是這同時又做成政府人員中的一種分界，將政府人員分為享有特殊權利的官吏，和社會經濟地位較次的政府僱員和職工。

此外，政府還設法用一種「脫離政治」的方法使行政人員較為團結較為可靠。政府要在行政人員當中養成一種對社會，經濟，政治等問題不生興趣的態度，使他們自視為政府的代表，超乎一切普通公民日常問題之上。

十九世紀後半行政人員數目激增，工作範圍擴大，政府不得不收容往往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下級社會份子，遂使這種政策更爲需要。公務員不但不得公開的贊助社會民主黨，而且最好不和任何政黨發生關係。防止公務員與開社會、政治、經濟等討論愈爲嚴密，則公務員愈是政府的可靠工具。

可是行政人員在團體上雖然不自動參加當時政治的鬭爭，實際上（我們已經說過）他們和政黨與議會比較起來可以算是一種優越的政治勢力。這一點行政人員自己也相當的感覺到。他們感覺到普魯士已經成爲一個有力的邦，德國的統一已經完成，不是由政黨和議會得來的結果，而是靠德國——尤其是普魯士軍隊的權力和紀律博得的。他們覺得政黨只能作宣傳，各邦議會只會作長期間的討論，但使德意志在國內外都變成一個強國的，全係行政人員和軍隊的活動、紀律、與忠心。這種在政治上優越的感覺，同時可以使行政人員在民衆心目中成爲熱誠、忠心和權力的基礎，這是政府設盡方法要培植的一種態度。

除了在行政人員中養成一種政治上優越的感覺以外，政府還設法給行政人員一種常人享受不到的經濟安全的感覺，藉以在他們當中培養出一種明顯的忠心。因爲各種原因——主要的是經濟的原因——政府所給的新金和工資，不比私人組織的高；實際上有許多位置所得的報酬，比較私人組織中同樣位置的還要較低，可是政府中位置比較穩定，足以償補這種缺陷。政府人員與私人組織中職員的差別就是公務員的任期是終身的，須經特別法庭長期和詳細的審判以後，纔得解職。此外，行政人員到了相當年歲，照例可得養老金。普通約當薪金的一半數或三分之二，看服務年數多少而定。

所有這些方法，都是傾向於造成一種忠實的行政人員，與其他民衆不同，超乎一切民衆之上。同時還得在官吏當中保持一種高尚的清廉標準和責任心。公務員不清廉事件絕少發生，但一經發覺，立刻免職，貪污與忠君忠國的觀念是不能相容的。同時政府又在行政人員當中養成一種對執行職務客觀的態度。一個官吏愈能夠壓止自己個性的表示和慾望，他愈是行政機器中超乎人事以外的好份子；行政機器的功能愈得充份實現，公務員愈被認為忠誠和能幹。對公務員最神聖的理想是客觀性（大公無私），清廉與責任心。這樣做成一副驚人的行政機器，其中的份子，均足代表被政府所認為理想的臣民的模範。

政府用盡這許多方法將行政人員與普通民衆分開，使他們成爲超乎一切民衆之上團結而忠實的團體，可是行政人員的構成，卻表示他們在社會上也不劃一。行政人員中可分爲上中下三等，反映着每人出身的社會等級。一個人能夠加入那個等級全看他曾受多少教育，而曾受教育多少又剛好反映着三種階級上的差別。加入上等行政人員的行列需受高等教育，加入中等人員的行列需要受中等教育，加入下級人員的行列需要受初等教育。經過若干時間，政府一方面保留這種界線，一方面設法再將每一等級再分成小階層。各層在薪金，行政上的等級，名稱，和權力上都不同。這種差異雖屬次要性質，但足使每級中每階層互相衝突而防止任何等級一致團結起來反抗其他等級，或更嚴重的，反抗政府。

行政人員的社會構成既然大致上反映着社會上經濟的結構，十九世紀後半和二十世紀前半社會中的衝突漸多，這種情形也在行政人員與政府的僱員當中反映出來。一八九七年德意志鐵路工人聯合會在社會黨的

自由工會指導之下成立。政府看到這種組織的危險性，設法對各職員的活動嚴加限制，藉以防止他們的異動。可是這種方法收效不大，政府於是在一九〇四年組織一個與該會對立的團體，一個普魯士海西亞（Hessian）鐵路工人會社的總聯合會。這個聯合會係由地方原有的社交性質的國家主義團體組織成功，人數約有十七萬。政府津貼費用三百萬馬克。除了這聯合會以外，還有基督教全國鐵路工人聯合會，政府對這項組織並不特別贊助，但利用牠來與社會黨的鐵路工人聯合會對抗。社會黨的組織以後加入德意志社會主義運輸工人聯合會（Vorbund Deutscher Transport-Arbeiter）。此外，還有幾個其他的組織，其中以中部聯邦郵電人員聯合會為最重。要。（註三）不過這些團體活動的範圍有限，因為不特罷工，連自己組織起來的權利，都被認為與政府官吏的職責相違背。

歐戰爆發以後，行政人員當中一切的差異，在表面上已經消除。不但全體行政人員看來是一個統一的團體，同時行政人員的數目與權力都大增，以後直變成軍隊在行政方面的臂助，共同為使戰爭結果勝利而努力。行政人員保持他們當政府官吏應得的聲望和特殊權利，同時因為正需要人做行政的工作，因此他們多數得免兵役。歐戰終結，大部份軍隊遣散。名義上只剩下十萬人；可是行政人員不特毫未受損失，而且地位在國內一般人的眼中更加重要。他們是資產階級對社會的統制從革命前到革命後的連接在物質上的表現。社會民主黨對政府的操縱並沒有促成破壞舊有行政組織的圖謀。他們反為公開的抨擊那圖謀干涉或操縱行政機構的工人與軍人評議會。他們設法維持行政人員的系統，只更換些主要的政務人員，和在任用新人員時先注重贊助共和派

政黨的人選。這與社會黨的整個政策相符，因為社會黨不想造成政體和社會間的根本改變。他們反而要盡量獲得行政人員和舊政體遺留下來的勢力的贊助，來對抗更危險的無產階級革命與獨裁。

甚至獨立社會黨也往往對政府的行政機構無可奈何；因為對驚人的行政機構一種畏懼而無可如何的態度，在戰前已經深入人心，他們不想從事破壞。他們一向主張法律與秩序，而且自信力缺乏，認為假如沒有以前遺留下來的久經訓練富有經驗的行政人員，德國政府實無法存在。結果他們的態度和社會民主黨一樣。在所有他們能在工人和軍人評議會中佔勢力的地方，僅革去幾個主要的官吏而代以對革命運動表同情的人。根本原因，是獨立社會黨傳授了他們在歐戰期內脫離的社會民主黨對行政人員的態度。還有，他們致全力於和平的工作，只求戰事終結，沒有注意到行政人員在政治上的重要。

只有共產黨因為有了德國革命中真正革命份子的經驗，和俄國革命的影響，纔在政綱上對行政人員表示明確的態度。（註四）共產黨是明白反對現有行政機構的，認為這是現有政體的主要部份，非破壞不可。共產黨主張將來建立獨裁政體時，要先打破行政的機構，使牠不復成爲一種機構，只利用各部份——尤其是下級份子——來做成未來的無產政府的行政團體。同時他們遇有下級官吏或政府職工對高級長官表示不滿時，總盡量設法贊助下級份子，藉以博得政府中下級人員的好感。因為這樣，勞工階級中，在這方面可說在全國，只有共產黨致力於瓦解現有行政機構。

社會主義的勞工，大多數還保持原有對行政人員不信任不喜歡的態度，但看不出有什麼改變的方法。此外，

他們所受領袖的統治，足使他們最少在理論上承認現有行政人員爲支持共和政體所必需。因此我們可以說，除了共產黨工人外，勞工階級對德國國家政府的忠誠，全靠德國行政人員的規模、訓練、效率和全能，來培養來維持。我們已經述過，行政人員是使資產階級能自革命前到革命後保持對社會控制的主要因素，可是在戰後行政人員的新發展裏，卻有好幾種爲資產階級與貴族所反對的。最重要的，就是行政人員在大戰期內和戰後不久，人數大增，一半是施行每天八小時工作辦法的結果，一半因有同情於社會黨者的加入。結果使政府的機構變成有些過於『共和』的趨勢，同時又需要多量的經費來維持。還有，政府實行了八小時工作的制度，私人工商業也得同樣仿行。

可是到一九二四年以後，整個行政機構經過改組，上述情形已經改變。八小時工作的制度在許多地方已經放棄，尤其在官辦的工業中（鐵路也在內。）官吏的數目大減，除警察外，人數比一九一三年還要少。各種加緊工作和提高效率方法的實施，變成對資產階級的一個大幫助，使他們在私人的企業中也可以仿行這種辦法。此外，一九二四年以後，薪金曾經幾次裁減，政府於是又開了一個先例，使私人企業得以立刻仿效。資產階級的大多數現時視行政人員爲一種得力機構，去執行他們在國會和各邦議會中所參加決定的政策。我們看到過去爲貴族所獨享的高等行政位置，現時多被資產階級佔去，我們很可得到一個結論，說行政人員對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比以前任何時期都更重大。

行政人員對維持資產階級努力上關係的重大，所有團體都感覺到，無論是擁護各『共和』政黨的，或是擁

護國社黨的。我們必須牢記，國社黨雖屢次對共和政府抨擊，他們卻無意於破壞行政的機構。他們除了更換幾個領袖以外，不願使行政機構動搖。實際上他們還靠行政人員來幫助軍隊，破壞素所深惡的議會式政府。資產階級看到現有行政機構在政治上的重要，深知這種機構在議會政體和獨裁政體上工作是一樣的，無論是共和政體也好，君主政體也好。

我們已經說過，行政機構在形式上與組織上向來是一樣。行政人員依舊享受許多戰前時代的特殊權利，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上的特權，不在收入多少，而在位置的永久和有領受養老金的權利。這在幾百萬工人失業的時期中，當然極為重要。

戰後社會改變性質，結果減弱社會優異的感覺。現時這種感覺雖然仍有，已不如戰前那樣重要。在另一方面，共和政府雖廢除了各種榮譽頭銜，但對官銜，始終沒有取消，反而增加不少。結果官界所保留的頭銜影響到社會的生活，使有頭銜的官吏與無頭銜的公民顯然分開。（註五）

這種政治上優異的感覺，曾因戰後的發展一面增強，一面減弱。當大戰終結，議會式的政府成立時，行政人員好像已失去政治上優越的地位，須受社會的統治。可是議會式的政府愈來愈不成功，屢下緊急法令，行政人員為資產階級政府有組織的團體，地位愈增高。結果在議會中的權力與聲望逐漸增強，隨着政府漸從議會式變成半法西斯式的政體而進展。

行政機構的性質和內容，大體上與戰前一樣。行政人員仍是一個有組織，有力量的團體，對公民忠誠的增強

很有點積極的影響。可是戰後有些新發展足以影響到他們的團結性以及他們對社會上一般人的關係。我們已經說過，革命的爆發與共和的成立，消滅了臣民與半專制君主間的關係，做成一種資產階級的共和中的公民。結果使行政人員以往對政府和對民衆的關係略有改變。他們曾致力破除行政人員與民衆間的隔膜，使行政人員對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發生興趣。他們得到各種當君主臣僕時享不到的權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發表政治意見的自由。(註六)他們不但可以隨便發表自己的政治意見(共產主義除外)，且經鼓勵參加政治生活。政府創辦『高級政治學院』給高級官吏一種共和的政治訓練。公務員如自願在議會中選舉，他們還可以有公假來作競選的活動。若被選出，他們不必特別請假來執行職務。(註七)

此外，公務員還有權利組織一個半與工會相似的團體。我們已經述過，在戰前公務員方面已有這種嘗試，在戰事期內更成立一個公務員團體的聯合組織(叫做 Reichsarbeitsausschuss Deutscher Beamtenverbände)這種辦法得政府允許，作為對行政人員要求的一種讓步，藉以增加他們對戰事的熱心。革命以後，公務員獲得與工人一樣結社的特權。一九一八年各公務員團體合組德意志公務員聯合會(Deutsche Beamtenbund)，會員達百萬以上。(註八)最初看來，這個團體好像會和社會主義的德意志工會總聯合會(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簡稱 ADGB)與辦公室中工作人員的同樣組織——阿發(Afa)成立一個三角式的聯合會，藉以使新政府在民衆當中得一穩固的根據。可是公務員當中階級間的仇視不久又出現，當這三角式的團體在一九一〇年宣佈總罷工來聲援政府，反抗苛帕的異動(Kapp Putsch)時，竟遭高級人

員中大部份的反對。他們不久便脫離公務員聯合會而另組全國高級公務員聯合會 (Reichsbund der Höheren Beamten)，受右派政黨的領導。

當德意志公務員聯合會在一九二二年拒絕贊助過激的鐵路人員所發起的罷工時，該會又發生第二次的分裂。(註九)聯合會贊成政府的政策，主張新政府所賦予公務員結社的特權中不包括宣佈罷工來反抗僱主的權利。罷工以後這全國鐵路工人聯合會與其他團體脫離公務員聯合會，組織德意志公務員總會 (Allgemeiner Deutscher Beamtenbund) (註一〇)後來這個組織在左翼社會黨份子領導之下，與自由工會和「阿發」——社會主義辦公室僱員聯合會，聯結起來成立一個三角式的聯合，受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可是一大部份與社會民主黨表同情的公務員仍在公務員聯合會內，這公務員聯合會於是變成代表在中立派政黨領導下的公務員的組織。所謂中立派政黨，係指原來參加維馬混合政府的政黨。經過若干的時日，公務員聯合會中社會上與經濟上的仇視固結日深，甚至會中高級，中級，和下級公務員各成派別 (Arbeitsgemeinschaften) 除上述團體外，還有基督教與國家主義的政府人員的組織。

上述行政人員中不和的情形，表示革命以來所獲得的結社權不但沒有助長公務員間的團結，反為使原有的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仇視得一較有組織的表現，這種仇視，更因戰後的危機而加甚。行政人員在政治上的活動，於相當範圍內，有使任用人員時特別注重本人政治信仰的傾向。這種情形，很明顯的不會提高歷來公務員誠實的標準。這也許與戰後發展的瓦解的影響同是一九一八年以來政治上舞弊事件增加的原因。

另一種勢力足以減弱行政人員的忠心和他們中的團結力的，是政府的用人和工資的政策，尤其是在一九二四年以後的。以前已經說過，政府因為經濟的關係從一九二四年開始將行政機關「合理化」，結果發現可以裁減幾十萬的官吏、僱員和職工。這種「合理化」的辦法繼續下去，政府不斷的裁員。政府的僱員和職工，與受僱於私人工商業的同樣有被裁的危險。同時得有正式官吏位置的人員因受關於公務人員法律所限制，不能隨便裁換。結果是給資格較老的養老金，給資格淺的一種暫時恤金（叫作 *Wartegeld*）這種恤金的多少因服務年數而異，而被裁的多係任用不久的，所以這種暫時恤金大致很微。這不但引起被裁者的不滿，且在大多數公務員當中，都發生反感，因為這種政策，在實際上足以打破公務員職業穩定的感覺。此外，政府僱用新人員，在可能範圍內，總要避免官吏的名義，只當作僱員或職工。這種情形，尤以下級人員中為甚。若是位置的性質不能當作僱員或職工，政府便廣行「候補人」的政策，在候補期內，職務與正式官吏同，但沒有官吏的權利；薪俸也比普通官吏低。被任為候補官吏雖係暫時的，但往往有候至一二十年還補不上的。最末，政府中官吏、僱員以及職工的薪金，經屢次緊急法令大受減削。這雖然為全體公務員所不滿，但受損失最大的，是薪金本來就很少的下級人員。

這種最近的發展，表示公務員對政府的忠誠如何受著消極的影響，以及他們超優一切民衆之上的感覺如何逐漸減弱。行政人員當中社會的和經濟的仇視日見增加，結果會使公務員中各等級與民衆遭受經濟危機損失相同的等級發生比較以前密切的接觸。許多政黨想利用這種不滿的感覺，將各級公務員本身利益作號召，要博得他們的贊助。共產黨用階級的利益來作向下級公務員宣傳的根據，希望這樣可以破壞資產階級政府行政

機關的穩固地位。在另一方面，法西斯黨的目標是要建樹一個有力的行政機構，與軍隊同樣成爲法西斯獨裁政體的柱石。同時並除去議會式政府的需要。爲達到這項目的計，他們設法領導行政人員當中現有不滿的感覺來反對議會式政府，卻不利用任何等級的公務人員來反對其他等級；他們藉抨擊政府「觀望」和「不愛國」的政策來向現有行政人員中各等級號召，指這種政策爲行政人員當中現有不良狀況的主因。可是擁護政府的政黨，卻設法減少行政人員內部的差別，以整個行政人員的團結爲號召，藉以增強行政人員的擁護。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戰後的一般發展——尤其是危機——曾經很明顯的影響到行政人員的性質與聲望。可是行政人員不但能夠保持以往的完整，而且權力和聲望都隨着議會式政府的衰落而增加，雖然沒有在帝國時代外表上的引誘力。可是戰後危機不斷的有使社會瓦解的趨勢，在大體上當然要影響到行政人員。他們的團結與精神，也隨着社會中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鬭爭而減弱。

(註一)關於行政人員初期發展的資料，主要的來源是 Otto Hintze 著的 *Der Beamtensland* (1911) 和 Max Weber 著的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e* 中關於行政人員的一章。還有下列各書，也很有用：

S. Isarsohn 著 *Geschichte des Preussischen Beamtentums vom Anfang des 15. Jahrhunderts bis auf die Gegenwart* (共二冊，一八七四年版)；Albert Lotz 著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eamtentums* (1914)；Fritz Winters 著 *Abriss der Geschichte des Beamtentums* (1922)。

(註二)我們很可以注意到官吏再也不必像從前一樣被稱作「君主的僕人」而被稱作「國家的僕人」。這表示以前君主和官吏間個人的關係，漸漸變成國家與行政機關抽象的，超乎個人之外的關係。在十九世紀的初期，比較近乎資產階級的名辭「官

吏』漸漸代去封建——專制式的名辭『臣僕』

(註三)參看 Fritz Winters 著 Geschichte des Verbandes mittlerer Reichs-, Post- und Telegraphen-beamten (1915).

(註四)在本問題的醞釀中，烈變著的國家與革命很重要。

(註五)著者曾認識一個高級官員，在他的郵件中，封面上寫着“Herr Ministerial Direktor, Wirklicher Geheim Ober-Regierungsrat Dr. von……”這裏“Ministerial Direktor 是他在共和政府中的官銜，‘Wirklicher Geheim Ober-Regierungsrat’ 是他在戰前的榮譽銜（現時已取消）因為習慣關係，依舊沿用。

(註六)參看 Adorno Colvelli 著 Die politische Tätigkeit der Beamten nach preussisch-deutschem Recht (1926); Walter Pietsch 著 Aufgaben, Wege und Ziele der deutschen Beamtenhochschulen (Festschrift Zum fünfzig-jährigen Bestehen der Verwaltungsakademie)(Berlin, 1919-24); Hermann L. Brill 著 Der Kampf um die Erhaltung des Berufsbeamtenkums (1926); Walter Pietsch 著 Jahrbuch der Verwaltungsakademie; Report of Wage and Personnel Survey(Hield Survey Division, personnel classification Board).

(註七)結果現時國會議員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是現任官吏。這無形中給國會一種行政人員的生活『行政化』

(註八)參看 A. Falkenberg 著 Die deutsche Beamtenbewegung nach der Revolution (1920); Kulmann 著 Gewerkschaften und Beamte (1921); Geschäftsbericht des deutschen Beamtendundes für die Zeit vom April, 1922, bis September, 1924;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4. Bundestages des deutschen Beamtendundes, 9.-11. Oktober, 1924; Flügel 著 Die Grundlinie der Politik des deutschen Beamtendundes (1924); Deutsches Beamten-Archiv 著 Deutsches Beamtentaschenbuch; Fritz Winters 著 Beamtenwissenschaft (Ein Wort zur Einführung und Begründung) (1926); Wilhelm Schröder 著 Paul Lockenwitz 著 Der soziale

Niederengang der deutschen Beamtenschaft (1921).

(註六) 魏爾 Fritz Winters 著 Zur Frage des Beamtensprekrochts (1919); Ludwig Bendix 著 Das Streikrecht der Beamten (1922); Vereinigung Internationaler Verlagsanstalten (註七) 著 Der Kampf der Eisenbahner (1925).

(註一〇) 魏爾 Bericht über den ersten Bundeskongress d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Beamtensbundes vom 12. bis 14. Januar, 1925; Protokoll der Gründungsversammlung d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Beamtensbundes am 18. Juni, 1922; Geschäftsbericht d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Beamtensbundes (A D B), 18. Januar, 1922 bis 31. Dezember, 1924.

第九章 軍隊

德國於十九、二十兩世紀間，軍隊在發展民衆對國家的意識上，爲歐洲任何國家所不及。（註一）此中的原因，一半是德國全國統一較西歐各國遲，統一的完成，多靠軍隊的力量。統一遲緩的原因一半是歐洲中部在十七、十八兩世紀間經濟發展的落後，一半是德國在歐洲地理上位置不適宜。幾個世紀以來成爲東西南北各鄰國的戰場。普魯士的團結和發展，是在這種阻力之下完成的，完成多賴軍隊的活動。拿破崙的勝利雖曾稍挫普魯士軍隊的威名，但聯軍終於成功，以及戰後普魯士領土的擴充，又使普軍的威力重振。這種威名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紀，經過一八四八年革命勢力的失敗而益顯著。

最末，有史以來頭一個統一、獨立、和自主的德國完成了。在表面上看來，好像全靠普魯士治下有力量的有紀律的軍隊纔能有這樣的成功。這是從以往的歷史得來的教訓，當事者不斷向全國灌注傳播的一種觀念。軍國的精神在歐戰時達最高點，戰後的發展，不表露出許多方面舊日軍國心理的遺迹，因爲國內外形勢改變以後時代的需要不同，而略改本來面目。

陸海軍與警察同是政府用來執行對內對外政策最後一步物質上的利器。關於研究軍隊在鞏固國家團結上的重要，以下列問題爲中心：（1）軍隊如何發展成爲專供政府驅使的可靠機關，（2）軍隊的存在與活動，如何

在各級社會中推進對國家政府的忠誠。因為要解答第一個問題大部份要看軍隊內部的社會成份和軍隊與社會間的關係，我們先討論第二個問題。軍隊的地位在戰前與戰後又不相同，因此我們在討論上述兩個問題時，先述戰前的狀況，再看戰後的形勢。（註二）

就貴族地主以往的觀點看來，軍隊是維持他們經濟上，社會上，和政治上的特權的工具。軍隊是保護他們的私產，和保持他們控制社會上其他階級的最後武力。還有，貴族對軍官團的把持，使他們的子弟充當軍官的能得終身的職位。大弗來得烈帝特別將貴族階級作為軍官人選的唯一來源。雖然以後兩世君主的政策稍為和緩，而在一八〇〇年非貴冑絕對不能進王家軍校，德意志其他各邦政策大致一樣。（註三）

普軍被拿破崙戰敗以後，軍隊不免改革，使貴族們感覺到再也不能保持軍官團專利。隨着拿破崙的敗退與國內外反動派的勝利，貴族們又能夠減少民團（Landwehr）的勢力，降至次要的地位，幾乎使資產階級份子不能參進軍官的隊裏。這種政策，繼續數十年。後來因為軍隊的增加——尤其是在一八五九至一八六〇這一年間軍隊刷新之後——纔感覺到收容一部份資產階級份子充當軍官的必要。可是高級軍官中貴族份子約佔百分之八十，而參謀本部人員，完全是貴族的專利。（註四）

尤其有趣的，就是軍官團中雖然容納資產階級份子，但騎兵方面則完全為貴族所把持。資產階級份子可以得到需要科學與技術的訓練的位置，如工程隊與砲隊裏的位置等，因為貴族們通常沒有受過這種訓練。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間軍隊擴充，不得收容較多資產階級份子的軍官，在一八七三年間，步兵排長中已有百分

之六十二出身於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到一九一九年，這種百分比增加到百分之七十八。

在十八世紀間資產階級承認軍隊正如他們承認君主政體一樣，因為兩者在相當範圍內，都是他們對外經濟利益的保障。在另一方面，軍隊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地位優越使他們相形見拙，成為社會中次要的階級，則並不喜歡。

普軍被法國革命的軍隊戰敗，政府對資產階級的要求不得不讓步，藉以鞏固自己在國內的地位和抵抗法國革命軍隊的力量。（註五）第一、正式軍隊改組，軍官團中收納一部分資產階級份子。第二、組織一種志願的民團（名 Landwehr），其中包含資產階級，中產階級以及農民份子，收容十七歲到四十歲不在正式兵役的民衆，一大部份歸資產階級出身而非專業的軍官指揮。到一八一三年甚至四十歲以上的人也組織成鄉團（Landsturm），但這種團體，直到戰事終結還沒有多大進展。

這種將全國武裝起來的辦法，對增強中下階級在政治上的自覺，影響很大。正式軍隊與民團間自然的階級上的仇視——尤其是在軍官當中——在戰時就已潛伏著。到拿破崙敗退以後不久就爆發。一經戰勝外國的敵人以後，弗來得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立刻致力於克服國內的敵人——進步的資產階級份子。原來革命的民團，變成正式軍隊的附屬品，這引起進步的資級份子激烈的抗議，他們堅決主張廢除常備軍隊，以民團替代軍隊，保存原有民團的風氣。（註六）

對資產階級的一個讓步，是成立所謂一年志願兵役的制度。（Einjährig Freiwillige）。根據這項規定，會

受教育的資產階級子弟，按照反抗拿破崙戰事時辦法，得受任爲民團中的軍官，最高可當連長。可是資產階級中一大部份對正式軍隊的仇視和對建設全國民團的要求繼續數十年不斷。（註七）在這時期內，德國的資產階級，開始靠和平的關稅聯盟，不靠普魯士或其他各邦的軍隊來保護他們的經濟利益。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又重新提起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組織全國民團的要求，但當時和以後二十年間都沒有多大成績。可是到了普法戰爭的結果使德國統一完成，資產階級承認軍隊現有地位，再也不提起以前組織全國民團的要求。新產生的社會民主黨將這項要求承受過來，作資產階級的後繼。資產階級承認正式軍隊現有地位，雖然軍隊一大部份仍爲貴族所把持。因爲資產階級現時已經成爲新建帝國的共同統治者，他們覺得現有軍隊實在是保護帝國，安內攘外所不可少的。

軍官中非貴族份子的比例，隨着資產階級的發展而增加。主要的司令官在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〇年間幾乎完全是貴冑，在一八九三年至一九〇三年間委任的十八員上將級的司令官中，有八個是資產階級出身。可是這八個資產階級中出身的軍官中，有六個被封爲騎士，藉以保存貴族的風氣。資產階級可以花錢加入精銳部隊中，甚至於加入貴族階級裏。

在無產階級起來以前，小資產階級的人數，在城市各級居民中人數算最多，在資產階級反對常備軍隊，主張全國民團的掙扎中，他們成爲左翼份子。在反抗拿破崙的戰事中，小資產階級與農民，佔志願民團中的大多數。中產階級曾受教育的子弟，居然可以充當軍官。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一五年軍隊改組以後，中產階級也和資產階級

一樣在軍隊當中失去原有的地位，再也不能加入軍官的行列。結果他們又與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一同反對專制政體下的常備軍隊，贊成組織全國民團。一八七一年統一完成以後，他們又和資產階級一樣承認現有軍隊為最近完成的國家統一的保護人。實際上編教科書，在報紙雜誌中發表論文，在各處演講，提倡軍隊和軍事生活的好處的人，還是小資產階級中的知識份子。要使本來就保守性成的藝匠和小商人相信養兵對他們本身有利，原是比較容易的事。

工業革命的急進和工業中無產階級的發展，使軍隊中一部份的制度，成為中級社會自別於無產階級的辦法。例如一年志願兵役的制度，被小資產階級曾受教育的子弟利用來博得渴望的優越地位，不特在軍隊裏，而且在社會生活中，此外，除了還有各種專業上的好處以外，這又是他們加入行政機關當「中級」職員的方法。另一種吸收中產階級的主要份子，使他們擁護政府的有效方法是擴充後備軍軍官的制度，收容中產階級的上層份子。可是下層份子不能參加。例如一個鋪掌的營業規模假如小到要親身招待顧客，他的兒子便不得充後備軍官。一個後備軍官，不能和其所僱用者的女子結婚。小資產階級的下層，能當下級軍官（non-commissioned）這還可以使他們有加入行政機關的機會；縱使兒子不能當軍官或上級職員，孫子最少可以當。這樣兩代以後，就可以擢進社會和政府間中級或較高級的位置，這也是中產階級和他們底下的無產階級的一種區別。這種擢登一般民衆之上的可能性，使軍隊成為中產階級與政府間聯絡的媒介，在增強中產階級的國家觀念與社會主義者所傳播的國際觀念對抗上大有裨助。同時因為中等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區別，比上級社會與無產階級的區別小得

多，這種上進的機會對中等階級心裏上的影響很大，結果往往在中級社會中做成一種愛國心比身為統治者的貴族和資產階級所有的還要強烈。

社會上另一種「中等」的團體便是農民。他們是一種享有小產的階級。他們對軍隊的態度，與城市裏的小資產階級相同，不過在大體上沒有那樣確定，也沒有那樣明晰。

工業中無產階級的觀點，也和社會中其他階級的一樣，認軍隊是政府的存在與權力的物質代表。在信仰任何一種社會主義理論的份子看來，軍隊是特別用來壓逼他們的機器。從比貝爾（Bohl）和來貝樂克（Tiebke-cht）反對普法戰爭時起，在他們當中就有一個繼續仇視軍隊的潮流，一直到今日共產黨對軍隊激烈的抨擊。當然不是所有的無產階級份子都抱這種態度；不過這種態度，只有從無產階級中找得出來。

德國國家訓練的一個大成功，就是戰勝了社會民主黨的反軍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態度。這種發展的主要原因，是社會民主黨雖然指常備軍為資產階級的軍隊，他們還沒有演進到產生一支無產階級的軍隊來和資產階級的軍隊對抗的地步。這是一個擁有無產軍隊的無產獨裁政體的觀念，還沒有養成的必然結果。在一八七五年拉沙爾和愛生樂（Eisenach）兩派合組現有社會民主黨時所接受的哥達（Gotha）計劃中，將資產階級以往組織全國民團（Volkswehr）的要求重新提出，作為該黨的正式條件。馬克斯和翁格爾氏很嚴重的批評這項條件，以為真正的民團，只有在無階級的國體裏能夠存在，社會民主黨所提出的民團性質，結果會和前幾十年間資產階級所提議的相同。（註八）可是社會民主黨並不管這個批評。組織民團始終為社會民主黨關於軍事

方面的中心條件，關係很重大，因為在實際上這足使該黨對於軍事方面的要求，只限於現有軍隊的民本化。他們要求消除現有常備軍隊的濫用，縮短兵役的年限，軍隊由貴族把持的停止，軍官團不再由貴族包辦，以及全國民衆日常生活軍事化的消除。可是他們對於這種新民主本化的軍隊或民團應當由那種階級——資產階級抑無產階級——主持的問題，並未提及。換句話說，他們在軍事上的條件也和他們在政治上的條件一樣。主要的是反對常備軍隊中在精神與形式上封建和專制的痕迹。這不是反資產階級的條件，僅是反封建的罷了。

農業中的無產者因為是在政治上最不顯著的階級，他們對軍隊的關係，一向追隨社會上其他階級。在軍隊裏農業無產份子很少能升到下級軍官的地位。他們一向遭受『少年貴族派』(Junkers)的威逼，使他們對軍隊權威的反感，沒有工業中的無產者那樣劇烈。軍隊對農業無產者的國家和公民的概念，發生多少影響，很不易斷定。最可能的，是他們在軍隊中的經驗，給他們一個較遠大的國家概念。可是我們不要妄卻，農業無產者一向具有順民的心理，這種心理比他們自視爲公民的心理還要強。

在軍隊中用來增強官兵的忠誠的方法，大致決定於軍隊內部的社會成份，軍隊與民衆的關係，以及民衆中社會的交惡情形。工業中勞工和僱主間的仇視，農業中田工和貴族地主間的仇視，在軍隊中形成兵士和軍官間的差別，不特加重階級的意識，而且給這種意識一種軍事的形式。因此形成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在兵士和軍官間養成一種與一般民衆不同而超越一切之上的特殊心理，使雙方對最高指揮者(Oberster Kriegsherr)有一種共同的忠誠。

德國政府迄今仍用以保證軍官團忠誠的最重要方法，是只收納統治階級份子充當軍官。（註九）軍官的訓練，始在限制極嚴的軍官學校，只有貴族和上層資產階級的份子纔能進去。校內關於科學和文雅的教育很薄弱，簡直不知有所謂社會科學，偏重軍事訓練，和發揚一種看不起民間生活的精神。學問被輕視爲一種平民的事業；軍人不重學問，只重動作。在軍官學校受過幾次訓練之後，學員便加入軍隊作下級軍官，很快升進軍官團裏。他們從來沒有和兵士的實際生活發生過直接的接觸，這樣加重軍官和兵士間的界線。政府要使軍官在思想上與兵士和常人都隔離，防止「自由」理想的侵入。政府施行一種所謂「脫離政治」的政策，又讓軍官與聞政治，軍官不特沒有選舉權，而且不能知道一切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問題，這樣他們便感不到社會上現有各種交惡的勢力。

「戰前軍隊中的三萬軍官，在思想上自成一個世界，每日在愚昧中過生活。沒有結婚的軍官，必須在一起聚餐，除了女人，狗，馬，和將來擢升的故事外，什麼都聽不到，這更使他們蔽塞。極少提起社會或政治的問題，縱然提起，他們也不往下討論，認爲這是只宜於平民的。科學與技術的進展，從他們看來是一種神祕。」（註一〇）

軍官具有一種政治上普遍的態度，認識會不但無用，而且是政府的一個危險的附屬品。軍官只要對德皇盡忠，他們自視爲騎士，爲君主的陪臣（vassal），只能對君主盡忠。他們相信在下一次的戰爭中，應先將外交家淘汰，使軍隊的功績不至被他們破壞。這種態度也許可以增強軍官的忠誠，但同時也足以造成軍官與社會間一種隔膜，將階級的差異，變成牢不可破。

軍官們在日常與平民接觸中，往往加強他們自矜的心理，因為他的制服就足使他們的地位超乎一般公民之上。威廉二世和他的祖父威廉一世都時常在公衆地方御制服；他的軍官也得常穿制服，以便使他們滿帶勳章的制服的光輝，和平民平淡的服裝比起來，特別顯得威風。政府中高級文官，往往同時受軍事的任命，以免減低軍事的風氣；例如國務總理勃羅（Bilow），受任爲驃騎軍的上校；國務總理米沙里士（Michaelis），受任爲中校。在朝廷上一個排長的地位，比一個大科學家還要尊貴，一個軍官在青年時就可以得到的勳章，一個文人非有大貢獻便得不到，縱然得到也多在晚年。軍官不受普通法律的裁判，有他們自己的『榮譽法』，這種法律在執行上非常嚴厲。在軍官當中以決鬪報復『侮辱』的方法。軍官侮辱平民並不算一回事，受了平民的侮辱就立刻要拔劍來保護自己的榮譽。在紀載中曾有許多軍官認平民出言不遜，因而拔劍殺人的事件。民衆對這些事件的公憤，只能使肇事的軍官受陸軍法庭幾個月禁錮的裁判。在軍官當中，這種舉動是能博得同儕贊許的，一個軍官若是不能保護自己的榮譽，就要爲同儕所不齒，甚至革職。

軍官的身分，對中上級社會的影響，和對下級社會的影響很不一樣。上等社會雖不滿軍官這種驕矜的態度，他們卻認軍官是國家政府的理想的表現，而與這種優越的人接觸對自己只有益而無害。一個社交的集會非得軍官惠臨，藉以和王室的軍隊發生接觸，不算成功。這種因素在中產階級看來非常重要，因爲這是一種手段使自己的地位提高到與政府以及政府所代表的發生關係。軍官團的組成和機會的壟斷助長中上級社會的忠心，而對下級社會的結果適得其反，不但無裨於全國的團結，而且這種當軍官機會的壟斷，使一國分成兩派。

後備軍官所享權利，雖然一部份與正式軍官相同，但除非本人同時是貴冑或兼充高級官吏，則在社會上的聲望不如正式軍官高。可是在政府服務上有些位置只有後備軍官能升任，一個曾在軍隊中服務的人在工商業中比一個未在軍隊中務服而又非後備軍官的人，較受優待。這後備軍官對於把軍國主義與軍事心理帶到常人生活中去，大有裨助。

在兵士當中養成一種強烈的忠心的問題，與在軍官團當中的同樣問題完全不一樣，因為士兵係從非統治階級出身。（註一一）

在施行普及軍事訓練以前，職業的兵士構成的僱傭式軍隊，大部份係下級社會中的無用份子和外國人。他們的結合，大致由於懼怕受懲罰，非由於真正忠君愛國的意識。普王弗來得烈威廉一世繼續擴充軍隊，覺得僱用職業的兵士費用太大，因此在一七三三年的「分區」諭令（canton edict）中（在一七九二年經弗來得烈威廉三世大加修改）實施對普魯士全體民衆強制徵兵的辦法。因為免除兵役的人數太多，被徵的多係最貧窮的階級中人。他們因為社會地位的卑下，很容易用通常對付正式兵士的方法來使他們服從。

當普魯士被拿破崙打破，弗來得烈威廉三世不能不實施全民軍事訓練時，他經過長期間的考慮纔能決定，本來對武裝全體民衆的結果，沒有多大把握。當「解放」的戰爭終結時，弗來得烈威廉樂得將軍隊改組，在保持全民軍訓的原則下，將常備軍減至四萬人，兵士多半出身於城市或鄉間的下層階級。

在十九世紀間常備軍的人數又逐漸增加，直至與行政人員的情形一樣，不能不收納多量最低級社會的份子。

對新招的士兵，在入伍後設法讓他們與平民生活分離，在他們當中造成一種軍隊的心理，將平民目爲卑下。在軍營中居住，已經與民衆隔離；加以在下級軍官勢力之下，語言讀物都受他們統制，結果在兵士當中造成一種與民間生活完全不同的心理。軍隊中不特沒有給兵士們公民的訓練，反而消除兵士們一切公民的活動和公民的概念，而代以一種忠誠和服從，不是對國家，而是對該管長官和最高的指揮者——德皇。因爲兵士所受的是順民的而非負責的公民的訓練，他們對於一切公民問題的教訓，從來未嘗受過。他們有時要聽長官演講，但這類演講，大致係關於臣民對君主的責任的教訓和對要破壞國家與社會組織的「無祖國者」的排斥。在入伍以前的生活中，兵士是臣子兼公民，在軍隊中僅係臣子。他們不斷的受紀律理想的薰陶。當事者要在軍人當中，養成一種盲目而機械的服從，能自動的遏止一切情緒的和智慧的反應，戕賊一切個人創造性的表現。因爲軍官對紀律的執行上擁有專制的權力，連下級軍官也有相當的威權，結果常有軍官對下屬濫用賞罰的事件。這種對待兵士的不公，加上絕對的紀律的不可免，是養成一般人厭惡軍隊生活的一個重要原因。（註二）

可是還有其他因素，無意中可以對兵士發生影響，使他在情緒上離不開軍隊與政府。軍隊中的生活，使他幾年內沒有經濟的憂慮。可是這種經濟上的吸引力，是因人和因時而異的。農民們從來不會願意讓子弟去投軍，因爲在兒子服兵役的期間內，田中的工作還得僱人幫忙。工業中的勞動者若將服兵役的兩年期間來做別的工作，很可以有點儲蓄。但在經濟的危機中，軍隊的生活最少可以作爲一種職業。服兵役的人從家鄉比較狹小的環境中，出來與德國各部份和社會上各等級的人接觸，得多見國內各地的情形，可使國家的意識增加。軍士們大概在

入伍時算是有生以來的頭一次和大多數人聚居，穿同樣的制服，參加共同的操練，受著軍樂節奏的刺激；他們不覺發生一種對國家關係上團結一致的感覺，與以前任何經驗都不同。所有這些因素，往往連在一起給軍士們一種有生以來印像最深刻之情緒的經驗。假期中穿著制服回家，他不特為全家引以為榮，而且還博得許多異性的欽慕。到年紀稍長脫離軍隊以後，對軍隊生活許多不良的方面好像已經忘卻，對以往軍隊生活的自尊心油然而生。甚至較老的社會民主黨的勞工份子，在羣坐飲啤酒的時候，也往往津津樂道當年在軍隊中的經驗。

經過長久的期間，政府發覺軍隊看來並不是他們所想像的那樣一個發揚愛國心的有效工具。在每次選舉中，社會民主黨的票數都較前增加。到了一九一三年，軍隊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未來投社會黨的票或與社會黨表同情的人。實際上軍隊因為加強社會上階級的差別，無意中助長社會主義。

我們特別要注意到下級軍官的地位。在舊有軍隊中，從大弗來得烈時代直到今日共和國的軍隊，下級軍官幾乎全由中產階級的下層和農民中出身，工廠中的工人沒有機會充當。新入伍的兵士係由下級軍官教練。他們對兵士的待遇以殘酷著名，這已成爲一般人對軍隊生活不滿的一個原因。經過十二年的苦役以後，他們可以獲得畢生受任爲政府中低級官吏的資格。他們在公務中所抱的自大態度，使他們和他們所代表的軍隊的制度很不得下層階級的好感。他們活演着一種悲劇，就是身爲下級社會份子每想擢升在一般民衆之上，而同時又不能加入統治的階級。下級軍官的地位，向來是軍官團和兵士兩方面的交接點。他們是將長官的命令傳給兵士的媒介；替長官擔受兵士們的怨恨。

各地退伍軍人的團體 (Krieger Vereine) 在傳播軍隊精神到民衆這一方面，地位非常重要，雖然他們的勢力，現時因有各種國家主義的半軍隊式的組織而減色。他們的重要性，在於把軍官和兵士一齊包括在內，利用共同的經驗和記憶來將社會上各等級團結一致。

這種團體在拿破崙戰事之後不久就開始，人數日增。普魯士政府不久也看出牠們在發揚對君主政體的忠心的重要。在一八六四年的戰事以後——尤其是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以後，這種組織發達得很快，變成培養忠君愛國情感的中心。社會黨和自由工會份子不特幾乎不能參加退伍軍人會，這類團體還禁止會員投票選舉「破壞黨」。

這些地方團體以後合組邦的聯會，各邦聯會又組成全國的總會。名為氣弗好色聯合會 (Kyffhäuserbund) 在一九〇〇年間成立，當時各邦聯會一起在條林吉亞 (Thuringia) 地方氣弗好色 (Kyffhäuser) 山上建立一個全國著名的紀念碑。即將大戰時總會內包括二十七個邦會，三二、〇〇〇地方分會，會員人數共有三百萬人。(註一三)

在大戰期內軍隊變成全國思想上和物質上的注意點。常備軍按全國人口什一微調，專業的軍官人數漸減，替代他們的或是年青缺乏經驗的軍官，或是從後備軍官中補上的。這類軍官因為有事業和家庭的牽掛，對新職務沒有決心。(註一四) 兵士的種類也有改變。作戰的隊伍，在一九一四年時多係常備或後備軍中的未婚青年，到一九一七年漸漸要用多數年紀較大已婚的或從來沒有受過正式軍事訓練的人來補充。到一九一八年連十七八

歲的男童也被徵入伍，戰事拖延下去，雖不斷有局部的勝利，但總無結果，國內的經濟情形漸漸不能支持，軍隊中漸漸發生反感，漸成明顯的不滿意的表示。最末，在一部份軍士中釀成公開的抗命。這種發展，更因軍隊中新舊弊端而加甚。（註一五）

戰事繼續，使軍士們愈覺到軍官們並不一樣的與他們同受痛苦與犧牲，他們看到軍官的生活不但安全舒適，而且甚至流於奢靡，而他們則要拚命。這種反感，尤以對從來沒有嘗過礮火滋味的參謀人員為甚。軍士對軍官發生惡感的另一原因是士兵從九死一生的前線回到後方，還要受和初入伍時一樣辛苦的操練，而軍官則在後方享樂。軍士稍犯紀律，便受嚴重的處罰，而軍官則可以任意作很明顯違犯軍紀的事情。還有一個兵士無論怎樣勇敢，無論有多少經驗，很少有機會升到下級軍官，但上級社會出身的一個十八歲的孩子，一經從戎，就立刻當排長。往往四十歲以上有家室而飽經戰陣的兵士，要受年少自大而從來未參戰役的排長指揮與懲罰。在戰壕中常有不得勢的，贊成罷工的，和非戰的份子。因此軍士當然要感覺到軍隊不只一種，實有兩種：其一是效死作戰的，其一是發號施令的，前者為下級社會所構成，後者為上級社會份子所營的禁樹。

在大戰的最後一年中，當事者曾經試設所謂『愛國的功課』（Vaterländischer Unterricht）來鼓勵軍士們的精神。一九一七年十月開辦實施這項工作的軍官訓練班，在一九一八年中，軍士們已經有一部份受到這項宣傳（註一六）可是許多人以為這種宣傳的結果，與本意正相反。其他用以鼓勵軍中精神方法，還有勳章的給予——尤其是鐵十字章。戰事繼續下去，軍士（甚至於平民）的勳章，如雨降下，逃避勳章之難，有如逃避槍彈一

樣。(註一七)

可是到一九一八年進攻失敗以後，大局已不可收拾。(註一八)德國方面同盟軍的崩潰已成必然的事實，軍隊中司令的機關和各高級軍官一時都不知所措。在軍士中一部份也有同樣的現像。最初成立的工人和軍人評議會只包含國內後備軍的兵士，前線上的兵士直到德皇出走，十一月九日臨時政府成立以前還沒有何種動作。爲保持對軍隊的統制起見，——尤其是在西方前線上正趕緊後退的部隊——，在興登堡將軍領導之下成立總司令部，決定對革命的潮流讓步，發令選舉軍人評議會，輔助軍官撤退在法國和比國境內的部隊。這一步完全做到。軍士們心目中的最高限度，不是革命的完成。而是停止戰事，好趕快回家去。(註一九)

軍隊回到家鄉以後，他們漸漸解散，而接近於比較帶有革命性的工人評議會，可是因爲軍士比較工人保守，他們又被各政黨——尤其是社會民主黨——利用來打倒工人和軍人評議會中的獨立社會黨與斯巴達團體份子。

當協約國最後允許德國有十萬陸軍來平止內部的叛變時，軍隊多由義勇軍中改編。從資產階級和貴族看來，國軍 (Reichswehr) 向來是執行政府政策的一種最可靠的武力。軍官團係由貴族與資產階級中保守的和可靠的份子所構成。在一九二六年間，國軍中二十六個司令官有十五個是貴冑，現有的三師騎兵，還以有貴族充當其師長而自豪。

國家軍官團的構成和舊日帝國軍隊一樣，但兵士間社會的和政治的成份已經改變。新兵入伍不由陸軍部

而由每連的連長經手。因為連長都帶有很明顯的國家主義色彩，他們在招收新兵時，非經可靠人介紹或用其他方法保證不輕收容。因此現有國軍反不如舊日帝國軍隊一樣，可以讓社會黨或民主黨混進去，和共產黨表同情的更無法參加。

現時推進國軍中兵士忠心的問題，當然與舊日帝國時代不一樣。(註二〇)第一軍隊完全由職業的兵士構成，每人服役的期間定為二十四年，十二年現役，十二年後備。在後備期內，他們被用為行政人員，軍隊的專業性，使兵士與民衆分開，較戰前更有效。兵士畢生有職業，可以使他們擁護現政體。在平民生活中謀生的機會愈少，這種因素愈重要。他們覺得自己在現有社會中享有特殊的經濟地位，這種感覺，較政府中官吏還要深切。政府還開辦公民訓練的演講與課程藉以增強他們對共和國的忠誠。

國軍對共和國的保護，究竟可達到什麼程度，我們很難說定。國軍對擁護共和，壓止革命工人的騷動的可靠性，似乎無足懷疑，但假如國社黨異動時，他們能否一定站在政府一邊，那就不易肯定，因為這要看許多條件。不過我們可以說，因為政府的策略愈變愈保守，早已具有半法西斯的特性，國軍和政府內部的關係，當然已經增強。此外，假如要建立法西斯的政府或由國社黨與其他右派政黨合組政黨，國軍一定能夠成為該政府的忠實的機關，那是毫無疑義的。(註二一)

除了國軍之外，還有不肯承認新政府，努力從事復辟工作的義勇團，其中最重要的有「Brigade Ehrhardt」，「Wervolf」，「Oberland」，「Roosbach」和「Organisation Consul」等組織。隨着通貨膨脹期內經濟困

苦的增加，這種團體的數目和團員的人數也大增，他們的領袖還往往與國軍中的軍官有密切關係。許多向共和國與共產黨領袖帶有政治意味的行制，是由這類團體主使的。一九二四年通貨穩定以後，這種陰謀團體的重要性漸失，想要在共和國法律範圍之內實現軍國的與君國的理想，『鋼盔團』(Stahlhelm)開始發達，逐漸吸收一部份義勇團。(註二)在色德 (Franz Selde) 和杜斯德堡 (Dusterberg) 兩人領導之下，鋼盔團現時自稱有團員一百萬以上，是已經衰落而擁護君主政體的國家主義黨的臺柱。

因為反動份子的兵力和國軍在政治上的不可靠，原有合組維馬混合政府的三個中立派政黨從一九二三年起開始仿照『鋼盔團』辦法，將附從者組織起來。一時有『國旗團』(Reichsbanner) 的突興，團員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社會民主黨的信徒。在一九三二年的年頭，國旗團自稱有團員一百五十萬，其中有十五萬精受軍事訓練，有戰鬥能力。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加強現有共和政體的軍力與聲望。

為建立一個與國旗團和鋼盔團對抗的軍事勢力計，共產黨也組織『赤色前線戰士團』(Rotfrontkämpferbund) 這是遇無產階級革命發生時，紅軍發展的中心點。可是這團體在一九二九年被取締。他們雖仍非法的變相存在着，但他們的活動和發展，大受限制。

近幾年間國社黨的軍事組織，『挺進隊』(Stormtroops) 隨着該黨驚人的進展而發達。人數估計在二十萬至五十萬之間。一九三一年國社黨和他們的挺進隊與國家主義黨和鋼盔團聯合組成所謂『全國的反對黨』(National Opposition)。反對的主要對象是共產黨，暫時的對象是勃倫寧的政府。這種『全國反對黨』

在一九三二年曾經分裂，但在希特拉領導下妥協內閣的成立，表示這些反對勢力受國內過激主義發展的壓迫，已經在根本上團結一致了。

所有這種軍事的團體，都按時舉行操練，在各種公共集會以及慶典中，作軍事式的列隊遊行。他們都有短小的兵器可以互相殺害，雖然現在是否已經有大批來復槍和機關槍，還是一個疑問。如果萬一國社黨與現政府發生內戰，『國旗團』一定要得到政府充份的供給軍械來作國軍的後援。還有，假如反共的內戰發生，國社黨的『挺進隊』以及『鋼盔團』也會受政府同樣的供給。最重要的，不在他們現有軍械的多少，而在他們是善經訓練的軍事團體，遇有內戰發生時，可以為各方所利用。革命以來強烈的政治和經濟的鬭爭，已漸帶有軍事的色彩。大有將全國變成武裝軍營之勢。雖然還沒有公開的內戰，但各方面的交惡的強烈，幾至隨時有發生內戰的危險。交惡的程度，可以從一九三二年間各地軍事組織的衝突估量出來，計死者一八二人，受傷者約有一萬五千人，其中大多數是國社黨或共產黨。（註二三）

德國軍隊被遣散以後，曾經參與歐戰的軍官開始組織各種團體，其中之一是「德意志軍官會」（Deutscher Offizierbund）。該會成立的主要目標是資助被解職而尚未謀得適當職業的軍官。另一組織名「德意志全國軍官聯合會」，主要的工作是維持舊日國家的風氣。

還有各種團會（Regimentstvereine）也很重要。這項組織有兩種：一種會員中包括軍官與士兵，另一種只包括軍官。大戰後曾出現幾種團體，目標在促進戰前受傷至成殘廢者的經濟利益。

關於警察在鞏固對國家忠誠的地位，我們也得略為說及。（註二四）警察是一種輔助軍隊的武力。他們和軍隊不一樣的，就是每日與民衆發生接觸。因此他們對民衆的生活和思想，有直接的影響。這一點尤以在德國為然，因為德國的警察除了維持法律和秩序以外，還有許多在他國歸行政機關主管的工作。警察常是政府的臂助，足以增強國內許多人對德國政府權力的嘉許——尤其是中產階級。在另一方面看，警察在執行職務時的官僚高傲氣派，在大戰以前引起下級社會對政府的惡感，恐怕比軍隊尤甚。這種反感最好的一個例，就是「軍警國」[*Polizei und Militärstaat*] 這個名辭的用法，這名辭的意思，就是指壓制公民的權利與自由的政府。

革命的發生與共和的成立對警察權限，沒有減少，反為增加。普魯士管理警察的權限一大部份還從地方當局的手中移歸普邦內政部。這種發展，是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無產階級屢次舉事的結果；有許多地方的警察，在事變時不能或不願抵抗。過激主義的進展，使普魯士政府施行一種逐漸將警察軍隊化的方針。警察須受軍事訓練，平時有機關槍，裝甲車，淚彈等設備。在各次事件中，表示警察的軍隊化，在維持現有體制上是一種很有效的武器。（註二五）

我們還須附帶說及海軍在發揚國家忠誠上的重要。（註二六）德意志的海軍是德意志帝國發展的產品，隨着帝國主義的發展，德國商業的擴充，資本的出口和殖民地的獲得，而地位愈形重要。對資產階級的發展，海軍是比較陸軍更直接的一種工具。但從大多數民衆對國家忠心的推進上看，海軍沒有陸軍那樣重要。可是隨着海軍本身的數量和重要性的增加，他們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增高不少。因為德國要建立一個可以和英國競爭的

海軍，在關心德國發展的人們的國家主義中，也開始含有反英的色彩。

這種反英的情感以大戰的爆發而表現極彰。國內一般人都希望德國的海軍能夠保護祖國來對抗較優的英海軍。世界各處德國巡洋艦個別的勇敢，潛水艇的戰爭，以及則蘭 (Jutland) 的戰役，給德國海軍一種浪漫的光榮，成爲祖國的干城。

但在海軍當中，不滿的感覺仍不能免，而且表露得較在陸軍中還要明顯。原因是：第一，海軍中有與陸軍裏相同的苛刻情形；因爲艦上官兵間居處較近，這種情形特別容易感覺到。第二，在歐戰中一大部份時間海軍被逼不能活動。最末，海軍中沒有像陸軍裏一樣強烈的軍國風氣，精神不如陸軍。獨立社會黨設法利用這種不滿，在一九一七年間一個變叛的計劃被發覺，結果兩名海軍兵士受軍法裁判，處以槍決。

海軍和陸軍不同，在革命的發動與擴大中，都居領袖的地位。當西戰線上陸軍被逐後退時，有一種流行很快的謠言，說全體海軍將要被調出來與英海軍決戰，作挽回頹局的孤注。這項謠言，激怒海軍甚烈，結果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四日停泊在開愛爾 (Kiel) 的某某數艦上兵士抗命，當局設法逮捕他們，竟激起開愛爾地方工人的異動。第一個工人和軍人（實際上是海軍的）的評議會便在該地成立。這次變叛消息傳出，各艦上軍士羣起響應，立刻登岸，到國內各重要城市去創立工人與軍人評議會，志在建設新政府，停止戰事。

和約中關於德國海軍須由英國接收的規定，在國內大動公憤。至開得斯卡帕弗羅港 (Scapa Flow) 艦員交出船隻後將船底洞穿的喜訊，而稍爲平息。在共和政體下，海軍因爲受條約嚴格的限制，地位並不重要。不過這

種限制，常為右派政黨借口來激動愛國的情緒。還有，每次舉行凡爾賽條約所允許的新艦下水典禮，都用作盛大的國家主義的示威運動。

- (註一) 參看 *Bärensprung* 著 *Der Nutzen der Armee und Flotte für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Beihft zum *Militär Wochenblatt*, 1904, 10. Heft.); *Lujo Brentano* 與 *Robert Kuczynski* 合著 *Die heutige Grundlage der deutschen Wehrkraft* (1900); *W. Hedler* 著 *Verdegang des deutschen Heeres* (1909); *H. Mellin* 著 *Heer, Staat und Volk* (1912); *Militärstaat und Bürgerstaat* (Sonderabdruck aus der *Frankfurter Zeitung*, *Erstes Morgenblatt* vom 27. & 30. Januar, 12. & 14. Februar, 1914) (1914); *Adolf Mühlmann* 著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in Deutschland über den Grundsatz der allgemeinen Wehrpflicht* (1909); *Martin Hell* 著 *Die Landsknechte. Entstehung der ersten deutschen Infanterie* (1914); *Otto von Sothen* 著 *Vom Kriegswesen im 19ten Jahrhundert* (1904); *M. Schwartz* 著 *Technik des Kriegswesens* (1913) (也有 *Kersting* 作的一節關於軍隊對普通民眾的影響); *Walther Thinius* 著 *Die Anfänge des stehenden Heeres in Kursachsen unter Johann Georg III. und Johann Georg IV.* (1912); *Otto Wigand* (註二) 著 *Zur Psychologie des Militarismus. Von einem deutschen Soldaten.*

- (註二) 因篇幅有限，警察與海軍的地位僅在章末提及。
- (註三) 欲知其詳，參看 *Schwartz* 書(書名見前)第八二一頁。
- (註四) 關於這方面的詳細統計，可參閱 *Franz Karl Endres* 所著的 *Soziologische Struktur und ihre entsprechenden Ideologien des deutschen Offizierskorps vor dem Weltkrieg* (載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LVIII (一九二七年) 第二八二頁至三一九頁)。

- (註五) 關於德國海軍部之發展 著者 Wilhelm Wendland 著 Versuche ein r allgemeinen Volksbewaffnung in Süddeutschland während der Jahre 1791-1794 (1908).
- (註六) 欲知其詳 著者 Freytag-Loringhoyen 著 A Nation Trained in Arms or a Militia? Lessons in War from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1918).
- (註七) 著者 Pinkow 著 Der literarische und parlamentarische Kampf gegen die Institution des stehenden Heeres in Deutschland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9. Jahrhunderts (1912).
- (註八) 著者 August Bebel Nicht stehendes Heer sondern Volkswehr. (1898); Karl Schmidt 著 F. Engels W. I. Lenin, Militär-politische Schriften, 1 冊 (1930-31)
- (註九) 著者 Riesel (在望 著) Der deutsche und französische (Offizier, eine soziale Studie (1907); Franz Karl Endres, (魯岑武藏)Freiherr von Freytag-Loringhausen 著 Was danken wir unserem Offizierskorps? Zwei Jahrhunderte seiner Geschichte (1919); Hans Lebert 著 Der Offizier als Erzieher und Volksbildner, Eine psychologisch-pädagogische Studie (1910).
- (註一〇) 著者 Endres 著 魯岑武藏 著 三〇 頁
- (註一一) 著者 Cochenhausen 著 Die Erziehung der Soldaten (1905); Moritz Exner 著 Katechismus des deutschen Heeres (1896); G. Gleich 著 Die alte Armee und ihre Verirrungen. Eine kritische Studie (1919); Georg Evert 著 "Die Herkunft der deutschen Unteroffiziere und Soldaten am 1. Dezember, 1900" (Zeitschrift des Kgl. Preussischen Statistischen Landesamtes, Ergänzungsheft 28); Arthur Janz 著 Die staatsbürgerliche Erziehung im deutschen Heere bisher und in der Zukunft (1919); Georg Liebe 著 Der Soldat in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 (1919); Die Soldatenmishandlungen vor dem deutschen

Reichstag (aus den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vom 10. und 21. März, 1893) (內有官方報告原稿的翻印)

(註一二) 參看國會和普魯士議會關於社會民主黨提出的歷次軍隊中濫用職權事件的紀錄。

(註一三) 參看 von Westphal 著 Handbuch für die Kriegervereine des deutschen Reichskriegerbundes "Kryfhäuser" (1922); von Westphal 著 Das deutsche Kriegervereinswesen (1906) Kriegervereine und Arbeitervereine (1909).

(註一四) 參看 E. Hartmann 著 Handbuch für Einjährig-Freiwillige Reserveoffizier - Aspiranten und Offiziere des Beurlaubtenstandes der Verkehrstruppen. Unter Mitwirkung aktiver Offiziere (1915); Hugo von Melchior 著 "Fürsorge für das geistige Leben im Heere, Wohlfahrtsanstaltungen usw." (編 in Der Grosse Krieg 1914 - 1918 第十卷第三部第七節 (一九一三年第三四八頁至三八八頁)) Adolf Matthias 著 Deutsche Wehrkraft und kommendes Geschlecht (1915); Hans Schreiner 著 Die allgemeine Wehrpflicht und ihre gesellschaftliche Bedeutung (1915); K. Schubert 著 Der deutsche Soldat (1918); Erich Lüdendorff 著 Urkunden der Obersten Heeresleitung über ihre Tätigkeit 1916 - 18 (1920); Constantin Altröck 著 Vom Sterben des deutschen Offizierskorps. Die Gesamtverluste unserer Wehrmacht im Weltkrieg (1922); Der Weg zur Wahrheit. Führervertrauen und Führerhass im Kriege. Von einem Frontoffizier (1920)

(關於海軍官團的一個客觀的分析)

(註一五) Herman Kantorowicz 著 Offiziershass im deutschen Heere (1919), 特別值得參考。

(註一六) 秘密的命令, 不斷的分發給各指揮官, 對實施時在技術上的詳細情形, 特別指示, 著者在巴黎附近 Vincennes 地方的一個專門收藏關於歐戰材料的圖書館中, 曾發現許多這種訓令。這些文件對研究宣傳方法的人, 極有意思, 但因為太長, 太複雜, 而

且結果對這次研究並不重要，所以在這裏我們不細加分析。（參看 W. Bäuerle 著 Ziele und Wege der Truppenaufklärung. Nach einem Vortrag als Manuscript gedruckt, Stuttgart, Spelly. Generalkommando 1. Teil. III. Heft. "Truppenaufklärung".）

（註一七）我們很可以注意到甚至在鐵十字的頒給時，還保存住階級的界線。例如『一等鐵十字』大致只頒給軍官，『二等鐵十字』頒給兵士。

（註一八）協約國與獨立社會黨以及斯巴達卡斯團體在軍隊中的宣傳的重要性，曾引起德國熱烈的辯論。著者在他正進行的另一個關於德國革命的研究中，曾經遍閱所搜集來的宣傳品，並曾與參加過組織這種宣傳工作的人細談。研究的結論是這種宣傳的效力極微，而且只限於少數團體。在革命爆發時成立的軍人評議會的紀錄中，也證明這一點。

（註一九）在這裏我們可以略為補充一下。在上述的研究中，著者遍閱可以得到的軍人會開會時的紀錄。這些紀錄，幾乎一致表示軍人評議會的注意點除了要求廢止一切職權的濫用以外，就是恢復軍隊的良好紀律，維持『法律與秩序』。我們還可以注意到東部軍隊雖與蘇俄的布爾薩維克軍隊直接發生接觸，但他們的評議會卻沒有要仿效俄國布爾薩維克革命動作的表示。他們看不起俄國人，覺得俄國人是文化低劣的民族，他們只想早點回家。有幾次左傾的軍人提議向俄國人致賀，但這些提案，都被大多棄否決。

（註二〇）參看 Th. Bertelot 著 Kultur- und Lebenskunde für Reichswehrschulen (nach den Lehrplänen des Reichsministeriums vom 10. Dezember, 1920); Feeser 著 "Soldatischer und bürgerlicher Gehorsam"; (見 Wissen und Wehr, 7. Heft (1928), 第三八五頁至四〇一頁); Oswald Froh 著 Erziehung im Heere (ein Beitrag zur Nationalerziehung der Erwachsenen) (1926); Jelfriden für dan Unterricht Ihm Heere (Reichswehrministerium 刊行. Heeres-Inspektion des Erziehungs- und Bildungswesens, 1926) (又參關於軍士的權利與義務，附有戰爭在軍事方面的歷史。) Fr. Schmidt 著 Der Wehrmann des 20ten Jahrhunderts.

- derts) (1928); von Waldeyer-Hartz 著 Mannszucht bei Heer und Marine (1920).
- (註111) 魏廉 Walter Hising 著 Die neue Wehrverfassung (1920); Bernhard Kiessling 著 Deutschlands Reichs-
heer der Zukunft; Rudolf Liepmann 著 Die Politischen Aufgaben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1923);
Karl Oertzen 著 Deutsches Reichsheer (1922); Ludwig Märcker 著 Vom Kaiserheer zur Reichswehr
(1921).
- (註112) 魏廉 Fr. Bendznlar 著 Der Stahlhelm (1925); Karras and Koennecke 著 Sechs Jahre Stahlhelm in
Mitteldeutschland (1926).
- (註113) 關於德國海軍發展計劃的專法雜誌見魏廉 H. R. Knickerbocker 著 1923年4月11日 中華民國海軍 (New
York Evening Post) 雜誌第15號。
- (註114) 魏廉 Ernst van den Bergh 著 Polizei und Volk. Seelische Zusammenhänge (1926); F. Friedensburg 著
Wirtschaft und Polizei (1926); Fritz Hellweg 著 Die Polizei in der Karikatur (1926); H. H. Houben Polizei
und Zensur. Längs- und Querschnitte durch die Geschichte der Buch und Theaterzensur (1926); H. von
thiermann 著 Aus den Geheimakten der politischen Polizei. Erinnerungen an ihre ehemalige Tätigkeit
(註115) 一九二九年柏林五月紀念日示威遊行計劃之表現也。魏廉的效勞也。一國或
(註116) 魏廉 Doctor Eredt 著 "Der geplante Flottenvorkoss Ende 1918" (或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CCVII
(一九二七年三月) 第一八九頁至二〇六頁) Deutscher Flottenverein (出版者) Deutschland sei wach!
Betrachtungen über Rüstungsfragen und Weltpolitik (1912); Captain Wittmar 著 Deutschlands Taten
zur See von ihren Ursprüngen bis zum Weltkrieg (1925); Arnold Fuchs 著 Die deutsche Flotte
(1920); Kalandar des deutschen Flottenvereins; Admiral Scheer 著 Deutschlands Hochseeflotte im

第十章 學校

學校在一個國家裏，無疑的是養成後一輩人的國家意識以及對現有國體的忠心的一種最重要機關。尤其是在整個教育系統都在政府掌握中的國家裏，這更毫無疑義。在這裏我們最好將以前討論過的國體性質的變遷，略為重提。因為國體性質的變遷，同時要影響到教育的理想，課程，教學法，以及學校造成的結果。在封建的社會中，無所謂公民訓練，因為那時就沒有公民，只有統治者和治下的百姓。公民訓練這個概念的起源，係起源於封建的資產階級要在社會上與在政府中獲得一個地位，同時將社會與政體改變來適應他們自身的發展。資產階級這種控制和改變社會與政體的嘗試成功以後，公民訓練的中心問題變為如何使中產以下的階級——尤其是較低的——歸依新建的體制。（註二）

德意志的學校，本來就帶有很明顯的階級性。為貴族與資產階級和為中下級社會設立的學校，各有區分。結果各階級學校的目標和科目，自然也不一樣，每種學校的宗旨，是要給本階級的人一種能夠應他們的需要，使他們忠於現有政體的教育。同時這種學校還能夠使每個階級繼續自成一團體，永遠保持着階級的界線。以前資產階級的份子要進專為貴族設立的學校，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一直到最近，一個中等以下階級的份子要進為中上等社會特設的學校，也很困難。這樣對教育的階級性的注重，使高級教育成為統治階級的專利品，同時這種

辦法，在中下級社會對國家忠誠上要發生反面的影響，因為這使中下級社會份子不斷的感到自己在社會上低劣的地位。在中下級社會都能各安本份，承認現有制度爲不可免的時候，這當然不一定有什麼壞的影響；一旦中下階級對現有社會制度或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起了疑問，這種階級性的教育的壞影響就要出現了。

現在讓我們一看在歷史上學校如何被用來發揚對現有政體的忠誠。(註二)我們只須從宗教改革的時候說起。宗教改革將學校和其他的權利從教會的手中移歸專制君主的掌握裏，給凡俗教育（對宗教的教育而言——譯者）一種新的推動力。結果使大小各邦的君主，都對學校系統發生比較明確的興趣，因為學校變成鞏固他們的政治地位的工具。這種運動是路德（Luther）和他的同志所贊助的，因為他們主張教育應當包含宗教的與凡俗的兩種性質。事實上路德在德國被教育家認爲公民訓練的鼻祖。希望擴充這種凡俗的教育最切的，是十六世紀間正在發展的資產階級，他們自己開始一種學校，名叫公民學校（Bürgerschulen）。(註三)可是十七世紀德意志經濟的崩潰使教育成爲一種奢侈品，政府和資產階級兩方面都無力作像從前一樣大規模的擴充。十八世紀經濟復興以後，正在起來的資產階級和王公們兩方面都重新關心教育事業，想用教育來鞏固他們的地位。在整個開明時期中，他們更得了較進步的法國資產階級對傳播知識與教育先例的鼓勵。這種運動在德國資產階級中產生不少的教育理論家，在那裏很明顯的形成公民（資產階級份子）訓練的問題了。我們很可以對這些教育理論家，詳爲論及，因爲他們代表最早的有系統的實施公民訓練的嘗試。

在這些教育學者中，最有趣的一個是來斯威特齊（Friedrich Gabriel Resowitz (1725-1805)）。在他的

著作中，有公民的教育（*Die Erziehung des Bürgers* [1773]）和改進公立教育的思想，建議，與志願（*Gedanken, Vorschläge und Wünsche zur Verbesserung der öffentlichen Erziehung*）。在後一種著作中，他建議我們應當學習世界的政治地理以及各種的政治制度，尤其注重德國方面。「關於政治的報紙，應與學生共讀，並引用地理的和歷史的科學——尤其是最近的歷史來解釋。」在本書第五卷中，他附入一篇在一七七四年寫成的論文，題目是「一八〇〇年——一個教育的夢。」文中幻想王公們都聽從各方面「愛國者」的建議，幾乎將所有的拉丁學校改作公民學校（*Bürgerschulen*）。

「在這類學校中，一切教學，都是專為中等階級公民而設……在地理中只包括各大洲的特點和對意志祖國一種較親切的研習就夠了。歷史應當從現時起，只追述到一七〇〇年，其餘的歷史，應在一個很短時間內授畢。和每個公民都有關係的本國法律，衛生的重要原則以及在生活上實用的良箴，都應當向兒童詳細解釋。」

來氏雖然主張農民也要受這種教育，但他的注重點在城市中的人民。這種教育應當在每個小邦的範圍內施行。

另一個改革者是巴斯道（*Johann Bernhard Basedow* [1724-90]）（註四）為養成少年人一種愛國的生活起見，巴氏主張每年舉行若干關於祖國節目的慶典。在這種慶典中，尤其是在市鎮和鄉村裏——應當為兒童特別預備各種遊藝。費用由政府擔負，可是舉行時應受政府的視導，因為這種禱年的印像是很深刻而且最能耐

久。在這種慶典的前後幾天，公立學校應當專門討論關於祖國的資料，爲愛國而犧牲的良範，在一個國家裏公民團結一致所得的利益，以及對祖國的責任。巴氏所謂愛國心，其中含有很強的世界性。一個人應當替祖國服務，因爲服務祖國卽所以造福人類。在巴氏看來，愛國的德性不在「對自己在那裏生長的國家愚昧的而單方面的偏袒，而在具有一種在我們所居住，給我們各種公民權利，使得享自由，榮譽，財產，以及安全的國家中，替全體造福的志願——一種避免的革命的紛擾的志願，一種促進君與民間的關係，和在任何危機中當先赴難的志願。」

這種建議的公民訓練的方式，很可以代表資產階級在發展的初期中對國家的普遍態度。他們要培植資產階級的公民理想，可是又要在專制的政體中來完成這個目的。他們的理想是「賢明的君主」，這種賢明君主爲個人的利益計而贊助資產階級的比較進步的教育理想。結果這種理想的一部份——尤其是對忠君的需要，特別重視。例如大弗來得烈在大體上對人類教育的理想表同情，但在實際上他更注意於將國內學校系統化和集中管理，使他本人能夠操縱民衆對他的忠誠。這種系統化的造成，係靠一七六三年所頒行，而變成往後一切學校政策的根據的普魯士皇家普通學校法規。大弗來得烈的各種法令，都摘要刊入他死後於一七九一年纔完成的著名法典中，到一七九四年纔見諸實行。這法典曾立下這幾個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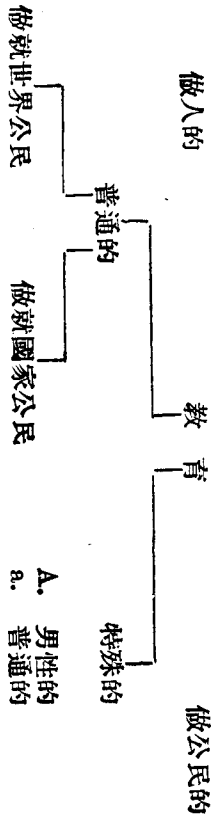
- (一) 所有學校都是國家的機關。
- (二) 學校由地方社會負責維持。
- (三) 每一兒童必須進初等學校或受經政府承認的他種教育。

(四) 所有被認可的教會，對學校裏的宗教教育，都有同等的權利。

在他死了以後，還有其他關於改進教育系統的建議，但所得結果，不外是一七八七年在國王直接管轄之下，成立中央學校委員會（*Oberschulkollegium*），整個學校系統，更加集權化。（註五）

在德國的教育文字中，很明顯的反映着法國革命的理想與事實。在已經關心到這個問題的人看來，公民訓練，已成為當務之急。此外，其他著作家也似乎表示需要一種新的教育。斯蒂芬尼（*Stephani*）、忽斯（*Voss*）和賴特（*Rade*）可以算作關於這個問題的許多著作中的代表。

斯蒂芬尼顯利（*Heinrich Stephani*）的一種重要著作是一七九七年刊行的教育的科學大綱（*Grundriss d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這本書的第一編討論『做人的教育』，第二編討論『公民的教育』。這種公民的訓練，『要給人類以各種直接與在社會上對他人關係有關的智識和能量。』這些『能量』中，當然有一部份是全國各人所必須有的，一部份只是『每種階級』所必須有的。前一種『能量』的發展，就是普遍的公民訓練，一半要使學生成為世界的公民，一半要使他成為國家的公民。因此我們應有如下的程序：



- | | | |
|--------|--------------|------------|
| 1. 法律的 | 1. 德國語 | 1. 技術方面 |
| 2. 經濟的 | 2. 德國歷史知識 | 2. 公法方面 |
| 3. 政治的 | 3. 他方(鄉土)的研究 | 3. 軍事方面 |
| 4. 歷史的 | | 4. 實業與專業方面 |
| 5. 統計的 | | B. 女性的 |

忽斯 (Christian Daniel Voss) 的兩卷著作對公民訓練有更詳細的討論。忽氏為哈利師範學校的教員 (Halle Pädagogium) 在一七九九年發刊他的國家教育論 (Versuch über die Erziehung für den

Staat) 一文中，將教育看作『在我們這時代中增進公民的福利，保障君主的安全所必需的一種東西。』他這樣說：

「……假如關於國家和牠的目標，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統治權的需要與價值等概念不完全是一種幻想，假如愛國心或公民的情感不僅是幻像，那麼我們便必須將這些概念作為教材，同時必須有特別的教學法來傳授這些概念，必須特別向這方面努力。因此這種教育，實際上就是為國家的訓練，應該由國家負責。因此在每個學校中，都應當有公民教育的一部份。」

這種公民訓練，不當附屬在其他科目當中，作為一種附庸，而應當和整個課程發生聯絡。忽氏表示恐怕普通的公民訓練所得的結果，乃是世界主義而非愛國心，所以這種公民訓練，應特別注重自己的國家。

「在這種教育中，要將國家作為主要的項目……在這種教育中，學生要明瞭服從法律和政府，是他們對國家的第一個最根本的責任。」

爲發展公民教育起見，忽氏還主張國家應當特設公立學校，取締一切私立教育，最低限度，凡年齡在有利無害的可進公立學校的兒童，不得進私立學校。

賴特氏（Karl August von Raede）在一八〇三年刊行的訓練公民的教育，雖不如忽氏的著作那樣有價值，不過還值得提及。在這裏賴氏的主張和忽氏一樣，要將世界主義與愛國主義連在一起。公民教育本身應從德國的地理開始，德國地理的教學，又應當與本國的經濟和政治狀況的教學相聯接。這種教學，有收得很大效果的希望。關於本國「優點」的描寫，可使學生喜歡本國。賴氏和忽氏一樣，主張女子也要公民訓練，「雖然他們因爲身體上的缺陷，不能與聞公務的。」

還有其他的著作家提倡一種國家的，對現有政體盡忠的「公民」訓練。德國式體操的首創人約安（Jahn）曾經這樣提議：

「兒童在沒有得到關於本國的基本智識以前，不能離開學校。公民的權利，只在經過一種對於公民的權利和責任詳細的體察以後纔能享受。教育不應當僅以在公民中養成機械的能力和灌輸智識爲目標，一定要激起全國公民的精神。」

普魯士在一八〇六年戰敗以後，曾發生一種更堅強，更貫注的國家精神。在菲克托（Fichte）和其他哲人領導之下，新公民教育理想中的世界主義成份，很快就被掩沒。對於公民（資產階級的）教育的需求，很明確的變作一種對於國家教育的需求；而所謂國家教育，實際上就是擁護各邦的專制君主來推翻法國的勢力。這班改

造家的希望是只要德意志擺脫法國的束縛，他們就有實現自由的公民（資產階級）教育理想的餘地了。可是在這方面他們終歸失望。

拿破崙被打倒，反動的勢力佔優勝以後，不但新的理想不能實施，而且對這種理想的提倡也被禁止了。德意志各邦的政府剛擺脫法國革命所引起的危機，將這類理想看作素所深惡的革命的另一种表現。甚至連關於政府的組織和行政以及最近史料的教學，也被認為危害政府的安全，都在禁止之列。初等學校受新理想的影響本來就很少，現時更得注重舊有課程。除了讀、寫、算以外，宗教和對統治者的服從變成主要的科目。換句話說，他們要教民衆將自己看作統治者的臣民，而不是能夠參與國事的公民。

在中等以上學校中，尤其是在古典中學（Gymnasia）裏，上述課程當然不夠。在這種學校中，無論如何得要避免一切能引起討論公民權利以及最近史料的教材。一種所謂新人文主義的潮流乘機而起，不顧一切與時代生活有關的問題而注重古典的語文和古代的理想。政府既將革命與愛國看作一事，他們理想中的高等教育的產品，當然不是愛國的志士，而是一個帶有世界性，具有貴族式的修養，而且自視超乎一切時代問題之外的君子。這是一種最好的分心宣傳法，在整個世紀中沿用不斷。各大學的教育政策也和中學相似，一切教學都要受檢查，教授一有傳播新理想的嘗試，就會立刻被解職或不斷的受迫害。

在政府和教育的正式代表，對公民訓練都不感到興趣且不表同情的時候，正在興起的資產階級力主這種訓練甚為重要。同時新教育的觀念輸入多從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教師當中，在一八三〇年七月的革命，尤其是在

一八四八年三月的事變中，資產階級又再提出政治教育的要求。那時有人編成許多政治的問答，多係含有政治意味的小冊。同時在教育的作品中，也發現公民訓練的要求。

平定革命以後，反動的勢力還操縱了學校系統。一八四九年在一個普魯士師資訓練學校教師的會議中，弗來得烈威廉四世這樣說：

『去年普魯士的愁苦，都是你們的過去，只有你們應當任其咎，這都是民衆的虛偽教育造成的結果。你們曾經藉真理的名義來傳播這種教育。這種虛偽誇大的教育，素爲我所深惡。在我登位以前就已恨之入心，在我登位以後更會竭力取締。』

當事者設法將初等教育限於讀、寫、算和武斷的宗教訓練；同時訓練初等學校教師的專校復奉命放棄文雅的教育。我們很可以注意到在一八七七年以前舉行的第三十九屆普魯士中學校長會議中，並沒有討論到公民教育的問題。可是愛國思想正在發展時期，無論如何總會跑到學校裏去，雖然各邦——尤其是較小的——都用盡各種方法來壓制這項反叛的思想。但在正要統治全德意志的普魯士中，教師漸變爲宣傳統一帝國的福音的人。

最奇怪的，就是帝國成立以後，學校中一點正式的宣傳也沒有。這也許因爲雖然在一八七一年以後政府的策略是要使資產階級與貴族妥協，但一切行政機關仍在貴族的掌握中，國家的學校系統當然也在內。他們覺得最好是使一切狀態照舊，不願使民衆知道『公民』的理想或政府的工作。加以政府正忙於文化的努力（Kult.）。

tur-Kampf) 反社會黨法律的制定，以及較重要經濟的立法，遂沒有過通任何聯邦的教育法。於是小學沿用舊日課程，中學死守出世的人文主義的理想。可是對新帝國忠誠的教訓，教師們自會灌注給學生，他們在普法戰爭以前，就已具有愛國色彩的。

威廉二世登位以後，發生很明顯的改變。新帝想鞏固人民對好恩卻倫 (Hohenzollern) 朝代和對他個人的忠敬，將這種忠敬與原有愛國情感聯在一起，以造成一種有力的君主國家主義的潮流。他所以要做到這一步的主要原因是社會民主運動的進展。高壓的方法既失敗，鬭爭便要改用智識的利器；同時在這種鬭爭中，學校當然免不了要參加。德皇提議歷史的教學應有如下的改進：

「歷史的教學，須以給少年人下列印像為目標：社會民主黨的說法，不但違反神聖的教規和基督教的道德，而且在事實上不能施行，施行的結果要危害到個人和社會。歷史的課程，必須多多包括現代的資料，同時還要表明只有國家的勢力能夠保障家庭和個人的自由與權利；要使全國的少年感覺到普魯士歷代君主，如何從大弗來得烈的改革和農奴制的廢除一直到今日，都不斷的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為達到這項目的，訓練教師的學校，必須要添設這一類的課程。」

各邦教育部按照上述意見，草成各種建議奏呈威廉二世在一八八九年八月三十日經威廉核准。為避免這種教學在學校中引起對於社會主義的討論起見，當局又明令「一切討論以常識為根據，只論社會主義的危險，避免社會主義學理的討論。」

在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四日至十七日在柏林舉行的中等教育問題會議中，德皇很堅決的反對舊有人文主義的教育理想。他說：

「我們所要教育的，是德意志的青年，而不是希臘羅馬的青年……最要緊的，我們要熟悉本國歷史中的事實。在我的求學時代，選帝大侯（The Great Elector）僅是一個印像模糊的人物；「七年戰爭」竟沒有提及；歷史只學習到前一世紀，到法國革命時為止，對於每個公民都很重要的解放戰爭也沒有提及。」

在這次會議中，他們都想不到德皇會採取這樣積極，這樣堅決的立場最後通過以下的議案：

「歷史教學的時間不增加，只裁減其他歷史教材的分量，將本國最近歷史作較詳細的研習。」

德皇的意旨的影響，在一八九二年公布的普魯士課程中更加顯著，這種課程雖然經過幾次更改，一直到一九二〇年還是沿用。在德國語文教學目標中，特別注重愛國心的激發，尤其是使學生熟悉德意志的神話和德意志文學中的傑作。對於中學第五年歷史的教學，特別規定如下：

「在本國史和歷代君主生平事蹟的研習中，附帶將我們一八八八年以前社會的和經濟的發展，作比較的討論，尤其要注重好恩卻倫（Hohenzollerns）朝代的德政，特別是對農民，中產階級，以及勞工狀況的改進。」

這些規定，當然只限於普魯士一邦。從國家主義的觀點看來，普魯士以外各邦的問題，要在對本邦君主和政府的愛戴之上，冠以對德皇和全國政府的忠誠。可是因為學校的管理在各邦手中而不在于聯邦政府的掌握裏，上

頭所採取的辦法效力很有限。僅在各邦中各級社會的利益與帝國政府的利益一致的範圍以內，對帝國政府的愛護心能夠充份發展。

在普魯士的歐洲史課本中，將德意志的普通發展，和特別普魯士一邦的發展，看作歐洲史的最重要部份，好像新德意志帝國的成立，就是整個歷史的最高點一樣。這種教科書和普通的『讀本』詳述歷代君主的德行以及他們爲德意志民族奮鬥得勝的戰蹟。此外，還用簡單的評語來使學生注意到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文化的優秀。

可是教科書在德國的地位，並不如在美國那樣重要。在德國學生受教師的影響較大，因爲一切智識，都直接從教師得來，靠課本的地方很少。因此政府的注意點，便趨於嚴格統制教師的國家觀和政治觀，他們嚴密監察教師，使在教學時只能發表忠於政府的意見。教師既是國家的公務員，這一點當然不難辦到；不但教師在專業上的責任隨時要向上司報告，連他們的私人生活也得隨時報告。一切監察的事項，由每學校區的視學員負責。視學員往往由牧師充任。還有地方的行政長官，對教師也有監察的職責。用這種方法，可以使教師當中不至於包含被認爲反對政府的份子——傾向社會主義的人。一八九〇年德皇聲稱教師的無上權利和責任，即公務員的權利和責任；因此除了擁護保守派政黨以外，他們不能參加政治活動，甚至對保守派政黨的贊助，也只好鍼默。

威廉二世所樹立的這種推進愛國心和忠君心的政策，並不注重養成對德意志政府組織的理解，反而保持歷來的愚民主義，使民衆對一切政治問題，完全不曉；留爲政府和統治階級的專利品。一個名叫遇利（Jules

Huret) 的法國人，在一九〇六年環遊全德以後，在一種名 Figaro 的刊物中，曾經這樣報告：

「首先使我驚異的，就是德國中產階級（藝匠，商人等）對本國政治組織，甚至對地方社會幾全茫然不知。」

一九〇七年斯蒂亞——桑羅 (Stier-Somlo) 也同樣的說：

「德意志和國內各邦的憲法，大多數公民全不知道。每天看見這樣少人熟悉我們的憲法和行政組織的大綱，真是令人不快。」

著名進步的神學家韓樂克 (Adolph von Harnack) 也說：

「這實在是一種不能再忍的罪惡。在許多的中學——或者可以說在大多數的中學——裏，學生學完幾年歷史，連我們憲政的生活以及現行公法制度的綱要都不知道。」

一九〇八年馬爾堡 (Marburg) 大學著名神學教授賴特 (Martin Rade) 氏也說：

「今日德國有統治勢力者，好像覺得要使後輩對政治永遠愚昧，他們自己的地位便極安全。」

政府和多數保守份子的觀點，很可以從柏蘭齊樓 (Prenzlau) 古典中學校長柏拉爾 (Prah) 氏的論文公民訓練與學校中看出來。該文見一九一一年四月的 Grenzboten 雜誌。在這篇論文中，柏氏反對特設公民的教學，主要理由是青年人多數對社會民主黨表同情，尤以德國西部的小學教員為甚。柏氏甚至對中學的教師也起懷疑。中學教師們對新服務規程的希望表示如下：

「很多中學教師充滿着破壞的，不受約束的民治精神。他們當中大多數不是世家出身，沒有多少家風。他們從貧寒的環境中擢進較高的地位，因努力工作而博得一個完全新的環境。因此他們往往覺不到自己地位的重要之教師傾向於民治，使整個學校連施行本來在學校的能力範圍以內的公民訓練，都更感困難。」

柏氏對教師的不信任，至將青年人的公民教育當作一種「危險的風尚」。可是勞動階級的青年，從社會民主黨方面得到一種「公民」教育的人數，卻日見增加。社會民主黨在人數日增的信徒當中，傳佈關於德國現有政府的組織和功能的智識，目標當然不是培養對政府的好感，而是指出政府機關如何被人利用來壓逼勞工階級，藉以破壞現有政體。這種「公民訓練」的效力，漸漸引起中上級社會和政府方面的注意，因此政府也設法在學校中施行政治教育來對抗社會民主黨對勞動階級的青年所施的政治教育。

一九〇九年一部份商界中人通函各要人，喚起他們注意為增進後輩職業和政治生活準備的公民教育。同時他們更設法引起各界中人對這問題的關注。經過這種初步佈置之後，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哥斯拉爾 (Goslar) 召開大會，成立「德意志民族公民訓練協會」，不久改稱「公民訓練與教育協會」。此外，一九〇九年十月八日，又成立「學校公民教育實施事務委員會」，由郎卻 (Friedrich Lange) 與德意志工程師協會秘書邁也爾 (Dietrich Meyer) 當首領。這個委員會，得許多會社的承認，一九〇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德意志

青年福利促進總會在柏林召集會議，討論公民訓練的目標與方法。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該會又召開一次夜間討論會。在其他許多集會中，我們可以特別提起一九一〇年三月那一次普魯士師資訓練學校教員的大會，當場議決向政府建議將公民作為師資訓練學校的一種課程。

此外，海斯（Hesse），漢堡，和薩克遜尼等邦政府，因為各地教師中有對社會民主黨的宗旨表示同情，雖對公民教育相當猶豫，（漢堡是個好例）也曾嘗試將公民科加入學校課程。一九一一年二月普魯士教育部最後決定在各種中學高年級要將公民作為必修科。內容包括關於政治狀況和政府機關的演講，再用參觀地方行政機關以及旁聽地方政府會議等來補充。在巴發維亞一邦，對這種教學沒有普遍的規定，可是在工業補習學校，技術學校，農藝學校，以及師範學校中，公民訓練採用公民學或法律通論的方式，

這些措施引起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在柏林舉行的「公民訓練會議」。參加這個重要會議的人數約有六百，各重要會社和全德意志各大報紙的代表還不在內。會中對公民訓練的各方面都討論到，以便在學校系統以內和以外都能一齊推進這項工作。

我們必須記得，這類團體和政府方面所提倡的公民訓練，與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各資產階級的改革家所鼓吹的很不一樣。這種訓練的特點，不在青年資產階級想改造專制政體的熱誠，而是資產階級已經與君主政體發生諒解，以阻社會主義觀念傳播的自衛政策。這種訓練所要輸入的不是公民權利的概念，而是臣民的職責和對君主的忠敬的概念。

我們要將各大學在發展公民訓練和對國家的忠誠的工作，很簡單的分析一下。大學久已成爲訓練全國高級官員或智識領袖的場所。牠們都自命爲德意志風氣的護衛人和國家文化前途的領袖。因此政府要設法領導大學中思想的傾向，使大學成爲傳播現有體制的理想工具。因爲在德國大學一向是（到現在還是）政府的機關，所以這一點很容易做到。普魯士君主有任命特殊教授的主權。教員是由各學院指定的，用不着先得政府的認可，但政府也可以使各學院受牠的影響。政府可以從頭銜與動位的授予中影響於教授的人選。結果在戰前德國的大學中，培植出一個愛國忠君的教授團體，對愛國理想的傳播上效力很大。

政府對學生團體本身的影響，不如在中學時那樣有系統，可是有幾種因素收效更大。第一、大學生多數從中上級社會出身，他們都是在國家和家庭的風氣中長成的。第二、大學生多數希望在政府中獲一位置，或在私生活中得享較高的地位。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最好是沒有什麼政治的觀念，否則須改變自己的觀念來適應統治階級的觀點。第三、大學生中大多數是所謂學生團（Studentenkörps）的團員。學生團是舊有愛國風氣的護衛人。這種組織最初固然是很進步的，可是以後變成保守主義和君主主義的大本營。

在反抗拿破崙的戰爭中，大部份學生參加戰事，爲他們所希望的德意志的解放與統一而奮鬥。對戰勝以後的反動政策不同意的學生，大多數加入著名的，與原有國民團（Burschenschaft）相抗衡的青年團（Landmannschaft），（僕省團（Bursen）以及其他秘密會社。這種青年團注重解放的，愛國的份子，而反對國民團的專制主義與區域主義。他們很快的博得多數人同情，竟能在反動的時期中繼續保持他們的進步的和國家的

風氣。在事實上一八一七年間舉行的哇堡大慶典（Warburg Festival）足見德國的學生，也有人充當國家運動和解放運動的領袖。可是一個學生名叫桑德（Sand）刺殺可齊勃（Kotzebue）的事件，使學生的解放和國家的運動都被明令取締。大學和邦的當局轉而贊助舊有反動的，現時通稱學生團或國民團。當一八四八年統一德意志的鬭爭爆發時，雖然有一部份學生參加，但大多數站在不動或反動的地位。從那時起，這種學生的組織愈變愈保守，不過問政治問題，有時竟退化到愚笨的墨守儀式。我們先前已經提過的法國人遇利，根據對哥廷根（Göttinger）大學學生團的觀察所得結果，曾作以下的評語：

「德國的保守份子，大概贊成這種團體的活動，因為這種活動可以分去青年人對政治的注意，使他們習守紀律……在這個年齡中，青年男子往往傾向於解放的觀念，而劍術會的組織，不會使這種觀念加強，只會使牠們減弱，因為會員必須無條件的服從……我曾經設法在一部份學生當中，引起政治的討論。他們的愚昧令人可憐，同時他們的漠不關心，又令人可惱。」

所有這些因素，都足給學生團體以一種極堅強的君國主義的印象。

雖然學校中增加了公民訓練，雖然愛國的精神佈遍了整個學校系統，而全國青年跑到社會民主黨旗幟之下者日見增多。（註六）學校系統中的階級性，當然是做成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因為我們已經說過，德國的學校系統，反映着階級的差別。教育從六歲至十四歲兒童的初等學校，是為下級社會——全國大多數民衆——而設的。而且畢業初等學校之後，一個學生受中等教育的機會很少。他只能進義務的補習學校肄業幾年，受點職業訓

練，但這種訓練，不會使他變作中等階級的份子。

各種中學校，有必修希臘文和拉丁文的，有注重自然科學的，有半古典半科學的，皆係爲中上級社會而設。這種學校，大概從十歲入學至十八歲卒業，必須曾在私立預備學校或私人教師下經過一番準備纔能進去。牠的目的是在於排斥大多數民衆，他們無力受準備教育，也無力交納官立中學所收的費用。

因爲大學和高等工業學校（相當於美國大學中的工科）的入學資格是中學畢業，勞工和貧窮的農民子弟要受高等教育幾乎不可能。教育中帶有階級性的組織，不但加重下層階級在社會上卑劣的地位，引起他們的不滿，而且使下級中有天才有魄力的份子無法擢進中上階級。這種下級社會的優秀份子不能突破學校系統和社會生活中嚴格的階級區分，都困處在本來的階級裏，因此許多有特才的人便另謀出路，跑到反對政府最有力的團體——社會民主黨——中當領袖。

在大戰中德國整個教育系统變成廣佈愛國宣傳最活躍的機關之一。（註七）大學生和中學的高級生雖然曾受軍事訓練，可是學校的重要，不在乎這種訓練而在乎別的方面。第一步，學校變成得力機關來激發對戰事和捍衛國家的熱誠。以後戰事繼續下去，學校系統又成了向國民解釋和辯證各種戰時策略的媒介。到大戰將要終了時，學校更被用來作維持學生及家長的爲國精神的一種工具。不特在各科的教學中使愛國心加強，而且學校還設法叫學生實際參加各種軍事的活動：如收集食品和衣服輸送往前線；縫紉班爲軍士縫衣服；搜集各種戰前需用的金屬（如金、銀、和銅等）以及舊皮革、橡皮和其他物品。這種活動不在實際上的價值，而在當這非常時期

中養成一種參加國事，與國家政府聯成一氣的感覺。學校生活中充滿愛國的訓練與經驗的後一輩少年現在已經長成了，這也是使德國的政治生活很明顯的帶着國家主義色彩的一種因素。

革命最初對學校沒有多大影響。雖然各邦政府都更換教育部長，可是常務職員一概仍舊，依然繼續學校行政的工作。教師的人選也沒有變更，雖然現時可以隨便發表他們在革命前所不准發表的解放和社會主義的觀念。革命的爆發，使獨立社會黨黨員好夫曼（Adolf Hoffmann）得充普魯士教育部長，他立刻設法將社會主義的政策介紹到學校去。他遇到不少的反抗，不久就被免職。新社會民主黨的政府，對教育系統的政策和該黨其他政策一致，不實行任何過激的改變。

維馬混合政府的成立，使共同的學校政策的問題，成爲焦點，因爲構成混合政府的三個政黨都想施行自己的教育政策。經過若干困難之後，他們終於成立一種妥協，載在憲法第四條中。（註八）關於教育系統的階級性，教材，以及普遍的國家主義的精神等，在新的學校政策上沒有根本變更，僅有些少改變。（註九）第一，所有邦立和私立的中學預備學校，都決定裁廢。人人都要入小學的頭四年，現稱基本學校（Grundschulen）。這是要廢除初等教育中的階級分界，使在十歲時進中學的機會均等。但私立的預備還沒有完全取消，因爲這類學校有許多是由教會辦理，封閉這種學校要被誤會爲抨擊宗教。

此外，所謂「建立學校」（Aufbauschulen）漸次出現，給小學畢業的學生以六年的中等教育，使他們得升入大學。最後，有許多城市在小學以後增加兩年的訓練，學生得自由參加，使他們得到與中間學校（Mittel-

schule) 卒業同等的程度。夜間中等教育也佔得一個地位。這樣中下級社會的人也可以使子弟受點較高深的教育。可是使這種機會成爲泡影的，就是中等教育在德國沒有一個地方是不收費的。學費的數目頗大，大致因各地和家長的收入而異。爲補救這個弊病，特設獎學金給予貧寒階級的子弟而有特殊才力的。不過在求學的時期中，家長最少得供給子弟的生活費用，這種擔負，在戰後經濟的恐慌中，就愈來愈不容易了。

如何將學校變成一個發揚對新共和國和政府忠誠的機關，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我們曾經屢次提過，共和的成立，並不是與半專制的君主政體長期奮鬥得來的光榮結果，而是建築起來防止無產階級革命潮流的一道關欄。整個的學校系統以往被用作發揚忠君觀念的中心，這種忠心經過歐戰中的經驗而愈加穩固。最重要的，就是共和政府係由三個政黨構成，這三個政黨在大戰期內都擁護君主政體，一直到共和成立纔改向共和。共和的理想不但爲附從舊有政制的人所仇視，就是掌握共和政權的人也目爲新異。因此在學校中也和在其他公共生活上一樣，共和的成立，根本上就沒有博得一般人的好感，無從發揚對共和的忠誠。

因爲學校系統在情感上還歸向舊有政制，共和政府最初並不設法公然以共和觀點灌注學校。可是自從平定工人中過激份子的革命騷動，並在苛帕 (Kapp) 領導下一九二三年三月間反動派的舉亂以後，政府便採用切實的步驟來使學校系統歸附新政體。這種步驟，並不是很明顯，很乾脆的擁護共和反對君主政體的宣傳；新政府所用的辦法，特別注重全德民族的團結，德意志民族以往共同的文化上的偉績，以及他們將來的希望來替代對君主的忠心。同時又在學校中增加公民訓練的份量，給學生以關於新政府工作的智識。(註一)此外，在各邦中

解釋公民的權利與責任時，特別注重的不是本邦與共和政體的關係而是本邦與德意志的關係。這樣，學校可以將德意志國家主義放在君主政體或共和政體之上，而同時又不至於開罪擁護君主政體的人。德意志的國家主義和德意志的團結所佔地位，於是較大戰以前更加重要。這不但使反動份子與新政體聯成一起，而且變成資產階級的共和國用來抵抗從共產黨家庭出身的兒童與青年過激觀念的重要工具。

這時候德國學校所養成的愛國心，當然與歐戰以前的不同。一個被剝奪去軍權的政府，內部一大部份受他國所操縱，國家將來的進展，靠外交的結果的成份多，靠軍事的成份少；在學校中所傳播的愛國心，自不能與戰前一樣。德國學校中的國家主義於是轉而注重德意志民族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上所有的成績，不只在國內，連在國外的功績也在宣揚之列。

我們要研究共和國培養公民忠誠的步驟，可以從一九一九年的憲法始。第一四八條的規定如下：

第一節——所有學校，應努力發揚公民的情感，個人的和職業的活動，德意志國性的精神，以及國際間的和好。

第三節——公民及職業教育，應在學校中實施。在每個學生強迫教育終了時，應每人發給一份憲法。

最初，他們對於這種規定的推行並不努力，可是苛帕的異動促成各種暫行的計劃，結果由教育家與政府人員合開會議，於一九二〇年舉行於柏林，討論的問題是如何用切實的公民教育來培養發揚對現有政體的忠誠，通過的議案中直接與公民訓練有關的有下列各節。（註一）

(1) 公民教育成功的根本條件，是要在各級學校整個的課程與學校生活中澈底貫注公民情感的精神。

(3) 在小學的畢業班，和在中學與中間學校的同樣班級中，公民教育作為單設的學科，普通定為每週二小時。在補習學校和工藝學校中，公民科授課時間與普通學校同。

(4) 在各種學校候選教師檢定試驗中，候選人應有曾受普通公民教育的證明。

(5) 公民教學的特殊訓練，得與其他學科教學的訓練連在一起，最好能將全部歷史教學的訓練與公民教學的訓練連成一片。

(8) 已聘任之教師，應補修數星期的公民課程，以後還得繼續修習特設公民課程。

這些為一切設施所因循的原則，對公民訓練在教育上的一般發展，與政府採用的各種方法，都發生影響。普魯士，勃倫斯維克，安好爾特 (Anhalt) 等邦在一九二〇年間先後通過大致的辦法，窩廷堡 (Württemberg) 在一九二二年間將關於德意志憲法和各邦憲法的解釋，作為學校的必修。

一九二二年外交部長拉得婁 (Rathenau) 被反動份子的暗殺，給公民訓練的推廣以一種新的策動力。聯邦內政部立即召集各邦教育部長會議，商討在學校中加強兒童對共和國情感的辦法。這個會議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九日在柏林舉行，通過幾個基本原則，不同意的，僅有巴維利亞一邦。茲將其中最重要的議決案略述如下：

- (1) 歷史書籍的編纂，應從共和的觀點着眼。
- (2) 根據聯邦憲法第一四八條的規定應在未施行公民訓練的學校課程中，實施公民教育。
- (3) 普通課程標準，也按照施行公民教育辦法修改。
- (4) 同樣的教育，應在師資訓練學校中施行。
- (5) 由各邦學校當局，歷史家，憲法的教師和教育家合組委員會，輔助各邦教育部修改課程，計劃新教材，和編訂新課本。

這個委員會，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八日開了一次會。

這種原則在各邦政府公報中刊登，在相當範圍內，作為各邦訂定規程時的根據。這裏為篇幅所限，不能對德各邦的規程詳加分析。在我們的研究中，只須參看普魯士一邦的就夠了。不特因為普魯士是全國最強的一邦，而且因為普魯士的規程，曾經好幾個小邦仿效。

除了關於公民訓練的普通規定外，普魯士的教育部長還公布了好幾種的「指導」(Richtlinien)，內容係關於各種學校中的教學和課程，其中有好幾個項目對我們的問題很有關係。關於基本學校（包括小學的頭四年）各科教學的項目，提到發展公民的和國家的理想的地方很少。這時期的教學的問題，集中於如何使兒童熟悉本地情形，和如何給兒童以閱讀，寫字，和算術的基本知能。一到小學的後四年，公民訓練的程序，便有更確實的規定，略如下述：(註一二)

歷史與公民(註一三)

這種教學的目標，在使學生熟悉德意志民族及德意志國家發展的重要事實；同時在學生當中造成了解現在時勢和現有國體的基礎，喚起學生對於整個國家和民衆交互責任的意識，以及對民族和本國的好感。歷史教學的最高法則爲達到與實事最近的地步。德意志民族的歷史（包括邊疆上和國境以外的德意志人）教材的組織，按照代表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社會，經濟，和精神生活上各方面的發展。對於戰爭的估價，大致以因果爲標準……其他民族歷史的研習，只限於對德意志歷史有相當影響的部份。

公民學就是現代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的入門，開始就應與歷史和其他科目連在一起研習。關於現時政治狀況的描寫，組織務求詳盡與具體，可作爲引論的結束。

地理(註一四)

地理教學的目標，在推進對家鄉的認識，對德國較親切的認識，對地球上各部份及外國大概的認識，以及對地球在宇宙間地位的了解。

學校中最後幾年的教學，係建在基本學校所造成的根基之上，除了祖國的地理以外，應包括歐洲各國以及世界各部份的研習。在這科中尤應注重有德意志民族在那裏居住和工作，以及與德國有重大關係的國家。

音樂(註一五)

音樂的教學，以喚起歌唱與歌曲的快樂為目標，尤其注重德意志的民歌。在為普魯士各中學校預備的指導中，更有比較詳細的指示，略如下例。

德國語（註一六）

在德國語的教學中，學生應學習閱讀和書寫德文，用德國語來思想，在德國語中生活。這種訓練，應使他們能隨便運用本國語文，和獲得從語文的本身，從文學與藝術，以及從一個活的民族的生力，產生出來的關於文化價值的重要概念。獲得這種文化價值的經驗的先決條件是勤懇的文化工作。因此，德文的教學在實施上雖然應採科學的態度，但我們不能忽略科學化以外的目標——就是為一種精神上目標的教育，和有勇氣而愉快的日耳曼主義。

文學（註一七）

德國文學的引論，應使學生充滿着對德國人智慧在文學上創作的理解和愛戀在 Obersekunda 的注重點是德國文學的黃金時代；在 Prima 的注重點是日耳曼主義在我們的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中的復興。在這種復興過程中德人的心智將有關的各種文化勢力融合一起做成一種新的團結，這不但迄今仍影響到德國智識的發達和文化的發展，而且對歐洲整個精神生活都發生相當的效果。

民間故事（註一八）

在低級與中級各班中，民間故事一科，目標在使學生在精神上認識家鄉，從對家鄉的認識進而認識祖

國。這一科教學的根據是對家鄉真切的研習，不靠書本而靠觀察和經驗。在本地方和附近的旅行中，學生立刻可以從方言，通俗詩，服裝，食品，草木鳥獸等特殊的欣賞，建築和居處的形式，風土人情，法律，慶典的習慣，以及各種迷信……中，漸與民族社會打成一片。範圍逐漸從狹義的家鄉，推廣到祖國；從部落的特性推廣到全國的國風，不斷的要使學能看見和體驗國內一切的生活……。

高級各班將民間的藝術作詳盡的討論。從研究德意志的古代和德意志的種族著手，與德意志文化史有密切的聯絡，這一科的目標是要領導學生理會德國藝術，在神話，古代故事，民歌，特別是語文的本身，法律，以及風俗習慣中的表現。這種訓練，以關於德意志文化的讀物和其他個別的資料作根據。個人的觀察和地方的風氣，在可能時應盡量利用。德國人的特性，往往可以因與外國人比較而更明顯。民間故事的最高目標是喚醒學生對於在各部落中表現出來的民族團結的感覺，這種國家民族的團結，不因性別與生活形式的不同而改變，更不因階級與教育上的差異而減少。

歷史與公民（註一九）

歷史應與其他各科有密切的聯絡——尤其是其他主要的科目——目標在使青年熟悉本地社會，德國的國性和國體……歷史的教學，最要緊的是關於德意志民族的歷史，特性和地位的討論。我們必須一種自然的方式，讓學生知道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組織，以及豐富的文化，藉以引起他們對於保存和發揚這種文化的志願，同時使他們一切見解，皆根據歷史的眼光。德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關係一定要表

露出來。

活躍的人格，如智識上和精神上的領袖，政治家，發明家，發現家，忠於信仰的英雄，社會運動的領袖等，在教育上都有特殊的效力，應提出來作犧牲和盡忠的榜樣。

地理（註二〇）

地理的教學與其他各科合作，要喚起和發揚學生對家鄉和本國的愛護心，使學生了解德意志過去和現在的文明，作學生公民訓練的輔助。

生物（註二一）

在我們的政治經濟中，有許多重要方面有生物學上的根據。農業，林業，以及我們的工業中一大部份，離不開生物上的基礎。在生物的教學中，關於動植物的培養和利用，關於人類對自然的經營的不良結果，以及關於土地利用的不得法——都是學習歷史的一種準備。若在討論殖民地國家的動植物產時連帶論及牠們的經濟價值，德國的需要殖民地就很明顯。年紀較長的學生對於有生命社會組織的領袖，可以教他們將國家看作一個有生命的社會，知道國家中各種份子不能分開。學生若習於生物學的思想，他們可以將這種真理應用到人類生活上去，設法使自己私人和公眾的生活都較豐富。

音樂（註二二）

最後，音樂的教學，要使青年能領略音樂在個人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尤其是在我們德意志的文

化中——和知道音樂不是任何團體所獨享的而是各級民衆的興致和愉快的來源。

這些「指導」表現出國家和公民的概念如何密佈於整個課程中。其他科目的教學指導中雖然沒有提起如何發揚國家的情感，但在一個充滿着愛國心的教師手中，無論什麼科目都可以培植愛國的情感，那是很明顯的。這一點究竟做到什麼程度，我們當然不能肯定，不過，試想德國教師當中充滿着國家情感的情形，我們就可以知道除了教學「指導」所規定的以外，學校中養成兒童對德國的自豪心的方式還有很多。

在這次的研究中，「德意志中學」（Deutsche Oberschule）很值得我們注意。這種中學是在一九一五年間創立的新學校。牠的目標在實施一種與古典式和科學式的中學都不相同，特別注重「德意志」的科目（如德國史，德國語言文學，德國藝術等）的中等教育。創辦這種學校的宗旨，是要給學生較多量關於德國生活和德國國體的智識，藉以陶冶更有意識的愛國心。自然革命以來，這種中學的數目大增，前途似未可限量。按照普魯士法規中關於這種學校的規定，注重德意志文化的成份比注重德國政體方面的成份較多。公民學自成一種科目。這種中學校，最能代表現代以本國成績和本國文化做一切科目中心的趨勢。在又是一種重要步驟藉以培植德國未來公民有意識的愛國心。在這裏我們還也以附帶提起，革命後新辦的「建立中學」（Anfängerschulen）課程也和「德意志中學」差不多。

一八一八至一八一九年共和初成立時，各校當然還沿用舊有的課本。最初，各邦政府並沒有將培養對新政體忠誠的課本來代替以前用來培養對德皇忠心的課本。當時普通的感覺，以為共和頭幾年間，課本自然會慢慢

適應新的狀況，不久各邦政府對教科書方面開始採取較積極的態度。一九二三年正月十日普魯士教育部長明令規定以下原則：對戰爭和君主的歷史的限制，注意最近學術、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根據憲法的精神藉歷史的教學來推進公民訓練。可是這一類的教科書卻留給教師自己去編纂，各邦中有些由政府方面發起編纂新課本，有些請聯邦內政部做這項工作。這樣在十幾年間舊有教科書——尤其是關於歷史、公民、文學、地理等科的書籍——都經過修改或重新編纂。這種新舊交替的歷程是逐漸的，而且經過在政府和學校中擁護新舊政體的兩派長期爭持。

看過大多數這樣課本時，最令我們注意的就是上述各種特點。第一、在歷史教科書和「讀本」中，找不出強烈的擁護共和，反對君主政體的宣傳。（註二三）關於政體形式的整個問題，縱然提及，措詞也非常冷淡。不過公民學和憲法教學的着着擴展，足以表示現有愛國心與現時政體連在一起的嘗試。各教科書中很明確的表現出對國家團結與對國家自由的重視，但所表現的國家主義的性質，不是浮燥的或軍國的，而是指出民族在文化上的成績。內中表示德意志民族的團結，不大靠政府的權力而靠保有共同語文，與共同文化上的風習和活動。這種國家主義，可以包括在邊疆上和國境以外的德意志人，大有利於一種文化的帝國主義。他們同時又在各教科書中乘機表示凡爾賽條約將德國解除武裝，使成殘廢至降為二等國的不公平。

在教科書中發揚國家情感的另一種較精密更有效的方法，是對教材的刪縮。在歐洲史的課本中，主要部份是德國史，其他各國歷史的討論，只限於和德國有關的部份。假如我們將普魯士中級學校現時最通用的普通歷

史課本（如 Gerhard Bonwetsch, Schnabel, 和 Neubauer 所編的各本）打開一看，我們可以發現在歐洲的中古史和現代史中，過半的篇幅是有關於德國史的材料。此外，外國的文學，只在外國語文的科目中方有機會學習，這樣使學生只有在學習外國語文時可以得悉德國人以外在文學上的成績。假如我們一看在一九二四年出版，現時最通用 Hofstaetter-Borthold-Nickolai 所編的估量與動作（*Wägen und Wirken*）一書，我們可以發現下列的分部：（1）德意志的土地與民族，（2）社會中的生活，（3）德意志的國體，（4）勞工與經濟生活，（5）自然界，（6）德意志的藝術，（7）德意志的靈魂。在中級學校和中學校所用的教科書，必須經各邦政府審定，使課本的性質多少可以劃一。但小學校的教科書由各區選擇，因此性質便比較分歧。

一向在學校內映演的電影，不但有裨於國家精神的增進，而且還可以增進君主政體的精神。在這類電影片中，我們可以提起的有「斯加格拉克戰役」（*The Battle of Skaggarak*）「Fredericus Rex」（人名），「德國的萊茵河」，「卑斯麥」，「十字架下的土地」（一套反波蘭的影片）此外，學生自己還時常表演歷史的戲劇，很可以喚起與過去君國時代同是一家的感覺。各班還到有歷史意義的地方去旅行，使學生們可以得到德國各地風景優美的印像。每月規定一天作遠足或旅行日，全體學生必須參加。學校的集會，也是發揚國家理想的要素。在重要的國家紀念日，如各次邊境上地方的民衆表決，雷爾（*The Ruhr*）區域的被佔等，學校中舉行特別演講，藉以喚起兒童的愛國心。在這種集會中，曾參加戰役的人時常出席講述他們在戰場上或被俘時的經歷，使兒童得領略前輩的愛國經驗。

各種假日也很重要，對兒童都有特殊的意義。在大戰以前的兩個重要假日，九月二日的「轎子節」(Sodan Day) 和正月二十七日的德皇壽辰，現時自經廢除，雖然右派份子依舊舉行慶祝。此外，還有各種地方的「國家」假日，例如在東普魯士的坦寧堡 (Tannenberg) 戰役紀念日 (與登堡第一次戰勝俄軍的紀念日) 到現在還舉行慶典。許多右派的中學校，例如紐魯濱 (Neuruopin) 地方的弗來得烈威廉古典中學，將簽訂凡爾賽條約的正月二十八日作為哀悼日。帝國成立的紀念日，正月十八，現已替代德皇誕辰變成國家的假日。普魯士教育行政當局特別指定各校哀悼西來西亞 (Upper Silesia) 割歸波蘭和法軍開入魯爾 (Ruhr) 地域的日期。除此以外，在耶穌誕，聖靈降臨節，以及復活節三個假期中，不但向兒童解釋這種假日在宗教上的意義，還特別注重灌輸「德意志」的特性。這種假日，已變成「德意志的耶穌誕」，「德意志的聖靈降臨節」和「德意志的復活節」。關於共和的唯一正式假期，就是八月十一日的憲法日。因為八月中大多數學校還沒有開學，這種假日初時對學校沒有多大意義。

可是國會在一九二七年間要求聯邦政府設法使各邦政府實行下列數事：(註二四)

(a) 本共和的精神，推進有價值的學校慶典，設法將憲法日作為假日，特別為學生與家長舉行盛大慶祝。

(b) 憲法日各學校懸掛聯邦旗。

(c) 在各校中詳細施行關於代表聯邦的顏色——黑，紅，金——歷史的教學。

普魯士教育部長於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公布關於慶祝憲法紀念日的詳細辦法，又下令本共和的精神修改唱歌教本。同時他又警告各教師不得自由發表個人在政治上的意見，必須訓練青年盡忠盡力於民主政體。學校的裝飾也經過詳細考慮。雖然教育部對各種必需的改變都有詳細規定，但各校往往不遵行。有些學校到現代還沿用帝國或皇室的名號；在走廊和教室中，我們還看得見以前的紅白黑旗幟與德皇的像片掛在一起，間或有選帝大侯（The Great Elector）大弗來得烈帝，卑斯麥，威廉一世等像片。直到一九二六年五月，民主黨的代表維克爾（Wickel）在普魯士的議會中還須作如下的辯論：「一切公立學校和在本邦政府視導下的一切私立學校，必須備有德意志國旗，並須在某種日子中懸掛之。」

我們已經說過，教師的態度比課本中所取的态度還重要，因為在德國的學校中，教師是主動的份子。國家紀念日，國旗，課本，以及其他教學的資料，不過是預備給教師們用來影響學生的工具。德國的教師是德國教育的樞紐，教師們對國家主義和現有政體的态度是很值得注意的。在大致上我們可以說，國內在政治和社會上意見的分歧，都從教師當中反映出來，除了信仰共產主義的教師比較少見以外。到底有多少教師真心擁護共和，很不易斷定。老一點的教師當然和戰前一樣；他們以前在社會上受過特殊的待遇，當然依戀着以往的好日子。只有在革命後纔聘任的青年教師中，可以找出自動的對共和忠誠的份子。特別在工業區的小學中，我們更可以找出不少與進步的觀念或社會民主黨表同情的。在較小的市鎮中，教師們所處的中產階級地位——尤其是中學的教師加重了他們的尊嚴。保守和反對共和的教師，比較上有固執成見在教室中或公共場所上發表已見的可能。社會

民主黨黨員韓納虛 (Hennisch) 在普魯士教育部長任內曾設法贊助擁護共和的教師，他在普魯士議會中說：「我們必須陳說擁護共和理想的人們所常要受到的犧牲。」雖然大部份教師中至今還抱着這種反動的愛國主義，雖然許多教師更因此轉而擁護法西斯黨，然而他們在經濟上卻要仰給共和政府，所以最少在外表上他們必須對新政體表示忠誠。

中小學教師的訓練都曾經過變更，往發揚對新政體忠誠的方向走。幾乎在所有訓練師資的學校中，公民學是必修的科目。此外，政府還試用其他方法來養成他們對國家自豪的感覺。普魯士教育部曾在中學教師檢定試驗中加考「德意志文化」一科。這種必考科目，注重於理解德國普通的國性和德意志民族的特質；認識各種主要的德國式建築，居處方式，以及全國各種服裝；熟諳本國詩辭的性質，神話，以及格言等。「德意志中學」的教師，特別要注重這種科目。

在轉向我們的注意到大學方面以前，我們應當先略說及所謂「家長會」(Elternräte)。這種組織是在革命爆發時創立的，目標在使反動的教師能夠受到勞工階級家長的影響。可是這種家長會，也和其他革命期中成立的團體一樣，漸漸失去本旨。有些地方這種組織縱還存在，常變成使保守的家長對學校更大影響的工具。在中學校內因為家長多係中上階級份子，所以這種可能性更大。

雖然在德國的學校中，還可以找出一點共和的潮流，但德國的大學卻完全是反動的。(註二五) 大學的教職員中一部份是以前的行政人員，學生的主要來源是遭受戰後經濟狀況苦痛最重的中產階級。根據一九二五年

的統計，在普魯士各大學中，學生人數約四萬四千人，家長職業的分配，表示只有三六七人，還不到百分之一的家長，屬於勞工階級。（註二六）這班學生都抱有青年的熱望，希冀總有一天德國會「克服外國內的一切敵人。」他們曾經參加反動派軍人團體的許多活動，在各種愛國的慶節中，都佔很重要的地位。

共和成立以後，一切學生組織，在進步份子領導之下成立一個總團體，名叫「德意志學生會。」可是這個團體以後為右派所把持，結果被政府解散。這種動作，使學生對政府的感情更壞。最重要的國家主義學生團體是德國中學生聯合會（Deutsche Hochschullring），牠又是學生反猶太運動中的領袖機關。這是由各學生會社組成的一種「連環」團體，此外，還有由各劍術會合組，極端反動的德國武術會（Deutsche Waffering）。上述各團體內包含有德意志國家民黨和法西斯黨的份子。法西斯黨近幾年來在學生當中的勢力擴張得極快；事實上據一般人的估計，學生當中有過半數對法西斯黨表同情。民主黨，天主教中心黨，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也各有學生組織，但共產黨的組織，有好幾回被禁。擁護共和的學生，所佔數目不多，我們可以說在德國的教育機關中，要算各大學裏的國家主義最為強烈，反抗的對像是「猶太的共和國。」

檢討完德國學校系統中的公民和國家訓練的演變以後，我們值得把顯著的要點，概括如下：在十八世紀後半期就有將公民訓練作為國家教育中一部份的要求，其起因係為資產階級要改變教育系統來適應本身利益的需要。可是在十九世紀的大部份時間中，專制和半專制的政府覺得公民與國家的教育會危害他們的安全，乃盛行一種策略，將這種教育擯諸學校之外。一八九〇年以後，直到一九一四年的前夕，各學校開始實施公民訓練，

來抵抗社會黨對全國青年的影響。同時這種國家的訓練，對盡忠於半專制德皇的教訓是連成一片的。最末，經過歐戰以後，各校中國家主義和公民的訓練都有新的進展，目標是抵抗革命無產階級份子的國際主義，以及反動派與法西斯黨的政治野心。在另一方面看，共和派和法西斯黨的教育理想，同是以發揚堅強的國家意識作根據，所不同者僅是形式和程度；前者注重文化的成份，後者注重軍事的成份。同時因為一般學校對培養愛國的情感比培養對議會式的共和政體的忠誠，所做工作還要多。現時在學校中所教的國家主義，可作為養成盡忠於法西斯政體的基礎，也可作為養成盡忠於共和政體的基礎。

(註一) 參閱 August Messer 著 *Das Problem der staatsbürgerlichen Erziehung, Historisch und systematisch behandelt* (1902); Franke 著 *Staatsbewusstsein als Erziehungsgrundlage vor hundert Jahren*; Franke 著 *Der Deutsche Staatsgedanke in der Volksschule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 (1912); Franke 著 *Geschichte des Staatsgedankens in Schule und Erziehung* (1912), 這幾本書尤其是 Franke's 氏的 *Geschichte*, 內有許多關於公民訓練的資料，而且許多是從原來文件中直接引用的，本章中歷史的資料和引用的各段，除特別註明的以外，皆取自這一本書中，因此不單獨註明。

(註二) 關於教育史的大概，參看 Friedrich Paulsen 著 *Die Geschichte des gelehrten Unterrichts auf den deutschen Schulen und Universitäten vo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bis zur Gegenwart* (二冊—八九六年版)；Friedrich Paulsen 著 *Das deutsche Bildungswesen in sein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1906)；Heinrich Lewin 著 *Geschichte der Entwicklung der preussischen Volksschule und der Förderung der Volksbildung durch die Hohenzollern* (1910)；Friedrich Wianstein 著 *Die preussische Volksschule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1915); J. Tews 著 Ein Jahrhundert preussischer Schulgeschichte (1914); Alfred Henbaum 著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ildungswesens seit der Mitte des 17. Jahrhunderts, 第1卷 (1905); Edward Reiser 著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since 1789 (1923); F. Seiler 著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Unterrichts (第1册 1906年版) W. Kahl 著 Zur Geschichte des Schulunterrichts (1913); H. Heppel 著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sschulwesens (第1册 1914年版) August Hinke 著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s Preussischen Volksschulwesens (1843).

(註三) 關於一八〇〇年以前的教育發展 著 Biedermann 著 Deutsche Bildungszustände in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18ten Jahrhunderts (1905); Julius Galland 著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Geschichtsunterrichts im Zeitalter der deutschen Aufklärung (1900); Alfred Henbaum 著 Die Nationalerziehung in ihren Vertretern Zöllner und Stephani (1904); F. Vollmer 著 Friedrich Wilhelm I. und die deutsche Volksschule (1909); Paul Krihmann 著 Die Versuche einer politischen Unterweisung in den deutschen Schulen des 17ten und 18ten Jahrhunderts (1905); Albert Richter 著 Geschichtsunterricht im 17ten Jahrhundert; Robert Stein 著 Die Schule als Staatsanstalt in Schulgeschichte und Staatslehre bis 1794 (1906); Ferdinand Strassburger 著 Die Mädchenerziehung in der Geschichte der Pädagogik des 17ten und 18ten Jahrhunderts i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1911); Georg Merz 著 Das Schulwesen der deutschen Reformation im 16ten Jahrhundert (1902); F. E. Ruhkopf 著 Geschichte des Schul- und Erziehungswesens (1794); 著本 著 Monumenta Germaniae Paedagogica 第1, VIII, LIII.

IV 卷

(註四) 著 A. Basedow 著 Johann Bernhard Basedow: Neue Beiträge, Ergänzungen und Berichtigungen

zu seiner Lebensgeschichte (1924).

(註五) 見 Friedrich Wienstein 著 Die preussische Volksschule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1915),

第二十七頁。

(註六) 但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在學校中所謂國家主義的訓練，社會民主黨中國家情感的增強，也有相當貢獻。

(註七) 參見著 Hans Auerlein Der Weltkrieg im Unterricht (1916); O. Karstent 著 'Kinderang' und Kinderang-fatz im Weltkrieg (1916); Lesestücke zum Weltkrieg (H. Kappoy 與 H. Koch 共編 1915年) Adolf Mathias 著 Staatsbürgerliche Erziehung vor und nach dem Kriege (1916); Staatsbürgerliche Belehrungen in der Kriegszeit (für Fach- und Fortbildungsschulen) (Königliche Preussische Landesgewerbeamt 編 1916) Max Engel 著 Leipziger Volksschulen im Zeichen des Weltkriegs (1915); Rudolf Gasch 著 "Kriegsübungen an höheren Schulen" (第 3 卷) Neue Jahrbücher 第 30 卷 第 3 期 第 1 卷 第 1 期 (1915) Deutschlands Wesen und Werden (Aufsätze zur staatsbürgerlichen Erziehung) (Kriegs-pressamt, 1918); L. von Golze 著 Universität und Schulen im Kriege; Schule und Krieg (Sonderan-stellung im Institut für Erziehung und Unterricht (Berlin, 19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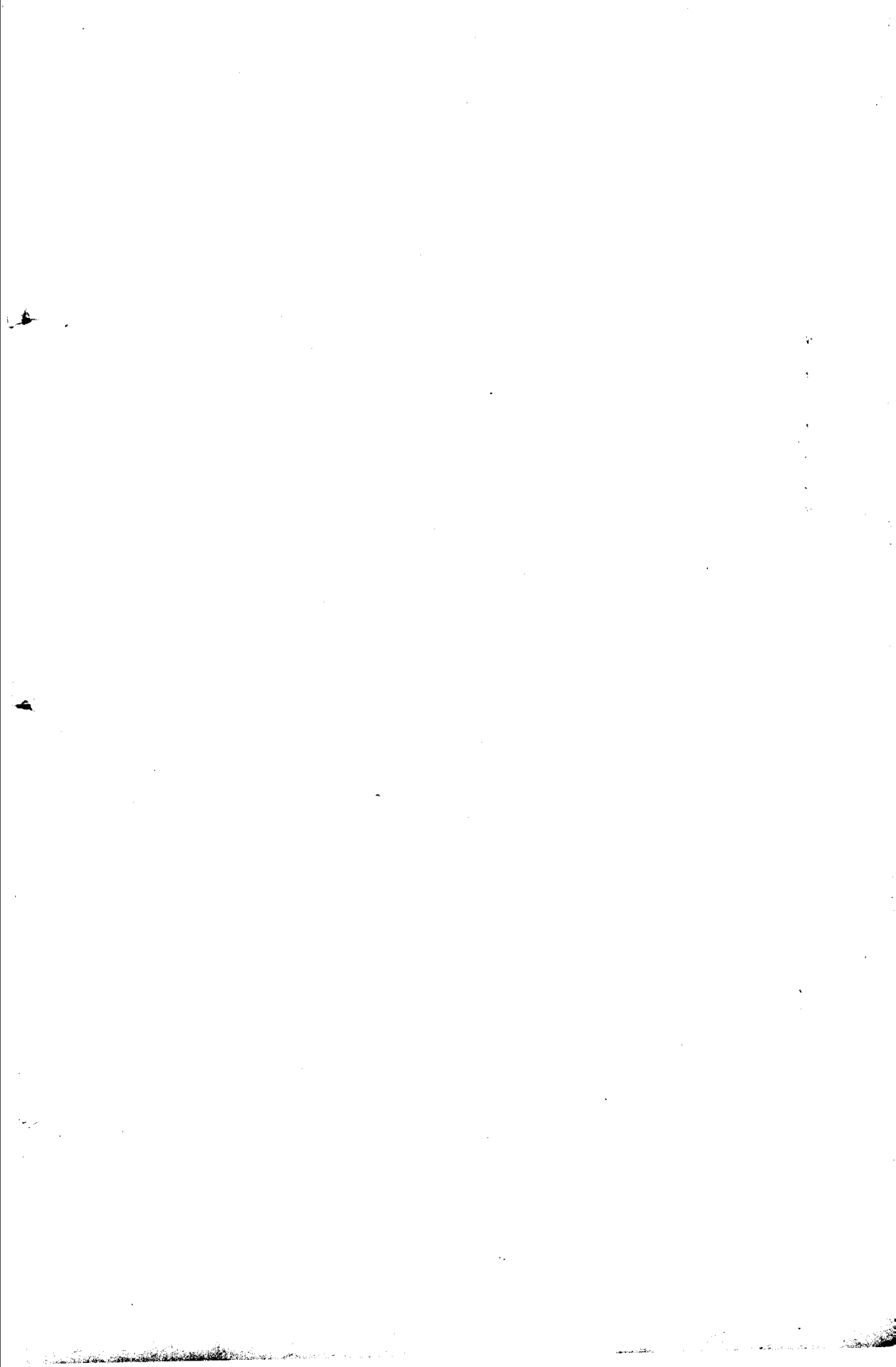
(註八) 見 Walter Landé 著 Die Schule in der Reichsverfassung (1929).

(註九) 參見 I. L. Kandel 著 Thomas Alexander 著 德意志方文件與刊物雜誌 The Re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Prussia 1919年 第 1 卷 Otto Foelitz, Der Aufbau des preussischen Bildungswesens nach der Staatswahl-zung (1923); F. J. Kleinsorg 著 Das Schulwesen in Preussen Volksschulen, mittlere und höhere Schulen (1927); Fritz Karfch 著 Die neuen Schulen in Deutschland (1924); A. Schurnagl 著 Die Schul-politik in Bayern seit der Revolution (1924); Alexander, Schwab 著 "Schulprobleme in der Revolu-

- tion" (報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第 XIV 卷, 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 第六二九頁至六五九頁; Gertrud Bänner 著 Die Staatserziehung (1924); Rudolf Laemmel 著 Die Erziehung der Massen: Grundlagen der Staatspädagogik (1923); Das deutsche Schulwesen (Zentralinstitut für Erziehung und Unterricht, Berlin) 教育部及各省教育行政的概况。
- (註一〇) 同參 國家公民教育, 發展及現狀, 報告書, 內閣府, 1921。
- (Denkschrift des Reichsministeriums des Innern) (1924); F. Lampe 或 G. H. Franke 合著 Staatsbürgerliche Erziehung (im Auftrage des Zentralinstituts für Erziehung und Unterricht) (1926); Arthur Janz 著 Die staatsbürgerliche Erziehung (1919); J. Boeger 著 Staatsbürgerkunde als Lehrfach der Schulen (1921).
- (註一一) 參照 Zentralinstitut für Erziehung und Unterricht, Die Reichsschulkonferenz, ihre Vorgeschichte und Vorbereitung und ihre Verhandlungen (Amtlicher Bericht erstattet vom Reichsministerium des Innern) (1920), 第三六至三十七頁。
- (註一二) 關於這種「指導」和其他與普通士學校有關的有價值材料, 參閱 Kandel 與 Alexander 氏在他們合著的 The Re-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Prussia (1927), 書中譯成英文。本書所引用的, 全部自該書。
- (註一三) 詳註一一。
- (註一四) 詳註一一。
- (註一五) 詳註一一。
- (註一六) 詳註一一。
- (註一七) 詳註一一。

- (註一八) 詳註一一。
- (註一九) 詳註一一。
- (註二〇) 詳註一一。
- (註二一) 詳註一一。
- (註二二) 詳註一一。
- (註二三) 魏廉 Siegfried Kawerau 著 Alter und neuer Geschichtsunterricht (1924); Siegfried Kawerau 著 Denkschrift über die deutschen Geschichte- und Lesebücher; Siegfried Kawerau 著 Die ewige Revolution (Ergebnisse der Internationalen Geschichtstagung, 2-4 Oktober, 1924); Max Fehring 著 Horbart Freundental 著 Geschichtsunterricht: Deutsche Geschichte im Bilderspiegel der Heimat.
- (註二四) 或 Educational yearbook, 1927, 卷一, 44頁。
- (註二五) 魏廉 Die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und der heutige Staat (Referate erstattet auf der Weimarer Tagung deutscher Hochschullehrer am 23. und 24. April, 1926, von Wilhelm Kahl, Friederich Niemecke, Gustav Radbruch); J. H. Migau 著 "Sozialistische Erhebungen in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nach dem Krieg" (或 Allgemeines statistisches Archiv, 卷十, 4卷 [1921年]) 魏廉 Die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nach bürgerliche Erziehung an den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eine Denkschrift im Auftrag der Vertretung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vorgelegt vom Zentralausschuss für staatsbürgerliche Erziehung an der Universität Marburg)(1920); Weltpolitische Bildungsarbeiten an preussischen Hochschulen (Festschrift aus Anlass des fünfzigsten Geburtstages des preussischen Ministers für Wissenschaft, Kunst und Volksbildung, Herrn Professor, Dr. O. H. Becker)(1926); Hellmut Volkmann 著

Die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in ihrer Entwicklung seit 1919 (1925); Die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in ihrem Werden, Wollen und Wirken (1928).
(註二六) 參看 Statistik der Landesuniversitäten und Hochschulen mit Einschluss der medizinischen Akademie zu Braunschweig für das Sommerhalbjahr 1925 (Bearbeitet vom Statistischen Landesamt), CCLXXXI (一九二五年) 第一頁至八十五頁)



第三編 政府以外的組織和份子

第十一章 教會

從發揚對政府的忠誠的立場上看，教會當然是一種重要的組織。其組織的廣佈，其歷史上的風氣，其情緒上的號召力，總合起來使牠根深蒂固於大多數民衆的心理中。因爲在德國幾乎每個國民必隸屬於一個教會，新教會、天主教會，以及附帶的一切組織，便成爲在民衆中培植公民忠誠的最重要機關。（註一）

在德國每人便生而爲教會中一份子，正和生而爲公民一份子相同；每人按父母的信仰在公立學校中受相當的宗教教育；到了成人時候，還要向教會納稅，由政府負責徵收。每人畢生是教會中的納稅份子，除了經過正式退出教會的手續以外，這種義務是不能免的；在退出教會時又必需繳納手續費。結果除卻已經脫離教會的自由思想份子外，幾乎所有德國人都是一個宗教團體中的一份子，都要對所屬宗教團體負經濟上的義務。

德國的民衆中約有三分之一是天主教徒，三分之二是新教徒。按一九二五年的戶口調查，宗教的分配如表一所示。（註二）其餘代表各小宗教團體或已經脫離教會的自由思想者人數約佔總人口百分之四·三。

表一

宗 教 團 體	會 員 人 數	佔總人口的百分比
路德派或改革派教會	三九,四八一,二五八	六三·三
羅馬天主教會	二〇,一九三,三三四	三二·四
希伯來教	二四七,四五〇	〇·九

可是天主教會和新教會中有一大部份人不很活動，一部份甚至對上帝的有無採取懷疑的態度；只因社會感情或家庭的關係仍屬教會中人。實際上向社會民主黨或共產黨投票的人，大多數仍舊是教會中的納稅份子。但是教會雖然幾乎倚靠全國人口的賦稅來維持，牠的影響一大部份只及於少數活動的份子。新教會和天主教會都不靠本身的宗教組織來影響信徒，而靠各種附帶的團體。這些團體的活動範圍，包括人生的各方面。除此以外，教會對多數不很活動甚或被動的份子，影響不很直接。這些人雖然不參與教會的活動但表同情於教會普通的宗旨。在承認教會的普通原則，覺得教會是對自身，兒女，或社會有好處的人當中，態度又各有不同。我們可以不必一一詳述，在這裏可以說在大多數的民衆當中，還有一種普遍的感覺，以為教會是政府和社會的繼續存在所必需。

在德國教會與政府有密切的關係，從上述情形中我們已可看出來。尤其是新教會，因為自從一六一三年宗教改革以後，新教會就差不多變成政府的組織。在普魯士政府的教會是路德派，主教就是國王。可是自從好恩却倫朝代（Hohenzollerns）轉奉加利非尼教派（Calvinists）以後，便發生一種反常的情形，歷兩世紀而不變。

到一八一七年間弗來得烈威廉三世將普魯士的兩個教會合併起來，組成福音會 (Evangelical church) 這種特殊情形遂告終結。(註三) 同樣合併的情形，在同年中在納梳 (Nassau)，次年在柏拉丁尼特 (Palatinate) 一八二二年在巴頓 (Baden) 都同樣發生過。教會依舊是政府的組織，教士為政府的官員，同時有些宗教上的差別，得到完滿的妥協。這種變化，對其他各邦的路德派或改革派教會當然不生影響。

各邦政府與天主教會的關係，性質比較複雜。在拿破崙征服壓逼之下，各邦曾大規模的沒收天主教會的地產，同時各邦政府對教會的統制，較前更為嚴密。拿破崙敗退以後，教會設法恢復以前的勢力和獨立的地位；可是各邦君主正想擴大自己的權威，因而反對這種舉動。巴維利亞公佈一個法令，作為一八一八年憲法的一種補充，對天主教會享有的權利，嚴加限制。

在弗來得烈威廉三世統治之下（一七九七年至一八四〇年），普魯士繼續沿用一七九四年普魯士法典中所規定的政策，將政府的主權，放在新舊教會之上。天主教會雖然不承認這種原則，但他們終於成立一種暫行的辦法，在一八二一年公布的 *Salute Animarum* 勅令中正式規定。天主教會與韓樂發爾邦政府在一八二八年也規定類似的辦法。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引起各處天主教會要求政府取消教會活動的統制。天主教徒設法使教會與政府分離，獲得教育的自由和出版的自由，可是一切的要求，都預備只用法律的手段來實現。我們可以說一八四八年一般解放的要求，與教會對本身活動從政府的統制中得到解放的要求是一致的。要達到這項目的，天主教徒組織成所謂派阿斯會 (Pius-Societies)，以在一八四六年間得勢的開明教皇派阿斯九世命名。一八

四八年十月第一次德意志天主教徒大會在曼伊恩齊 (Mainz) 舉行。該城在前十年間已經是教會脫離政府統制運動的中心。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本身雖然不能實現這類的要求，但一八五〇年普魯士憲法卻給新舊教會不少的自由。每個宗教團體得規定自己的事務，同時對實施其文化的教育的和慈善的活動所必需的組織與經費，保持着享有，應用，及行政的權利。政府廢除關於干涉教育任用人員的權限，但有特殊規定的不在此例。因而天主教會與普魯士政府在此後二十年間乃得相安無事。

帝國成立以後卑斯麥與天主教會的爭持，從這次研究的觀點看來是極有意味的。這種爭鬪，表示政府從教會手中奪去許多權利，要使教會成爲政府的附屬品。從卑斯麥看來，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〇年間出現的天主教會中心黨純粹是代表邦的權利的政黨，黨員多出身於傾向自由的萊茵流域，威斯發利亞 (Westphalia) 以及南德各邦，他們的傳統觀念是反對普魯士獨霸，因此他覺得這項工作非常重要。此外，正在德意志帝國成立的歷程中，高唱教皇無不是的論調，可以看作教皇干涉德國事件的嘗試。

我們對「文化鬭爭」(Kulturkampf) 不必詳細討論，其結果是廢除一切反對教會的辦法。在各種不利於教會的法律中，只留下普魯士對一切婚姻事項，全歸政府管理的規定，以及耶穌派 (Jesuits) 的取締。後一種辦法，到一九一八年也被取消。政府加緊統制教會的無效，卻使一個重要宗教團體結成一種政治的組織爲天主教中心黨。這個政黨現在還隨時準備保護天主教會的一切權利，使不至被政府所侵剝。不過，只要天主教徒的權

利不被侵犯，中心黨始終是擁護政府的政黨。

一九一八年的革命，結果使新教會得到相當自由，根據聯邦憲法第一百三十七條的規定，一切宗教團體都是私人的組合，對自身的事務有處理的全權，對人員的任用，也不受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干涉。這可不像在美國一樣政府與教會完全分開，不過是政府不干涉教會內部的事務罷了，因為政府對新舊兩教會原有的許多權利都予以保障，教會與政府的關係，實在比從表面上看來更為密切。除了正式宣佈脫離教會的人外，每人在政府的心目中，都算教會中的份子。還有，新舊兩教會都保有向會員徵收賦稅的權限，而由政府代收。現行最普通的辦法，是在所得稅項下附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此外，在拿破崙時代曾經沒收天主教會地產的各邦，到現在還按期賠償地價。普魯士也同樣的向福音會賠償斯坦與哈登堡的改革時所沒收該教會地產的價值。此外，各邦和各地政府對教會所辦的慈善事業，還捐助一定的款項。

憲法中對教會與政府分離的正式規定，結果並沒有減少政府對教會經濟上的保障與供給，只有增高教會的地位。因此戰後德國所謂政教分離究竟意義何在，實是一個疑問。因為革命以前從來沒有一個聯邦正式教會，憲法中對於政教的分離僅規定一個通則，僅指各邦政府而言，特別是指各邦政府與新教會的分離。在普魯士，威廉二世的逃亡，使福音會失去了主腦。革命政府在接過王室對教會的管理權時，曾經委派三個委員（俗稱為「東方的三個聰明人」）暫時處置教會的事務。最後的辦法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間決定，將教會內部的事務，全歸教會自己處置。由原有的牧師會選舉一個評議會來代替國王以前的主教地位。現在教會具有對於自

己的立法權，任用職員時不必先得政府的允許。只有在財政方面政府能提異議，因為教會稅係由政府代收。因此普魯士的福音會的地位，較在君主政體時代好得多，在經濟上繼續受政府的供給與保障，但在行政上卻享有自由權。

天主教會與各邦政府的關係，除了巴維利亞外差不多沒有改變。在巴邦一九二四年政府與教會所立的契約中，曾給教會以處理本身事務的自由。可是一切人員的任用，雖然政府無權否決，須先報告政府，這契約的重要部份在於允准教會對巴邦教育系統，有相當的影響。政府照舊承認教會經濟上的責任，不特代教會徵收賦稅，而且賠償在拿破崙時代沒收教會地產的價值。巴邦與在當地的福音會，也有同樣的協定。聯邦政府與教會也會經磋商訂立同樣的契約，可是因為左派與中立派政黨（天主教中心黨除外）的反對，尚沒有具體的結果。

在德國，教會與政府關係的密切，在學校系統中也表現出來。歐戰以前宗教在德國中小學內是必修的科目，可是各派宗教的教育，不由牧師擔任，而由普通教員按照經過政府公布和各該教派牧師認可的規定來教學。革命不能實現社會黨廢除學校中宗教教育的計劃，妥協的辦法是如經家長的請求，學生可以免習宗教的科目。此外，在有人不信宗教的工業中心，特別為反宗教份子的子女另設學校。因為這種辦法要使非宗教份子的兒女隔離，結果反使其他學校不至受這些份子的影響，宗教教育的勢力反為增強。同時這些非宗教學校的學生，在社會上的地位很不利。在巴維利亞一邦，教會對教育的影響特別大。在政府與教會所訂立的契約中，規定天主教會對於教授天主教教義的教員，有考試及檢定的權限。

特別有意思的，就是政府對一切被認可的宗教團體的信仰與實行，都給以明確的保護。按照刑法第一六一節的規定，不但是褻瀆曾經承認的宗教是犯刑法，連對曾經承認的宗教團體、牠的信仰、組織，以及儀式作公開毀謗的，都得處三年以內的徒刑。這種法律，使許多社會黨和共產黨中的思想自由份子因攻擊宗教與教會而被捕受着處分。共產黨的報紙南德勞工報 (Süddeutsche Arbeiterzeitung) 的三個編輯，Hammer, Jans, 和 Lämmle, 因為指教會為『廣播愚昧的組織』，每人被判罰二百馬克。(註四)民報 (Volkzeitung für das Volkland) 編輯 Knaut, 因說教會『與犯罪的組織聯合一致』而被判處兩星期的監禁。(註五)同樣的案件時常發生。

就大體論，我們可以說革命與大戰後革命的時期，結果使政府給予教會的權勢有增無減。這種出人意表的發展，可以說是因為信奉新教的德國中央政權的衰弱，不能制御天主教的勢力；因為當局懼怕過激主義，因而用宗教來抵抗過激主義的影響；因為使共和政體能夠維持下去，特別給予教會多量的自由，藉以博得教會的擁護。因為天主教中心黨在德國成了政治上的樞紐，舉足輕重，所以當局不能不博得天主教徒的好感。

從這次研究的觀點看來，這種對於教會和政府關係的分析，發現許多重要的事實。教會在理論上雖然和政府分離，但在事實上卻和政府有密切的關係；教會在經濟上的一切利益，全靠政府維持。教會必須對現有政府忠誠，縱然牠或許反對現有政體的性質。新教會與天主教會所養成的對政府的忠誠，性質並不一樣，這種差別很值得我們注意。在大多數的邦中，新教會是政府直接的機關。這一點我們早已看到，這使他們不能不對政府一切必

要的設施，加以宗教上的認可。教會在大體上是政體的一部份，對政府一味忠誠，絕不疑問，與其他部份一樣。所有教士和牧師，與行政人員一樣是政府的官吏，將來要享受政府的養老金，因此操縱政府的階級同時也可以左右教會的政策。這就可以解釋爲什麼普魯士的福音會可以頌揚擁護半專制式的軍國主義的政府。這同時又可以解釋爲什麼這個教會不特注重國家的理想，而且可以就當時政府的形式來擁護這種理想。尤其是在普魯士，因爲福音會的重心不在工業的中心而在農業區。此外，在政府視導下牧師的委派，只有態度和履歷都合適的人才中能中選。新教的牧師和任何政府官員一樣，在政治上抱解放思想的人很少，社會主義更不用說了；因爲這種信仰是不忠誠的。可見福音會對上帝、德皇、和國家認爲是無上的。

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〇年間，在青年的德皇影響之下，社會改革的興趣極盛一時。可是社會黨工人冷淡的態度，使德皇漸漸灰心，同時又使教會中解放份子的勢力減弱。福音會幾乎完全受著貴族的、和帝國的風氣所支配，這種情形，可以說明在大戰期內該教會爲什麼表示強烈的愛國心，在革命後爲什麼要反對新政體。

天主教會本來國際的性質多，國家的性質少，在普魯士與在全德國所佔的地位都不很重要。牠的組織也不是政府機構的一部份。可是牠被認作一個正式的教會，得領受各邦政府的賦稅、賠款，和其他的資助。此外，天主教會在德國南部和在解放派勢力範圍的萊茵流域聲勢最大，明白標榜着反普魯士及反帝國集權的風氣。「文化鬭爭」(Kulturkampf)的經驗，使天主教徒對帝國干涉宗教的反感特別敏銳。這些因素，都有使天主教會不願自視爲與統治德意志帝國的勢力連成一氣的傾向。這雖然可以使統治份子對天主教會所擁護的某種原則

表示懷疑，我們可不能說天主教徒不和新教徒一樣是良好而忠實的臣民。

大戰的爆發，更證實這一點，因為新教會和天主教會一致贊助這次戰爭，祝福前線的戰士，安慰後方的軍隊。（註六）到底新教教士或天主教士的愛國心較為熱烈，是一個屢經爭辯而尚未得到結論的問題。戰事遷延下去，勝利的可能性愈來愈少。天主中心黨全體出來主張請教皇發起和平運動，在一九一七年提出著名的和平提案。這種動作，使國家主義黨大為憤懣，指天主教徒為不忠。在同年中一班德國新教的教士與神學家出來號召同道中人，一致從事和平的工作。（他們覺得以往傳播國際的自由理想的工作，曾只讓反宗教的社會黨去做。）這種宣言分寄給四千個牧師和神學教授，但只有少數簽字贊同這種鼓吹國際間互相了解的運動。一大部份人對這種運動，表示忿怒。一部份新教的教友建議召集全世界各教會在柏林開會，一致為和平而努力，這項建議也遭大多數德國教士的拒絕。

天主教徒在大戰前一般的態度，以及戰事將要終了時他們的隨時準備贊助和平運動，這兩點可以幫助我們解答為什麼在革命時天主教徒立刻能夠承認新局面，並即和社會民主黨合作共組新共和政府。（註七）這種變遷的另一原因是中心黨既為天主教會在政治上的左右手，他們當然可以將政治程序往左移動來滿足信徒中的過激份子。他們雖然曾經擁護君主政體，但也可以真誠的擁護共和，因為他們的國家主義並不與普魯士君主國的政治系統連在一起。維馬憲法的成功，實際上全賴天主教中心黨的扶助。天主教會實已變成一種擁護新政體的主要勢力，因為在共和國的政治生活中，中心黨可以得到比在舊政體時更加重要的地位。

因為普魯士的新教會與君主政體有密切關係，好恩却倫的出亡與共和的成立使教會陷入混亂的狀態。他們雖然有很大的自由，但不知歸向那一方面好。從他們的性質和一向的風氣看來，新教教士與君主政體的關係非常密切，這使新教會繼續處在反動的地位，成為反動思想的中心。這種情境一直繼續到現在。做成這種情境的一個因素，是教會為舊政體遺留下來的唯一行政組織，現時雖然仰賴共和政府的維持，但已經與政府的機構分離，享有全部表白本身意見的自由。他們可以對其他舊日遺留下來，未受新政府干涉的勢力保持原有的同情與諒解。可是教會對共和在感情上的反對，因在經濟上得繼續享受各種利益而稍減。此外，他們強烈的君主式國家主義，在大戰後德國民衆中得不到許多人的同情。普魯士的新教會與天主教會不同，他們沒有提出社會的計劃，他們對信徒的影響大減。實際上我們可以說，在德國，新教徒雖然比天主教徒多兩倍，但天主教會對信徒的統制和對政治生活的影響卻較大於新教會。

我們特別感覺到興趣的，就是教會對政體的態度。因為我們所要討論的不是教會在宗教上的功能，而是教會對國家政府的關係與擁護。可是我們不要忘卻，甚至在純粹宗教的教訓中，教會也可以做公民的工作。牧師們覺得使信徒安份守己是一件基本的要事，尤其是在下級社會。因為教會雖然承認社會的和經濟的交惡的存在，但他們要表明這不是生活的根本問題。他們一方面注重個人靈魂的價值；一方面卻又重視國家社會的團體。教會的宗教教訓於是成了一種安定人心的勢力，尤其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當社會的和經濟的崩潰即要發生的時候，這種力量特別顯著。因此宗教的教訓縱然不直接涉及國家的情感或公民的忠誠的問題，但對政府很有

價值。此外，在新舊教會的教義中，都有一部份是關於世俗的，教人在俗事中服從世俗的權威。這種服從世俗權威的教訓並不在教義之外，而是教義中的主要部份，有聖經中各段作根據，最顯著的就是耶穌所說的『將一切屬於上帝的歸給上帝，一切屬於君主的歸給君主』的教規。良好基督教徒的一種責任，就是同時也作一個忠實的臣民或公民。這分明就是教會教人民要盡忠於國家政府。這種忠誠程度甚深，竟使在大戰時把捍衛國家成爲每個基督徒在宗教上以及在公民生活上的責任。（註八）這種忠誠可以採取好幾種形式，從對這種責任的默認，至戰時甚至戰後時常流露出來的熱烈的國家情感。以下是一個新教牧師的領袖在一九一九年的愛國表示，這很可以代表一般牧師的態度：

「培植國家的生活，在這生活已經消失或恐要消失的狀態之下，要使牠重新活躍，這是上帝放在他孩子之前的一種最偉大的工作，在各種民族中，我們的感情、榮耀、和希望所寄託的就是德意志民族。」（註九）

「耶穌的精神與國家的觀念團結起來，就是上帝的天國在人間的實現。」（註一〇）

教會傳播這類對政府盡忠的觀念，全靠宗教的集會和各種附屬的團體活動。在各種宗教的集會中，演講佔很重要的地位，足在聽衆中做成一種特殊的印象；因爲這種講辭與其他集會的演講不同，立論以神聖的權威作根據，又不許公開的辯難和討論。我們當然不能假定所有——甚至於多數——的講辭都能喚起公民的忠誠和國家的情感，可是在危急關頭中這類的演講，曾屢被利用來歸納到這些概念上去。他們還爲國家的福利祈禱，請求上帝給世俗的當局以一種的指導。在國難危急的時候，這種現象，當然更明顯。此外，在軍營內教堂的禮拜儀式

中，國家的色彩更爲濃厚。就大體論，他們將政府看成一種組織，雖然會有錯誤，到底是實現神聖目標的工具。

可是這種態度的傳播，不僅靠教堂的集會，還要靠附屬於新舊教會的各種團體。這種團體的設立，特別要包括會員各方面的活動，代表各種的興趣。各教會都有男女青年團的組織，工人的俱樂部，各種教育會社，慈善和福利的組織，以及精神病療養院等，其中有許多曾經在本書各處提及了。這些組織，不僅是加強教會力量的工具，而且是直接或間接散佈教會所主張的公民概念與國家情感的工具。（註一一）

在新教的組織中，特別有趣的是一八四二年成立的古斯他亞多夫會（Gustaf Adolf Verein）目標在扶助在 Diaspora 中較貧窮的教區；這就是說，扶助國內外德意志新教徒比較佔少數的地方的教會。這當然可以使在國外的德意志人與國家保持密切的聯絡。現時德國所有的新教會都一齊合組德意志福音教會總會（Deutsche Evangelische Kirchendeckung）。於一九二二年成立，目的是將全世界說德國語的新教徒團結起來，使他們與德國發生較密切的關係。他們活動的結果，奧大利的新教會也於一九二六年加入這個總會，作助成一個大聯合（Anschluss）的準備。此外，在歐洲各處許多德意志人佔少數的地方和在德國境外德籍人當中各新教教區的居民，都變成這個總會的會員。這個總組織，於是變爲促進全世界說德國語的新教徒在宗教上和文化上團結一起的一個重要因素。

天主教會所附設的活動，比新教會的較多而且較有組織。男青年團共有會員三十萬以上，女青年團約有會員六十萬以上。婦女會會員約二十五萬，各地母親會會員約五十萬，基督教工會會員約五十萬，工人俱樂部會員

約三十萬，此外，還有各種文化會社，會員數在二百萬左右。從這次研究的觀點看，最重要的也許要推在一八九〇年間成立的民衆俱樂部（Volkverein），現有會員在五十萬以上。這種組織的一個目標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保障基督教的社會制度，反抗一切社會革命的嘗試。他們一向注重社會的基本團結，反對一切破壞社會團結的舉動。他們開設公民訓練的課程，和散發對社會中各階級份子的宣傳品。下面所引語句，係他們在一九二七年所發傳單中的話，很可以表示他們的立場『我們贊成民主的政府，我們擁護從全國各團體在社會上和平得來的團結，這是真正民主政體所必需的根本條件。』

教會藉各種附設的組織，勢力普及到各方面的活動，居然變成政府的一個很大——或者可以說是最大的輔助。教會到處和政府合作，直至在各種活動中對教會的忠誠與對政府和對國家的忠誠幾乎分不開。一切公民對政府與國家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責任，都變成神聖的宗教的責任。

可是假如宗教與教會曾經被人利用來擁護現有資產階級的政府，非宗教便曾經被用來攻擊現有政府。我們不必將這個問題作詳細的分析，但要把德國非宗教的勢力作一個簡短的報告。（註二）這種人雖只佔人口的極少數，可是他們的野心卻不小，不能因人少而輕視他們。雖然在十九世紀的初葉德國就發現各種思想自由的團體——從不歸教的到信仰無神論的——可是明確的反宗教勢力，直到帝國時代纔組織起來。一八六一年德意志思想自由會（Deutsche Freidenkerbund）成立，這個組織，係由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內的解放派份子的左翼組成，代表『資產階級的開明化』的理想，這就是說，一種普通的思想 and 良心上的自由。他們在政治上，

沒有承認歸附任何方面。另一種反宗教運動的採取『葬禮會』的形式，目標在鼓吹火葬的辦法，第一個火葬場在一八七八年成立。

隨着社會民主黨的進展，在勞工階級當中發生一個無神的運動。一個無產階級的火葬會（Verein für Feuerbestattung）在一九〇五年成立，入會的必要條件是退出一切教會的組織。三年後一個無產階級的思想自由組織叫作無產階級思想自由會（Gemeinschaft Proletarischer Freidenker）跟着成立，開辦一種機關報名叫『無神論者』，以後變成直接主張無神論的理論中心。他們對教會和宗教的攻擊，不從宗教思想自由的觀點著手而以宗教是資本主義的朋友，幫助資本主義者壓逼工人使工人永遠不能翻身為理由。雖然社會民主黨的領袖許多人相信無神論，但社會民主黨卻不肯遽然採取反宗教的立場。根據一八七五年的哥達計劃和一八九〇年的愛爾福特（Erfurt）計劃，社會民主黨宣稱『宗教是個人的私事。』

大戰以來社會民主黨中發生的變遷，也在社會黨對宗教和思想自由問題態度上的改變表現出來。戰前社會民主黨不肯對宗教表示正式反對的態度，但承認唯物學的哲學為社會主義的根據。可是到了歐戰以後，因為他們與天主教中心黨同是統治的政黨，他們對宗教以及哲學的唯心論不復如前之仇視。實際上在現時的社會民主黨中，還有一部份人自命為『宗教的社會主義者』，其中有些人是新教會中的牧師，因為與福音會積不相能而轉向此途。一九二〇年這類宗教的社會主義者創刊一種報紙，叫作宗教社會主義報（Blätter für religiösen Sozialismus）。此外，舊日『改組派』的機關報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以及其他社會民主黨的出

版物中都有許多論文抨擊馬克斯主義的唯物根據和注重推進足以滿足勞工界精神上所需求的宗教式社會主義的需要。甚至在黨內高級職員當中，也發現這種態度。例如曾任聯邦司法部長的社會民主黨教授拉特勒樂克 (Radbruch) 在其一九二一年所刊行的社會民主的程序 (Das Program der Sozialdemokratie) 小冊中曾說及勞工階級對宗教方面的「得不著滿足的願望。」他要求推進一個無產階級的宇宙觀 (Weltanschauung) 和現有教會內外的一種宗教的精神。

由此可知社會民主黨漸漸容納各種形式的宗教思想。這當然對在該黨統制下的無產階級自由思想團體發生影響。他們愈來愈不注重反宗教和反教會的活動。這種組織的首領，將重點移到思想的自由，和在政治上一種中立的政策。因此他們與較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自由組織——尤其是 Monistenbund 的關係更密切。在另一方面看，共產黨領導下的過激份子對這種政策曾經竭力抵抗。我們不必細述這種長期而且艱苦的鬭爭，只說在一九三一年曾經發生分裂。影響不僅限於德國內部，還引起一九二五年成立的國際無產階級思想自由總會（德國思想自由會是這個總會的一份子）的分裂。右翼份子在社會民主黨領導之下，在一九三一年九月與在比京成立了許久的資產階級的思想自由國際，合組現有的國際思想自由聯合會。國際的會員達七十五萬以上。在成立新國際大會的開幕詞中，國際的秘書哈德威格教授 (Professor Hartwig) 說他「向聯邦內政部長華爾 (Wirth) 氏擔保，在思想自由的人中，沒有人要使本來信奉宗教的人脫離教會。思想自由者的目標，僅要使已經不信宗教而仍舊是教會中會員的人加入他們的團體。假如有人將信奉不虔誠的人拉了出來，從教會方面看來

豈不更好？」(註一三)此外，在德國分會對報紙和出版界的一個勸告中，表示他們的注重點不在非宗教的推進和助長階級爭鬪，而是要在宗教方面取得思想的自由。

思想自由運動分裂以後，「國際思想自由者」為左派所改組，現時自稱有會員五百萬。最重要的分會是蘇俄的『無神會社』(Society of the Godless)。在蘇俄之外的分會，算德國的無產階級思想自由會(Verband Proletarischer Freidenker)最大，會員在十萬以上。該會與德國其他革命團體一致，很積極的反對所有宗教和教會活動。他們同時又抨擊社會民主黨與資產階級的思想自由團體，反對教會的不徹底，和不贊同他們的革命政策。他們的主要口號是馬克斯所用的『宗教是民衆的鴉片烟』，希望總有一天在其產黨領導之下，教會和宗教在德國都要消滅。(註一四)

(註一)關於普通宗教參見：Hugo Leo Cooke 著 *Religious Life in Germany, during the Wars of Independence (1872)*;

Hugo Leo Cooke 著 *Kirchliche Welt und nationale Freiheit (1914)*; M. Meinhert and H. Saehner 著 *Deutschland und der Katholizismus (Gedanken zur Neugestaltung des deutschen Geistes- und Gesellschaftslebens)*; H. Gallwitz 著 *'Vom deutschen Gott'* (in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XCVIII, 第三號(一八九九年)第三八五頁至四一六頁) Günther Holstein 著 *Luther und die deutsche Staatsidee (1926)*; M. Lenz 著 *'Nationalität und Religion'*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Kleine historische Schriften)* 第 111 冊) Heinrich Mayer *Deutsche Nationalerziehung und katholisches Christentum (1921)*; Martin Rade 著 *Vierzig Jahre christliche Welt (1922)*; Adolf Fellmeih 著 *Das kirchliche Finanzwesen in Deutschland (1910)*; Johannes Schauf 著 *Die deutschen Katholiken und die Zentrumspartei (eine politisch-statistische Untersuchung*

der Reichstagswahlen seit 1871); Max Schreier 著 Der Einfluss des Staates auf die Verteilung kirchlicher Aemter nach geltendem Reichs- und Landesstaatskirchenrecht in Preussen, Bayern, Sachsen, Württemberg und Baden (1925); Wilhelm Solmann 著 "Religion und politischer Machtkampf," (譯) Die Gesellschaft, 1 卷 11 号 252-253) H. Weinel 著 Die deutsche Reichskirche (1915); Albert Werninghoff 著 Nationalkirchliche Bestrebungen im deutschen Mittelalter (1910); Emil Schaefer 著 Der nationale Gedanke in der Predigtliteratur der Rheinbundsgebiete, Hessen-Darmstadt, Frankfurt am Main und Königreich Westfalen in den Jahren 1806-1813.

(註1) 參見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1929).

(註2) 參見 H. Post 著 Die "Verquickung" von Religion und Politik in der preussisch-deutschen Geschichte (1928); Karl Merbt 著 Der Zusammenschluss der evangelischen Landeskirchen Deutschlands (1903); Friedrich Michael Schiele 著 Die kirchliche Einigung des evangelischen Deutschlands im 19. Jahrhundert (1908); Joseph Werner 著 Der deutsche Protestantismus (1906).

(註3) 見 Ulmer Tageblatt 一九二八年四月。

(註4) 見 Leipziger Volkszeitung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一日。

(註5) 參見 Otto Baumgarten 著 Christentum und Weltkrieg (1918); Schulte 著 Der deutsche Katholik im Weltkrieg; Der deutsche Krieg und der Katholizismus; Deutsche Abwehr französischer Angriffe (Herausgegeben von deutschen Katholiken) (1915); Otto Dibelius 著 Nationale Erhebung (1919); Bruno Doehring 著 Krieg und Kirche (1919); George Freilichtrifer 著 German Culture, Catholicism and the World War. A Defense against the Book: "La Guerre allemande et le Catholicisme" (1916); Haller 著 Wie stellen wir

uns als Christen zur Kriegsanleiher (1917); Martin Hennig 著 Fromm und deutsch (ein Geleitwort zur Konfirmation im Jahre des grossen Krieges (1914); L. Hoppe 著 Feldpredigerfahrten an der Westfront (1918); Franz Meffert 著 Religion und Krieg (1918); Kramer 著 Patriotische sowie Kriegs- und Friedenspredigten (Ansprachen und Reden aus älterer und neuerer Zeit, nebst einer grossen Anzahl einschlägiger Perikopen im Anhang)(1914); Martin Rade 著 Dieser Krieg und das Christentum (1915); Heinrich J. Radermacher 著 Militarismus und religiöses Leben im Weltkrieg (dargestellt an der Seelsorge einer Heimatgarison) (1916); Martin Schian 著 Evangelische Kirche und der Krieg (1915).

(註六) 德 著 Jakob Beyll 著 Deutschland und das Konkordat mit Rom (1925); Otto Dibelius 著 Staatsgrenzen und Kirchengrenzen (eine Studie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des Protestantismus) (1921); Gotthard Eberlein 著 Die verlorene Kirche (1923); Friedrich Giese 著 Recht und Religion als Kräfte zum Wiederaufbau (1924); Hans Otto Haebler 著 Die rechtliche Stellung des Kirchenregiments (1925); H. Heisler 著 Kirche und Religion (1919); Heinrich Hermelink 著 Katholiken und Protestanten in der Gegenwart (1923); Otto Kunze 著 Der politische Protestantismus in Deutschland (1926); August Pieper 著 Sinn und Aufgaben für 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 (1925); August Pieper, Was geht den Geistlichen seine Volksgemeinschaft an? (1926); G. Schenkel 著 Der Protestantismus der Gegenwart; Martin Schian 著 Die Arbeit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 (1921); Erhard Schlund 著 Katholizismus und Vaterland (eine prinzipielle Untersuchung) (1923); Georg Wieber 著 Christentum und soziale Idee (1922); Joseph Rütger 著 Der katholische Staatsgedanke (1925); Gustav Grundlach 著 Zur Soziologie der katholischen Ideenwelt und des Jesuitenordens (1927).

(註八) 特別是新教各教會有這種情形。天主教會將這個問題留給個人自己決定。這種中立性在實際上使天主教徒的愛國程度比新教徒高。

(道九) 著者 Otto Dibelius 著 *Nationale Erziehung*。

(註一〇) 同上第四一頁。

(註一一) 關於新教會附屬組織的描寫參看 Schneider 著 *Kirchliches Jahrbuch, für die evangelischen Landeskirchen Deutschlands* (自從一八七四年以後每年出一冊) 關於天主教團體的紀載參看 *Kirchliches Jahrbuch für 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 (Amtliche Zentralstelle für kirchliche Statistik 出版)。

(註一二) 著者 W. Breitenbach 著 *Die Gründung und erst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Monistenbundes* (1913); Georg Decker 著 "Katholizismus und Sozialismus" (見 *Die Gesellschaft*, 第五號 (一九二八年五月) 第二八九頁至三一一頁); Theodor Hartwig 著 *Jesus oder Karl Marx? (Christentum und Sozialismus)* (1924); Theodor Hartwig 著 *Sozialismus und Freidenkertum* (1924); F. Siegmund-Schultze 著 *Sozialismus und Christentum* (1919); Karl Vorländer 著 *Katholizismus und Sozialismus* (見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LI (一九二四年第七六頁至七九〇頁) Walker und Anna Lindemann 著 *Die proletarische Freidenkerbewegung* (1926); Paul Piechowski 著 *Proletarischer Glaube* (1927); 此外可參閱各期的 *Der Freidenker* 與 *Die proletarische Freidenkerstimme*。

(註一三) 引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五日 *Vorwärts* 所載的大會報告。

(註一四) 因看 *Was wollen die proletarischen Freidenker?* 與 *Die proletarische Freidenker-Internationale greift an* 二者皆係無黨思想自由國際出版。

第十二章 青年運動

說到發揚公民的與國家的忠誠，我們不能不認一國中的青年是最重要值得注意的團體之一，因為青年時所受的一切影響，對一個人將來進入國家政治的生活時在公民與國家方面的忠誠，當然有相當的關係。從十四歲到二十一歲的期間，也許是決定一個人以後的政治心理最重要的時期。各方面要陶鑄未來國家思想的機關，都愈來愈重視這個時期。（註一）

在十九世紀的大部份時間中，民衆大多數直接受政府的影響，只到十四歲為止，此外，男性中大部份還可以在兩三年的兵役期內直接受政府的控制。十九世紀末期國家逐漸工業化，和同時社會黨觀念在勞工階級中的傳播，使政府與關心維持現有社會制度的各團體都感到如何控制全國青年（尤其是在工業中心的）思想的一個難題。

在這種發揚愛國心的嘗試中，以往和現在所用的方法，與在成人當中所用的相似。政府和私人機關都曾嘗試將勞工階級中一部份最不良的經濟和社會狀況，加以改善，藉以防止青年人過激觀念的發展。這種預防工作的表現，就是各式各樣的青年福利事業。此外，他們還利用各種「分心」的宣傳，如娛樂，不帶政治意味的活動，以及特別為達到這個目的而設的補習學校等——希望分散勞工階級青年對自己不良地位的注意。最後，還用各

種直接的宣傳法，想要引起他們對公民的與國家的問題發生直接興趣。在各種政府和私人的愛國或福利機關中，都可以發現這類的宣傳。

我們已經述過，青年運動是最近纔發生的。以前幾十年間固然也曾有與新舊教會有關的輔導青年的團體，但這種團體的組織不嚴密，而且不直接以發揚國家的和公民的忠誠爲目標，僅反映着各教會對政府的普通態度。政府和各中上階級團體對青年運動發生興趣，細說起來可以算是由兩種發展所引起。一九〇〇年以後國際仇視日趨險惡，使國人活動的各方面都漸軍事化，因此遲早總要設法在後一輩人當中，發揚一種對國家，對政府和對君主的有意識的忠誠。同時社會民主黨的速進——尤其是在工業中心——表示今日之青年，快要變成明日社會黨的投票人，這種趨勢，實有設法糾正之必要。

一九〇一年普魯士教育部長在十一月公布的法令中，早已指出這個問題：

「本邦當局對如何使男性青年從脫離小學校直到參加兵役這個時期中，不至誤用餘暇；如何從教學和適當的社會環境，以及適宜的消遣中領導他們；和如何教他們在資產階級的社會中安份守己，都曾作詳盡的討論。」

這個問題經過幾年的考慮以後，普魯士商部長在一九〇八年七月的法令中，公布「補習學校，應作爲小學畢業以後的青年輔導與福利的基本組織。」（註二）他們還在補習學校以外，設法影響青年的思想。

「目標應爲造就一種爲青年所願意接受的情緒上的影響。使補習學校學生參與福利事業的管理，對

這種工作大有幫助。」

各種私人辦理的發揚工人愛國心的團體，都樂意接受一切關於青年福利的建議；所有為青年福利的活動，不久都歸中央公共福利局 (Zentralstelle für Volkswohlfahrt) 縛其大成。(註三) 各方青年團體對這種工作興趣的普遍，可以從一九〇九年五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在丹爾姆大他特 (Darmstadt) 所舉行的青年大會中講演員的名單上看出來。在演講員中有法蘭蘇亞將軍 (General von Franqois) 代表軍隊，市教育委員克森斯坦納爾 (Kerschensteiner) 代表市立學校，軍隊牧師露齊 (Roese) 代表德意志青年團體聯合會，牧師維白爾博士 (Dr. Weber) 代表新教青年團體，派柏爾博士 (Dr. A. Pieper) 代表天主教青年團體，樞密顧問 (Geheimer Regierungsrat) 斯特格曼博士 (Dr. Stegmann) 代表商會和德意志商業教育會，督學虛墨克 (Schimmek) 代表德意志體育會；市委員潘澤博士 (Dr. Penzig) 代表道德文化會。當時有人建議在普魯士各地藉會受專門訓練的青年福利工作人員的幫助與補習學校的合作，來組織地方青年福利的團體。各地先後成立委員會，但委員中往往有以前對少年福利問題沒有多大興趣的名人。

事後不到兩年，在一九一一年正月十八日德意志帝國成立紀念中，普魯士教育部長蘇爾齊氏 (von Trost zur Solz) 公布一種規定普魯邦青年輔導和福利工作的法令。全部各地設立地方委員會，行政以省為單位，在省長領導之下，與各私人機關合作。普魯士議會核准撥款二百萬馬克，作為經費。德意志各邦，先後採用相似的辦法。政府和各私人組織正在設法改良青年的社會和經濟狀況，藉以發揚他們當中公民的自愛心，現有的青年

團體更對廣播忠國忠君的理想大為活躍。(註四)這種組織成立的本旨，原是將中上級青年的國家精神團結起來，與下級青年當中社會主義的觀念對抗。他們努力的結果，各青年團體最後聯合起來，組織青年德國會(Jung-Deutschlandbund)。該會成立於一九一一年正月十三日，首領為高爾齊將軍(General von der Goltz)。目標在訓練青年作參加兵役的準備。這是各重要非社會黨的青年團體，和全國各愛國團體青年部的大聯合。在這些團體當中，有一部份是特別為給青年人一種軍事訓練而設的。其中最老的是青年挺進隊(Jungsturm)。這團體遠在一八九〇年時由軍官組成，但到一九〇〇年以後專為一般人所重視。將會員組織成軍事形式，訓練他們將來在軍隊中服務。巴維利亞一九一〇年成立同樣的組織，名叫碑爾立虛地方保衛團(Bayerische Wehrkraftverein)。此外，德意志童子軍亦仿照英美的辦法成立。童子軍中每人必須謹記十個信條，第二條是『童子軍須盡忠於他的上帝，他的統治者，他的皇帝，以及他的本國。』(註五)這種團體的數目雖不多，但牠們的影響很大。

天主教青年團體聯合會和新教同樣的組織，都是青年德國會的會員。新舊兩教會在幾十年前都會設立宗教的青年組織。天主教的組織更會參加「文化的鬪爭」(Kulturkampf)。可是到了二十世紀的初年，兩種教會的組織都變成促進青年們國家的和軍事的精神的重要因素。

青年德國會的主席團中包括各部位代表和二十七個其他重要職員；執行委員會中包括各青年團體的代表共二十一人，還有各邦，各省，和各獨立市的代表，內中有些是軍官。這會施行各種軍事的訓練，准各青年團體有應

用政府的操場，營房，以及游泳池的權利；替牠們領出鐵路優待券；設立青年俱樂部。到一九一三年，活動的範圍包括一千個市鎮以上，國內青年與該會發生接觸的約有五十萬人。（註六）

在青年德國會的團體會員中，最有趣的就是所謂『遊鳥』（wanderbird）的組織。這種組織成立於一八九七年，創始人是柏林附近的斯忒格力齊中學（Steglitz Gymnasium）的學生，代表中產階級青年中較進步份子的一種反動，認冷酷的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政府要摧殘個性，要把各人照既定的模型鑄成一個德意志帝國和德意志社會的臣民。這個團體向他們認為不了解青年人問題的成人們宣佈革命。會員們要成立一個獨立的青年運動，一切由自己主持，與現有在成人勢力之下，甚至受成人管理的青年組織，完全不同。所有『遊鳥』團於是成爲醞釀一切解放甚至過激觀念的中心。我們以後可以看見，這些組織，在革命潮流之下，更分成若干政治的黨派。

他們要表示自己的獨立性，常在國內各名勝地點開會，或在週末舉行遠足，不許家長，教師或其他成人參加。他們採用德國舊日的各種民間故事，民間跳舞，和民歌。他們更將民歌刊印成冊，名叫Zupfgeigenhansl，內有他們開始提倡的古式六弦琴合奏譜。他們還製成一種爲遠足而用的男女服裝，以後風行一時。這種運動最有意義，最長久的影響，要算養成德國青年對本國以往文化的成績發生新興趣。

『遊鳥』的組織，在一九〇六年以後逐漸盛行，到一九一一年，全國各地已經有四百一十七個這種團體。相似的進步青年解放的團體，先後成立。一九一三年德國號稱進步的青年在好恩買斯納爾山上（Hohen Meis-

snor) (因德國中部在歷史上很重要的一座山)舉行全國大會。在這個機會中，自由德意志運動成爲一種勢力，將所有國內的自主、解放和過激(但非社會黨的)的青年團體，一齊聯合起來。會中雖有各種鼓吹自由獨立的過激而似乎帶有革命色彩的演講辭，但大會的精神可以在飽受熱烈歡迎的托納伯(Gottfried Traub)氏的演講辭中表現出來：

「於是，我相信國家政體的觀念，應當站在愛國的觀念之上……我相信今日國家政體的觀念，一定要重新變成將現有各種份子聯合起來的一種團結力，我相信國體是在我們當中，從我們自身發展出來的。將超乎人事以外的國體觀念鑄成，爲我們自己人格中的一部份……我覺得這是最高的理想。」

與愛國青年運動並行，而還相當的增強愛國青年運動的一種發展，是社會黨的青年運動。最初，社會民主黨沒有將青年直接組織起來的嘗試；他們只要號召成年的投票人。實際上在一九〇〇年的國際社會黨大會中，德國代表對青年人的政治訓練，還表示相當的反對，理由是青年不該與聞政治。同時奧國社會民主黨黨員丹寧堡(Dannenborg)，卻在一九〇三年創立第一個社會主義的青年組織，會員有一百人。次年，後來充任國會議員的法蘭克博士(Dr. Ludwig Frank)，創辦青年工人會。新組織相繼蓬勃成立，在一九〇六年，由各團體合組「德意志青年工人聯合會」(Verband Junger Arbeiter Deutschlands)，同時黨中觀點有些改變，在一九〇六年間指派一個青年教育委員會。可是一半因爲大多數人恐怕讓青年人參加以後要增長過激派的勢力，黨中和自由工會依舊反對單獨的青年運動。因此他們也一部份反對一九〇七年在黨中左翼領袖卡比尼克(Karl Lie-

bruecht) 領導之下，於斯特格爾(Suttgen) 地方舉行的第一次社會主義青年團體國際大會。在『與軍國主義奮鬥』的演講辭中，來氏說『帶有社會主義性的青年團體的成立，就是造成一種不受法律限制而特別適用於反軍國主義爭鬪的利器。』可見中上級社會的組織一方面要設法使青年軍事化，社會民主黨的左翼卻想利用青年來抵抗軍國主義的滋長。

社會黨的青年運動，在政府看來好像是一種帶有危險性的新發展，結果在一九〇八年禁止一切有政治作用的青年組織（就是指社會黨的。）因此，社會黨的青年團體，都變成教育性質的俱樂部，在社會黨指導之下，產出一個德意志中央勞工階級青年局（Zentralstelle für die Arbeiterjugend Deutschlands）來主持。這種組織發展很快，到一九一三年，牠的活動有如下表：（註七）

表一

	次 數	舉 行 地 方 數
演講	四、七五六	三六五
遠足旅行	五、四六七	三四三
午後遊戲	四、一八一	一五一
青年家庭	三〇三	二八〇
圖書館	三五、五五七（冊數）	四七

歐戰發生以後，青年人也被牽入漩渦，參與國家的掙扎。青年的軍隊化進行很快。（註八）一九一四年八月十

六日普魯士下令規定青年的軍事準備。這種辦法，經各邦先後仿行。與青年德國會組織相似的青年團，得了政府和原有各成人或青年團體的幫助，先後成立。參加這種團體完全由於自動，但他們希望每一個身體健全的青年都能夠參加。全國普遍而熱烈的愛國精神，新奇的吸引力，以及得有和長輩同樣的受着訓練與列隊遊行的機會，使參加這種青年團體的人非常踴躍。高級學校奉命每星期必須有一天的操練。（在歐戰以後，這改作每月舉行的遠足。）

可是戰事的持久，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他們對青年團的熱心與興趣也逐漸消滅。制服，簫鼓隊，銅樂隊，以及政府對曾在青年團服務有成績的人將來服兵役可得優待的應允，稍爲可以提起一點精神。一九一六年陸軍部想利用一般人對這種運動的興趣，特別爲青年設各種軍事式的體操和軍事式的運動比賽。這種比賽一直到現在還沿用，雖然形式稍有更改。現時採取一種聯邦青年體育競賽的形式。戰事遷延下去，國內各方對戰爭的不滿，當然在青年也發生影響，尤其是遭受食料缺乏的痛苦最深的無產階級青年。（註九）實際上大戰爆發不久，青年人對社會民黨贊助戰爭的反對，就已經很明顯。這於社會黨青年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斯特格爾的大會中表現出來。在各種議決案當中，有反對組織軍事青年團一項。反對派勢力的增加，產生自由社會主義勞動青年的組織。這個組織，成立於一九一六年，在同年間他們曾參加勃爾恩（Berné），粗爾力克（Zürich）和斯托克何姆（Stockholm）等地的國際大會。他們發刊了十期的青年國際，內有來比尼克，烈寧，托洛斯基等人的論文；他們還幫助其他革命文學的流通。於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間他們又舉行三次國際青年日，爲反抗強逼青年

工人儲款買戰事公債的軍令，曾幾次領導少年工人罷工，結果都非常良好。十月二十五日本來接觸機會不多的各地方團體，舉行第一次全國大會，議決用全力來輔助快要爆發的革命。

革命的爆發和經濟與政治上的危機，對青年的影響或許比較對成人的還要強烈；因為青年不像成人那樣受風習或心理上習慣的束縛，所以對目前問題的反響也比較直接。結果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的革命期內，許多無產階級的青年都被引作革命的掙扎。實際上共產黨所吸收的青年，百分率比較成人高。因此在這個期間中，特別顯出爭鬪更加嚴重，青年團體的人數與勢力都有驚人的增加。加以投票年齡的最低限度從二十一歲降至二十歲，使政治理想的陶冶，比以前關係還要重大。此外，常備軍隊的裁廢，使大多數青年失去在生命中最重要的時期內，受愛國理想的燻染與為國服務的機會。最末，還有戰後經濟的危機日迫，也使青年當中容易發生過激的思想與行動。這種博得青年人心的鬪爭，一方面是成人和青年團體在資產階級與社會民主黨領導之下，防備共產黨將青年革命的熱心與共產黨運動打成一片的掙扎；另一方面又是承認共和政體的組織，與代表反動勢力或法西斯理想的團體，互爭獲得青年的掙扎。共和的勢力曾用各種方法來博得青年的人心。第一，他們曾試在各政府機關增加青年福利的工作；第二，他們會藉組織與經費上的幫助來使各青年團體與政府發生聯絡。我們已經述過，青年福利工作的目標，是要抵消現有社會中的交惡狀態和培養國家團結的觀念。(註一〇)普

魯士福利部長在他的著作中曾指出這一點。(註一一)

「於是，我相信假如我主張青年福利工作應當與黨派的政治分開，一定能得各政治團體和各政黨的

同意。但青年福利的工作，卻可以盡力使德國的青年——無論是在茅屋中或是在大廈中長成的——都保持着對本國的愛護與忠心，共赴國難，一致維護德意志的文化與理想。」

結果青年福利工作的規模——無論是政府的或私人的——規模都比前較為增大。以前政府所辦的工作在其戰期內已經瓦解，但在一九一八年以後曾設各種方法來恢復以往的損失。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青年福利工作從普魯士教育部的手中移歸新成立的普魯士公共福利部管理。戰前原有地方、區和省的委員會制度不但恢復，而且擴充，福利工作人員的數目也逐漸增加。每年由普魯士政府撥款數百萬馬克，分發給青年的家庭，遊藝場，和運動場等。(註一二)此外，還設一個邦立青年福利與青年運動指導委員會，目標在聯絡一切政府的和私立的與青年有關的活動。

此外，聯邦政府對這方面的工作，也開始活躍，他們設法將各邦的青年福利工作造成一個系統。這種工作，藉一九二二年公佈的聯邦青年福利法而完成，可是內中有好幾項規定，大受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儲蓄法令所限制。根據這項法令的規定，全國各市或鄉區都設一所青年局 (Jugendämter)，作為施行與青年福利有關工作的正式中心。在這些地方的青年局之上，有區、省，和邦的機關，最高的機關是聯邦的青年局。

這種青年局，同時又是綜合政府與私立機關的福利工作的中心。根據該項法律第九節的規定，每個青年局除了受薪金的職員以外，還有一個顧問式的委員會，委員中有五分之二代表私立的青年福利機關。此外，局中還有各青年團體的代表。到一九二九年的初期，這類的青年局一共設立了七百一十四所，其中有五百零七所有各

種福利機關的代表。(註一三) 參加這項工作的組織見下表：

表二

名稱	有代表參加的青年局數	青年局數的百分比
名新教團體	二七五	二八
各天主教團體	二五一	三五
紅十字會	二三一	三二
勞工福利	一六九	二四
各工會	四六	六
其他組織	一六〇	二二

這類私立的福利機關實施很大規模的福利工作，曾經成立一個全國的中央獨立青年福利委員會。他們與政府切實合作，受政府的津貼。實際上牠們已經成了半官式的機關，間接的變為政府行政機構的一部份。

同年各政治、經濟、和宗教的組織，都要爭得『青年的靈魂』，結果使各青年團體的會員，從一九一四年間約有一百萬的數目增加到一九二八年間五百萬以上的數目。除了共產黨的和傾向於法西斯主義的青年團體以外，多數青年機關隸屬於聯邦德意志青年組織委員會 (Reichsausschuss der deutschen Jugendverbände)。該會成立於一九一九年，係半官式的組織。所做的工作，以前原歸中央公共福利局的青年部。聯邦委員會內有社會黨代表四人，非社會黨代表七十五人，目標是推進『青年團體對政府和國家負責的合作。』(註一四)

這是一個半官式的組織，辦公處在聯邦內政部裏，受政府的津貼。一切隸屬於該會的青年團體，在鐵路可享半價的優待。

所有隸屬於聯邦委員會的青年團體都是主張愛國的，雖然在程度和表現的形式上各有不同。牠們大多數擁護共和政體，但在程度上全看他們活動的性質和所屬團體的政治態度。這些團體，構成一個驚人的陣勢如下表所示：

表三

聯邦德意志青年組織委員會的會員

團 體	組 織 數	二十一年歲以下的會員	
		人 數	百 分 比
1. 新教團體	一九	四五七、九〇〇	一〇·五
2. 天主教團體	八	七八一、〇〇〇	一八·〇
3. 社會黨團體	六	三六八、八〇〇	八·五
4. 獨立德國青年	二八	五六、三五〇	一·三
5. 各工會與專業團體的青年部	一二	四五九、九五〇	一〇·六
6. 各體育會的青年部	八	一、六一六、九〇〇	三七·五
7. 各政黨的青年部(非社會黨的)	三	四七、四五〇	一·一
8. 其他愛國團體	六	五五〇、五〇〇	一二·七

9. 其他	六
總計	九六	四、三三八、八五〇	一〇〇〇

在這些研究的範圍內，我們不能詳論各團體（差不多有一百個）對政府和公民訓練的態度，而且我們也不必詳論；因為牠們所代表的觀點與牠們所屬的成人團體一樣，關於這些成人團體，我們在本書各編中已經討論過了。這些青年團體中每個如何設法發揚對政府和國家的忠誠，我們也不能詳述，只能指出牠們大多數所用的方法。

爲盡量的吸收會員起見，各組織設法投合青年各方面的興趣，設立許多團體及支部來滿足他們。這種對青年興趣的投合，是各組織所通有，這也是牠們發展迅速的原因之一。雖然這些組織的目標，往往與國家和公民訓練沒有直接的關係，但牠們的貢獻，在使本年無所適從的青年參加一個培養國家的和愛國的思想的團體。青年們對這種團體生活的參加，往往是使他們與國家政府發生聯絡的第一步。

這類組織，普通每星期開會一次，每次開會時有演講與討論，內容多數關於個人或本組織對社會和國家的關係。實際上有些組織是專門討論這項問題的。牠們常邀請成人去演講，遇有這項情形，問題總不僅與地方有關，演講人常有談到青年與整個國家關係的機會。演講後繼以討論，使青年會員能夠發表自己對團體、國家政體、本組織，以及普通一切事物的意見。有些組織在開會時對這類問題僅間接的涉及，可是在國家的危機中，這些問題是必得一般青年嚴重注意的。

在多數青年組織的主要活動當中，尚有旅行和遠足。這種旅行是養成愛戀德國鄉間風景的重要工具。大多數旅行的目的地在國境以內，地點往往是有歷史價值，或可以引起愛國心的名勝。有時還唱着德意志民歌或愛國歌藉以助興。這項旅行或遠足的價值，是不能忽視的，牠們普遍到幾乎成了一種國風。牠們在宣傳上的效果如何，要靠該團體所代表的愛國心的種類與程度。但無論團體的性質如何，這樣的郊遊總可以給人一種重要的情緒經驗，可以增強團體的與國家的意識。

吸引某種青年的一個很有效的方法，是各軍事組織和牠們的青年部一齊舉辦的遊行，軍隊式的排列，旗幟，制服，銅樂隊，簫鼓隊，以及愛國的歌曲，往往是妙法以吸引好露鋒芒的青年。這種宣傳的方式，繼續為國家主義的軍事組織所沿用，尤其是在某種愛國團體或全國的慶典中。

每種組織的地方團體，每年普通舉行幾次慶典。此外，區，邦，和全國的組織還有大會，會議，和按時舉行的慶節。有時這種慶節，變成與成人組織聯合舉辦的盛大的國家主義遊行。這類遊行不但可以引起一般人對該組織的注意，而且還可以助長一般人的國家主義的觀念。

青年的雜誌也很重要。這種出版物不但可以發揚本組織的理想，而且可以推進各團體共有的公民的與國家的忠誠。這類雜誌一共有幾百種；大概每個團體都發刊一種，規模較大的團體可以發刊好幾種。據聯邦德意志青年委員會在一九二八年間的調查，該會所屬青年團體刊行的雜誌，銷數達一百五十萬份。有許多團體沒有答覆他們的調查，還有許多不屬於該會團體刊行的刊物沒有算在裏面，因此我們可以說德國流行的青年雜誌約

有三百萬份。此外，還有一百多種做成人閱讀的關於青年福利的定期刊物。

從我們所說過的關於戰後德國青年運動的各點，可以得到一個印象，覺得整個運動幾乎都是和共和與議會式的政體站在一邊的，但事實上卻不盡然。上述的幾個團體，固然佔着有組織的青年的大多數。可是這些團體當中，有許多的宗旨是文化的，宗教的，或經濟的；對政治的問題僅有間接的興趣。因此，這些團體雖然有被現政府利用的可能，但牠們在政治上直接的活動很少。

再接再厲的經濟危機，使後一輩的人都希望得到一條逃出現有困苦的新路。這使他們傾向於直接或間接能改變現時狀態的勢力。青年中最活動的份子一部份變成國社黨或各國家主義團體的附從者，一部份傾向共產黨。組織成法西斯或國家主義團體的青年——如鋼盔團等——是中上級社會青年中最活動的份子。他們不大反對上述的其他青年團體，僅在復興德國的工作中以思想上的領導自居。這些份子的數目不易估計，他們增加的速度有突然猛進之勢。比他們的人數還重要的，就是他們已經成為資產階級青年運動的中心點。他們在整個青年運動中要佔多少勢力，靠許多因素決定，最基本的，就是將來德國社會的和經濟的狀況。

假如我們將以培養後一輩人對共和政體的信仰為已任的社會民主黨青年運動的衰落，與法西斯黨對青年影響比較，相形之下，後者的激增愈加明顯。社會主義勞工青年聯合會（社會民主黨的青年部）的會員從一九二四年間的九萬五千數目降至一九二八年間的五萬數目。以後還繼續再減少。他們再也不作積極的政治活動，漸漸變成一種教育的組織。在這團體當中往往有反對與現政府合作的表示，想要採取一個進一步的無產階

級的政策。這使大批過激份子被逐出黨，當中有許多人加入共產黨。社會黨雖仍自稱在各自由工會中有青年會員二十萬以上，可是這些人加入工會的主要目標是經濟的而非政治的。還有，社會黨將共和派政黨附屬的軍事組織——國旗團——的青年中一大部份都算作他們的附從者。可是這個團體青年部的發展的速度，遠不如右派政黨的同樣組織的發展。更要緊的，就是在法西斯黨和國家主義派勢力下的青年團體，在情緒上的驅動力，宣傳的熱烈，以及進取的活動各方面，都比在社會民主黨勢力下較為強烈。

和法西斯黨處在反對地位，同時又反對社會黨的，有共產黨的青年運動。這種運動，係從戰時成立的自由社會主義青年團產生出來。他們反對社會民主黨的愛國政策。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舉行的第二屆全國大會中，通過擁護最近成立的德意志共產黨的議案。該議案的結論是『……我再也不要自視爲德國人，要試將自己看作無產者。』（註一五）次年，他們決定接受第三國際（共產黨）的原則，根據這項決定，改名共產主義青年團，隸屬於共產主義青年國際。他們對於與別國共產青年在國際上的關係——尤其是對俄國的關係——非常重視，時常派青年代表到俄國，以各種旗幟去贈送俄國青年團體，而帶回俄國各市鎮和工廠青年團所還贈的旗幟標誌等。

他們會爲國內階級鬭爭和國際無產階級團結的原則，努力奮鬥。

「勞工階級的少年，在一切以推翻現有政體爲目標的革命動作中，將要而且應該擔負一部份主要的責任。其他一切活動，都是附帶的。」（註一六）

這雖然是在一九一八年說的話，但還很明白的表示今日共產青年的觀點，使其產青年成爲一切明白反對現政體青年的中心。他們藉公開的自動的反抗現有社會制度，博得多數無產階級青年份子的附從。實際上他們對活躍青年的影響，定比社會黨的青年爲大。

(註一)參看 Victor Engelhardt 著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als kulturhistorisches Phänomen (1923); Friedrich Wilhelm Förster 著 Jugendseelen, Jugendbewegung, Jugendziel; Charlotte Lütken 著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 soziologischer Versuch) (1925)。關於德國青年運動的資料很多，每年的論文小冊，甚至書籍，層出不窮。可是這些著作，多屬理論的和暫時的性質；關於該運動的歷史的論述很少。除了本章所引的材料以外，在一種由私人與聯邦內政部合出的一種半官式刊物 “Archiv des Reichsausschusses der deutschen Jugendverbände” 中搜集這一類的材料不少。

(註二)因爲進小學的只有勞工階級和農民的子弟，而農民子弟又補習學校工作範圍之內，這種法令，很明顯的，是專對勞工階級青年而發。

(註三)參看 Heinrich Wetterling 著 Staatliche Organisation und Jugendpflege (1911); Wiemann 著 Jugendpflege; Karl Waller 著 Der König der Jugendpfleger! Der Jugendpfleger unker den Königen! Kaiser Wilhelms II Sorge um die schulentlassene Jugend (eine Festgabe zum 25. Jugendtage für alle deutschen Söhne) (1913); J. F. Landsberg 著 Behördliche Jugendpflege (1914); Jugendfürsorge und Jugendvereine (ein Handbuch herausgegeben unter Mitwirkung von A. Pieper) (1910)。

(註四)參看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或 Süddeutsche Monatshefte 第二十三卷第九號 (一九二六年) 一個詳盡的摘要)。

(註五)這在一九一八年以後改爲「一個童子軍愛他的祖國，忠實，正直，和誠懇。」

(註六)據一種叫作 Der Jünglingsverein 的出版物(一九一〇年份第一三七頁)上記載，在德國的六百五十萬青年中，有九十四萬，大約百分之十五，是有組織的。在這個數目中，有四十五萬隸屬於宗教的青年團體，其餘屬於不帶宗教意味的團體。在不帶宗教意味團體的青年中，有九萬隸屬於社會主義青年團。

(註七)參看 Wilhelm Müntzenberg 著 Die sozialistische Jugendinternationale 第十三頁。

(註八)參看 Georg von Graevenitz 著 Die militärische Vorbereitung der Jugend in Gegenwart und Zukunft (1915)。

(註九)參看 Fr. Bauermeister 著 Vom Klassenkampf der Jugend (1916); Ebert 著 Die proletarische Jugendbewegung in der Kriegszeit; Bondi 著 Die proletarische Jugendbewegung。

(註一〇)參看 Martin Bittner 著 Die Jugendpflege in Preussen, insbesondere im Regierungsbezirk Königsberg und ihre Förderung durch den Staat (1924); Jugend - wohlfahrt und Lehrerschaft (ein Handbuch für Jugendwohlfahrts-pflege) (1926)。

(註一一)普魯士公共福利部: Denkschrift des Preussischen Ministeriums Für Volkswohlfahrt (1925) 第十二頁。

(註一二)同前，第二七頁。

(註一三)這類組織中之一是德意志青年旅舍聯合會，賤價供給作遠足旅行的青年住宿。在一九二八年間全德有青年旅舍二千三百處。全年寄宿青年旅客達三百萬人。自從一九二八年以後，這個團體的人數和活動，都大加擴充。

(註一四)該委員會規程的第三節(見 Tätigkeitsbericht für die Geschäftsjahre 1926-1-27 第五十頁)。

(註一五)參看 Proletarier Jugend 第十四號(一九二〇年)第十頁。

(註一六)參看 W. Müntzenberg, Program und Aufbau der sozialistischen Jugendinternationale (1918) 第七頁。

第十三章 地方主義與區域主義

對地方和對區域的忠誠，在德國國家的生活中，一向佔很重要的位置。這兩種忠誠都從中古時代起就有，起源遠在對國家的忠誠之前。可是我們要討論的不特是對地方和區域的忠誠，而且是這種忠誠上的衝突所產生的交惡狀態。在近代地方間的交通，在政治上的意義已經不很重大。對地方的忠誠，在近幾十年間的確曾經被用來做成對國家的忠誠。區域間的互相仇視的地位比較重要；實際上延遲德意志統一的，就是這種區域間的交通。而且這種交惡的狀態，一直到今日還沒有消滅。我們以後就可以看到，這種對區域的忠誠，對國家政府的影響有正負兩方面，曾經被用來增強國家政府的地位，也曾經被用來減弱國家政府的地位。

現有區域間的互相仇視雖然很多，但比較最重要的，要算德國北部、南部和西部間的仇視。這種區域上的差別，常有『三分的德意志』之稱。大致說來，這種差別在根本上就是德國境內社會、經濟和政治上交惡的一種地理上的表現。東部一向在貴族地主的管理和勢力之下；南部一向是城市或鄉間的中產階級的勢力範圍；西部爲重工業的中心，居留的多數是資產階級與工業中的無產者。這些社會團體的不能相容，是現有大多數區域交惡的根據。可是，因爲在歐戰以前東部是普魯士與德帝國政治上的根據地，於是南部與西部對東部的仇視變成對德國國家政府形式和特性的仇視。舊政體傾覆以後共和政府的領袖與以西部作中心的重工業利益漸趨一致

結果使東部又漸漸對現有國家政府的某幾方面，有反對的趨勢，而南部則繼續反對農業的東部與工業的西部。德國南部與北部間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差異在中古時代已經形成。十六、十七世紀間宗教鬭爭的結果分不出明顯的勝負，更爲德意志的統一加多一種阻力。雖然居住德國北部的天主教徒比居住德國南部的數目還多，但南部的居民幾乎全體信奉天主教而北部（除偏西各部份外）卻是新教的勢力範圍。十七、十八兩世紀中，大部份時間內德意志在經濟上的不進步所引起的政治遲滯發展，不但沒有減少而且增強這種對本區域的忠誠和區域間的仇視。在分裂的期間內德意志南部各邦在地理上的位置，使牠們的政策不親奧大利，便親法蘭西，成爲德意志統一的大障礙。十八世紀的後半期普魯士的興起，增加一種新的政治因素，產生一種在普魯士與大利之間搖擺不定的政策。

在拿破崙時代，南德各邦自願的或逼不得已的與法國站在一邊。巴發利亞的王室，更因此獲得特殊的利益，因爲擁護法國的勢力而得到提羅爾（Tyrol）和薩爾斯堡（Salzburg）地方的一部份。（註一）不特王室，而且連中級社會和農民都沾得法國統治的好處。可是不久對人對貨品的賦稅都逐漸加重，這些中級社會份子慢慢感到壓逼，貴族也漸漸被法國的統治勢力奪去政權。因此拿破崙在俄國慘敗的消息一傳出來，巴發利亞立刻與普魯士和奧大利變成聯盟。南德各邦中有幾個君主給上級社會成立一種憲法以後，在一八一五年間南部——尤其是巴登（Baden）地方——於是變成中級社會民主運動的中心。德意志統一的問題，使南德的解放派一時不知所從。他們反對普魯士統一德意志，不完全因爲普魯士信奉新教，倒是因爲反動的「青年貴族」派在普

魯士佔勢力。在另一方面，奧大利雖然奉天主教，但和普魯士一樣的反動，在梅特涅（Metternich）領導之下，已成爲歐洲反動派的領袖。此外，奧大利正忙於應付德意志以外的各邦，無暇顧及完成德意志的統一。因此在一部份人當中，有一個包括奧大利、普魯士和普魯士以外各邦合成的統一的德意志的意思。教士方面多傾向奧大利，而普魯士以外的各邦，對奧大利或普魯士兩方面統一德意志，都不大感到興趣。

雖然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間統一德意志的勢力失敗，普魯士宣佈憲法的結果，使南德解放派和普魯士較前接近，而保守派與教士中的一部份，則愈加傾向奧大利。可是在普魯士領導之下，德意志統一以後的經濟利益，和奧大利的很明顯的無力完成統一，以及普魯士在一八六六年戰事以後在政治上的聲譽，使各階級的人（連王公們也在內）不得不承認普魯士作領袖。這些對統一最不發生興趣的各邦君主，終歸能夠保持他們的地位，不使一個集權的全國政府實現。一八七一年所以要建立一個聯邦政府而不是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一部份就是這種區域上的不相能的表现；這種區域間的交惡，更因有主張分治主義的人，以及各邦君主對本朝利益的重視而加甚。德國統一以後，本來可以自己消滅的南北間的仇視，更因北部與中部工業化的急進而增加。農民與小城市中的中產階級對人數衆多的工業無產階級和強有力的商業階級的仇視，這時候在地理的分界中表現出來。區域間的交惡，於是更因階級間的交惡而愈加強烈。

歐戰爆發的時候，德意志全國統一。可是戰事延續下去，勝利看來很近而總得不到，在德國南部的農民與市鎮中人裏面，漸漸發生對於「普魯士的戰事」不滿的感覺。分治主義（particularism）縱然僅在無意中流露

出來，但較有完全消滅。實際上過激的獨立社會黨領袖艾斯納爾 (Eisner) 氏，還以為巴發利亞的分治主義在其反抗不很激烈的柏林政府中大有求援的重要。一九一九年四月到五月間的巴邦蘇維埃共和被推翻以後，反動派在巴邦得勢，利用巴邦來作攻擊比較解放的柏林全國政府以及攻擊北部不斷的勞工革命的根據地。當天主中心黨與社會民主黨合組維馬混合政府時，中心黨內部衝突的強烈，使代表國家主義和保守農民以及中級社會的巴邦份子退出該黨，另組獨立的巴發利亞民黨 (Bavarian People's party)。一時巴邦各地方政黨中對「赤色的柏林」的仇視，竟強烈到引起脫離德國的問題。巴邦民黨領袖漢姆 (Heim) 博士，建議脫離充滿着過激的無產階級的北德意志，加入鄰近的，信奉天主教的奧大利。還有一個計劃，主張建立一個多瑙河 (Danube) 流域的聯邦。同時他們暗中還希望脫離德國以後，就可以減去戰事賠款的擔負。這些份子，也和萊茵流域的情形一樣，受着法國政府的幫助，已成爲公認的事實。這類計劃雖然終歸失敗，巴邦雖然依舊隸屬於德國，但他們反抗的強度，使一個中央集權的全國政府無法實現。一九一九年巴邦民黨大會全體通過反對集權的全國政府，他們的態度於此可見一斑。只有南德的工業化，能夠消除普巴兩邦間一大部份的仇視。我們只看巴邦北部努連堡至孚耳特 (Nuremberg-Fürth) 一帶工業區反普情感的薄弱，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另一種重要的交惡，就是西部與東部間的仇視。德國的西部在經濟上與文化上一向和西南方的鄰國較與普魯士還要接近。在法國革命期內德西部和鄰國的關係更加密切。(註二)這一帶的資產階級，已經發達到相當的程度，當萊茵流域在一七九二年被法軍佔領時，他們歡迎法國人作朋友和解放者。法國人在那裏實施他們的

民法(Code Civile)設立商會，在一八〇五年間還將科倫(Cologne)作為自由港。在法人統治之下，舊有封建制度都被廢除，土地撥歸農民享有。舊日行會的規則消失，近代的工業發展得很快。因此，當普魯士將萊茵地帶「恢復自由」時，居民不見得頂高興。萊茵流域的居民反對普魯士的統治，因為他們一向鄙視普魯士的反動的軍國主義和農業政策。當一八一八年減低關稅，使萊茵流域一部份的工業受英國入口貨品的摧殘的時候，對普魯士的關係非常緊張。這種惡感，最初還因萊茵流域威斯特發利亞一帶的政府官員全是「普魯士」人而加甚。萊茵居民不但被看作外國人，而且還被目為被征服的叛徒。當局甚至竭力強制施行反動的普魯士民法來替代法國的民法。

在後幾十年間工商的發展很快，萊茵——威斯特發利亞的資產階級與普魯士的農業家的衝突，日甚一日。資產階級的代表——當中有堪合二氏(Camphausen與Hanemann)——是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七年間憲法運動的首領，又是一八四八年三月在柏林舉足輕重的份子。不過他們在一八四八年不讓這種反抗變成與普魯士政府公開的武裝衝突。因為意志堅強，頭腦清醒的資產階級，心目中僅希望做到像一八三二年英國一樣的雙方讓步，而不希望做成一七九九年法國一樣的革命。此外，他們不但有英國的民權運動(Charlist movement)作借鏡，而且在馬克斯和翁格爾士一向活動的萊茵地帶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衝突的先兆，已經出現了。

這種普魯士「青年貴族派」與資產階級間的裂痕，一直繼續至一八七〇年。萊茵居民出於萬不得已，纔做普魯士人。他們看不起軍隊和普魯士的官吏，看不起他們粗俚的語言，他們蠻野的舉動，以及他們命令式的口吻。

社會生活最少在表面上是法國味比普魯士味還重。甚至連居民與普魯士官員通婚的也很少。普魯士的官員在社會上的生活完全孤立。除了這些惡感之外，還要加上奉天主教的萊茵流域與奉新教的普魯士在宗教上的衝突。

可是到了一八七一年以後，德國資產階級的勢力愈大，萊茵流域的資產階級與普魯士政府的關係愈密切。到現在共和政府成立後，他們和德國其他部份的聯結愈爲堅固。可是我們要注意，當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布爾薩維克主義看來要在柏林得勢時，許多萊茵流域的工業家預備建立一個萊茵流域的共和國，一來自衛，二來避免賠款的負累。萊茵地帶的天主教中心黨反對這個計劃，但贊成在德意志聯邦之內成立一個西德自由邦。天主教中心黨的新聞事業團體(Augustinor Verein)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六日，對所屬的報紙編輯，曾作如下的訓示：「我們的目標是德意志國體的統一，由各邦按照平等的比例而組成的統一，權利務求平等，盡量實行自治。西德聯邦的成立，就是我們鵠的。」

這種運動，得到法國人竭力的幫助，一九二三年法國人竟主使一部份人宣佈成立一個萊茵共和國。可是因爲民衆中很少人對這種工作表同情，同時德意志共和國最少暫時還不至有被共產黨襲擊的危險，這個分裂的運動於是自然消滅。德國工業在國內經濟和政治生活中漸佔勢力，現有的交惡，大概不久還要減少。

普魯士的一省，韓諾發爾(Hanover)對普魯士邦政府的仇視，現時除了在中級社會的一部份人當中以外，已經沒有多大意義。(註三)在一八六六年普魯士吞併韓省以前，當地對普魯士的反感從畏懼變成厭惡，但這種

感覺，只限於中上級社會。前韓省公爵對普魯士王的惡感特別深，因為一八六六年戰事的結果，除了韓省整個被普魯士吞併以外，他的私產，也一大部份被沒收。一個韓省的政黨跟着成立，派遣代表出席國會與普魯士議會，要求將韓省作為德意志聯邦中的一邦。但這個政黨不久便衰落。到一九一三年韓諾發爾公爵和德皇威廉二世的唯一公主結婚，韓諾發爾的問題看來好像已經解決了。可是韓諾發爾黨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間又重張旗鼓，這時他們對於自治的要求，頗得一般畏懼柏林將要成立過激政府的保守份子的贊同。共和的根基固立了以後，這個政黨的人數漸減。雖然民衆中一大部份依然覺得自己是韓諾發爾人而非普魯士人，但這種感覺除了中上級社會少數份子外，還沒有強烈到能夠釀成一種政治上要求的程度。

現時薩克遜尼與德國各部份幾乎找不出互相仇視的情形。（註四）我們在這裏提及這種交惡的大概，完全是因為歷史上的關係。從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間，薩克遜尼和普魯士間的仇視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競爭要執北德意志的牛耳。因為這種爭鬪，薩克遜尼與普魯士的敵人——波蘭——連結。在法國革命期內，薩克遜尼的工業已經比普魯士發達，他們和法國比較和普魯士還要接近。拿破崙利用這種衝突，設法增強薩克遜尼與波蘭間的關係來制普魯士。在拿破崙時代薩克遜尼的工業發展得很快。薩克遜尼與法國間的聯絡的強度，使薩克遜尼的軍隊直到一八一三年來比錫（Leipzig）戰役時纔歸向德奧那邊。到後來薩克遜尼要割土地的大部份給普魯士的時候，對普魯士的惡感更有加無已。可是人口在全德意志最密的薩克遜尼，工業的發展非常迅速，使當地的資產階級贊同在普魯士領導下的德意志帝國的成立。普魯士愈趨向於工業化，薩普間的關係愈密切，加以薩克遜

尼的勞工，大多數一向傾向社會主義，又可以減少畛域之見，有助於統一的完成。普薩間宗教的相同，也會助長團結的勢力，一九二三年政府用國家軍隊來對付薩克遜尼，當然不是地方上的爭鬪，而是怕共產黨要在那裏成立蘇維埃共和。

我們在這裏提到不倫瑞克 (Brunswick) 純然因為一九一九年二月和三月革命政府在獨立社會黨與爾特爾 (Sepp Oetler) 領導之下，設法聯合各方革命勢力，成立一個「西北德意志蘇維埃共和」這種工作的目標是要與在社會民主黨把持下的柏林政府相抗衡。這種工作始終沒有實現，到現在再也沒有互相仇視的情形了。

漢堡，畢內門，和律伯克 (Lübeck) 三個自由市，都是漢薩 (Hanse) 時代的遺留，已經幾乎完全與德國其他部份同化。可是因為牠們主要的是代表商業的利益，所以在過去的「外交」政策，有時與德意志各農業邦的政策不一樣，在法國革命的第一期中，這三個城市的商業資產階級傾向法國，可是被法軍佔據以後，法人對當地的徵收漸苛，商務因封鎖政策而衰落，一種德意志的「國家精神」開始發展。在十九世紀的末葉和二十世紀的初葉當中，漢薩的城市和德國其他部份之間已經沒有重要的差別。漢堡與畢內門固然一直到一八八〇至一八九〇這十年間纔加入德意志的關稅聯盟，和參與德意志稅則的協定，因為牠們不願放棄自由港在商業上的利益。他們加入德國關稅協定的條件是他們能夠將一部份的海港作為自由港。舊日漢薩城市的風氣到今日還存在，而且對增強這三個城市人民，對本市，和對德意志國家的自豪上大有幫助。

在阿爾比河以東的土地中，現時還有地方上差異存在，但原因完全是爲有柏林，哥尼斯堡（Königsberg），北勒斯勞（Breslau），斯德丁（Stettin）等城市和工業中心。這裏的仇視，是工業的民衆與農業的民衆間的仇視。可是「赤色」的柏林與「反動」的東阿爾比間的惡感，已不如戰前那樣緊張。在戰前保守黨幾乎把持着德國的東北部，而在柏林一類的城市，他們僅得極少的票數，大戰以後東普魯士與麥克倫堡的一大部份與西來西亞的一部向社會黨投票的人很多，而國家主義黨與國社黨卻得柏林全票數四分之一。可見經濟上與政治上的交惡，已經失去本來的地方性，而遍及全國了。

對於鄉土的依戀

對區域的忠誠和區域間的仇視很明顯的影響到德國國家的統一，曾經給予德國各區域的國家情感以一種特殊的色彩，對鄉土的忠誠的性質卻略有不同，所佔的地位也不一樣。區域的忠誠有時和國家的理想發生衝突，但對鄉土的愛戀卻一向——尤其是最近數十年間——被利用來增強對國家的自愛心。（註五）

無論是生在一個田舍裏，一個村莊中，一個茅屋裏，或是一個城市中的住宅裏，一個人的誕生地和兒童時代的景物，一定是早年的記憶和情緒上回想的集中點。在大多數的民衆中——尤其是在農民當中，對於本國的觀念，一大部份爲以家庭或鄰近作中心的觀念所構成。這種對家鄉的感情，加上對本鄉土的自愛心與愛護心，是一種比較國家思想還要具體，還易捉摸的情緒。交通工具的進步，電影和無線電等發明，使空間的距離縮短，同時在受到這種新發明的恩惠的團體當中，「地方」和地方的概念的范围也因而擴大。可是在大多數民衆中，鄉土的

生活與經驗，大概到現時還在他們的意識中佔一重要地位。因此如何利用對地方的興趣和對地方的自愛心來加強對國家政府的忠誠，向來成一問題。

對鄉土的依戀在以往一向是一種重要的忠誠，但有意識的研究，發揚，和最後將這種忠誠運用來加強對國家和對國家政體的忠誠，卻是比較近代纔發生的一種運動。這種比較近代的對鄉土生活的注意，起源於資產階級和貴族中的開明份子，在十八世紀末葉對平民生活的逐漸關心。（註六）不滿於貴族的不自然，淺薄，和奢侈的生活，資產階級趨向於下層階級——民衆——的勇壯和樸儉的生活及其文化。他們的純樸簡單的德語，是宮庭中不自然的法語和故意賣弄的花式德語的一個好調劑。在民間的故事和民間的歌曲，他們發現出一種在宮庭中呆板的詩詞裏，找不到的在藝術上的生氣。在音樂方面簡單的民歌，漸漸得人鑑賞，取充滿著不自然的裝飾的宮庭音樂而代之。他們又發現農民的美麗，不亞於新古典派的宮院；農民的服裝不但合乎自然，而且比怪物似的大裙子和假髮還要美觀。這樣看來，鄉土風俗的研究不是一種保守的勢力而是對上等社會矯揉造作的文化生活的一種反響。

這種對於民間生活的興趣，最初不限於任何一國的生活；牠是一種普遍的性質。最好的例，就是受了黑爾特爾（Herder）的影響，在一七七六年出現的民歌集，所搜集的歌謠中有四分之三是外國民族的。可是反抗拿破崙戰爭的結果，使這種對民間生活的興趣變成對德國民間生活的興趣。到了一八一五年，甚至連國家方面都不注重，而注重區域的和地方的民間生活與民間文化。格林姆（Jacob Grimm）在一八八二年給霞斯厚生

(Werner von Haschhausen) 的信裏，在關於民族研究 (Volkskunde) 的討論中，主張「一切工作，必須在一省的範圍以內舉行。無論如何，不要使你的活動範圍超出你的區域之外，推廣到德意志其他部份。」民間的詩詞，雖曾經發拉斯來賓 (Johann von Fallersleben)，烏蘭 (Uhland) 和他人搜集，民族研究 (Volkskunde)，尤其是地方生活風俗的研究（以後稱作鄉土研究 (Heimatkunde)）並未引起一般人的注意。

統一德國的運動，和統一以後產生的一種強烈的國家精神，引起一種對「民族研究」「鄉土研究」的比較深刻，比較持久的興趣。引起這種興趣的一個原因是一般人（尤其是中級社會）對於詳細研究德意志國家生活豐富的內容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各式文化的願望。幾百年來使德意志分裂的許多地方的差異，現時變成研究各式各樣的德國文化生活的好資料。同時他們還培養對鄉土生活的興趣來抵抗工業革命的破壞勢力。大多數市鎮尤其是鄉間的民衆很快的受工業的吸引和無產化，加上社會主義觀念的傳播，成爲對舊日民間生活，民間風俗興趣以及對鄉土的依戀的有力破壞因素。結果產生一種運動，要分去勞工們對社會黨國際觀念的注意，設法在他們當中，養成一種對新的居住地方的依戀。

在戰後期內，這種運動比較以前更強烈，更盛行，將於以下幾頁中加以論述。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增強，兩者對德國民間生活和對地方忠誠的研究都曾助長興趣。在國家主義方面，這種研究變成一種工具用以喚回已被打破歐戰幻想的愛國德意志人，使他們對鄉土的美景加以仔細的研究。這種趨勢，更隨着通貨膨脹與最近的經濟危機而加強，因爲上述的兩種發展，使德國的中級社會份子不能再像戰前一樣隨便到國外去旅行，不得不

在國境以內消遣假期，同時培養下級社會愛護地方的觀念和對德國民間生活興趣，比戰前尤甚，藉以抵抗共產主義的國際理想。

有好幾個團體特意培養對鄉土的愛戀。培養青年人對鄉土的愛護心最重要的機關是學校，尤其是在共和政府的新學校課程將「鄉土研究」作為一種科目以後。各城市編印「讀本」，在鄉村和小市鎮的學校中，由教師自己預備所需的教材。鄉土研究，在教師領導而學生必須參加的旅行中，成一重要的部份。目的地通常是鄰近的名勝，有時還到「鄉土博物館」(Heimathmuseum)去遊覽。

設立博物館來陳列在鄉土上有意義的事物，也是十九世紀的新發展。(註七)最初提出這種意見的是哥德(Goethe)。他在一八一五年與斯坦(Freiherr von Stein)一同到萊茵流域去旅行一遍之後，寫了三篇文章論述萊茵，納克卡爾(Neekar)和美因(Main)流域一帶的藝術寶藏。在寫給各邦主要部長的一封信中，他建議設立省博物館，藉以發揚對鄉土的愛護心。可是這種建議不被採納。巴維利亞王路易一世雖在努連堡(Nuremberg)地方設立日耳曼博物館(Germanisches Museum)，但這不完全是地方的博物館。設立關於地方生活的博物館的意見，實現得很遲。

要研究設立地方博物館的觀念發展的經過，我們最好追溯一個地方的發展。我們現在舉勃蘭登堡(Brandenburg)一個地方來做例。在一八三一年間頭一個研究本地方歷史的會社成立，但這個組織，不關重要。第二個會社成立於一八六四年。一八六四年方但(Theodor Fontane)刊行他所作的馬克族遷徙(Märkische

Wanderungen)描寫被稱「馬克的虛無的美麗。」一八六五年穆舍爾堡(Muschelberg)第一個地方博物館成立；一八七四年柏林的馬克博物館(Märkische Museum)成立。一八六七年間馬克有十個地方的博物館；一九二六年間約有五十個(註八)現時在德國不但各省有博物館，幾乎連各縣都有自己地方的博物館。鄉村的博物館，現在正設法推行中。

在一九二五年間德國約有九百四十個博物館，或專門陳列關於地方風土生活的品物，或陳列一個區域的品物，但以前者為較多。還有三百個在國外的德意志博物館，性質與在國內的相似(註九)自從一九一八年以後在德國國內的博物館曾經組織成博物館聯合會(Museumverbände)，在捷克和奧大利也有相似的組織。

這種博物館，驟然看來好像是無關重要的，而實際上關係很重大。因為現時利用博物館來專供消磨一個兩天的星期日的遊人已經漸少。當事者不但用各種方法來使陳列品有意義而且能引起遊人的興趣，還讓學校中修習「鄉土研究」的兒童按時到館來參觀。以後還將遊覽作為作文的題目。吸引成年遊客的方法有好幾種：例如漢堡的歷史博物館在夜間舉行民歌的集會，杜里斯頓(Dresden)的民間藝術博物館表演民間的慶節，哈里(Halle)的博物館表演民間歌曲跳舞等。有許多博物館舉行耶穌誕的慶祝和音樂會等；凡願意參加表演的都可以暫時在館內借用舊樂器。這種變地方博物館為民衆化和現近化的結果，使遊人增加得很快。有些博物館保存遊人數目的記錄；例如阿爾東那(Altona)市立博物館在一九二四年間的遊人數目達一五〇、〇〇〇。在一九二八年間當柏林的馬克博物館有特殊的陳列時，後至的遊人竟因過於擁擠而被拒。

『現時一般人，愈來愈覺得藝術博物館是激動一切人類愛護鄉土，民族和祖國的美德的地方。一個人在本地地方博物館所經驗到的關於鄉土歷史和風土人情上以及在藝術和文化上的意義，是永遠忘不了的。』(註一〇)

博物館的落成典禮，是表揚對鄉土的愛護心的一個好機會。勃蘭登堡 (Brandenburg) 省古本 (Guben) 市的市立博物館在一九一三年二月四日的落成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這種辦法，一直到共和時代還沿用。學校從上午十一時起一律停課，舉行大規模的遊行。地方上各主要愛國團體一齊參加。到了博物館以後，教會的樂隊演奏『讚美我主，萬能的帝王』的曲調；次由政府及各團體代表致詞，主要的演辭，多和以下所舉的相似，以下是任虛 (Jentsch) 教授在某次博物館落成禮中的演辭 (註一一)

『經最後的分析，對鄉土研究的興趣，和搜集品物在地方博物館陳列的活動的根基，就是由狹義的對地方的興趣推廣而產生的愛國感覺，地方博物館必須具有下列兩種宗旨：喚起愛護鄉土心以及喚起愛本國心。』

這種博物館一部份由邦政府，一部份由地方社會，一部份由私人團體出資辦理。館內陳列各種與地方，或省有關的品物：本地地質上構成的模型，還有各種動植物，以及本地方引以為榮的史前遺蹟。博物館收藏關於地方歷史的圖畫，大致都很豐富。還有古代房屋的模型，以及仿古代各時期陳設的房子。地方的服裝佔很重要的位置。地方和本省在經濟上的產品陳列很多。關於本地在歷史上有名人物的紀念品，都很慎重的搜藏。舊書，舊藝術

品等凡係本地的產品都在收藏之列。藉此可以保持與本地方歷史的、地質的、動植物的、藝術的、以及研究鄉土民間風俗的種種會社的接觸。各博物館又隸屬於一九二三年成立的德意志技藝會。這個組織的宗旨是保存和發展地方與鄉村的手工藝技術，他們還要求政府幫助推銷出品。

傾向於發揚對鄉土的愛護心，和將這種愛鄉土心推廣與對國家與公民的榮耀心聯在一起的另一種勢力是『保護鄉土』(Heimatenschutz)的運動。(註一二)這種鼓吹保護天然景物與地方的鳥獸的運動，起源遠在幾百年以前，但到最近纔變成關係全國的重要運動。保護美景的理由有好幾種。從經濟的觀點看，目標是保護森林，使德國在木料方面可以自給。同時還統制全國的水源。對禽獸魚類的保護，一半也是因為經濟的關係，一半是要留給貴族們去漁獵，作為一種消遣。從科學的觀點看，目標是保存罕有的動植物以及在地質學上有意義的結構。從審美的觀點看，目標在使近代的工廠與廣告牌，不要再摧殘天然的景物。我們要記住，愛自然純粹是一種城市的產品；是工業革命的結果所引起的反響，一大部份是無意的對隔絕田野，人口稠密的城市居住狀況的反感，當局利用這種愛美的成份，來作國家的宣傳，不斷的引起一般人對德國的風景，德國的森林的優美的重視，不提別國也有同樣或更加優美的風景名勝。這種愛美的觀念，還被利用來增強對鄉土的愛護心，甚至本地沒有多少美景也要特別指出本地風景如何的優美。在無論如何找不出一點美景的工業中心，他們也設法使附近環境比較不討人厭，藉以養成對地方的愛護心。

『保護鄉土』一個名辭，最初在一八九七年 Grenzboten 雜誌中一篇論文裏發現。這篇文字是音樂家魯

多夫 (Ernst Rudolph) 所作。他因為愛國與愛美兩種原因，對自然的保護非常關心。一九〇四年康文子 (Conventz) 刊行第一本關於保護自然景物的重要著作。同年薩克遜自然保護會在杜里斯頓成立。其他各邦，也先後成立同樣的組織。這些組織，現在聯合起來成立全國的聯合會，自稱有會員十萬人。該聯合會的宗旨如下：(註一三)

『保存德意志本國的自然和歷史的名勝，和綜合整個保護自然景物的運動，特別注重下列目標：

- (1) 自然的保護——尤其是本地動植物以及地質上的特點與風景名勝。
- (2) 保管古代遺留下來的品物，不論是建築或是可以遷移的品物，或是街道與地方的名稱；保管紀念碑誌；保存推進城市和鄉間古式的建築；推進民間藝術，風俗，慶節，以及服裝。』

各市政府一向對贊助風景的保護。普極 (Putzig) 一縣會同意購買及探討一個寶貴的沖積期的沙石洞。卡厚斯 (Kathaus) 一縣買了一座奇特的堆石。法蘭克福 (Frankfurt) 市在奧得 (Oder) 河上花了兩千萬馬克來保護鳥類。藉漢諾威 (Hanover) 布勒門 (Bremen) 和漢堡 (Hamburg) 三個城市的幫助，在魯尼堡 (Lineburg Heath) 地方開關了一個偉大的自然公園。當在「七更山脈」(Siebengebirge) 開採山石快要破壞自然的風景時，各市籌集款項來將最美麗的部份買來保存着。波昂 (Bonn) 籌得五萬馬克。科崙 (Cologne) 籌得十萬；萊茵流域各省籌得二十萬。為慶祝薩克遜尼王登位二十五週紀念，德勒斯登 (Dresden) 市購買幾乎有二百五十萬畝的草原，決定將來作本市的園林。為紀念皇帝的銀婚，科僕 (Coburg) 市買了一座佔地七十一頃 (每 hectare 約有二英畝半) 的森林，即以皇帝和皇后的名字命名這座森林，叫作 Kaiser-Wilhelm-Angu-

sta-Viktoria-Grove。柏林的全國碑誌保管局最近提議在自然風景優美的地方，立誌紀念各種愛國的慶典。這個提議很得各方的贊同，現時有許多地方，正設法建立或保存這種紀念品來紀念歐戰中陣亡的將士。

此外，一九〇六年間普魯士創立一個全邦保護自然景物的機關，在各省各區都設分處。以後有好幾邦仿設同樣的組織。這種機關的工作是調查所有重要的天然紀念品，藉以妥加保護，使不被損壞。他們設法博得輿論的贊助；藉教師與遠足旅行來喚起兒童對這方面的興趣；和地方團體與遠足會合作；將意見貢獻給教士，教育部，水源管理會，政府地質家和地形專家，林務局，警察以及鄉村間的地保。在各種美術日歷與美術雜誌中，都有關於保存自然景物的項目；此外還印刷風景明信片；分發小冊給學校兒童與遠足會；在本地方博物館舉行展覽會；與無線電中播送的講演，以及地方「自然保護日」並開關於自然保護的全國大會。

對鄉土依戀心的強度，在民衆當中各階級份自然不一樣。我們必須從這個觀點來分析各階級的情形。在農民方面對本鄉的愛護心主要的成因是本人和土地在經濟上的關係。在過去，農民除了本鄉以外，很少知道別的地方。只有在本人謀生以及還債的地方——本人的小小地產——居住，纔覺得舒服。這種情形，更因農民教育的淺薄和經驗的有限而牢不可破。他們對鄉土的依戀有具體的根據，但他們對國家的依戀的性質，卻是空虛的，抽象的。可是現代工業的發展，有擴大農民眼界的傾向。他們可以乘火車到市場去，跟着物價的消長，感受到世界競爭的影響，聽到關於稅則的宣傳，買到無線電收音機，看到電影戲。農民中年紀較輕的子弟，假如在農業中找不到工作，往往到工業區去謀生，對故鄉的依戀，因而大減。

大市鎮裏的手工匠情形與農民略同。他們受着鋪子或生意的束縛，全靠最近而最直接的環境來維持生活。他們生活的方式，一直到現在還特別適宜於愛護地方心的發展。當然，在現代的工業城市中，他們對於自己居住的地方概念要比農民較廣；不過他們依靠地方來生活的程度，足夠養成他們對本地方強烈的愛戀，使他們成爲在城市中發揚「地方的精神」和「公民的自尊心」的中堅人物。他們在經濟上的獨立性逐漸減少，他們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獨立的地位漸失去，他們或則變成無產者的一部份，或則保持這中產階級的地位，努力保存本地的與傳統的生產制度，因此對人生的態度，往往流於傳統的頑固與自驕。可是對「鄉土研究」的興趣的發展，全靠具有科學的和文化的智識的中等階級智識份子。他們希望藉推進鄉土的研究，可以增強愛國心，特別是可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大戰和戰後通貨的膨脹時期，使他們不能像以前一樣隨便到國外去旅行，不得不將心力集中在本國的景物上去，給「鄉土研究」一種新的驅動力。

地主也受著經濟的束縛，不能隨意離開鄉土。還有家門的風氣不能不維持。可是地產的管理，往往交給管家地主自己往往對於城市比對於自己的田地還要熟悉。在另一方面，爲他們本身的利益計，最好能夠增強工人們對地方的忠誠，使他們永遠依戀著工作的地方。最末，大商人最不易感覺到對鄉土的依戀。他們的商業也許以某地方作中心，但商業要靠全國以及全世界市場的消長，這使他們的眼光，遠超乎地方之外。還有，他們的生活並不以任何地方作根據。在爲商務或爲娛樂的旅行中，他們隨處可以安居。

態度最難捉摸的，要算工業中的勞動者。他們不但常缺乏一個固定的經濟中心，而且很不容易對居住的地

方發生好感。(註一四)

「他們的生活，一大部份消磨在工廠裏或集居的房屋中。他們的住處也許比街道還要低幾層，小窗戶外面只靠一個氣管通氣，往上看只見一塊小天，在這種地方的小孩，四週環境只有黑暗，如何能發生對地方的依戀？」

另一個「鄉土研究」運動的領袖對本問題曾發表如下的議論(註一五)

「生在一个山洞一樣的工人住所中，在城市的街邊長大，四圍只見牆壁與烟筒，和田地與鄉間的風俗完全沒有接觸，每日在工廠或礦內機械的喧擾中很單調的掙扎着，藉以找得果腹的機會，工人們從來沒有機會知道德國郊野的美麗以及本國的自然和歷史的名勝。享受不到德意志自然與文化的寶藏，他們於是在本國中變成陌生的人。」

爲了這種情形，發展對鄉土的愛護心的工作，便以城市中的勞工階級爲中心。

「在這時候關於地方文化和對鄉土的愛護心我還要說什麼？一個錯僞的人類概念便足根滅我們；令人失望的經濟狀況，又使我們當中或我們的子弟多數不能不漂泊到外國去謀生；我們現在如何的需要對鄉土的愛戀，對祖國前途的信賴，以及對我們的後輩在精神上不會離開我們而終有一日回到他們內心生活所深寄的故土的堅強希望。」

可是阻礙勞工對鄉土愛護心之發展的，不僅是經濟的困苦和不良的住處。因爲他們大多數在革命觀念的

影響之下，他們的注意都集中在國內外經濟的和社會的爭鬭，而在發展對地方的自愛心。

- (註1) 關於比利亞的亞蘭 參見 Michael Doeberl 著 Bayern und die wirtschaftliche Einigung Deutschlands (1916); Doeberl 著 "Bayern und die deutsche Erhebung unter Napoleon I" (見 Abhandlungen der Historikerklasse der Kgl. Bay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第114卷第1號 (1906年) 第315-34頁 第115頁) Doeberl, Bayern und Deutschland (第1卷第191-195年號) Julien Ruvère 著 La Pavrière et L'Empire allemand. Histoire d'un particularism.
- (註11) 參見 Georges Blondel 著 La Rhénanie. Son passé, son avenir (1921); Julius Baehern 著 Die Vereinigung der Rheinlande mit Preussen (1916); F. Brüggemann 著 Die Rheinische Republik. Die Gründe für die Entwicklung eines rheinischen Freistaates und die Vorgeschichte der Proklamation vom 1. Juni, 1919 (1919); F. Brüggemann 著 Die Rheinische Republik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und Kritik der rheinischen Abfallbewegung während des Waffenstillstandes im Jahre 1918-19); (1919); Martin Fassbender 著 Westdeutschland los von Preussen! (1919); Joseph Hansen 著 Rheinland und Rheinländer (1925); Joseph Hansen 著 Die Rheinprovinz, 1815-1915 卷111 (1916年) Joseph Hansen 著 Preussen und Rheinland von 1815 bis 1915 Hundert Jahre politischen Lebens am Rhein (1918); Justus Hasbagen 著 Das Rheinland und die preussische Herrschaft (1924); Walter Kamper 著 Die Rheinlandkrise des Herbstes 1923 (1925); P. Kirchern 著 Landvolk und rheinische Republik (1919); K. Krämer 著 Die rheinische Bewegung ihre Entstehung und ihre Begründung; ihre Freunde und ihre Gegner (1919); Maas 著 Die rheinische Freistaatsbewegung; Robert Michels 著 "Étude sur les relations historiques entre la France et le pays du Rhin" (見 Revue Historique CXXXIX, Année 47 (1922); 卷161頁 第110頁) Paul Moldenhauer

- 著 Von der Revolution zur Nationalversammlung. Die Frage der rheinisch-westfälischen Republik (1919);
 Joseph Hansen 著 Die Rheinprovinz 1816-1915. Hundert Jahre preussischer Herrschaft am Rhein (1917);
 Julien Rovère 著 La rive gauche du Rhin de 1792 à 1814 (1919); Max Springer Loßungsbestrebungen
 am Rhein (auf Grund authentischer Dokumente) (1924); Aloys Schulte 著 Tausend 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und deutscher Kultur am Rhein (1925).
- (註三) 著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Bezirk Hannover (若譯) Die welfische Partei, was sie ist, und was sie
 will; G. F. Konrich 著 Die hannoversche Frage in Hannover (1919); Quart-Faslem 著 Hannover einst
 und jetzt (1922); Fritz Rickhey 著 Die hannoversch-niedersächsische Freistaatsbewegung (1926).
- (註四) 著 Curt A. Nitzsche 著 Jahrbuch Sachsen, 1925-1928 Politik und Wirtschaft, Kunst und Wissenschaft
 im Freistaat Sachsen; Bernhard Lange 著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in Sachsen von 1813 bis zur Rückkehr des
 Königs, 1815 (1912); Paul Ruhlmann 著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in Sachsen während der Jahre 1806 bis 1812.
- (註五) 著 Die Heimat, Zeitschrift des westfälischen Heimatbundes (Monatschrift für Landvolk und Kunst in
 Westfalen und am Niederrhein); Martin Kittelmann 著 Schlesische Dorfstege (1925); Märkische Blätter,
 Heimatkundliche Beilage der Oder-Zeitung, 1911-1914; Robert Michels 著 "Vaterlandsliebe und
 Heimatgefühl" (或 Köhl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Soziologie 第五卷第六卷(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二
 一頁至第二頁) Hanna Meuter 著 Die Heimatlosigkeit Ihre Einwirkung auf Verhaltung und Gruppe-
 nbildung der Menschen (1925); Hildgard Roksroh 著 Die ländliche Wohlfahrts- und Heimatpflege
 (或 譯) (1926); Arthur Wienkoop 著 Heimatkultur (1913).
- (註六) 著 Adolf Haufen 著 "Geschichte der Volkskunde" (或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Volkskunde 第二

至卷二十一(一九一〇—一九二一年)內有兩篇很詳細的論文關於 Volkskunde 的唯一歷史的分析。

(註七)參看 Wilhelm Pessler 著 Das Heimatmuseum im deutschen Sprachgebiet als Spiegel deutscher Kultur;

Pessler 著 Unsere Heimatmuseen.

(註八)參看 Markische Blätter, Heimatkundliche Beilage der Oder-Zeitung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

(註九)參看 Wilhelm Pessler 著 Das Heimatmuseum im deutschen Sprachgebiet.

(註一〇)圖頁第十四頁。

(註一一)參看 Gubener Tageblatt 一九一三年七月五日。

(註一二)參看 Alfred Biese 著 Das Naturgefühl im Wandel der Zeiten (1926); Wilhelm Bölsche 著 Die deutsche Landschaft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H. Franz Goerke 譯註 H. Cowents Über nationalen und internationalen Naturschutz (Rede bei der Internationalen Naturschutzkonferenz in Berlin am 18. November 1913), (1914); O. Doering 著 Heimatschutz (1908); Erich Ewald 著 Das Gesicht der deutschen Heimat (1928); (Monats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Pflege der Natur- und Landeskunde in Schleswig-Holstein); Heimatschutz (Mitteilungsblatt des Deutschen Bundes Heimatschutz); Gertrud Stockmayer 著 Über Naturgefühl in Deutschland im X. und XI. Jahrhundert (1910).

(註一三)參看 Deutscher Bund Heimatschutz 公佈的「德國地圖」。

(註一四)參看 W. Schoenichen 著 Natur und Heimat als Erziehungsmächte für die Industriejugend.

(註一五)參看 Karl Wagenfeld 著 "Heimatschutz-Volkssache" (見 Heimatschutz) (Mitteilungsblatt des Deutschen Bundes Heimatschutz' 第一卷第二號(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

第十四章 日耳曼人與非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與非日耳曼人的衝突，有好幾方面在德國國家主義的發展中，不但有趣，而且很重要，給德國的國家主義一種特殊色彩。這種因素在德國對國家精神的影響，大概比歐洲任何國家都要深刻，影響的方式也比任何國家都多。這不特因為在德意志的民族中最近纔有國家政府，還因為國家的政治的界線，從來沒有和語言文化的界線一致——這種情形，在戰後時期更甚。問題很自然的分成三方面：德國內的弱小民族，德國境外的日耳曼人，以及外國對德國國事的干涉（註一）

國境內的弱小民族

生存在德國境內的弱小民族，只有波蘭人，丹麥人，和立陶宛人（Lithuanians）能夠算是通常所謂弱小民族；因為他們在語言上和文化上都隸屬於鄰近的國家。其餘的兩種小民族，非利斯安人（Frisians）和斐斯特齊（Fainitz）的塞爾比人（Sorbs）（通俗誤認為萬特人（Wends），並不是通常所謂弱小民族，而是兩種先前曾經獨立的民族的子遺。非利斯安人係條頓民族（Teutons），萬特人是斯拉夫民族（Slavs）。這些弱小民族份子，除了猶太人以外，現時合組成德意志弱小民族聯合會（Verband der Nationalen Minderheiten Deutschlands）刊行一種定期出版物叫文化根源（Kulturwelle）。每種民族都有代表自身利益的經濟、政治、

和文化團體。

這些弱小民族中最大的還要算波蘭人。(註二)雖然大戰的結果，德國失去所有波蘭人佔多數的領土，現時在德國居住的波蘭人還有二百萬上下。在萊茵流域——威斯發利亞和柏林，有一種民族的組織叫作「波蘭人聯合會」自從一九一八年以後，波蘭人中大多數是萊茵流域——威斯發利亞，上西利西亞(Upper Silesia)以及柏林一帶工業中的勞動者。在波蘭人已經居住了幾個世紀的地方——西利西亞和東普魯士——他們多數是擁有中等地產的農民。馬蘇利安波蘭人(Masurian Poles)，通常爲馬蘇爾人(Masurs)居住在西普魯士的南部，他們已經放棄或者失去和波蘭文化遺傳的接觸。

幾百萬波蘭人居住在普魯士境內，一直到十九世紀當局設法使他們德國化時，纔激起全國對波蘭人的惡感。在波蘭人方面也在一八六〇年以後開始從經濟和文化上作自衛的組織。(註三)波蘭人在德國東部的進展，引起國家主義者的恐慌，增強新成立的帝國內部的國家主義。這引起卑斯麥對付波蘭人的設施，這種壓逼的政策更促成波蘭人的團結，這種團結又引起德國民衆的反響，增強以代表德意志的優秀文化自命的中等階級和智識份子的國家意識。貴族地主對波蘭人並不特別厭惡，只因為他們是勞工和「低劣」文化的份子加以鄙視；因爲波蘭人的工價較賤，地主們還覺得他們很有用。政府對波蘭人這種策略引起天主教徒和社會民主黨的反對；在天主教徒方面因爲波蘭人奉天主教和擁護天主教中心黨，在社會民主黨方面因爲在工業區中一部份波蘭人向社會民主黨投票，以及因爲社會民主黨在原則上反對在文化上壓逼弱小民族。所以我們可以說，普魯士

政府對波蘭弱小民族份子的政策，同時增強和減弱德國國家的團結。

在大戰期內，波蘭人與德人間的交惡暫時減少，尤其是在征服了波蘭以後。當時好像在希望中的勝利實現以後，一個受德國控制的波蘭政體可以成立。戰後領土大規模的喪失給素所深惡的波蘭，遂激起德人仇視一切波蘭的事物。這種德波間的仇視，比德法間的惡感還要深。邊境上軍隊時常發生衝突。反動勢力特別要助長這種惡感，利用這種惡感來作對付革命勢力和擁護新建共和政府勢力的利器。

猶太人在德國成一特殊問題。（註四）他們的人數雖然只有一百萬左右，但他們對國家情感的性質上影響很大；他們的勢力遠在他們的人數以上。他們除了德語以外，沒有別的語言。雖然少數人學習希伯來文，但目標純粹係宗教的。他們和非猶太人的區別是宗教的，種族的，和文化的，尤其是在團體的風習上。歷史的原因，使猶太人多屬中產階級份子。一小部份是商業和銀行界中的資產階級。在勞工當中猶太人很少，農民當中簡直沒有猶太人。他們在政治上傾向於資產階級的左翼，尤其是民主黨（現稱國家黨）和社會民主黨。

就對德國團體和德國文化的態度上看，猶太人可分成三種。子昂種（Zionists）自視為真正的弱小民族份子，將巴力斯坦（Palestine）當作他們的祖國。但在人數上他們在德國並不算重要。在另一個極端，有一個小團體的猶太人，在德意志國家猶太人聯合會領導之下，特別重視他們當中的德意志國家精神。這個團體反對東歐的猶太人移民到德國，因為他們也和德意志的國家主義黨一樣，認為這足以危害德國的文化。德國的猶太人大多數站在這兩個極端的中間。他們自認為德國的公民，可是要維持相當的猶太風俗。他們的一個主要組織是中

央猶太信仰德意志公民會 (Zentralverein Deutscher Staatsbürger jüdischen Glaubens) 還有第四種猶太人我們也可以附帶提及。這種人的數目沒有一定，他們都是想完全受同化的，設法否認或掩飾自己是猶太人。追溯猶太人在德國社會上地位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從舊政體壓逼下所得到的解放，與普通的第三階級 (Third Estate) 的解放——特別是法國革命的影響——有密切的關係，可是當資產階級在他們的解放主義中放棄了一部份的政治理想，承認半封建式專制政體的政治理想中一部份時，他們還沾染了一點封建的農業的，反猶太的心理。在帝國時代反猶太主義充滿了整個政治系統，尤其是在軍隊當中，一個猶太人完全沒有充任軍官的希望。在文化方面反猶太主義同樣的發達，漸漸替代十九世紀初葉德國文化上的國家主義的反法成份。這種運動的主要人物是發格納爾 (Richard Wagner) 和郎賓 (Langbehn)，而哥賓婁 (Gobineau) 張伯倫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和巴特爾士 (Adolf Bartels) 的著作也很重要。

在政治方面，帝國的反猶太主義變成一種攻擊一八四八年遺留下來的解放理想的工具。凡主張解放猶太人和博得猶太人擁護的民治理想，都被指為猶太的，不愛國的，以及與德意志帝國理想不能相容的。還不只此，社會民主黨的突興，表示階級間的仇視日甚，反猶太主義於是被用來作將一般人對上層階級的惡感轉移到猶太人身上的工具。必然的反響，就是青年的猶太智識份子跑到社會民主黨方面去。

在大戰期內階級間的衝突看來似乎已經消除，反猶太主義在表面上也好像已經成爲過去。可是在革命和戰後期間內卻變本加厲。爲掩飾在舊政體下德意志的慘敗起見，右派政黨設盡各種方法來指譎革命份子，務使

他們失去國內的信仰。德國的革命領袖也和俄國的一樣，許多是猶太人，這使右派有機可乘，將整個革命運動指為猶太人，要使德國走入歧途的大陰謀，目的在使德意志民族屈服在『國際猶太馬克思主義』之下。

反猶太主義一向以在城鎮裏和鄉村中的中產階級為最普遍。加以在長期的戰後危機中，遭受經濟和社會的崩潰的損失最重的就是這種人。他們對共和政體的夢想已經打破了，同時又不願服從無產階級的領導，因此特別容易對政府和商業中的猶太份子發生惡感，將目前的不良狀況，一律歸咎於猶太人。

反猶太主義在德國的勞工階級中，居然也能傳播。因為德國幾乎沒有猶太的無產階級份子，受了右派政黨影響的工人，相信他們的困苦，全係猶太的資本主義者所造成。

國外的弱小日耳曼人。

雖然除了猶太人以外，在德國境內的弱小民族份子自從大戰以來對德國人的國家主義的影響並不大，可是在德國境外說德國語的民族，對國內愛國心的強度的影響，卻日益顯著。(註五) 因為歷史的必然結果，歐洲說德國語的人民在地理上並不是一個密集的團體，全世界說德國語的人民，估計約有九千四百萬，其中有三千一百萬在德國國境以外居住。(註六)

德國境外說德國語的民族分成兩類：(註七) 第一類是居住在德意志鄰近國家中的日耳曼人，在奧大利，捷克，瑞士，盧森堡，法蘭西，波蘭，立陶宛等國中，德人總數幾乎有一千五百萬。這是促進德國中一種『同文團結』(irredentist) 精神的有力因素。第二類是居住在和德國國境不相連的地方的日耳曼人。這又可分作三種：第一

種是居住在和德國國境較接近的國家，如俄羅斯，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國內的日耳曼人，他們一向保持着自己民族的語言和特性他們。所以能夠保持日耳曼的文化生活的主要原因，是在過去幾個世紀中，他們的經濟和公民的地位都比四週的民族高。其次是遷移到經濟程度比德國還要高的德意志移民，他們要得到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進展，必先放棄德國的特性，在語言上和文化上都與新國土同化。最好的例就是遷移到美國去的德國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日子久了和祖國的關係一定會減弱。要保持原有的語言，全靠有新的移民陸續進來。在巴西（Brazil）的德國移民是介乎前述兩種人之間。最末，還有德國政府或私人組織派遣到外國去的德國人，他們不但繼續是德國的公民，而且還要回到德國去。

保持德國的語言和文化的問題，第一是以在德國國境鄰近居住的德國人作中心，其次是居住地與德國國境不相連接的份子，前者是一個可能的大德意志中的一部份，後者是增強德意志在國外勢力的工具。兩者現時在增強國內對國家的自豪感，都佔很重要的地位。在德國境附近一帶的「外國」日耳曼人——尤其是在波蘭與捷克兩國的——的重要性，在於他們所受的待遇往往引起德國國內的不平；這種人往往要求德國政府保護。

在十九世紀的初葉，德意志的當前問題是經濟的與政治的統一，居住在德意志國境以外的說德國語的人，不能引起國內特別的注意。（註八）

普魯士在一八七〇至七一年間獲得勝利之後，德意志帝國跟着成立。但因爲新帝國正致力於政治和經濟

的團結，對於被遺在帝國境外的日耳曼民族的問題，一時尙未能顧到。德國工業在國外發達以後，殖民地逐漸到手，對於國外日耳曼人的注意，也漸次發生。可是最大的刺激，是從大戰中得來的。孤立的德意志大受全世界說德國語人民的贊助，不管他們是否德意志的公民。大戰的結果，因為帝國的領土和財政上的損失，所有說德國語民族的聯絡，在大體上更加強固。

現時德國有各種關心保持國內外日耳曼人關係的團體。（註九）大戰終結以後，這類團體，幾乎都一致聯合起來，組成德意志自衛會（Deutscher Schutzbund）。該會成立於一九一九年，目的在集中一切為未來的民衆表決的宣傳，和保障邊境上和國外日耳曼人的利益。

隸屬於該會的團體共有一百以上，每年在聖靈降臨節開會一次，地點通常多在邊境地方。該會還與德國及國外報紙都有密切的聯絡，他們實行大規模的出版計劃。所屬團體中有各種不同的全國組織，以及邊境上或國境以外日耳曼人的地方組織。國境外的日耳曼人組織，有一部份在大戰以前就成立，在聯合會成立時，他們變成中堅份子。這些組織現時共有六十個，非常活動。

「國外日耳曼主義聯合會」（Verein für das Deutschtum im Ausland），通稱爲V. D. A.，是努力於圖謀國外日耳曼人與祖國保持文化上聯絡的最大而最重要的全國組織。

該會工作的性質是兩重的。第一是要激起國外日耳曼人對文化的遺傳的意識，藉此從強固的文化和情緒上的關係中，使他們歸向德意志國家政府以及統治份子。他們的主要工作，到現在還是按照該會的本旨，在國外

設立德意志學校——尤其是在被割佔的區域中。註一〇第二種重要工作是在國內的日耳曼人當中，引起對國外日耳曼人的注意。會內的二十八個以邦為單位的組織和四千五百個團體，會員達二百五十萬人。他們的主要宣傳工作是藉會內巡迴演講員的幫助，舉行各種講演。藉一種巡迴的圖書籍展覽，使一般人對國外各區域的分配狀況和特性，得一活現的印象。會中新聞部不斷的供給國內各報和國外的德文報關於國外德人的新聞。會中還刊行好幾種定期出版物。

隸屬於這個聯合會的另一種代表各處說德國語人民經濟上交互關係的組織是國外德人會 (Bund der Auslandsdeutschen)；他們自稱有一百五十個支會，國內外會員達十二萬人。該會的宗旨是恢復或償補德意志公民在大戰中被協約國沒收的產業。被沒收的財產，總計約值一萬兆馬克，他們在經濟方面有強大的吸引力，對目標的實現上曾有相當的成功。

有幾種機關是特別為研究國外德人以及集中各團體對於這個問題的活動而設。其中最重要的是司徒嘉 (Stuttgart) 地方的德僑研究會 (Deutsches Auslandsinstitut)。

新教會和天主教會，在藉附屬的組織來維持一切說德國語的人們在宗教上和 cultural 上的團結，同是重要的因素。註一一 德意志殖民與移民聯合會，地位也很重要。體育運動也漸漸被利用來使世界各地說德語的人發生聯絡。我們萬不能忽略的，還有在德國境外各德人團體中都可以找得出來的德意志唱歌會。每三年舉行一次的盛大國歌節，常有許多國外的德人來參加。

外國的干涉。

外國對德意志內政的干涉，確切影響於德國團結和國家意識的發展，在歐洲各大國中實在找不出第二個同樣的例。這是因為德國在地理上居歐洲大陸的中心，沒有自然國界的關係，加以從十七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中葉間經濟發展落後，結果使德意志在歷史中一大部份時間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政府。

幾百年來實力較強，內部較團結的鄰國，在外交上軍事上干涉聖羅馬帝國 (the Holy Roman Empire) 以及德意志各邦的政治與經濟生活，曾為德意志政治和經濟統一的一個大障礙；可是這種干涉是否曾在社會上各方政治勢力中激起一種國家的意識，還是一個疑問。在十五世紀的初年間，城鎮中對於外國加諸德意志的恥辱，曾有忿恨的表現。這種惡感，更因對當時教皇統治的不滿而加甚，結果引起路得和他的附從者對教皇統治的指示。

各國對德意志的控制——尤其是法國——助長十八世紀間資產階級的國家意識。法國革命的爆發，不但增強了法國資產階級，連德意志的資產階級，也因而增強了。可是拿破崙連年征戰，對人工和物質的徵收不能不加重，結果德意志的資產階級和農民都覺到壓逼，以往對法國的熱心與同情逐漸消失。本來沒有多少國家情感的統治者與貴族，因此能夠利用資產階級和農民當中正在萌芽的國家情感來幫助他們反抗法國。除了這種反法的爾感以外，後來在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方面還發生一種反奧的情感。奧大利因為是德意志反動派的領袖，一向要壓制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進步觀念，阻止德意志統一的完成。

直到十九世紀的中葉，資產階級與中產階級的民治與國家統一的運動，對各國——如法、奧、意、波蘭等——同樣運動，表熱烈的同情。法國革命的爆發，是德意志革命爆發的先兆，法國革命勢力的衰落，也同樣是德意志革命勢力失敗的預斷。

德意志的資產階級人數與勢力都逐漸增加，德意志的統一還沒有希望完成。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失敗以後，卑斯麥不難將統一的願望，與拿破崙三世在德意志各種外交上陰謀所引起的反法情感，連在一起，藉以博得資產階級的擁護，好對法國宣戰。戰爭的勝利和德國統一的完成，不特激發國家精神，而且造成一種與反法情感打成一片的國家心理。可是這種情感的本質，已從厭惡和嫉妬，變為自驕與鄙視了。

從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各國對德國政治生活在外交上和軍事上實際的干涉，自然停止。但德國與列強的關係，對國內各階級國家意識的構成，還有相當的影響。反法心理在這時期內繼續不斷，到摩洛哥事變時尤其強烈。對法國的厭惡與鄙視最甚的，照例是城市裏的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其次是大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中的非社會主義份子。在政治意味不濃厚的農民中，這種惡感當然比較薄弱。對法國的仇視，在西部與南部不如其他部份那樣顯著，因為這一帶的居民與法國人同是天主教徒及比較「解放」的份子。此外，以往這一帶和法國的接觸比較和德國東部的接觸還要多，法國人在拿破崙時代給他們的許多改革——民法也在內——效力還沒有消失。亞爾薩斯洛林 (Alsace-Lorraine) 一帶沒有反法心理，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

俄羅斯是一個逐漸加強德國國家觀念和愛國心的外力。(尤其是在一八九〇年以後) 德國對俄羅斯的

反感不是厭惡，而是一種對這個巨大而且半野蠻的帝國的虛驚。社會上除一部份貴族以外，各階級都有這種感覺。（惟貴族們視俄國的存在為德國半專制式政體的一種保障。）這種在潛意識中對俄國懼怕，遍及勞工中各等級。從各社會民主黨領袖的話來判斷，這種懼怕，是他們一九一四年所以投票贊成戰事公債的主因，因為他們希望這樣可以保護德國較高的文化，不至受俄國蹂躪。

除了海軍方面，商業界中一部份，以及中等階級的一部份以外，英國對德意志的外交政策在大體上沒有引起德國國內很大的反感。但我們可不要忘記，在南非荷蘭農人（Boers）與英國爭戰時，德國是一致對南非荷農人表同情的。

歐戰的爆發引起兩種主要的國際間惡感——對法國的厭惡與對俄國的畏懼。各級民衆中這種惡感差不多都達到最高度。新發生的對英國的憎惡，在戰爭的狂熱中不久變成主要注意點。在戰事中與奧大利和匈牙利的聯合，使德國人和奧匈人的接觸比較密切。德奧間的關係一直到現在還很密切，在德奧聯合的工作中，這是一個重要因素。

一九一六年戰勝俄軍的結果，在一九一四年為鞏固全國團結之要素的對俄畏懼，漸漸消失。在統治階級當中，開始流行一種認俄國為無關重要的感覺；下級社會和中產階級的一部份更對俄國民衆表同情。布爾薩維克得勢，自然加強德國內部革命的無產份子的精神，同時使統治階級感覺到不安。可是到俄國退出戰團以後，中上級社會又恢復他們對最後戰勝協約國的希望。

戰敗的結果使德國在經濟、政治、和軍事各方面都要屈服，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八年間的國家主權暫告終止。協約國控制德國的主要工具——賠款——，結果助長戰時的仇恨和培養一種強烈的愛國心。這一層在法西斯黨的發展中很明顯的表現出來。法西斯黨利用這種驚人的仇外心理，將日趨險惡的社會當中的惡感移到國家主義方面去。因為賠款給資產階級一種藉口，將造成戰後德國經濟、政治、和社會上的困苦的責任，一齊推到協約國身上，使自己反成了德國的利益和榮譽的保護人。

列強中最足以助長德國人的愛國心的是法國，因為在戰勝國當中法國對於履行和約的要求最苛。此外，駐守德國領土的軍隊，也推法國最多。德國人覺得法國用有色人種軍隊進駐德國土地是一種有計劃的侮辱。在另一方面，德國內部有些勢力，傾向於和法國進行經濟上的合作，與採取一種親善的政策。這種運動的先鋒，是在勒堡格 (Arnold Reebberg) 領導下的一部份實業界，以及在戰後大概一向把持政府的中立派政黨。

波蘭所引起的鄙夷與仇視，較法國更甚，因為德國領土的最大損失，全由波蘭獨立所造成。共產黨對波蘭勞工階級的奮鬥極表同情，但他們對波蘭的資產階級政體卻深惡痛恨，尤其是因為波蘭是蘇俄的最強而軍力最足的鄰邦。

對英國的惡感在戰後已經減輕不少，因為英國對德國的待遇和法國不同；他們覺得英國比較能夠顧到德國的利益。

捷克對德國國家主義的增強也有不少貢獻，因為在捷克境內的德人有好幾百萬，捷克當局要設法使他

們同化。德國對戰時守中立的鄰國，感情還不錯——尤其是對瑞典，因為瑞典在戰後對德國社會上的困苦，曾做了不少救濟的工作。但對丹麥的感情就不很好，因為德國方面遭北斯萊斯威地帶(Northern Slesvig Zone)的損失。

對英國的態度自然一九一八年以後曾經屢次改變。一般人對威爾遜總統提出十四點的失望，曾引起一種對美國的仇視，可是民衆中有一部份人受着在美國的親友接濟，因此對美國的情感又可以得到一種調劑。德國財政在一九二三年崩潰以後，一般人開始看美國爲救星，以爲美國一定能解救德國財政上的困厄。道威斯計劃從中立派政黨看來是一種解救德國經濟困厄的辦法。以後工業「合理化」的實施，又將美國工業作爲理想的模範，甚至連社會民主黨也抱這種態度。在共產黨方面結果和上述的正相反，因為他們覺得美國資本給予德國的幫助，不但不能改善德國的狀況，反能引起德美兩國資產階級的攜手，將德國變成美國的經濟屬地。國家主義黨與法西斯黨也反對美國，主要的目標，在於把國內的互相仇視移到國外去。

法西斯黨治下的意大利對德國國家主義的影響上，地位很重要。意大利是歐洲反動勢力最爽直的代表，能博得德國國家主義黨和國社黨份子的同情；他們覺得法西斯主義是理想的政治形式。在另一方面，德國國內的革命無產勢力，也因而增強，集中勢力來防止法西斯狀態在本國實現。

蘇俄的存在，結果增多了德國內部的糾紛；一方面共產黨的精神因而加強，另一方面其他各政黨都聯合起來，成一條「全國的戰線」。從德國的資產階級與貴族看來，蘇俄是傾覆他們的象徵。實際上這不只是一種象徵，

而且是德國內部一切革命無產勢力的有力聯合，不斷的影響到全國的政治和經濟生活。結果使德國的資產階級與西歐各國的資產階級關係愈加密切，對厭惡蘇俄心理的唯一調劑，就是德國資產階級希望俄國會變成他們出品的市場。這種希望，到現在只實現了一小部份。

在反蘇維埃的陣線中，最急進的一種勢力是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和自由工會的領袖雖然知道俄國蘇維埃勢力的傾覆，一定會減弱德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但他們與現有政體的關係太密切，同時又與要使勞工階級放棄他們國家思想的共產黨衝突太劇烈，所以他們當然要遷怨到比較強大的共產黨勢力——蘇俄身上。

(註一)關於種族和國家問題的普通參考書看 Adolf Bartels 著 Rasse und Volkstum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nationalen Weltanschauung) (1920); Hans Günther 著 Rassenkunde des deutschen Volkes (1925); Otto Hanser 著 Rasse und Politik (1922); John Oakesmith 著 Race and National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Patriotism (1919); Franco Savorgnan 著 "Verschmelzung und gegenseitige Penetration der Rassen und Nationalitäten Statistische Untersuchunge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Band XXXV, Heft 1-2, 1914); Albrecht Wirth 著 Rasse und Volk (1914).

(註二)關於德國內的波蘭人的普通參考書 Johannes Altkemper 著 Deutschland und Polenium (1910); Ludwig Bernhard 著 Die Polenfrage (1910); Denkschrift über den dritten Polenaufruf Mai-Juni 1921 im Kreis der Hindenburg (Herausgegeben von den deutschen Parteien und Gewerkschaften des Kreises Hindenburg) (1921); Heinrich Geffken 著 Preussen, Deutschland und die Polen seit dem Untergang des Polnischen

Reiches (ein geschichtlicher Rückblick von dem Standpunkte moderner Staatslehre) (1908); Helmuth von Gerlach 著 Der Zusammenbruch der deutschen Polenpolitik (1919); Waldemar Mischerlich 著 Die Austreibung der Polen in Preussen (1913).

(註三) 關於這種種類的問題，因德 著 W. Mischerlich 著 Der Einfluss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auf den ostmärkischen Nationalitätenkampf (1910).

(註四) 關於猶太人與反猶太問題的著作很多，特別有用的有下列數種：Otto Arnim 著 Die Juden im Heer (eine statistische Untersuchung aus amtlichen Quellen) (1919); F. Bernstein 著 Der Antisemitismus (1926); Friedrich Bloch 著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von einem jüdischen Deutschen (1911); Lujó Brentano 著 Der Judenhasse (1924); Constanthin Brunner 著 Der Judenhasse und die Juden (1919); Constanthin Brunner 著 Deutschenhasse, Judenhasse, und Judenhasse der Deutschen (1919); Heinrich Coudenhove-Kalergi 著 Das Wesen des Antisemitismus (1923); Neue Jüdische Monatshefte (新猶太) Das deutsche Judentum. Seine Parteien und Organisationen (1919); Anton Fendrich 著 Der Judenhasse und der Sozialismus (1920); Ismar Freund 著 Der Judenhasse (ein Beitrag zu seiner Geschichte und Psychologie) (1922); Theodor Fritsch 著 Antisemiten-Katechismus (eine Zusammenstellung des wichtigsten Materials zur Verständigung der Judenfrage) (1892); Theodor Fritsch 著 Handbuch der Judenfrage (1923); Felix Goldman 著 Das Wesen des Antisemitismus (1924); Herzog Mosse 著 Ratheman 著 Protest der deutschen Juden gegen den Kommunismus; Otto Jöhlinger 著 Bismarck und die Juden (unter Benutzung unveröffentlichter Quellen) (1921); Georg Liebe 著 Das Judentum in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 (1903); Max Neumann 著 Vom nationaldeutschen Juden (1910); Rieger 著 Ein Vierteljahrhundert im Kampfe um das Recht und die

Zukunft der Deutschen Juden (1918); Jacob Segall 著 Die deutschen Juden als Soldaten im Kriege, 1914-1918 (eine statistische Studie) (1922); Werner Sombart 著 Die Zukunft der deutschen Juden (1912); Werner Sombart 著 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1911); Adolf Sommerfeld 著 Der Antisemitismus, eine Rassenfrage (1920); Alfred Wiener 著 Das deutsche Judentum in politischer wirtschaftlicher und kultureller Beziehung (1924).

(註五)關於邊境上和國外的德人曾經有多量的著作，戰後出來的特別多，下列參考書籍目錄特別有用：Jacob Robinson: Das Minoritätenproblem und seine Literatur (krit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Quellen und die Literatur der europäischen Nationalitätenfrage der Nachkriegs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völkerrechtlichen Minderheitsschutzes) (1926); Gottfried Fittbogen: Wie lerne ich die Grenz- und Auslandsdeutschen kennen? (Einführung in die Literatur über die Grenz- und Auslandsdeutschen) (1927); Das Deutschtum im Ausland (eine systematische Zusammenstellung der im Gesamtkatalog der preussi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Bibliotheken verzeichneten Schriften, 1900-1923) (1925), 168pp.; "Führer durch die deutsche Auswanderungsliteratur," Wissenschaft, Kunst, Volkstum 第五第六期的增刊。

(註六)參看 Wilhelm Winkler 編 Statistisches Handbuch (1925), 第十八頁至二十三頁。

看這種數目時，我們必須顧到 Winkler 教授是贊成增強國內外日耳曼人關係的代表，所舉數目，會有過高的傾向。可是他的數目，大部份根據戶口調查的結果，而且除了自己的數目外，他還列舉別人研究中的詳細估計。

(註七)關於本問題的著作，下列是很好的代表：

M. H. Boehm, Europa Irredenta (1923); M. H. Boehm, Die deutschen Grenzlande (1927); G. Boeltz, Grenz- und Auslandsdeutschtum (1926); Friedrich Wilhelm Mohr und Walter von Hauff (eds), Deutsche

im Ausland (1923); Gottfried Fitzbogen, Was jeder Deutsche vom Grenz- und Auslandsdeutschtum wissen muss (1924); Hans Fehlinger, Deutsche in der Fremde (eine Abersicht nach Abschluss des Weltkrieges) (1920); Georg von Hassel, Die Auslandsdeutschen Ihr Schaffen und ihre Verbreitung über die Erde (historisch-wirtschaftliche Studie von den Kreuzzügen bis zur Gegenwart); Hans Nawiaaky, Gesamtüberblick über das Deutschum ausserhalb der Reichsgrenzen (1926); Paul Rohrbach, Deutschum in Not! Die Schicksale der Deutschen in Europa ausserhalb des Reichs (1926); Walter Schultze, Deutsche Brüder in Grenzmark und Ausland (1923); Hermann Weck, Das Deutschum im Ausland (1918); Fritz Wertheimer, Deutschland, die Minderheiten und der Völkerbund (1926).

關於本問題的最重要的雜誌在本章中討論刊行各該雜誌的團體時附帶提及。下列著作係關於本問題某幾方面的。

Andrejewake, Das Deutschum in Westpolen (1919); Band der Auslandsdeutschen, Auslandsdeutschum und Heimat (eine Zusammenstellung) (1927); Erich Giersch, Katechismus für die Sudeten-deuten (1920); W. Hauff, Das deutschum in Belgien (1915); Jahrbuch des baltischen Deutschums in Lettland und Estland (1929); Hans Martin Johannsen, Grenzland Schleswig (Aufsätze zur deutsch-dänischen Frage) (1925); Liber, Das Deutschum in Westpolen (Preussisch-Polen): seine Zahl, seine Gliederung, sein Stärkeverhältnis gegenüber Polen (ein statistischer Beitrag zum deutsch-politischem Problem) (1919); Karl Stephan, Der Toteskampf in der Ostmark (1914); Zygmunt Stojnaki, Die deutsche Minderheit in Polen (1928).

(註八) 參考 A. Pokrandt, 著 "Aus den Anfängen der Erforschung des Deutschums im Auslande" (或 Der Auslandsdeutsche [Stuttgart, 1927], 第十三號)

(註九)關於各組織的材料主要係從各大組織的紀錄或與牠們的職員會談得來。

(註一〇)參看 Paul Rühlmann 的 *Schulrecht der deutschen Minderheiten in Europa* (1926) 年版全書共六百頁，中有趣味的彙集與分析。

(註一一)參看 Aufhäuser 著 "Katholikentage und Auslandsdeutschtum" (見 *Der Auslandsdeutsche* (一九二五年) 第十六號)；"Das katholische Auslandsdeutschtum" (見 *Spezielle Revue* (一九二三年) 第六八至七十一頁)；*Handbuch des Reichsverbands für die katholischen Auslandsdeutschen*；Georg Schreiber 著 *Auslandsdeutschtum und Katholizismus* (1928)；Theodor Grentrup 著 *Nationale Minderheiten und katholische Kirche* (1927)；Franz Rendtorff 著 "Das Auslandsdeutschtum" (見 *Die Evangelische Diaspora*, Beihette 第九號)。

第十五章 報紙無線電與電影

報紙

自從印刷發明以後，我們得到一種新的傳播意見的方法，使口頭上的語言的重要性逐漸減少。雖然口頭語言的重要到現在還不能忽視——實際上在無線電出世以後，口語的重要性又恢復不少——，印刷的文字已經成了現時傳達意見的主要工具。這不純粹是因為印刷事業的流行，而且還因為印刷出來的東西，證據特別確實。

(註一)

書籍、小冊、雜誌、傳單，固然在意見的傳播上往往極有價值，可是最重要的媒介，還要推報紙，因為報紙對讀者的影響是自動的有恆的，每天將各種消息灌入讀者的腦中，造成各種觀念；讀者很不易逃脫牠的影響。因此日報很早就被認為一種宣傳政治意見的重要媒介，一向是養成公民盡忠國家的一個大幫助。

報紙的設立與發達，和資產階級的發展一向有密切的關係。(註二)報紙在德意志的興起，原為推進資產階級的商業利益，原係仿效英法兩國較發達的資產階級的辦法。最老的德文報紙在一六〇九年間創辦，到現在還很流行，名字叫作梅恩與僑客晚報。(München Augsburger Abendzeitung) 發源於法國的商業情報，最初在漢堡行刊，在一六三七年間，該地已發現關於商務的「通告」與「廣告」同時在努連堡(Nuremberg)羅司

託克 (Rostock)、不倫瑞克 (Brunswick) 等地刊行的報紙，都模仿商業情報的形式。在德意志各邦的都城中，官辦報紙都很發達。(註三)

雖然資產階級在十七世紀後期的衰落牽連到他們的新聞事業，但到十八世紀間新聞事業又隨資產階級的復興而再起。這時候報紙更成爲代表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利益反抗貴族的工具。

普魯士王弗來得烈威廉一世已看到報紙在這一方面的功用，他一登位後便禁止發行一切報紙，因爲民衆是不應講理的。以後他雖然允許各報復版，可是施行嚴厲的檢查。(註四)大弗來得烈利用報紙來博得輿論對他的外交政策的同情。他自己在報上發表過好幾篇評論，同時又使人根據他的意見來寫成許多論文，還有許多論述最少可說是他指使而寫的。他也和前人一樣利用檢查的政策，除了禁止登載不合他意的材料以外，他還強迫各報登載對他有利的材料。(註五)

在拿破崙的戰爭中，拿破崙和他的敵人兩方面都知道報紙對左右輿論上的重要，兩邊都用各種方法來防止各報刊登對自己不利消息，或任意將新聞刪改。一八〇五年度蒙 (Marius Dumont) 創辦科倫報 (Kölnische Zeitung)，他是反對拿破崙的，可是他的報紙居然能安然渡過拿破崙的時期。另一個國家資產階級的代表是高勒斯 (Josef Görres)，他是萊茵水銀報 (Rheinische Merkur) 的創辦人。該報在拿破崙退出萊茵以後刊行，是竭力宣傳德意志的自由與統一觀念第一個的重要報紙，因此在一八一六年被普魯士政府禁止發行。(註六)

一八一五年以後所發生的普遍的政治反動，當然影響到新聞事業。對一切資產階級自由的觀念檢查極嚴，使各報紙設法避免登載政治新聞和政治言論，免被政府不斷的干涉。可是一八三〇年以後情勢改變，新開辦的報紙漸多。最重要的是在這種監視之下，各報紙還能夠逐漸表示正在興起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要求。在這種要求中，出版自由一項逐漸佔重要地位。從資產階級方面看來，貴族統治的含義，是對報紙的檢查與控制，資產階級統治的含義是出版自由。這項鬭爭在德意志西南部——尤其是西部——最烈，因為在這些地方資產階級的地位比別處稍為強固。這時期中有許多通訊社，先後成立。

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當中，報紙對於提倡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所要促成的民治和全國統一，曾有很大的貢獻。轉眼間整百的新報紙先後出現，其中有些只能支持數星期。革命失敗以後，反動派得勢，為出版自由而奮鬥，又變成資產階級為民治與統一的普通鬭爭的口號。這種現象，在普法戰爭的前十年間特別顯著。（註七）

德意志統一以後，資產階級跟着贊成新帝國，報紙遂變成傳播忠國忠君觀念的有力因素。從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當中，報紙的數目大增（在一八六五年有二、五〇〇種，到一九一二年增至三、五三四種）（註八）可是報紙數目的增加，還比不上人口的增加那樣快，因為在一八八五年間，每一四、七三一一人有一種報紙，在一九一四年間每一五、三八一人有一種報紙。（註九）但普通報紙銷數的增加，足以補足上述報紙種類和人口比例上的差數。普通報紙的銷路各種平均在一八八五年是三、〇六九份，到一九一四年增至四、二二一份。（註一〇）

歐戰前整個德國的新聞事業幾乎完全是發揚忠國心的媒介，因為新聞界差不多整個在宣揚國家的和公

民的忠誠的勢力掌握中。我們在表一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註二) 表中最顯著的事實，就是各報紙中大約有一半被列入不屬任何黨派一類。這可不是說這些報紙不是灌輸愛國觀念的可靠媒介，牠們大多數屬於在德國稱作通告報 (Generalanzeigerpresse) 一類，其中包括純粹為營業性質，竭力適應各種政治和經濟團體，藉以推廣銷路的報紙。(註二) 這樣牠們不得不對政黨方面保持中立的態度。可是牠們所謂「中立」大致多偏向於右派的政黨，因為牠們常對政府的敵人 (社會民主黨，有時甚至連資產階級中的過激份子也在內) 取仇視態度。這些報紙，幾乎全是現有體制的熱心擁護人，在將國家主義與君主制度打成一片的工作中，牠們的地位很重要。

表一

年 份	保 守 黨		自 由 黨		天 主 教		社 會 黨		無 黨 派	
	報紙數	%	報紙數	%	報紙數	%	報紙數	%	報紙數	%
一八九八	八〇七	二二·一	五五〇	一九·五	三一八	九·五	五四	一·六	一、五〇二	四五·〇
一九〇七	七七一	二四·六	五九〇	一八·九	四一〇	一三·一	六五	二·一	一、二九二	四一·三
一九一三	九一〇	二二·六	五八四	一四·四	四七六	一四·六	八七	二·二	一、九八八	四九·二
一九一七	四八九	一六·八	四九三	一六·九	四〇〇	一三·二	七七	二·七	一、四五〇	四九·八
一九二五	七一九	二四·二	一二六	五·六	三八〇	一二·四	一四二	四·五	一、六三五	五一·〇

除了利用報紙當中對自己有利的材料外，政府還禁止刊登和自己作對的材料。在大戰以前常受取締的是

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在這裏我們可不必列舉不可勝數的社會民主黨報紙被指爲犯上或謀叛的事件。社會黨的報紙有時甚至因登載關於議會和法庭的紀錄而受處分，因爲這些新聞，被認爲「在編輯的正當範圍以外」。在事實上社會民主黨的報紙想出一個對付這種苛待的防衛方法，每種報紙有一個「牢獄編輯」對報上登載的一切負法律責任，他的時間中一大部份是在牢獄中代表編輯部受刑事的處分。

除了消極的監視控制以外，政府還設各種積極的辦法利用報紙來推進自己的利益。卑斯麥和大弗來得烈一樣看到報紙的意義，（註一三）從他贊助十字報（Kreuzzeitung）的時候起，一直到他反對新德皇政策的時，他都在利用報紙。他利用報紙的功效，可以從愛姆士電報（Ems Telegram）布虛（Moritz Busch）的日記，以及許多零碎的例中看出來。當一八八六年德俄關係因爲德國對布加利亞的亞力山大王子表同情而趨於緊張時，卑斯麥用了整夜工夫以最緊急的方法通電全國報紙，在二十四小時以內竟能將輿論轉變過來。這件事爲曾經參與這次工作的華爾滋氏（Walz）所證實。（註一四）這種政策爲後繼人所奉行，已成了一種定規。

政府和通訊社以及國外官方或半官方的報紙保持密切的接觸，大有助於政府對輿論的影響。官報是帝國政府或各邦政府刊行的報紙，內載一切政府的佈告。普魯士各區的公報，也可以算是官報，因爲一切地方政府的命令和佈告，都在這些報上登載，爲各地方當局所必讀。此外還有半官式的報紙。這些報紙是私人的經營，可是和政府不斷有接觸，按時得到官方關於當前問題的觀點和事實；牠們自己的政治觀念，也隨官方的意見而定。這種報紙色彩的輕重又各有不同。北德通報（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的新聞欄，總是由內閣指定，對

一切政治問題，永遠擁護政府的立場。

政府又利用通訊社來向全國各報紙傳播自己的觀點。在革命以前普魯士內政部內設一王家宣傳局，每日爲各報刊行一種官方通訊，叫作柏林通訊（*Berliner Korrespondenz*），隨時發送。內容主要的是官方新聞，政府文件，關於議會中議案和政府政治方針的評論，間或有與反對派報紙的爭辯。

德國的外交部內，也和內政部一樣設有情報司，情報司長同時兼充爲帝國國務總理專掌新聞事宜的人員。大戰前的十年間這司的地位很重要，爲供給總理一切關於新聞界消息的來源。有價值的新聞只給擁護內閣的報紙。

政府自己雖然沒有新聞機關，卻和鳩爾夫電報社（*Wolf's Telegraph Bureau*）有密切聯絡。政府免費供給該社各種重要報告與電訊，又給該社所發電報一種優先權，同時該社必須將一切政府發出來的消息，向各方訂戶分送。我們只要記起一切外交消息差不多全由該社專利，就可想見他們對傳播有利政府的消息的重要了。

在無產階級爭取政治與經濟權力的奮鬥中，報紙的功用一向很大，其情形正相同於當年資產階級求解放的奮鬥中報紙是一種重要的工具。（註二五）戰前社會民主黨報紙的發展，是與形同專利的非社會主義報紙一場苦鬪得來的結果，因此發展的歷程很慢。每次增加了一個訂閱者，在社會黨的進程中都算是一種重要進展，因爲訂閱社會黨的報紙，就是脫離舊有傳統的思想，反對現有政制走入新境界的表示。此外，訂閱社會黨的機關報，

無異於公開宣佈自己對社會主義的信仰，結果一定遭富於國家觀念的人所反對。加以社會黨的報紙，大多數只根據黨員的觀點說話，在一般人看來不易感到多大興趣；就是社會黨黨員的家庭中，有時也喜歡訂閱非社會黨的報紙，因為可以多看看點普通的材料。最後，商界中大多數不喜歡社會主義的理論，不在社會黨的報上登廣告。例如在一八九二年間前進報（Vorwärts）的印刷費用，只有百分之八從廣告中得來。可是到了一九一四年就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五。（註一六）因為這些原故，社會民主黨新聞事業的發展，不如在歷屆選舉中該黨所得票數的增加那樣快。一九一二年間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只佔全國報紙總數百分之二·二，而社會民主黨所得票數卻佔全數百分之三四·八。（註一七）這表示那時的經濟和社會勢力，足以抵消一大部份國家主義派報紙的宣傳。播送社會黨宣傳的最有效方法是刊行小冊，散發傳單、集會、遊行、和與工廠中工人舉行口頭討論。

在大戰爆發時，全國的新聞界——從社會黨的到保守黨的——都一致站在捍衛國家的戰線上。（註一八）政府和各方面愛國的勢力，利用報紙來維持全國的精神比利用任何媒介都較多。政府設各種方法來加強對報紙的統制。新聞的來源，專由最高軍事當局和他們在各區軍事機關附設的新聞部供給。一切新聞的發出，集中在馬克最高司令機關的檢查處和官方戰事新聞局的手中。戰事新聞局係供給各方普通戰事消息的機關，由參謀總部直轄。此外，還有專為帝國外交部內政部和海軍部用的新聞機關；普魯士、巴維利亞、薩克遜尼、符騰堡（Württemberg）等邦的陸軍部，都沒有新聞機關。各佔領地的軍事當局，也設新聞股。

可是散佈政府方面宣傳的最重要中心，是我們剛纔說過的軍事新聞局。他們除供給各報館，各軍政當局，以

及各私人團體或個人各種小冊，傳單等刊物外，每三星期還出一次德意志戰事新聞，專為供給各報紙消息之用。他們還發行一種德意志戰事週刊，性質較普通，適宜於個人演講或文字宣傳之用。（註一九）在大戰將終止時，奧登堡和魯頓道夫都愈來愈注意到戰事新聞局，想要利用該局來喚起逐漸消沉下去的愛國精神。該局的活動曾經大加擴充，一時被目為政府在人心漸漸厭戰的情態中，重新喚起民衆不可少的利器。

為與國內報紙發生比較密切的接觸起見，政府從一九一四年八月起按時召集新聞會議。在這項會議中，政府派代表出席，向各報代表報告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狀況。這種辦法收效很大，直到戰後期內還沿用。

除了積極的影響新聞界的各種辦法以外，消極的新聞檢查，對於在國內擯絕一切不利的消息，效用也很大。這種工作集中在戰事新聞局的檢查科手中，可是實際施行檢查的是各地方的軍政當局。國外來的新聞和外國報紙，只有戰事新聞局能收到，由該局再將各種消息融會起來，變成一種愛國的形式以後纔轉送到各報館。統制的嚴密，甚至連掌管政府和新聞界間消息的互通的官員（漢門博士（Dr. Otto Hammann，當時的外交部情報司司長））也被瞞到事後好幾個月還不知道馬爾恩（Marne）戰役的結果。這樣繼續下去，各種規則和指導愈來愈複雜，有時竟至自相矛盾。最後，戰事新聞局中的檢查總機關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刊行一本關於檢查新聞的手冊，分送給各報館。這小冊上標明是「密件」，內容是向各報編輯說明什麼可以登載，什麼不能登載，還有如何「改正」或「補充」不利消息的方法。（註二〇）

對反對政府的報紙，另有一種壓制的方式。因為紙料缺乏，假如報館置政府的警告於不顧而繼續反對政府

或主張和議的政策，政府就要斷絕牠們紙張的來源。此外，編輯若批評政府的措施過於苛刻，便有被逼參加兵役的危險。

這樣全國對於實際上的情形，都陷入一種愚昧的狀態。事實上檢查制度的效力，使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日海軍在基爾 (Kiel) 地方變叛後好幾天，各報還不敢登載隻字。軍隊中各單位刊行的軍報，也有相當的重要性，尤其在大戰的後期。(註二)

德意志帝國在一九一八年崩潰了以後，新成立的社會黨政府除了本黨的報紙以外，得不着報界的援助。(註三) 新聞界中大多數在大商業或農業家的手裏，對臨時的社會黨政府，取公開的或間接的仇視政策。社會黨設法利用舊日政府統制新聞的機關來推行宣傳，同時又設立半官式的議會政治新聞 (Parlamentarisch-Politische Nachrichten) 來作施行新政體的宣傳機關。直到社會民主黨要求召開全國大會時，政府纔算得到民主黨和天主教中心黨報紙的直接援助。可是國家主義派的報紙對於新政體的反對是有界限的，因為他們只反對新政體中違反保守的觀念與政策，直到在政府取締勞工革命運動時得到國家主義派報紙竭誠的援助，這事實就很明顯。取締勞工革命運動，使新政府博得不少國家主義份子的擁護，用其他方法，無論如何都不會發生這樣大的效力；同時也使新政府較前更右傾。這樣看來，新政府一旦與共產黨爭鬥起來，華能得全國新聞界的擁護。最明顯的事實，就是中央新聞社 (Reichszentrale für Heimatdienst) 的成立。這種組織的本旨，原係替新政體施行宣傳，可是活動的中心，卻是反對布爾薩維主義的爭鬥。這種辦法，當然為右派報紙所贊同。

同時新政府又設法利用舊日遺留下來的行政機關中附設的官方宣傳中心。戰事新聞局和所屬的各檢查新聞部份都已經撤廢，但舊日帝國政府的新聞司仍然存在，變成獨立的機關。目標仍舊是影響新聞界，使他們贊助現有政府。因為戰後政局的容易發生變動，和新聞界地位的日常重要，每次內閣更換，新聞司的人選總要跟着變更。政府和報界的接觸，還是靠戰事開始時創辦的每週或每兩週召開一次的新聞會議。政府以往和鳩爾夫電報社的關係，始終保持不變。

政府雖然裁撤了戰事新聞檢查部，取締共產黨和獨立社會黨的革命機關報的政策，始終沒有改變，一直沿用至今。所有共產黨的報紙，都曾因攻擊政府過於劇烈而受暫時禁刊的處分。對待極右派宣傳推翻共和政體的報紙，也用同樣的政策，雖然這種事件，實際上已經比較不多見。

一九一八年以前由政府直接管有的報紙，共和政府照舊維持。編輯事宜，仍由舊有人員襄理。不過這類公報造成輿論的效力不大。德意志國家與普魯士邦政府公報 (Deutsche Reichs- und Preussische Staatsanzeiger) 是政府的日報，同時又包括不關係政府的一欄，但內容無非是確實材料的一種客觀的報告。各邦的公報中有幾種性質與普通報紙相似；例如薩克遜尼的杜里斯頓報 (Dresdner Journal) ；隈爾延堡的隈爾延堡公報 (Württemberg Staatsanzeiger) ；以及卡爾斯魯厄時報 (Karlsruher Zeitung) ；威馬爾時報 (Weimarer Zeitung) ；安哈爾特時報 (Anhaltische Zeitung) 等。地方的公報本來不算什麼報紙，可是巴登 (Baden) 創辦了一種半報紙的「公佈」，適應政府取得新聞界贊助的要求。刊登官方消息的各區公報，仍舊刊行。雖然這類刊物，

擁護右派政黨的成份多，擁護中立派政黨的成份少，共和政府還給牠們津貼。此外，還有組成政府的各政黨的所屬報紙，依然和戰前一樣自成一體，自成一體的新聞紙。因為一九一八年以來政府中的政治份子屢經改變，半官式報界中的成份也隨着更換。在帶有政治意味的報紙中，國社黨或法西斯黨的領袖是在慕尼克（法西斯黨的大本營）出版的民衆評論報（Völkische Beobachter）。在柏林出版的德意志報（Deutsche Zeitung）和法西斯運動也有密切關係。

德意志日報（Deutsche Tageszeitung）是農業協會的中心機關報；十字報（Kreuzzeitung）繼續保守黨的貴族風氣，這兩種報紙與國家主義黨都有密切的聯絡。國家主義黨和民黨在柏林都受地方情報（Lokal Anzeiger）、日報（Tag）、德意志通報（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代表大商業的報紙）和日日評論報（Tägliche Rundschau）各報的贊助。以科尼時報（Kölnische Zeitung）與巴特時報（Badische Presse）贊助這兩黨最力。德國中部和東部小城鎮中各報更不用說了。巴維利亞民黨照舊和右派合作，他們的黨報巴邦郵報（Bayrischer Kurier）是巴邦中部和南部各小城鎮和鄉間報界勢力的先導。在各種評論中，當推德意志評論（Deutsche Stimmen）為首。

德國各重要報紙中所表示的民治趨勢，往往言過其實，但在較小的報紙中，很少帶有民治主義的色彩。在新聞和聲譽方面，當推法蘭克福時報（Frankfurter Zeitung）、莫西希時報（Vossische Zeitung）和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等報為首。閱讀民治派評論的，多數是左派或中立派份子。在這類評論中，有民治（Der

Demokrat) 德國民治 (Das Demokratische Deutschland) 助力 (Die Hilfe) 新德國 (Das Neue Deutschland)

在第一派大報紙當中，代表天主教中心黨的很少。雖然在該黨支配下的宗教報紙地位也很重要。柏林的耳曼尼亞 (Germania) 和科倫的科尼民報 (Kölnische Volkszeitung) 都是很著名的日報。定期出版物中有中心 (Das Zentrum) 公路 (Hochland) 以及歷史政治日報 (Historisch-Politische Blätter)。

社會黨的報紙，是該黨有力的附屬品。在社會黨報紙當中，有前進報 (Vorwärts) 輿論報 (Chemnitzer Volksstimme) 和大約有一百三十種較小的報紙。評論中有新時代 (Neue Zeit) 鐘 (Glocke) 社會主義的世界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都是極好的刊物。各工會的報紙多受社會黨的支配，正和各大天主教會報紙都受中心黨支配一樣。

共產黨有報紙約四十種，其中以在柏林的紅旗 (Rote Fahne) 為最重要。夜間世界 (Welt am Abend) 是共產黨非正式的單張晚報，在柏林各晚報中，銷路算牠最大。該黨正式的言論機關名叫國際 (Die Internationale)。

號稱不帶政治色彩的各報紙，大多數和戰前一樣含有明顯的愛國情感。報界中一大部份受少數商業界所操縱，被他們用來作政治的宣傳。在這種報紙中最佔勢力的商業團體是許根堡 (Hugenberg) 的商店，他們支配所謂中立派報紙中的一大部份，將這些報紙造成一個發揚國家和類似法西斯的觀念的得力工具。許氏的目標，

是要用報紙的勢力來築成一道穩固的右派陣線，在大地主和大實業家領導之下，替右派政黨建樹一個無敵的政治勢力。

許氏在柏林報界中的勢力，全靠余爾 (August Scherl) 出版公司。(註三) 該公司刊行的最重要日報是 Berliner Lokalanzeiger，每日銷數在二十五萬以上。許氏在各省報界中的勢力靠維拉 (Vera) 出版公司，該公司有維普羅 (Wipro) 各省報界商業顧問部 (Wirtschaftsberatung der Provinzpresse) 的組織。該組織發行兩種主要的通訊，一種專為不帶黨派色彩的報紙，一種專為右派的報紙。這樣在各省的報紙中，有一大半為許氏所操縱。

影響國內報紙的另一種方法是把持電報聯合會。一九二四年間電報聯合會，得到政府的特別待遇，與塢爾 夫電報社享有同樣權利。

許氏影響新聞界的另一方式是從阿拉 (Ala) 廣告公司著手。這公司在大戰爆發以前由許氏設立，目標是要將德國商業的廣告，只刊登在國內外評論政策對商業本身有利的報紙。

摩士 (Rudolf Mose) 和烏斯坦兄弟 (Ullstein Brothers) (註四) 是擁護現有政體而性質比較進步的兩種新聞事業。可是他們的勢力，比較許氏小。尤其是在各省中。

據最近研究的結果，德國的報紙平均每種每天出一〇・二頁，最多的頁數為一四・〇頁，最少的只有二・二頁。(註五) 可見德國的報紙規模不如美國的那樣大，紙張大小只有美國的一半，字體有的較大。因此，德國人

看報時也看得比較仔細，每段材料對讀者的影響也比較深切。報章內容的組織，使讀者要遍看各部份，不至於專注重某一欄。此外，德國報紙並不像他國的那樣注重駭人聽聞的資料，因為牠們多是定戶訂閱，街上零買者較少。直接的為國家宣傳，新聞欄當然是最重要的部份。自大戰以來帶有國家思想的報紙，都自動的採取不登或少登不利於德國消息的政策。德國各報中，很少登載德國在國外的宣傳。在擁護政府的報紙中，絕少登載政府應負責的貪污和腐敗的事件。若是事情擴大到人所共知，不能掩飾時，他們還可以設法將各種互相矛盾的紀載，盡量刊登，使讀者見而生厭，不想再看為止。用這種方法的實例，有來比樂克的被判，拉德婁的審判，希特勒的發動，巴爾馬（Barnat）的審訊等，巴爾馬和同謀者的審訊也照樣的延長許久，證人召集的很多，文件達八百種以上，等到法庭將被告判罪時，一般人對報上的登載已經不很注意了。

除了普通的新聞欄以外，德國報紙常有名人寫作的各種重要論文（如大學教授，國會議員，各邦議會議員，官吏，軍官，大商人等作品。）這類文章對政治問題加以詳細討論，所適應的需要與美國各種雜誌相同。這也是德國雜誌不多的原因。這一欄有兩種方法影響讀者：一種是間接的方法，從材料的表現中引起國家的觀點；一種是分心的方法，材料純粹係娛樂的性質，分去讀者對目前重要問題的注意。

報紙中本來與政治沒有關係的部份，也被用來發揚公民的和國家的忠誠。這包括短篇小說，長篇小說，雜錄，體育新聞，無線電廣播和電影消息，婦女欄，少年欄等都可以吸引未必對本報的政治態度表同情的新讀者。這樣可以慢慢的使讀者改變觀念而感覺不到改變的歷程和所用的方法。

分析完報紙用來傳播愛國心的方法和手段以後，我們要糾正一般人視報紙爲造成輿論上極佔重要的一種觀念。在一九一二年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所得票數佔全數百分之三十四·八，而該黨所有報紙只佔全國報紙總數百分之二·二，在一九三〇年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得全票數的百分之二十四，而他們的報紙數只佔全國總數百分之五。共產黨所得票數佔全數百分之十三，而他們的報紙數只佔全國報紙總數百分之一。這種數字似乎表示大多數報紙中關於國家和國家主義的宣傳，影響於大部份勞工階級的政治觀點，很爲有限。

無線電

無線電在德國與報紙和電影同是發揚公民的和國家的忠誠之重要媒介。(註二六) 因爲收音機的價錢比較貴，政府每月又要徵收五角錢的捐稅，無線電在德國並不像在美國那樣通行。可是無線電也和德國其他方面的文化生活一樣，要受政府的指導。無線電剛流行了不久，聯邦當局就將無線電播送作爲政府的專利。一切廣播的事宜，由一個獨立的混合公司——聯邦無線電公司——負責。這公司的股本，有一半以上(51%)在聯邦郵政部的手中。此外還有九種輔助的組織，每種各設立幾個副電台，聯邦無線電公司也照樣的以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本操縱這些電台。除了這些網佈的電台以外，在離柏林不遠的科尼烏厚生(Königswusterhausen)地方，還有一個名叫「德國電波」的，可以遍播全國，由政府直接管理。

爲防止無線電用來作反政府的宣傳起見，在各廣播電台內設有政治管理委員會。委員中有一個是聯邦政府指派的，其餘由所在邦政府指派。各電台在播送政治新聞以前，必須先得該管委員會的許可。這些委員會的一

切政策，完全依照聯邦政府規定的各種「指導。」因為委員會的人選隨着各邦政府在政治上的構成而異，所以對這項「指導」的解釋又各不同，不過無論如何，總不能播送對政府的抨擊或批評，那是很明顯的。

將播送的節目詳加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一大部份是音樂。關於各種有教育價值的問題的講演也很重要。在音樂的範圍內有軍隊進行曲，愛國歌曲，民歌等，在科尼烏厚生（Königswusterhausen）的電台每日在播送完畢時，還演奏「德意志在一切之上。」此外，關於藝術，文學，甚至科學的演講，都常帶有國家的色彩。他們並不侮弄別國的成績，只是將別國的成績放在一邊不提，專替德國的成績作過分的鼓吹。每次德國的軍艦或航行大西洋的商船下水，當德國飛機畢內門號完成飛去美國時，或是當「徐伯林」飛艇首次飛渡美國時，全國佈滿了關於這種功績的宣傳，使人人都知道德國的科學，德國的工程，以及德國人一般的精神是如何的優異。這種對德國的成績過分宣傳的方法，當然也在無線電播送的節目反映出來。還有特別為兒童的廣播時間，告訴兒童鷹是德國的國鳥，狐是德國的國獸，榆是德國的國樹。

在德國的無線電播送節目中，我們還可以注意到沒有政治的討論。播送國會中會議的提案，好幾次被否決。政黨的大會不許在無線電中播送，各政黨代表在競選時的演說，也在擯絕之列。換句話說，就是一切和國內政治上的交惡有關的材料都不許在無線電中放送。可是屬於愛國性質的政治事件，如國務總理的講演，總統和其他政府大員的講演等是要播送的。同時又設法將播送的節目中一大部份用在「娛樂」和各種帶有教育性的問題上，藉以分去聽衆對政治上紛爭的興趣。他們希望將社會上各種紛擾的勢力遮掩着，給大衆各項娛樂的節目，

就可以激發一種共同的國家心裏。這是重要的方法藉以斷定無線電在減少國內紛爭上的價值。

無線電的本身有加強和減弱愛國心的能力。一方面無線電波不知有政治上的界線，因此是打破這種界線的一種工具。一個人若是得了一副良好的收音機，免不了要聽到英、法、瑞士、奧大利、意大利、捷克、波蘭、瑞典、蘇俄等鄰國各大電台的廣播。但在另一方面，因為語言上的差別，他只能略到一些音樂的節目。從他聽不懂的各國語言上的差別，他也許反為想到自己語言團體的較小的範圍；縱然不增加他對本國的自愛心，也足加強他對本國語言的意識。最重要的，就是無線電的播送，對社會上各階級的節目是一樣的，這在像德國那樣的一個國家中，意義尤其重大，因為這可以不顧一切階級、宗教、和地方的觀念上的差異，使全國的思想內容標準化。這種趨勢能否成功，要看聽衆的心理而定。因為計劃和演奏無線電節目的人，多數從中上階級出身，內容當然要反映著這種階級的國家和社會心理。因此無線電的勢力，也在這種人當中算最大，最牢不可破。無線電在農民當中的影響也不小，雖然在農村中收音機的數目有限。此外，我們先前已經注意過，農民並不如城市裏的中等階級那樣富於「國家意識。」

在另一方面看，引起勞工階級中的激烈份子對無線電的反感的，也就是這一類的節目，因為無線電沒有充份的顧到勞工階級的觀點和利益，社會黨在無線電廣播中曾得到相當的權利，但共產黨還未能用無線電來發表他們對勞工或其他問題的意見。

我們還要知道在民衆中的國家主義份子看來，無線電還是太過於中立，性質太近乎共和。這些份子主張無

線電應更多的用來宣揚德意志愛國理想，應更大的作為國家主義的政治宣傳機關。

電影

在德國，電影也變成培養國家意識的重要媒介。(註二七) 電影與無線電不同，不是政府的專利；政府將一切關於影片的製造和分配的工作，留給私人資本去經營。因此操縱電影事業的勢力，也和操縱報紙事業的勢力一樣，利用電影為工具來傳播他們對政府對國家主義的態度。德國最大的製造和發行影片的公司是烏發(Ufa)。這對公民訓練的問題，意義也很大，因為烏發是在許根堡的掌握中；許氏除了操縱國家主義的報紙事業之外，還是德國實業界的一個領袖，同時又是國家主義黨的首領，很明顯的傾向於法西斯主義。烏發公司在歐戰的末期成立，成立的原因是實業界接受政府的建議和軍事當局的命令，要糾正中歐各國中逐漸增加的厭戰心理。

革命以後烏發公司仍然在舊日股東的手中，變成新政府的一種不歡迎的障礙物，因為牠是公開和新政府作對的。在財政上有德意志銀行作後盾，烏發的當事人不放棄他們的國家主義和反動的目標。最初僅從間接方面表現出來。所製影片如Anne Boleyn、Madame Dubarry、Henry VIII，將協約國的歷史，用一種不友善的眼光表演出來。跟着又製出各種公開的帶有國家主義情感的影片如Fredericus Rex (Nibelungen) 等，同時獲利還不少。一九二二年烏發轉入許根堡氏的手中，從此遂被用來推進許氏的國家主義的目標。同時許氏還獲得操縱其他影片公司——如飛拔士(Phoebus)、杜力(Deulig)等——的機會。烏發公司又開設許多電影院來映演本公司和其他公司的產品，藉以擴充勢力。有人曾經指說烏發公司開設的戲院，不准映演和舊政

體開玩笑的影片。(註二八)

可是電影能夠被用來作直接的國家宣傳，推進和增強國家意識的程度，很為有限，因為在德國映演的影片中，有一大部份是舶來的——尤其是從美國輸入的。一九二三年間映演的正片中，約有百分之六十是舶來品。政府設各種方法使舶來影片的百分比減少，到了一九三〇年新片中外國製造的僅佔百分之四十。在經檢査局通過的二百六十四部影片中（一百三十七部是有聲的，一百二十七部是無聲的）有一百六十二部（有聲的九十三，無聲的六十九）是德國產品，六十部（有聲的二十五，無聲的三十五）是美國產品，四十二部（有聲的十九，無聲的二十三）是其他各國的產品。(註二九)

除了外國影片之外，還有一部份『中立』的德國影片，片裏不帶國家的傾向。有一半以上的影片可以歸入『分心的』宣傳的範圍內。這類影片的地位也很重要，因為牠們能分去民衆對戰後困苦的通知。

可是其餘的影片，都竭力作國家的宣傳。替共和直接宣傳的影片可以說沒有，但頌揚君主和軍國主義時代的好日子的影片卻很多。頌揚的方法有直接的與間接的兩種。用直接方法的影片有『世界大戰』、『我們的恩姆登』、『被沉的艦隊』、『潛水艇第九號』、『海軍軍官』、『赤色的 Ace』（表現著名軍事航空家李鶴生 (Manfred von Richthofen) 的生平和殉難經過）等。性質和上述差不多的，有『Fredericus Rex』和『Der Alte Fritz』兩部都是表演大弗來得烈生平影片；『卑斯麥』、『滑鐵鎚』、『潑斯登 (Potsdam)』、『一所王宮的命運』、『路易斯王后』一片的廣告是『一張愛國而不帶政治上傾向的影片，每個德國人必看的德國影片。』

第二類影片是專對舊日政體無成見或稍帶仇視態度的觀衆而製造的。這類影片設法用富於情感的和幽默的題目來傳播國家主義的觀念。例如在「軍士的生活是愉快的」一片中，用幽默而贊許的眼光來描寫舊日軍民的生活。午報（12 Uhr Mittag）報對於「Kuzmarek」一部軍事笑片，曾有以下的評語：「大衆做什麼？大衆說：『當軍人是何等的有趣啊！』軍官不但和女僕發生戀愛，還和她們結婚；軍官和僕人像好朋友一樣過活，一起喝酒等。還有其他不可能的情形，一切無非要表示以前的生活並不壞，實際上以前許多人過的日子，比現在還要好得多。

此外，我們不要忘卻新聞影片。差不多每套新聞影片都含有激發觀衆國家精神的資料。一隻德國軍艦或商船的下水禮，一個國家主義團體的遊行，各種愛國慶典的拍照，每種都可以喚起觀衆的國家精神，與登堡的像片佔很重要的地位，在最近幾年間幾乎沒有一部新聞片沒有與登堡的像片，無論是正在替一座重要的建築主持奠基禮，或是參加一個兒童俱樂部的慶典。

與這類影片在勞工階級當中培養國家主義的效力相抗衡的，有俄國的影片。一九二五年以後這類影片的數目逐漸增加，而且多數帶有革命的色彩。這類影片中流行最廣的是『Potemkin』（註三〇）同類的有震動全世界的十天，聖彼德堡的末日，可怖的愛文，他的警告，中國快車，亞洲風雲等。俄國的滑稽片，看來也很成功。有些帶有過激傾向的德國片如生命之歌，郝特曼（Haupmann's）的『織工』和『Schinderhannes』（描寫萊茵流域的農民反抗拿破崙的聯軍和德意志的官吏狀況）結果都很成功。

政府的工作，限於統制一切的影片，藉以淘汰「可以危害政體的安全」的影片。在大戰中當然要設立檢查電影的機關，可是革命以後便將這項機關裁撤。反動的勢力發展，使政府認為有恢復對反政府和有傷風化的影片的檢查之必要。一九二〇年政府設立電影檢查局，有權檢查一切在德國映演的影片。現時有兩個檢查委員會，一個在柏林，一個在慕尼克。如對方認委員會的判決為不滿，可向一個高級委員會上訴，該會的判決，即為最後的決定。政府訂立各項檢查的規程。假如一部影片經檢查後被認為「傷害德國名譽或危害德國和友邦政府的交誼」便不許映演。若是一部影片能夠引起犯罪的行為，危害法律秩序，或是嘲笑宗教與教會，或是會產生一種粗鄙的不道德的影響，都在被禁之列。

一部或全部被禁的影片，禁止的理由多數屬道德的範圍；只有一小部份因為在政治上反對現有政府而被禁。〔註三二〕就大體上說，檢查委員會——尤其是在慕尼克的那一個——對國家主義的影片多能通融；只有太明顯的反對現有政府的纔被干涉。禁演這項國家主義影片的主要原因，是怕開罪友邦政府。例如「在十字架下」被認為容易開罪波蘭；「雷爾的恥辱」和「雷爾鐵路工人的典押」兩部影片，被認為太過於反法；在雷爾地域被佔期內，不宜映演。較近的一次事件在一九二八年發生，一個映演鋼盔團（一個國家主義的軍事組織）遊行的影片因以下原因而被禁：「舊日軍官參加檢閱時鵝步式的遊行；遊行的本身；鋼盔團所用的舊政體的旗號；野鷄的應用；舊日的制服等」。「鋼盔團雖然沒有武器，但遇緊急事故發生，隨時可以變成會受軍事訓練的武裝團體」的印象，一定要設法避免。

自從俄國革命的影片輸入以後，檢查的注意點漸漸移到這類影片上，被認為「危害國內和平」的部份多被裁去。『Potemkin』一片先則被裁，繼則全部被禁，經過許多的努力，纔能按照原來版本映演。有些帶過激甚或非戰傾向的德國影片，也被裁去一部或全部禁演。最顯著的例，就是檢查當局對於『西線無戰事』一片的判決。電影助長社會上各階級的公民意識的程度，很不易肯定。公開的國家主義或反動的影片，在增強中上級社會或無產階級中的一部份原有的國家情感上頗有價值。在過激的勞工階級當中，這類影片是要受抵制，或被嘲罵的，抵制或嘲罵的強度要隨着政治情形的緊張程度而異。在這裏我們還要知道，因為電影院收價較高，普通的工人和眷屬不能像美國的工人一樣常看電影。可是他們對看過的電影，情緒上的反應或許比較強烈。

鄉間的民衆在情感上雖然帶有國家的色彩，他們在反應上卻不很敏銳。他們的政治態度，不如城市中人那樣明確。當他們看電影時，他們願意接受任何足以減少鄉村生活單調的東西。可是因為從事於影響鄉村民衆的宣傳不多，鄉間的民衆看完了一部國家主義的影片以後所受的影響是否要比城市中人看完了十二部所得的印象還要深刻，那是一個疑問。俄國的影片，很少在鄉間映演。

所謂「中立」的影片，和其他不帶政治意味的娛樂一樣，在德國可以，而且曾經，被用作減輕社會上紛擾勢力的工具。這種「分心的」宣傳，是不可輕視的，尤其是在政治已經到了危急關頭的時候。在這種狀態之下，愛國片只足以激起民衆中過激部份的惡感。可是中立的影片最低限度可以減輕目前狀況所引起的苦惱，使當時的心境不至過於緊張。

(註一)參看 Julius Goldstein 著“Die Presse”(或 Zeitschrif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forschung, II 一九二四年,第三六七頁。)

(註二)關於德國新聞事業的歷史與特性的參考書有: Ludwig Salomon 著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Zeitungswesens von den ersten Anfängen bis zur Wiederaufricht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第II卷 1906); F. Bruckmann, A. G. (亞賈) Die Zeitung, ihre Entwicklung von den ersten Anfängen bis heute 1609-1914 (1914); M. Wittwer 著 Das deutsche Zeitungswesen in seiner neueren Entwicklung (1914); Dr. Strahlmann 著 Geschichte der Presse Nordwestdeutschlands (1920-21); Alfred Oehlke 著 100 Jahre Breslauer Zeitung 1820-1920 (1920); Leonhard Müller 著 Geschichte der Breslauer Zeitungen (1907); Karl Jaeger 著 Von der Zeitungskunde zur publizistischen Wissenschaft (1926); Friedrich Mönckmeier 著 Die Rhein- und Moselzeitung (ein Beitrag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katholischen Presse und des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in den Rheinlanden) (1912); Karl Schottenloher 著 Flugblatt und Zeitung (ein Wegweiser durch das gedruckte Tagesschrifttum) (1922); Ludwig Salomon 著“Zeitungen”(或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卷八卷(1921年)) Robert Brunnhuber 著 Das deutsche Zeitungswesen (1908); Josef Kürschner 著 Handbuch der deutschen Presse; Karl Bücher 著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Zeitungskunde (1926); Karl Bücher 著 Die deutschen Zeitschriften und die Entstehung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Max Carr 著 Parlament und Presse (ein Beitrag zum Prinzip der parlamentarischen Öffentlichkeit)(1908); Albert Haas 著 Das moderne Zeitungswesen in Deutschland (1914); Herman Diez 著 Das Zeitungswesen (1910); Max Garr 著 Die wirtschaftlichen Grundlagen des festländischen Zeitungswesens (1911); Emil Dovifat 著 Die Zeitungen (1925); Wilhelm Schwedler 著 Das Nachrichten-

wesen (1925); Frankfurter Sozietätsdruckerei (註四) 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Zeitung, 1856-1908 (1906).

(註三) 參看 Hugo Buschmann 著 Die deutsche Lokalpresse (1922).

(註四) 參看 Herman Dietz (書名見前) 第二十五頁。

(註五) 參看 Franz Etzin 著 "Die Freiheit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unter der Regierung Friedrich des Grossen" (見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XXXIII 號 1 期 (1920))

(註六) 參看 Emil Dovifat (書名見前) 第十六頁至十八頁。

(註七) 參看 Otto Bandmann 著 Die deutsche Presse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Frage 1864-1866 (1910).

(註八) 關於報紙的數目和牠們銷流的份數的統計都不很可靠。結果各方面所獲得的材料很不一致。Bücher 說一九一四年間報紙的數目是四〇二二。這種差別在現時報紙的統計中還不能免。

(註九) 參看 Gerhard Muser, Statist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Zeitungen Deutschlands, 1865-1914 (1918) 第十七頁。

(註一〇) 同上第五八頁至六一頁。

(註一一) 參看 Alfons Nobel 著 Handbuch der Politik.

(註一二) 參看 Walter Hammer 著 Die Generalanzeigerpresse Preussens (1911).

(註一三) 參看 Eduard Schnitzler-Bismarcks Einfluss auf die deutsche Presse Juli 1870 (1910), 其中包括 "Tabelle zur Orientierung über die Verbreitung der Weisungen Bismarcks in den einzelnen Blättern."

(註一四) Paul Eitzbacher 著 Die Presse als Werkzeug der auswärtigen Politik, 第二二四至二三三頁。

(註一五) 參看 Ludwig Kantorowicz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resse Deutschlands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1922); Ernst Drahm 著 Zur Entwicklung und Geschichte des sozialistischen Buchhandels und der Arbeiterpresse (1913).

(註一六) 參看 Kantorowicz (參見前註) 卷六二頁。

(註一七) 同上卷三二頁。

(註一八) 關於大戰期間的狀態參看 W. Nicolai 著 Nachrichtendienst, Presse und Volksstimme im Weltkrieg (1920); Handbuch Deutscher Zeitungen (1917); Bearbeitet im Kriegspressamt von Rittmeister a. D. Oskar Michel, mit Nachtrag (1918); A. Meister 著 Die deutsche Presse im Kriege und später (1916); Karl Bücher 著 Unsere Sache und die Tagespresse (1915); Graeven 著 Praktische Erfahrungen im praktischen Unterricht (Vortrag) (Kriegspressamt, 1918); Georg Schweizer 著 Das Nachrichtenwesen im Kriege (1916); Friedrich Leiter 著 Die Zeitung im Kriege und nach dem Kriege (1915); Friedrich Berkman 著 Das amtliche Zeitungswesen im Verwaltungsgebiet Ober-Ost (1928); M. Gothlieb 著 Weltkrieg und Zeitungswesen (1922); H. Thurston 著 The German Press Propaganda (1917).

(註一九) 參看 Deutsche Wirtschaftspapaganda 卷十七頁至十八頁。

(註二〇) 此外可參看 Kurt Mühsam, Wie wir belogen wurden. 上述關於報紙檢查的手冊有一部分轉載於 Mühsam 的書中。這是很重要很有趣的文件。這種刊物足以證明政府對報紙散佈不利新聞的畏懼以及當局對全國心理的特別控制上無微不至。

(註二一) 這類報紙在反抗拿破崙的戰爭和普法戰爭中就已經有，但在規模和銷路上都不很重要。關於德國俘虜營中的報紙可參看 Die Zeitung im deutschen Gefangenen- und Interniertenlager (eine Bibliographie von Stefan Wargart

and Richard Heilmann) (1920).

(註二二)關於戰後的發展參看 Muenzer 著 *Öffentliche Meinung und Presse* (1928); Leo Lania 著 *Naketa, Die Fabrik von Nachrichten* (1927); Theodor Heuss 著 *“Die Presse”* (Tenbners Handbuch der Staats- und Wirtschaftskunde [1924]); Herman Fuchs 著 *Die Pressefreiheit der Gegenwart und die Entwicklung des Zeitungswesens seit Ausbruch der Revolution* (《青年革命時代雜誌》一號) Handbuch des Vereins Arbeiterpresse (1927).

(註二三)關於許根堡托拉司的材料大部份採自 Ludwig Bernhard 著的 *Der Hugenberg Konzern* (1928).

(註二四)參看 Ullstein (出版) *Fünfzig Jahre Ullstein* (1877-1927).

(註二五)參看 Hans Traub 著 *Zeitungsverlag* 第二十六號，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

(註二六)除了技術方面的書籍和著作之外，關於無線電在德國發達的經過的材料很少，*Reichsrundfunk Gesellschaft* 曾經發刊簡短的研究和報告多種，下列是曾經著者採用的 Bredow, *Vier Jahre deutscher Rundfunk*; Giesecke, *Entwicklung und Aufbau des deutschen Rundfunks* (1928); *Rundfunk und Landwirt* (1927); 下列雜誌也很有價值: *Funk*; *Der aktive Radiogenosse*; *Die Rundfunkwoche*; *Der Funk Bastler*.

(註二七)關於電影在發揚國家精神上的位置，還沒有系統的研究。左派報紙間中有簡短的，可是這完全對於個別影片的本章曾採用以下參考資料:

Alexander Jason: *Der Film in Ziffern und Zahlen, 1895-1925* (1925);

Fr. Lembke: *Das Kino im Dorfe*;

Wilhelm Münzenberg, *Erobert den Film* (1925);

Norbert Freiherr von Grünau: *Die finanzielle und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der Filmindustrie in*

Deutschland (1923);

Walther Pahl: Die psychologischen Wirkungen des Films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ihrer sozialpsychologischen Bedeutung (1926);

Zentralverband der Filmverleiher Deutschlands: Handbuch des Filmverleihs (1925);

Albert Hellwig: Die Grundsätze der Filmzensur und der Reklamezensur nach den Entscheidungen der Oberprüfstelle (1923);

Konrad Lange: Das Kino (1920);

F. Emmel: 'Filma und Volk' (eine Denkschrift an das Reichsministerium des Innern und der Filmindustrie) (in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CCVII (1927), 164-88);

Emilie zur Altenloh: Zur Soziologie des Kinos (Die Kinounternehmung und die sozialen Schichten ihrer Besucher) (1914);

The Film Daily Year Book.

(註二八)參看 Carl Bretz 著 "Fatum der Ufa" (見 Berliner Tageblatt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註二九)參看 Lichtbildbühne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註三〇)根據經理發行該影片公司的紀錄從一九二六年四月至一九二四年四月間曾經看過這部影片的人數約有五百萬。

(註三一)參看 Filmjahrbuch 中被禁影片一覽。

第十六章 國家的象徵主義 (Isidor Ginzburg 原著)

這章是要檢討象徵主義 (symbolism) 在德國公民的與國家的忠誠發展上所佔地位如何。一種帶解釋的介紹必先將象徵主義在社會上的地位加以估量，其次再看現時德國社會中的重要象徵是怎樣發生的。

我們這裏所謂象徵，無論是標語或是徽號，係指含蓄情緒，從情緒中影響社會生活的一切事物和語句。牠們可以算是一種意念發出來的模型。(註一) 能夠將情緒的反應集中起來，作為情緒反應的焦點。一種象徵可以引起強有力的情緒，建立對社會上各種事物宜否的心境，正如一個電門可以放出電流來做各種工作一樣。象徵主義在社會上的重要性，全憑心理上習慣養成的趨勢，因為心境係由各種經驗，根據外間社會環境的指示所組成。這種指示就是概念或通常稱為固定的行為 (stereotype)。從這些概念，固定行為中，發生各種習慣的反應。這些固定行為愈變愈為一般人所熟悉，一個字，一句話，一曲歌，或是一種物件，都足以引起固定行為的本身和相關連的情緒反應。假如個人的經驗或社會的訓練結果使一種概念或固定行為在被引起時帶有強烈的情緒色彩，心境更可得一簡捷的途徑；概念的本身已經不很重要，而引起這種概念的刺激，卻成為我們意義中的象徵。一個交替的反應於是完成。社會的態度，這樣可以化為主要的字句，語調，或物件，這就是我們所謂象徵；可是我們當然不能說定一個名辭——例如民治主義——到了什麼程度纔不僅是一種抽象或理想而變成一種口號或關鍵語。

(keyword) 因為象徵含有情緒的力量，這種情緒可以應用到與本象徵有關的一切事物上。贊許「愛國」的人，有對一切被認為愛國的都看作好的，一切不愛國的都看作不好的趨勢。象徵藉引起贊許或不贊許的反應把本身也變作贊許或不贊許的標記，可是這種標記不一定與任何事物的本質有關。實際上這種標記打開整個思想的局面，在這種思想的歷程中，每種步驟的關係不靠演譯式的論證，而靠湊巧的或故意的聯想或交替。這種心理活動非常重要，因為聯想容易養成，使這種歷程幾乎成爲不自覺的；要發現在強烈的情緒催逼之下養成的不合邏輯的聯想，非常困難。(註二)

變成社會或國家的象徵的事物與字句，也和其他象徵一樣，很容易脫離本身所賴以養成的環境而向着自己的路線發展——這種路線，大致傾向於跟着一種社會的歷程。各種計劃最初是理想和願望，以後變成名辭，口號，或希望中改變的象徵，各方面的影響不斷的侵入，直至激成一種鬭爭的狀況。這些表號變成了衝突的標誌以後，牠們便觸發起強烈的情緒，經過屢次的重演，直到象徵與情緒幾乎不能分開。假如鬭爭消滅下去，或僅得到無關重要的成功，象徵後邊的情緒勢力便漸漸減少，象徵的本身或許變成一種羞愧或失敗的標誌，爲一般人所放棄，或被另一個階級的人採用。例如「自由」的口號在一八四八年以後已經被德國資產階級放棄，但被勞工階級所採用；在勞工階級當中，「自由」一辭至今還含有一種重大的抱負。

一個主要階級的要求若得不到滿足，同時象徵還含有充份的力量，當局可以採取一種應變的方法，對這項要求作局部的讓步，這樣有時可以給關係的象徵一種不明確的或變相的意義。因為象徵原來在掙扎中產生，一

定要簡單，不能過詳，所以上述情形特別容易發生。用一種較和緩的條件來替代本來的要求，政府中的統治勢力可以抵消該象徵所引起情緒歸附的力量；或者拿住這種象徵，將原來反對政府的情緒用來擁護政府。代表新派的份子，因為失去了象徵，只能在消極方面來作小規模的破壞。社會民主黨竭力反對卑斯麥的社會保險辦法，爲的就是這個原因。

可是假如一種社會的衝突結果一旦成功，象徵便成了勝利或功業的標誌。沾了「公理」戰勝的榮光，充滿着情緒，道德，甚至神祕的價值，牠們得到了一種新的生命。這時牠們再也不是反政府的象徵，牠們從掙扎和成功中得來的情緒力量反被用來使下級社會歸依新建的社會和政治的制度。例如從資產階級爲要控制政府而掙扎中產生出來的象徵，現時大半要受在資產階級操縱下的政府的庇護。牠們的意義，已經脫離時代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鬭爭；被統治階級的心理，一定要設法支配制約。象徵與情緒間的聯結現在已經完成，不是從爲新的正義掙扎所受教訓得來的結果，而是從根據當時所謂正義的有系統的訓練得來的。

整個公民的與國家的宣傳技術，中心問題幾乎就是支配民衆心理到象徵資產階級的社會和政府的一切制度上面去。第一，政府的象徵，必須深印於青年人感受性最大的腦筋中，青年人受了這種印像的影響以後很容易擺脫。爲達到這個目的，不但要利用口號，還要用人格和具體的事物來作標記，使青年和想象力較薄的人，可以將情緒集中在這些標記之上。從對熟悉的事物的感情，和從愛林野的本性，可以使鄉土風景四週發生一種吸引力——在表現過去的高尙風習的古蹟，這種吸引力當然更大，而且不難聯想到國家政府方面上，感覺到政府是

團結地方和保護地方的象徵，同時又是現時民族的光榮歷史和風俗的象徵。在這裏不但可以表出國家的標記如國旗、國璽、國歌，君主的人格等，還可以表出超乎一切常人之上，品格足為模範，以及為國家社會而犧牲自己的民族英雄。（註三）不只是民族英雄與歷史遺址，而且整個國家民族的風氣都可以表現出來，政府立刻成了國家功業和風氣所鍾的焦點。

政府對這方面的努力，不限於青年人。政府的一切活動，差不多都有裨於國家和社會象徵的普遍化。當然有比較正式的標誌：如政府官吏穿制服；貨幣與郵票上印着國徽；公共的建築和紀念碑。最重要的，就是每次個人對政府有接洽時，所接觸的，總是一個看得見的人物，一種制度，或一個機關。這種看得見的人物，制度和機關，就是看不見，摸不着，而事實上存在而且很有力量的組織——政府——的象徵，政府的象徵中有些非常普遍，有些給人印像不靠發現的次數而靠嚴肅和希罕的程度；例如某一首聖詩專為紀念陣亡將士時演奏。政府的主要象徵，實際上變成一種煩細的儀式主義的對象。在每次國家典禮中向國旗和君主致敬時，儀式都非常隆重。這種儀式主義，更因政治式宗教方面的最高人員的參與，而意義愈加隆重。整個的目標是要養成對國家象徵的敬畏，因連帶關係而及於政府。其次，政府本身也成為各種理想的象徵——公正，人道，榮譽——同時人類的最高理想也因象徵主義欠嚴密的邏輯，而變成政府的象徵，再三轉移，最後直達到一種說不出的國家神祕主義的境地。在這種狀態中，從海格爾（Hegel）和他的信徒看來，國家政府立刻變成時代的精神（Zeitgeist）和人類善行的完成的神聖表現。

現在我們再詳論象徵在發展德國公民的與國家的忠誠上的地位。我們所說的是一種從資產階級的國家政府演進出來的象徵，這些象徵與資產階級發展中的各階段，都有密切關係。因為資產階級幫助專制君主剷除封建的制度與封建式的統治以後，自己得了勢力，又放棄專制主義而想得到自由與放任。他們佔得上風以後，漸從自由而變成權威，當他們感受到正在興起的工業中民衆的危險時，他們按危險性的大小而對民衆施行制裁，甚至施行壓逼。資產階級的政府與資產階級的社會的各種象徵，很確切的反映着這種變遷。

在資產階級對封建貴族的掙扎中，大邦裏的資產階級便與王公勾結。王公們是封建式的統治者中最強份子，他們的目標無非要增強自己對其他貴族的統治。統治者所造成的新制度，變成王公們的權力的象徵；這種象徵，與較舊的封建的形式聯合起來，造成一種專制政體的象徵。君主象徵公理，法律，秩序；封建制度象徵不公，非法，與無秩序。在王公們爲獲得優越的奮鬥中，資產階級接受而且助長使王公與其他貴族分離的趨勢。比較單純的例，可以從英國和法國的歷史中找出來。君主很早就變成國體權威的象徵；他是王法的執行者；他在王家的大道上維持王家的和平；他享有全國的土地，別人必須向他納稅，登位時經過教會的加冕禮，他的本人和他的地位都變成神聖的。在德意志因有一個實力薄弱的皇帝，使情態更加複雜，直到十七世紀皇帝與資產階級兩方面的勢力已等於消滅，使十八世紀地方的專制政體得以發展。這裏也和其他各處一樣，專制主義結果使王公的本人以及屬於他的一切都帶有無上的光榮。王冕、寶杖、寶座，以及王公的袍服，御駕的親臨，王庭、王宮、王璽，和一切的徽號，甚至於王公的手杖、獵犬，都有特殊的意義。勳章的授予，是王公對佩帶者個人的讚賞。統治者的本人和他在心理

上所達到的一切，都變成國體的象徵，受資產階級和下層階級的愛戴，因為牠們是這些階級捧着來抵抗貴族地主的對象。「王家」「王公的」……等字眼，變成引起資產階級對君主的忠誠，反抗貴族階級的象徵。在普魯士一邦和全德意志君主政體一直繼續到一九一八年，君主和王公們的象徵對資產階級的號召力很大。我們以後就可以發現，資產階級對君主政體的忠誠，愈來愈明顯。

除了統治者是國體的一個大象徵，四面有較小的象徵環拱着以外，整個機構都以君主作中心，君主說一句話就立刻變成法律。尤其是在普魯士這種情形更明顯。第一，是軍隊和一切與軍隊有關的象徵；軍服、頭盔、軍官的指揮刀、軍旗（王室的和本團的），以及在軍事機構培養出來，在軍事上有一切理想與態度——勇氣、紀律、服從、忠於職責、犧牲自己。對君主——最高的司令者——的盡忠，當然是最主要的。軍隊中的風氣——尤其是普魯士軍隊以往光榮的勝利——是無時無刻不被重視的，像盧斯巴（Rosbach）和柳恆（Leuthen）等名，已變成軍事上勳業的象徵。軍士與整堆的事物，概念和符號發生接觸，他的訓練中一重要部份，是從仔細的練習中養成對這些象徵的迅速的動作和情緒上的反應。像德國一樣的全國普及軍事訓練，使民衆中大部份要受這種支配，效果當然很顯著。在貴族的軍官團中，榮譽和勇敢的風氣是直接從封建主義傳來的，他們更鼓勵決鬥和決鬥的一切法則來切實培養這種風氣，直至「軍官的榮譽」名辭的本身已經變成一種象徵。這項象徵的價值第一在保證軍隊對王室的忠誠；第二是推進軍隊的團結，使成爲一個較有效率的機構；第三是使軍隊在心理上最少與貴族階級平等，藉以吸引貴族來充當領導；第四是引起民衆對軍隊的愛慕，因爲軍隊要靠民衆作後盾；最末，軍

隊的本身就是君主的一個偉大和有力的象徵——同時又是正在興起的資產階級的權力的象徵。

警察是王公們在軍事方面的另一種臂助；在德文表示專制的行政的名辭，本來是 *Polizeistat* 名辭的本身。雖然是專制主義裏面的，但我們所知道的警察，一部份由中古時代市鎮中的守夜人演變而來。這些人的職責是防止爭鬪和保護良好市民的財產。國家的警察成立以後，警士的制服，警刀、警署、總說一句，民衆日常與警察的接觸，都足以代表王公的權威，使下級社會的心中，都留着這種權威的印象。

除了軍隊之外，君主的另一重要臂助是正在發展的行政人員。軍隊在專制國體中是貴族的穩固地盤，這種情形一直到一九一八年還不變；另一方面專以執行政府事務為職責的行政人員，卻大多數由資產階級出身，造成資產階級風氣，雖然高級的位置往往要留給貴族，一個軍官的「榮譽」通常係指他的勇氣，一個文臣的「榮譽」大致係指他的誠實；軍隊重視個人的自尊心與榮譽，行政人員卻傾向於忽略個人的情感而重視客觀性；軍隊注重紀律，視紀律為心理上的柱石，行政人員傾向於注重有系統的工作。固然，行政人員也和軍隊一樣忠於自己所穿的制服，所負的職責，君主的個人，以及專制的政府；可是他們所擔負的職務（他們最初的工作是王室產業的管理）需要一種對理財、會計、行政和其他事務的理解；這些事務，一大部份要借助於資產階級的經驗。這使行政人員與資產階級在實際上和心理上都不斷的發生接觸。從實施資本主義的經濟各種技術上的需要（如穩定的通貨、郵政制度、關於公司和銀行的立法、鐵路、電政等）行政人員打開了一條大路讓資產階級發展。

資產階級也對行政人員的各方面養成一種友善的態度，第一將行政人員看得和他們必須反抗的貴族一

樣高，行政人員在社會上的聲望只在軍隊之下。這種聲望不但在社會上有重大的意義，還可以助長行政人員當中對於官吏的榮譽的高尚理想。行政人員從資產階級生活中所帶過來的竭力發揚對國對王的心理上的價值，是資產階級一向認為可貴的，因此上述的關係，更不難發生。誠實、盡職、不偏不倚，以及在德國和行政人員關係最切的所謂德國的效率——一切都變成象徵。執行政府事務的行政人員，本身便成了政府的象徵，他們有計劃的一視同仁的，毫無私情和偏見的來援助和指導正在發展的資產階級。

這樣在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進程中，資產階級到了路中心的一站——專制主義，沿途標榜出與王公、軍隊、以及行政人員有關的招牌。在王公方面，封建社會的分裂變成資產階級的團結；在軍隊方面，封建社會的紛擾變成資產階級的秩序化；在行政人員方面，封建政府的浪費和混亂變成審慎的資產階級社會上和經濟上的行政。因此資產階級的感情、敬虔和謝忱，都歸在這三種份子身上。於是王公的個人、軍隊、行政人員，每種都變成中心的象徵，四面環拱着各種較小的象徵的價值，同時每種在取得資產階級社會的主要條件的掙扎中，都有特殊的意義。

將君主捧了出來，十八世紀勢力薄弱的資產階級，並不向國家方面，而是向地方方面發展。因此地方王公勢力的興起，所產生的不是國家主義而是地域主義。德意志各地的宮庭，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跟着比較進步的法蘭西君主政體後面走；在威斯發利亞（Westphalia）和約以後一百多年間，他們要模仿凡爾賽宮中的語言，辭章、禮儀、和奢靡。直到十八世紀末葉的二十幾年間，德意志的資產階級纔受了英法的資產階級的刺激，開始擁護

國家主義與自由的象徵。可是因爲這種階級的勢力比較薄弱，他們的象徵初時不採取政治的形式，最初出現時係一種文化上的口號。從文化的範圍中，他們漸漸覺得國家主義是一種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需求，同時感覺到其他的政治和經濟上的變遷的必要。涉及這些方面以後，他們更在原有的以上增加了不少新人物、新口號、新概念、來象徵資產階級的要求。於是純粹文化上的概念，遂變成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需求的象徵。

我們在這裏不能詳細分析這許多德意志文化的發展上的線索。概括的說來，這時期中德意志的文化生活，完全受着幾個口號勢力的支配：自然和自然主義，民衆的自然無玷的生活，從民衆很容易的轉爲民族或國家。盧梭 (Rousseau) 的『回自然去』的公式，變成德意志資產階級反抗宮庭中法國化的形式主義和宮庭中的詩辭以及學校中拘泥於拉丁文的吶喊。在這種歷程中，德意志在詩辭各方面的成績（德文叫作 Deutsche Dichtung），便成了偉大的寫實的象徵。萊興 (Lessing)，少年的哥德，少年的虛拉爾 (Schiller)，以及他們所領導的整個『狂風暴雨』運動，不僅是一種對比較自由和比較自然的表現，以及新文體，新內容的要求；在他們對舊日文體的抨擊中，在他們對中級社會情緒上直接的號召中，他們的名字，他們的題目，他們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變成德意志資產階級自尊心的提高，抵抗貴族對他們的輕視的象徵。

新運動雖然有一個時期因爲古典派的復興而稍停頓，但在世紀的轉變間又重新活現，演化成一個複雜的浪漫主義運動。法國革命在德意志曾經大受歡迎。『自由、平等、博愛』變成德意志資產階級中的重要象徵，經過恐怖、反動、和拿破崙的興起三個時期這種影響還得保存。實際上浪漫主義的運動有好幾方面可以被視爲在心

理上逃避新象徵與舊實際間的衝突的一種方法。浪漫派作家從現實逃到過去，逃到超乎自然的和神秘的範圍內，逃到一種幻想的中古主義裏，可以算是不發達無組織的德意志資產階級的特徵；一方面要擺脫與專制主義的關係，一方面又不願意和不能夠引導自己的藝術到完全革命的潮流上去。這種對現實的逃避——同時又是對於現時承認的象徵的逃避——所產生的重要結果，或許是現時對黑爾特爾（Hörder）的文化國家主義的觀念的衝動。浪漫主義者將民歌和其他民間的幻想的表現重新搬出來，民歌（Volksdichtung）剛好適合一種巨大的需要，變成資產階級的普遍口號；一切民衆詩意的表現，都被搬出來，大受讚揚。現時德意志的資產階級，再也不模仿貴族而傾向於與民衆站在一起。在民間的故事中，在民間的詩歌中，在十六、十七世紀間的民間書籍裏，在民間的傳記中，在俗語中，在民間的慶節中，在民間的服裝中，他們都能夠找出各種的偉績，對這些成績大加讚揚，作為證明資產階級的偉大的象徵。德意志的資產階級無意中正與農民聯結起來，情形和法國的資產階級所經歷過的一樣。（註四）

專制主義（以集權的趨勢來抵抗封建社會的地方主義）已經不是充滿着意義的象徵。在法國革命的驅動力之下，國家主義是正在發展的德意志資產階級對於小規模專制君主集權的反響。他們否認貴族們所鼓吹的國家就是君主的原則，而贊成國家就是全體民衆的原則。可是受了拿破崙的打擊，德意志的國家主義從反王公和反舊政體一變而為很明顯的反外國。祖國、德意志國家、德意志民族、德意志土地，現在都變成中心的象徵；安爾恩特（Arndt）、烏蘭（Uthland）、可爾恩納（Körner）和好德爾林（Hölderlin）唱着德意志的自豪的歌曲，

注重全德人民在本國中精神上的團結。以格林姆 (Jacob Grimm) 爲首，德意志的天才在許多人中表現出來；德意志的語言和民間文學，現在已被認爲國家民族的；“Volk”名辭的本身，現在不特代表民族，還含有國家的意義。宗教改革以來的頭一次，德意志國家和德意志祖國變成自豪的活動的名稱。

德國靈魂內部的詩性已經被人發現，所有這類德意志民族精神 (Deutscher Volkgeist) 的表現都變成精神團結的象徵。這還不夠。現在正是從動作上發現和啓示德意志國性的時候了；這是菲克推在他的『告德意志全國』中所要做到的事。题目的本身注重精神上的團結，要用這種團結的情緒力量來作政治上統一的掙扎。從哲學家變成了愛國者，菲氏注重說活的德意志語的人和說死的拉丁語的人比較所佔的利益。他更進一步分析德意志的人格，發現德意志人具有純樸、靈性、勤懇、熱心、忠誠和一種不能翻譯的特性，叫作 Gemüt。這類在德意志的人格中發現的美德，應當變成個人與國家行動的理想，以及國家的團結和決心的象徵。要證實德意志的偉大，浪漫主義者設法從德意志的過去找出各種能使人興奮的象徵——例如小歌曲家 (Minnesinger) 大歌曲家 (Meistersinger)，中古時代帝國的統一（總有一日會再起來領導德意志民族擺脫一切壓逼）的赫弗來得烈大帝 (Frederic Barbarossa)，中古時代的自由共和市，宗教改革時代的自由帝國騎士等，在實際上全部德意志的政治與文化歷史，和整個德意志的意想文學 (Dichtung)，都變成各種足以證明德意志民族以往的成績的象徵的來源，在新領袖之下，重新恢復以往的偉大——這種工作，資產階級一律參加。歷史、神話、語言、法律和其他各種學術，遂變成德意志資產階級愛國心的附屬品。

原來爲反抗貴族和舊政體發展的國家主義，現在被用來反抗拿破崙的侵佔，與原有的忠誠連在一起，經過很大的擴張。可是德意志正在發展的國家主義，一方面雖仍忠於該管君主，另一方面卻採用了一句從法國革命借過來，在以後幾十年間對德意志資產階級關係非常重大的口號——爭取自由的吶喊。在不帶政治意味的德意志智識份子的心目中，這種概念變成有點神祕主義的色彩：例如菲克推談到一個民衆與王公們應當聯成一氣的自由共和國。（註五）自由實在是正要造成的新德意志中的基本因素；普魯士的君主政體已經藉斯坦和哈登堡的開明的改革而頓形偉大，很得民衆的擁護。德意志各邦反抗法國革命的象徵和法國軍隊的第一次戰爭，不很得人心。可是到了這時新的要求與新的象徵已經將資產階級吸引着；藉「求解放的戰爭」作號召，德意志的領袖比先前的任何一次都能夠喚起國家的熱誠。這幾次戰爭，實在是證明統治階級如何利用強有力的象徵來約制基本上反對自己的情緒，收這種情緒爲己用的一個好例。整千整萬的愛國德意志人士在解放戰爭中喪命，爲的是求得從來沒有過明確定義的自由，和實現統治階級無誠意履行的條件。（註六）

可是戰敗了拿破崙之後，王公們便立刻拋棄了已經流於濫用而帶有危險性的國家主義與自由的象徵，重新標出舊日專制的，分霸的象徵。資產階級的主要象徵——國家主義與自由——已被目爲明顯的反對政府；代表國家主義與自由的詩人，都被目爲危險人物。梅特涅反動的經過，我們在這裏不必細述。可是一切騷動雖然被遏止，從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八年間正在興起的資產階級將中心的象徵——自由——從文化方面帶到政治和經濟方面去，給他一種特殊的意義，而且收得相當的效果。因爲這個階級正設法謀自己的解放和取得盡量

發展的基本條件，資產階級的自由，不特指個人的自由和說話、出版、集會、教育等自由，而且還含有工商業的自由，訂約自由，以及購置地產自由的意思；這也就是從一種社會階級跳到另一種社會階級去的自由。尤其重要的，就是政府不能隨便沒收私人的產業。為保障本身的自由計，資產階級要將這種自由，變成民權載諸典籍；這與要求議會式的政府和責任內閣的實現，不過一步之隔。實際上英國人創出來防止專制的各種辦法，和法國革命採用的各種辦法，現時從勢力比較薄弱的資產階級看來已經變成象徵。商人的要求和努力都拿牠們作中心；想用政治的手段來達到文化上的目標的詩人和學生，也靠牠們來實現解放德意志靈魂的夢。

在各邦中——尤其是在資產階級的發展比較快，和法國革命的影響比較大的南部——對這許多政治上和經濟上自由的要求多少得到實現，但在程度上卻很不一致。同時他們對全國統一的需求，使國家主義的象徵也佔有同樣重要的地位。資產階級逐漸放棄在反動的，農業的奧大利勢力之下的毫無實力的德意志聯邦，轉而歡迎在普魯士關稅聯盟中的德國在經濟上的統一。擁護德意志國家的統一的政治和經濟勢力日增，同時又得着日趨發達的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勢力協助。德意志兵士在戰場上的血是為德意志國家統一而灑的，因此給他們一種神祕的價值。政治上的騷動雖然可以禁止，以整個的民族文化生活作根據的民歌的風尚是無法壓制的。現時再也不能反對這種語言為非克推和黑爾特爾所認為一個偉大自由的民族的活靈魂，以及哥德與虛拉爾用來著述者。此外，一般人對曾經受過德意志浪漫的過去所燻陶，或能吸引對德意志風景的新愛戀的地方，都發生熱烈的情感。像萊茵 (Rhine)，納克加爾 (Neckar)，沙利 (Saale) 等河流，士發次瓦 (Schwarzwald)，條林

吉瓦 (Thüringerwald) 保尼爾瓦 (Böhmerwald) 等地方，哈爾齊 (Harz) 等山，阿克痕 (Aachen)，法蘭克福 (Frankfurt)，慕尼克 (Munich)，德勒斯登 (Dresden)，努連堡 (Nuremberg)，威馬爾 (Weimar)，科倫 (Cologne) 等城市，發忒堡 (Wartburg) 與海得爾堡 (Heidelberg) 等地方，全在歌曲或故事中，變成情感化。每個地方都變成愛國的德意志人的聖地，他們相信在歷史的事蹟和風景的優美上沒有一國可以比得上德意志。每個地方都變成德意志的偉大和終有一天要實現的國家政治統一的象徵。詩人的頌揚，以這種國家民族、國家主義、和國家風氣的象徵作中心。這又是以往學者們在智識上和道德上資料的來源，他們的影響，到現在還沒有淹沒。歷史、語言學、哲學、比較法律學——各種關於社會的統治的科學——都很深刻的受了新社會象徵的演進和一般人承認這種象徵的影響，這種新的象徵，於是成了新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以及道德制度的心理根據。

從我們的觀點看來，這個時期的主要貢獻，可以算是海格爾對國家的推崇。假如像特勒斯虛 (Treichke) 所說，康德 (Kant) 曾經將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的實現看作文明的鵠的，菲克推也 同樣的曾經頌揚國家政府，我們可以說海格爾「將國家政體看作道德理想的實現，和道德志願的實現，」根據這種制度，造成「一個萬能……爲自從基督教的世界承認個人良心上的權利以後所沒有的。」(註七) 海格爾比任何思想家都進一步，造成當時德意志資產階級正需要的國家政體在理智上的根據。他所傳播的對國家的尊崇，是要爲資產階級和智識份子成立一種有力的新因素，最初是計劃出來的一種進步的理想，以後連海氏本人也變成反動的象徵，被用來頌揚現有態度的工具。

可是海氏對國家的重視之所以被一般人承認，不專因為他思想的精深，而是因為他的思想與資產階級主要部份態度的轉變正相合。德意志較大一點的邦，對新制度的理想與象徵，看來很能夠適應。從普魯士邦的斯坦和哈登堡的改革和巴維利亞邦的蒙格拉斯的改革起，各邦逐漸施行一種對新要求的重要部份讓步的政策，有時結果反將象徵收為己用，農民的「解放」關稅聯盟的成立，資本主義的經營主要條件的取得，對於造成未成熟的資產階級大部份人在現有政體中前途安全的感覺，和對於使資產階級承認現有政體，都有相當的貢獻。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大部份是實現自由和統一的偉大理想和象徵的嘗試，在法蘭克福特大會中大多數人只要完全就現有各邦中完成這種工作，並不想攫取實權。先前已經讓步的君主，現在更被敦促屈服於憲法的改變之下，可是這種改變的本意，並不要危害君主地位的安全，只要從資產階級的自由與團結中保證資產階級的統治。我們當然可以顧到資產階級力量比較上的薄弱和缺乏政治的經驗，以及他們當時問題的困難。可是還有一個新的重要的原因使資產階級不能不稍為和緩：就是他們對一個新的階級和新興的過激主義的畏懼。帶有警告性的事件連接發生，變成不特對政府而且對資產階級危險的先兆，例如法國的恐怖，英國的民權運動，里昂絲業織工的罷工，西來西亞絲織工的暴動，柏林的三月紀念日，巴黎工人六月間的異動，法蘭克福特城九月間的異動。所有對現有社會制度安全的恐嚇，所有流血與暴動的現象，都使資產階級可以歸納到以下的事實：就是資產階級的發展引起無產階級的發展——這種人沒有恆產，靠資產階級來謀生，但在現有的制度中是毫無顧慮的；受了經濟和政治的無能和失望的壓逼，他們要用暴力或以暴力為威嚇來改進自己的狀況。

弗蘭克福特大會失敗以後，統一法治與自由等象徵大受影響，勢力逐漸衰落。整千整萬的人到美國去尋自由，在那裏他們感覺到和他們所撇下來的差不多象徵的魔力。像「救救聯邦」、「解放黑奴」等口號，在南北戰爭中會吸引了不少德國籍的移民到北軍的隊裏去。

後二十年間經濟上的繁榮，使德意志的資產階級在財富、人數、和權力上都大擴充，加以普魯士在一八五〇年間新佈的憲法，使他們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大致都滿意。甚至在普魯士他們在政府中也與貴族一起享有共同統治者的地位，同時行政人員方面，又可以供給他們的根本的經濟需求。卑斯麥與普魯士議會從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六年間的紛爭，是一種取得政治統制的鬭爭；可是資產階級不想用反叛的手段自己處置一切。卑斯麥一方面將政治上的權利任意蹂躪，一方面卻立下了復興國家理想的計劃。他在一八六五和一八六六年間設法藉什列斯威、好斯敦 (Schleswig-Holstein) 省來重新激發德國的國家情感，這完全是有用意的。因為這些省份在一八四八年當各方面在法蘭克福特集款建設一個艦隊來拱衛牠們的時候，已經變成帶有鼓動力的國家象徵。

到了一八六六年卑斯麥已經將十九世紀德意志的兩個大象徵拆散。國家的統一已經很快的從戰勝奧大利而得到勝利，普魯士議會也因而向卑斯麥表示屈服。自由的象徵已經被置於腦後，因為資產階級再也不需要牠來達到目標了。君主與軍隊以前被看作暴力和壓逼的象徵，現時反變成國家團結的新象徵。不久跟着戰勝了法國，帝國在凡爾賽宮宣告成立以後，德意志國家主義的象徵，於是與半專制的霍亨倫堡朝代的象徵聯成一片。

資產階級的國家主義歌曲，如德國萬是（*Deutschland über Alles*）、萊茵防次（*Die Wacht am Rhein*）等，原來是在一八四〇年到一八五〇年間騷動期內製成的，現時竟傳遍各級社會。普魯士的君主變成德意志的皇帝，卑斯麥和他的「鐵血」政策變成渴望中統一完成的偉大象徵。

帝國正式的國徽立刻採定。普魯士的黑白二色和商業聯盟（*Hanseatic League*）的赤白二色混合起來做成新的「黑白紅」。將普魯士的鷹擴大，胸間帶盾形，作為帝國的鷹，普魯士的鷹爪執着球和杖而帝國的鷹爪卻是空無所有的。除了對德國其他各邦的君主和資產階級留相當的餘地以外，帝國正式的象徵，多數採自半專制的普魯士。以君主作中心的專制的象徵，現在與軍隊和行政人員的各種象徵，以及德意志資產階級的偉大的文化和國家民族的風氣混成一片，構成新德意志帝國的象徵。（註八）民治的理想並沒有完全被漠視；在保持普魯士三級制度的原則之下，卑斯麥還讓國會的議員由全國成年男性公選，雖然還具有各種君主政體和貴族統治的形式，帝國就要變成德意志資產階級的帝國。固然，統治權還是為貴族所擁有；固然，君國主義的象徵一如舊日；可是工業的發展，使資產階級的進展一日千里，而貴族的根據——農業——的發展卻很慢。在國內外，政府和半專制的帝國的象徵，逐漸變成資產階級的政府和資產階級的象徵。從一八九〇年以來幾乎整個德國的外交政策的目標，就是要取得新市場，新前程，新機會，讓資產階級好和其他各國的資產階級競爭。德國海軍的發展和德國殖民地的獲得，都有助於德國的商業和權威，使在全世界各地擴充。這些發展，在一大部份民衆的心目中，變成國家的勢力、實權、和精神發展的象徵。

受了各種催迫如經濟上需要的獲得，國家的統一，政治上所得的優遇，以及勞工階級的畏懼等等，資產階級遂與普魯士半專制政體媾和。資產階級發展的第二個階段，現時可以開始前進；不是像英國和法國一樣在自由的象徵之下，而是在可以防止無產階級異動的秩序、效率和權威的象徵之下。（註九）

德國資產階級在象徵和要旨上承認復興的半專制主義，放棄了一向維持住他們和勞工階級間的聯絡的自由主義的計劃與象徵，從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看來，帝國給他們許多好處；可是新興的工業無產階級當中，多數原是資本主義發展以前其他階級的份子，現時淪為無產階級。從他們看來，帝國對他們沒有多少好處。在被棄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民治主義的象徵中，和在新興的馬克斯社會主義中——法國革命和工業革命的混合產品——德國正在發展的民衆獲得各種理想、計劃和象徵來表現他們的需求與不滿。從他們在一八七五年間的合併中，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建立他們的組織，直到一九一四年他們成爲帝國中最大、最活動的政黨。後來勞工階級中集合在國際的紅旗之下，響應勞動的民衆——無產階級——所提倡的「世界的工人聯合起來」，贏餘的價值，階級爭鬥，「棄絕霸奪者」和社會民主黨其他口號的人數漸多。如馬克斯、翁格爾斯、拉沙爾、來比樂克、比貝爾、高德斯基等人物和社會主義的先進都變成階級的英雄。馬克斯的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變成新的福音。

（註一〇）

表面上看似無法抵禦的社會民主黨的進展，雖然經卑斯麥狂暴的壓制，結果還引起一種兩重的發展。在該黨以外，社會主義的象徵的增加，是促進非馬克斯甚至於反馬克斯的社會主義的理想與象徵以及社會變遷的

主要因素。在克得勒 (von Ketteler) 在議會中社會黨的代表，和最後在卑斯麥的領導之下，統治階級設法將一種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來代替馬克斯的社會主義。到了一九一四年，德國的社會立法在全世界算最進步，有和邦有的企業的規模，在全世界也算最大；幾乎每個政黨都要實現一個社會改革的計劃。半專制的海格爾式的資產階級國體，已變成社會的，父惠主義的 (socio-paternalistic)；不過始終是資產階級的國體。

從社會民主黨借過來，或是推行來抵抗社會民主黨的象徵，很明顯的被撤去馬克斯主義的內容。同時在該黨裏邊，社會主義的象徵，在含義也經過很精細的改變。在創始的時候，社會民主黨曾經實行一種反對半專制的資產階級政府的政策，他們的象徵立刻變成反抗資產階級社會與資產階級政府的代表。這種運動變成一個政黨，具有相當的功能和人數以後，漸傾向於放棄反國家的態度，變成只反對現政府的政黨。(註二) 引起這種改變的因素很多，我們在這裏只能夠提出幾種：勞工階級中有組織的份子因德國工業的大擴充而狀況得以改進；帝國藉牠的巨大的機構——學校、軍隊、行政人員、教會、出版物、文學等——養成無產階級青年崇敬國家的象徵；本黨對地方和省的政治團體的增多參加，使黨中份子得到資產階級政府機構中行政的訓練，和能夠分負責任階級的政治責任。到了這世紀轉換時，「改組派」想要表現一種新的動向：馬克斯社會主義的象徵必須放棄，黨中須設法作具體的改革。勃恩斯坦提倡「目標不算什麼，只有運動要緊」的論調。在跟着發生的掙扎中，「改組派」失敗，「正統」的象徵與計劃得勝。可是在馬克斯主義的名辭之下，已經遵行曾被拒絕的「改組派」的觀念，直至事實上等於承認資產階級的政府和牠的象徵。革命的馬克斯主義已經被拋在一邊，全靠左翼的領袖和

民衆的擁護纔能繼續存在。雖然表面上標榜着社會黨的象徵，舞臺的中心已經被民治、自由和改革的象徵佔去。因爲自命爲一八四八年的正統社會民主黨，主張傳統的資產階級自由的象徵必先得到實現，然後纔能實行社會主義；前者是後者的先具條件。這種態度，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竟將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理想與象徵，變作社會反動的桎梏；甚至大戰之前，他們已經打好一條新的社會化的愛國途徑，皇帝的存在雖然不能容許（因爲與民治的象徵不能相容），但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和大多數的信徒已經有意或無意的接受了德國資產階級的政府和德國的國家主義，將德國資產階級的國家主義的象徵與自己的象徵連在一起。一九〇五年以後德國的領袖對軍事上被包圍的危險愈表示恐慌，這種趨勢愈加明顯。工人必須捍衛德國，因爲德國有在全世界最好的社會立法。他們必須捍衛社會主義運動和勞工運動在世界各國中最強的國家。這就是說，德國的資產階級必須得到保護，因爲他們和社會主義最爲接近。這也就是說德國的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毀滅最爲接近。馬克斯社會主義的象徵，原來是一種吸引要打倒資產階級的人們的革命學說，到現在已變成勸人保護資產階級政府的工具。（註二二）

這種矛盾現時更加明顯，可是在一九一四年間只有這種運動中的左翼份子感覺到。大戰中社會民主黨作過幾次鼓吹和平的遊行以後，便和其他政黨一樣響應「祖國遇到危險」的口號。一九一四年對戰債投票贊成，更明白的表示社會民主黨認德意志帝國國家政府的象徵爲較高於本黨的象徵，認自己的象徵僅屬於一黨的而置諸度外趕快促成太平（Burgfrieden）。從此之後，社會黨的黨員很忠誠的聽見「德皇萬歲」（Heil Kaiser

Dir) 的歌聲而起立，加入歌唱，以及爲德皇歡呼。在這種國難時期中，當無數的社會民主黨份子參加作戰的時候，軍服的顏色、鋼盔、鐵十字架，實際上整個軍隊的裝飾與象徵，在社會黨當中引起積極性質的情緒。以前被指爲象徵軍國主義的一切事物，現在一時變成一種使無產階級與軍隊發生感情，擁護政府的工具。直到一九一八年，黨中右派和中立派的份子擁護任何得勢的政府，在一九一五年間被排除的一部份人，次年另組獨立黨，進行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運動。只有一小部份人，在盧森堡與來比諾克領導之下，主張革命；可是他們的活動只能暗中進行，他們的影響並不大。到了一九一八年，民衆中日漸增加的對戰事的不滿，得到一個發洩的機會。俄國的布爾薩維克革命會使德國一部份工人發生驚人的興奮，給他們一個新的程序，和一種新的具有無限情緒力的象徵——大部份是馬克斯社會主義象徵的復活。開爾 (Kiel) 叛變的爆發和工人與軍人評議會的成立，是全國的導火線。工人評議會先後成立，同時前線上的軍隊亦被邀請舉出自己的評議會。援俄國的例，一萬個無名的工人策動成立許多地方評議會，攫取實權。各方面高呼着「將一切力量集中在蘇維埃上」的口號。德皇出亡，同時在政治上曾將身獻給半專制的君主主義的資產階級因爲中心的象徵已經失去，一時不知所措。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黨原來早已因爲抨擊資產階級政府中的封建和專制的殘餘份子而得人心，現時立刻接管政府。民衆中已經採用俄國革命的一切象徵，可是還沒有接受烈寧曾在俄國提倡和實行的馬克斯和翁格爾斯二氏反對資產階級的教訓。多數的社會黨不能挽回革命的狂瀾，但不久便設法控制局面，勸導或強迫各種評議會自己解散。對於左派的騷動，他們借助於隨時樂意幫忙的反動軍隊來壓止。用資產階級的革命和民治主義的象徵來代替

俄國革命和無產階級獨裁的象徵。『全國大會與獨裁是相對的，』『民治主義與獨裁是相對的』等口號，盛行一時。全國大會（一八四八年遺留下來的精神）成爲德意志的自由的救星。用全國大會的名義可以號召一切贊成資產階級政體的團體，從社會黨至國家主義黨，都一致起來反對危害資產階級社會安全的無產階級獨裁。

社會民主黨處在當權的地位，在應付上很感到困苦。他們早已拒絕用強暴手段破壞資產階級社會來實現社會主義的觀念，後來竟發現自己不能不用強力來保護資產階級的社會，壓制無產階級的激烈份子。將資產階級的自由象徵挾了出來作爲社會主義的必經之路以後，他們堅持着和不斷的頌揚一時被目爲革命的而從歷史上看可以算是反動的象徵。可是拒絕了無產階級的獨裁，贊成全國大會以後，社會民主黨發現自己僅佔少數，不得不與民主黨和天主教中心黨共分政權。從較激烈份子的觀點看來，社會民主黨已經用一種反革命來消滅革命。

勢力比較薄弱的左翼反對全國大會與共和主義的象徵，曾經設法藉無產階級獨裁的象徵來向工人號召。他們的努力失敗；來比諾克和盧森堡都被槍殺，因而變成斯巴達卡斯派和共產黨運動中的殺身成仁者和代表這種運動的象徵。雷爾（Ruhr）和各處的罷工，都經武力制止。獨立社會黨想要將民治與自由的象徵和共產主義的象徵聯在一起，可是他們這種『騎牆』的工作不能繼續很久。他們當中不久便發生分裂，一部份變成共產黨，其餘的回到社會民主黨去。一九二三年漢堡起事失敗以後，共產黨當中的革命衝動在表面上已經看不見，雖

然這種衝動的存在，和以後隨時可以再起來，是毫無疑問的。該黨在政治上非常活動，進展很不穩。到一九三〇年，他們獲得票數在四百萬以上。德意志共和國沒有給勞工們多少真正的好處，加以大戰以來長期的危機與失業，與蘇俄工人所得到的利益相形之下，使其產黨的象徵的勢力，愈來愈大。烈寧憑他的著作與在革命上的領袖才力，將馬克斯從社會民主黨中救出，重新成爲共產主義的先哲，將社會主義者的思想與功績，重新加以整理。馬克斯主義的整個象徵，曾經社會民主黨的刪改，來適合他們向社會主義漸進的程序。現在共產黨把牠再拿過去，灌滿了革命的赤血。紅旗、國際、革命、勞動的民衆，無產者的獨裁，都變成了主要的象徵，四面爲一羣連帶的小象徵環繞，一切都恢復以前的意義，恢復舊日對資產階級的政府與社會的仇視。其實社會黨很想他們的態度從否認國家政體變爲承認國家政體的時候，將他們的象徵的一部份帶到國家政體方面去，不過他們沒有完全成功。因爲馬克斯社會主義的象徵中，有許多已經變成蘇俄的象徵。「赤色的俄羅斯」或「蘇維埃的俄羅斯」已經變成具有驚人的號召力的中心象徵，同時俄國新制度的整個象徵，在共產黨運動的議論和情感中，都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錘與鐮刀、紅星、蘇維埃、革命、第三國際、烈寧、史丹林、五年計劃等等，一切這些標誌、口號、人物，只是運動在外表上的象徵，公開的目標，就是使人心離去資產階級的勢力，和資產階級的社會，歸向一種新的沒有階級的無產社會。

一九一九年民主主義的象徵的勝利，使維馬大會能夠脫去德國資產階級政體中的貴族面目，而代以一八四八年間的象徵。君主政體被廢除；宮院變成博物館；用一八四八年黑、紅、金的顏色來代替帝國時代的黑、白、紅；將

帝國的鷹作爲共和的鳥。在活躍的無產革命恐慌中產生的新共和憲法所包含的民主主義的條款在各國現行憲法中可算最詳；此外還加上一些社會主義的辭句；但同時也爲獨裁政體留下餘地。其中對於一個得勝的階級實現了因多年的苦鬪而期望愈切的象徵時的愉快，很少表現。就是在一八四八年間，贊成共和的人也僅屬少數。直到一九一〇年盧森堡建議在社會黨的政綱中，立下共和的條款，還被拒絕討論。（註一三）憲法只表示舊時代的崩潰，並不表示新時代的勝利。從妥協中選出來代表新體制的象徵，久已失去活力，而帝國舊有的象徵，對於許多經過大戰和革命還對舊政體忠誠不變的人們，比以前更要親切。同時德意志國家的光榮所得來的餘蔭，爲和約所剝奪的更多。軍隊是德意志統一和力量的象徵，被裁剩十萬人，海軍、商船、海外屬地，一切都是德國勢力發展的榮耀的標誌，都落到他國手裏。德國領土的重要部份亦被佔據或被割去。德國在地理上的統一被破壞；德國國家主權被蹂躪。歐洲外交上的主要國家，竟變成一個被征服國，要向征服者納貢。（註一四）

假如從右派的觀點看來接受和約的共和政體是國恥的象徵，苛帕（Kapp）異動的失敗表示民衆已經不受帝國和牠的象徵所束縛。可是戰後連續的經濟恐慌和共產黨勢力的發展，將共和的存亡所繫的民主主義與進步主義的象徵中驚人的弱點，都表露出來。我們已經說過，甚至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帝國博得勞工階級的人心，也要靠在社會上讓步的象徵。這種趨勢一直繼續不變。蘇俄的存在不特刺激起德國一個有力的共產黨的發展，而且對非共產黨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的思想，在積極的和消極的兩方面都有很大的影響。在蘇維埃的磁性吸引之下，加以經濟狀況的不良，資產階級的國家和資產階級的社會已經有希望要進入第三期的發展中。這個時期

的特徵，是要從兼重國家主義和社會化的辦法，做成一種極顯著的社會團結——在必要時，不惜用強迫的手段——藉以維持現有狀態。資產階級的進步主義，連對資產階級本身的號召力都失去。我們可以在共和政府的許多活動中看出這一點；在法西斯黨或國社黨人的活動中，這更爲顯著。

共和政府對於左派復興和增強社會主義的象徵的意義的反資產階級勢力，以及收羅了許多舊政體的象徵的右派反無產階級勢力，實在是無法應付。有一個時期他們曾經將一八四八年和民治主義的象徵搬出來，可是一般人對這種象徵並不熱心。「憲法紀念日」也只是政府和中立派政黨的慶典而不是全國的慶典。不過各方面對於將共和政府與國家的風氣連在一起的工作，還能共同努力，要使共和政府成爲現時的德國的代表。「德意志國家」一個名辭，仍舊沿用，但不作德意志帝國解，而指德意志共和國。他們還有復興海軍的嘗試，同時設各種方法使新的國軍與舊日德意志軍隊的光榮打成一片。新編的各團沿用戰前的名號，傳受舊日軍隊的旗幟，風氣和聲望。愛拔脫 (Ebert) 和興登堡兩個總統對於先使勞工階級，次使中等階級和上等階級的一部份歸附共和政體，都有很大的貢獻。(註一五) 更重要的，就是共和已經承受了前世紀所推崇的海格爾式國體的一切權力，聲望與機構。政體的本身，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大加擴充的政府活動，在物質上的表現，以及公務機關中的人員，現時都變成新資產階級政府的象徵。這些因素，對於轉移一般人的忠誠從舊的對象到新的對象去，以及對於注重新共和與舊帝國間的連續性和國家的偉大的象徵，都大有幫助。

在社會的立法上，新國家比舊日的國家更進一步；現時再也不否認國家政體的社會黨，竟稱共和政體作

『社會的政府』目為真正社會主義政體的前驅。在這裏我們不必列舉一九一八年以後各種社會立法上的變遷，我們必須指出的，是各工會的新權利，工作委員會的設立，以及社會保險的擴充，對保持資產階級的共和與工人間友善上，都大有幫助。可是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打擊，又足以減少這種影響。邦和市的社會主義，也曾經很快的發展——因為戰後私人資本的缺乏，這情形更容易發生——如市營電氣廠，市營洗衣廠等，往往對民衆的日常生活發生密切的關係。所有這些庇護的辦法，都變成資產階級的共和政府從社會主義得來，用以抵抗無產階級騷動的危險的象徵。

除了表示共和政府是下級社會的保護人以外，統治勢力還曾經設法抵抗共產黨階級鬭爭的學說（對法西斯黨的條件，也曾經相當的抵抗，）特別注重文化的國家主義的象徵。這種嘗試，目的在使下層階級得到一種所有的德意志人全是一家的印像。在學校和教堂裏，在無線電的廣播中，在報紙上，在地方博物館中，以及在『鄉土研究』的科目裏，特別注重德意志國家意識在浪漫主義的驚醒中的各種理想與象徵。一個德國的學生從學校出來，相信德意志的文化比較任何國的都優越。在少年運動中，對德國的土地和風景的愛戀，都重新經過熱烈的提倡。一切這些對國家主義的注重，當然反對共產黨的成份比較反對法西斯黨的成份多，因為國社黨雖然要推翻共和政府，他們的目標卻不是要破壞德國的國家政體和牠的一切象徵，而是要將德國的國體和牠的一切象徵發揚光大。共產黨不但要破壞共和政府，而且還要破壞整個資產階級的社會，以及將軍事的國際主義來代替軍事的國家主義，將國家主義移到文化方面去。（註一六）

法西斯主義，或希特勒主義，在實際上無非是資產階級的政府用社會化的政策和注重全體德意志人的團結來抵抗共產主義的一種極端的表現。將戰後的經濟狀況大不如前時穩定的中等階級作出發點，德意志的法西斯主義曾經想利用他們的境遇，不是來反對，而是來贊助資產階級的政府。在實際上他們要使這種人的怨恨增加，藉已經有了根底的情緒上的路線，將這種惡感引導到外國人、猶太人、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黨佔私人財產的危險上去。因為中等階級中有許多方面已經無產化，僅僅保留一點他們以前在社會上比較勞工階級優越的地位。法西斯主義可以算是在最近的政治生活中「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一句格言的最好例。(註一七)

在一九一八年以後起來維護舊日體制的理想和象徵，對革命取敵視態度的君國主義的狂瀾，與反動的運動，都在國家社會勞工黨中找到歸宿。顧名思義，這個法西斯主義的政黨在希特勒領導之下，要將國家主義的象徵與社會主義的象徵聯在一起。他們的目標，是要獲得實權，直到最近還毫不猶豫的主張用革命來建立一個為「國家民族的解放」而努力的「國家的獨裁政體」。在將國家主義的號召和變態的社會主義的號召的混合中，他們特別重視國家主義。其中心象徵，不盡是國家主義的浪漫時期中的德意志國家或德意志民族，一大部份是早年阿爾利安人(Arjuna)的活力、勇氣和魄力的一種假設的神祕的實現。他們特別的標字是卍，假定這是阿爾利安人所特有，在「純粹」的日耳曼主義中，這種運動自命為繼承戰前的德意志國家政體，要佔用戰前國體的象徵。他們要表示自己是唯一真正能代表整個德意志民族和牠的光榮的風氣的政黨，和其他專靠議會來

撞騙的政黨不同。直到最近他們還主張將議會撇開，用非議會的手段來建立一個獨裁政體。他們要做成一個「第三帝國」，保證德意志國家宗旨的勝利，洗去條頓民族的盾牌上外國勢力遺留下來的恥辱。現有議會式的共和政府以及牠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的象徵；社會黨和共產黨的運動以及他們的國際主義與階級爭鬪的象徵；外國銀行家對德國的操縱——從法西斯黨人看來都是反面的象徵；都是法西斯所反對的。這些名辭都要加上一個「猶太的」的惡號——猶太的憲法，猶太的共和政府，猶太的馬克斯主義，猶太的國際主義，猶太的資本主義者的貪婪等等。反猶太主義變成消除階級間仇視而達到純粹的團結的日耳曼主義的途徑。法國處在「天生的敵人」的地位，也變成一種反面的象徵，一切成爲德國國恥的標誌，德意志國家主義的污辱，都係法國所做成。例如凡爾賽條約、賠款、雷爾地的被佔，萊茵流域被非洲士兵的駐守。在一切以上的，還有國際的共產主義，這是一個必須根除的死敵。

爲進行這種工作起見，法西斯黨將他們的旗幟，挺進隊，以及他們的第三帝國的理想，一齊都獻給全德意志民族。他們不特創造自己的象徵，而且很靈巧的採用各種國家、地方、和階級的象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說所要建立的第三帝國要將中古帝國的光榮與戰後德意志看爲幾乎不能相信的霍亨索倫帝國的繁榮聯合一起。在新造國中將無階級的鬪爭，只有在一個盡職的政府中各方面很友善的互相理解和互相適應，每種階級都安守本份，一致服從和敬仰中央的權威——德意志法西斯的政府。他們竭力避免君主政體的問題，雖然前皇太子的幾個兒子在黨內很活動。直到最近還預備用來作法西斯革命軍的「挺進隊」，穿着褐色的制服，帶着黑紅的

袖圈，行着法西斯式的敬禮與招呼，在象徵上已經別具意義，而且他們都在戰前的軍隊中受過風氣和紀律的訓練。法西斯黨的旗幟——紅地白圓形中間一個黑卍字，暗中包含着帝國時代的黑白紅旗與社會主義的紅旗。他們的口號『國家和社會的解放』幾字中表現出德國歷史中三個大趨向。

國家社會主義工黨以一大部份時間和精力來博得勞工階級的同情，但一直到現在收效還不大。在中等階級的聽衆當中，他們特別注重黨中國家的象徵和目標；在勞工階級的聽衆當中，他們又特別注重黨內社會的和社會主義的目標與象徵。『工作與麵包』的口號，改善老年人待遇的要求，馬克斯的名辭的應用，和其他的手段，都一齊用來使法西斯黨成爲德意志勞工民衆的政黨，反抗外國人的資本主義的操縱和外國人的貪婪。法西斯黨旗對中等階級的號召是黑、白、紅，對無產階級的號召是代表德意志同胞的紅旗。對無產階級的演說和文字，充滿着馬克斯的語句，使人瞠目不知所云。

在他們對法國猶太人、共和政府、社會民主黨、共產黨、有時連天主教中心黨的抨擊中，他們口稱要用極端的壓制手段來對付這些德國的敵人。可是法西斯黨在積極方面的計劃，還是非常空泛。在一九三一年間希特勒將自己和黨放在一個合法的立場上，反對用武力來攫取政權，黨中的政策於是發生驚人的變化。這種動作，係跟着一九三〇年選舉中法西斯黨票數的激增而發的。希特勒用了這種新策略之後，能否維持全黨的團結，或者放棄了革命的象徵以後，會使他失去大部份人心，現時還不能看得出來。

無論如何，希特勒加入政權就是用更嚴厲的方法來壓制共產黨份子的先聲。國務總理勃倫寧的合法獨裁，

不過是一種先兆。這種高壓的政策也許會與在社會立法方面的讓步和社會化的經營，以及資產階級政府對國家主義的愈加重視，同時並進。

總結起來：象徵是由特殊的需要所引起的樞要字句或樞要事物，在這種字句或事物的四週可以牽連着各種社會的態度，因此我們從一個民族的象徵的發展和繁殖中，可以看出牠的歷史的大綱。我們從歷史的、經濟的觀點來考察今日德國民族的象徵的嘗試，發現資產階級的發展一共經過三個階段。反抗封建主義的掙扎，係以王公們作中心的象徵。直到了君主變成專制，反抗這種專制主義的掙扎，又以自由和國家來作中心象徵。可是獲得主要的經濟條件以後，這種掙扎便得到解決；資產階級隨着君主接受國家主義的象徵而自動的放棄了自由的象徵。第三個階段的掙扎，是反抗無產階級要管理和享受工業社會的收獲，對資產階級的日甚一日的壓逼。增強的裂痕。資產階級能否用這種方式來養成一種有力的象徵，足以永遠保持他們對德國社會的控制，那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可算是社會歷史上的一個新紀元。（註一八）

（註一）參看 F. S. Chapin 著 Social Change 第二十頁。

（註二）參看 F. H. Allport 著 Social Psychology; R. M. Eaton 著 Symbolism and Truth (1925); J. K. Folson 著 Social Psychology (1931); H. D. Lasswell 著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1931)（第二次版）R.

Mayreder 著 Der typische Verlauf sozialer Bewegungen (1926)（第二次版）C. K. Ogden 與 I. A. Richards

合著 The Meaning of Meaning (1923); S. A. Rice 著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Politics; A. N. Whitehead

- ste und Spiele des deutschen Landvolks (1909); J. Schrammen 著 Nordisch-Germanische Götter-u.-
 Heide:agen (1884).
- (註九) 參看 W. H. Dawson 著 The German Empire: 1867-1914 and the Unity Movement (註一〇) (1919); J.
 Hohlheld 著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Reiches 1871-1924 (1924).
- (註一〇) Fr. Mehring 著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22) (第十二卷四卷註一〇) A.
 Bebel 著 Aus meinem Leben (註一〇) (1910-14); H. Peus 著 "Zur Maifeierfrage" in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一九〇六年六月) F. Giovanoli 著 Die Maifeierbewegung (1925); F. Wendel 著 Die rote
 Fahne (1927).
- (註一一) Cf. C. J. H. Hayes "History of German Socialism Reconsidered" (譯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
 九一一年十月號)
- (註一二) 參看 P. Kampffmeyer 著 E. Bernstein und der sozialistische Aufbau (1930).
- (註一三) 參看 Rosa Luxemburg 著 Gesammelte Werke 德文版第六卷
- (註一四) 參看 E. David 著 Um die Fahne der deutschen Republik (1921); W. Erman 著 Schwarzrotgold und
 Schwarzweissrot (1924); E. Jäger 著 Schwarzrotgold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1921); A. Rosenberg
 著 Entstehung der deutschen Republik (1929); G. P. Gooch 著 Germany (1925); F. F. Blachly 著
 M. E. Oatman 著 German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Germany. (1928); E. Luehr 著 New German
 Republic (1929).
- (註一五) 參看 F. Ebert 著 Schriften, Autzählungen Reden (1928) (註一五) F. W. Schaafhausen 著 Hinden-
 burg Vater des Volkes (1931); G. Schultze-Fraetzel 著 (G. R. Turner 譯) Hindenburg (1931);

R. Weterketten 著 A. M. K. Watson 合著 *Biography of President von Hindenburg* (1930).

(註一六) 參看 E. Diesel 著 *Germany and the Germans* (1931); E. Müller 著 *Bolschewismus, Faschismus oder Freistaat* (1931).

(註一七) 參看 E. Czech Jochberg 著 *Hitler eine deutsche Bewegung* (1930); A. Hitler 著 *Mein Kampf* 第一卷 (1925), 第二卷 (1927); A. von Koerber 著 *A. Hitler, Sein Leben, seine Reden* (1923); W. Lewis 著 *Hitler* (1931); I. Wilsner 著 *Das Hakenkreuz* (1922).

(註一八) 這一章的編寫與排版，都在一九三三年正月希特拉得勢以後跟住發生的所謂「國家復興」之前。此後的事態也許還我以再給我們不少的例證，在大體說，本章中所立下的原則，不會因新事態而致動搖。

第十七章 結論

將影響到德國公民的忠誠與國家的情感各種因素一一分別詳論過以後，我們值得將發現各點作一個撮要。我們最初已經說明，公民（Bürger-bourgeois）與公民訓練（staatsbürgerliche Erziehung）是資產階級發達的產品。在封建的政體中無所謂公民；封建主義只知道有統治者和治下的庶民。為取得公民權利而發生的掙扎，是資產階級希望建立一個能夠讓他們利益得到盡量發展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的結果。因此在資產階級剛開始發展的期間內，公民訓練是一種訓練藉以增強資產階級能力來反抗封建社會，以及專制或半專制政體中的封建份子。可是到了資產階級的目標一大部份得到實現，和以前的政體與社會變成資產階級的政體和資產階級的社會以後，公民訓練便成為被資產階級利用來維持本身權力的工具。

隨着十九與二十世紀間資本主義的速進，資產階級的社會愈加鞏固。但同時資產階級發展的必然結果，造成一大批工業中的無產階級。這種人的數目日增，可是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實在不能享受資產社會的基本權利——生產工具的私有，和從享有生產工具所得收入的受用。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受了各種限制，不能享受資產階級曾經取得而為資產階級時代之所以異於封建時代的經濟地位。工業中的無產階級是一種虛有其名的公民。因此社會主義便從這種階級中發展，想找得一種只有破壞現有資產階級的政體以後纔可以實現的新社會。

制度。

社會主義要破除勞工對國家政府的忠誠而代以對國際勞工階級和未來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的忠誠。社會黨的宣傳漸漸表示成功，資產階級較前更努力替國家政府宣傳，藉以與社會黨的宣傳對抗。實際上為抵抗社會主義的傳播，在帝國治下的資產階級自願放棄原有的自由主義和民治主義的政治理想，與半專制的政府妥協。這種發揚一種較強烈的國家主義的努力，一方面要打破社會民主黨正在培養的對新國際階級的忠誠而代以對德意志帝國的忠誠，另一方面要加強沒有受過社會主義燻染的中下級社會份子的愛國心。從社會黨所得票數的不斷增加看來，這些人隨時可以加入政府敵人的陣綫。

可是大戰的爆發，表示社會黨中大多數對現有國家政府的忠誠，還沒有完全泯滅。他們對國家的忠誠，比他們對國際無產階級的忠誠還要強。但戰事延續下去，社會民主黨的工人以往反對現有制度的心理，又重新活現。發生一種對兩方面忠誠上的衝突，這種衝突以後愈演愈烈。少數社會黨份子很明白的出來在戰爭當中擁護德意志政府；他們的目標是要『將帝國主義者的戰爭變成內戰。』這些份子隸屬於斯巴達卡斯 (Spartacus) 團體或其他較小的組織。在大多數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當中，發生一種對國家的忠誠和對階級的忠誠的衝突，一直繼續到大戰以後還未終止。這部份人在政治上的組織是獨立社會民主黨。從我們這次研究的觀點看來，這個政黨，就是上述忠誠上衝突的一種表現。這種衝突一直到革命以後一九二〇年間纔得到解決獨立社會黨中多數份子加入共產黨，其餘的回到社會民主黨去。

大戰以來共產黨代表一切勞工階級中的勢力用以破除對現政府現社會的忠誠，和設法建立一種與在蘇俄一樣的對新社會制度的忠誠。事實上蘇俄的存在，使戰後的共產黨比戰前的社會民主黨又更進一步，他們可以指出一個無產階級政體的一個具體的例，要設法發揚一種對這項政體的超乎一切國家偏見之上的忠誠。這黨的活動波及於多方面，隨着戰後危機的日趨險惡，在人數上與活動的範圍上都有增加。他們設法在一切社會民主黨的團體中（如工會，思想自由的組織等）組成一種革命的反對派來吸收信徒。事實上他們設法利用任何有工人在內的反對運動。此外共產運動自己也有一種軍事的組織名叫「赤色前線戰士團」（現時已被取締），青年部，兒童團體，以及各種救濟會。推進這種革命觀念最重要的工具是發起和援助一切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鬭爭，不但在工業中的無產階級方面，而且還在農業中的勞工，較貧的農民，以至在無產化的中等階級方面，也同樣工作。他們所用的方法是罷工，搖旗吶喊的遊行，貼標語、音樂，以及公衆集會，尤其注重和工廠中工人舉行非正式的討論。他們對報紙、雜誌、小冊、傳單等刊物的印行，都非常重視。用革命的觀點寫成的各種書籍，在養成一般人對本運動詳細澈底的了解上，也佔重要的地位。

爲抵抗共產黨的活動和勢力的發展起見，資產階級的社會與政府中各方面的勢力，都加緊公民訓練，希望可以使已經接受國際共產主義學說的人們回心轉意，同時增強中下級社會裏邊因爲謀生困難而漸對現政府失去信仰者的忠誠心。

最重要的，當然是政府一向藉軍隊和警察來行使的權力。當他種方法不發生效力時，當局往往用軍隊和警

察來維持現有政府和現有社會的法律與秩序。這種實力，當時只有在緊急時纔應用；牠們在平時的價值，是有牠們，中下級社會份子便感覺到政府的實力。除了軍隊和警察以外，各種私人的軍事組織——如國社黨的挺進隊，國家主義黨的鋼盔團，中立派政黨的國旗團——都可以給中下級社會（尤其是共產黨份子）關於資產階級政府實力的印象。同時這些組織的會員，還可以獲得嚴格的愛國訓練。

國家勢力由各種政治機關廣佈的活動（法庭、普通行政機關、學校、官辦實業等）以及隸屬於政府的私人組織所支撐。因此除了軍隊和警察所代表的實力之外，國家藉宏大的行政機構，半官式的組織，和與政府有關的私人組織，可以行使一種驚人的強制力。政府機構對公民日常生活的統治與強制，在戰後有驚人的增加。

此外，資產階級的國家與社會中的統治份子，還給中下級社會以許多政治上和經濟上真正而易見的讓步，藉以抵消他們因客觀環境而發生的不滿。政府不但施行各種保險與社會福利的工作，而且還公開的贊助一種「勞工貴族」的發展，使他們覺得擁護現有政府，實在對他們本身有利。這種較有組織，收入較豐的勞工份子的發展，對破壞勞工階級的團結和減少他們反抗政府的力量上大有幫助。政府的策略，還要抵抗中級社會裏面的分解勢力，藉以保存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一個緩衝團體。

對國家的忠心，藉一般網狀分佈的組織來作有系統，有意識的培養。其中最重要的是各政黨（共產黨除外），他們反映着各種程度的國家主義，並要使全國各種活動政治化。因為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要求，多藉議會和政黨以外的手段來滿足，所以資產階級對於議會式的民主政體的發展的感覺，一向不很敏銳。還有，近年間共

產黨的發展，曾經激起一種強烈的驅動力，想廢除民主政體而代以獨裁政體。

一直到最近，德國的學校中很少注意到關於國內政治組織的教學。專制和半專制式的政府，對應否在學校中提起這類問題，表示懷疑。為保存自己的地位計，他們不讓兒童注意到這些問題，一味注重對本朝的和文化上的忠誠。有意識的培植國家情感之被重視，大約從一八九〇年起。這大半是對社會黨在青年當中勢力日增的反應。自從大戰以來，教科書既不能說是很堅強的贊成共和，又不是很明顯的反對君主政體。注重點在國家的團結，國家的自由，以及隱意志民族在文化上的成績。對他國的歷史大不注重。因為教師比課本還重要，而教師多數帶有極濃厚的舊政體的態度，在培養對德意志國家民族的忠誠的工作中，往往不包括對現有政體的忠誠。學校被用來維持階級間差別的程度雖不如革命以前，但昂貴的學費，足以使在德國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只有比較富足的份子纔能享受。

在德國，每人一生下來就是教會的一份子，正和一生下來就是國家的一份子相同。按照家長信仰的派別，在官立學校中受宗教的訓練。成人須納教會稅，這項賦稅，由政府代收。避免這項擔負的唯一辦法是繳納相當費用，退出教會。教會在經濟上對政府的依賴，做成教會一定要竭誠擁護政府的現象。普魯士新教會與君主政體關係的密切，至霍亨索倫的出亡與共和政體的成立使教會一時無所適從。教士們一向是傳播反共和情感的中心。天主教會的主力在德國南部和以解放見稱的萊茵流域。這都是反普魯士和反集權的趨勢盛行的地方。天主教徒在大戰以前雖然盡忠國家，但贊助一九一七年的和平運動。這使君國主義者與國家主義者大為忿激。在革命後

的幾年中，天主教中心黨在實際上已經歸附新政府。因為一切教會都重視個人靈魂的價值，與和睦的社會關係。教會很得受着現有社會私產制度恩惠的人們所推崇，被認為現有制度的柱石；同時當然不免為過激份子所抨擊。

德國青年組織的起源很晚，在前世紀的末葉纔興起。牠們在傳播德意志的文化和德意志國家政府的原則上足以補助學校所不及輔助。牠們由各政黨指揮，作為一種養成未來黨員的附設機關，對德國人生活上的政治分界完全遵照。

德國北部、南部、與西部間區域上的差異，因各種環境和各種組織而得保存，往往妨礙國家的統一。地方主義卻是一種擁護國家政府而非危害國家政府的勢力，因為對地方的依戀，很容易推廣和類化，變成對國家的愛護。

波蘭人如猶太人等弱小民族份子，曾經增高全國德意志人的自覺心。自從普魯士境內的波蘭人對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二年間波蘭革命表同情，以及普魯士開始攻擊他們的文化以後，跟着發生的衝突使各有關方面的交惡更加嚴重。因為波蘭人是天主教徒，多少也是社會黨的工人，高壓政策造成一反響，先使普魯士政府，後使德意志政府的地位減弱。從以往德國認為自己的領土當中，在大戰以後竟產生一獨立的波蘭，這事曾經激動全國的憤怒，因為以前被認為「低劣」的民族，現在竟和自己平等。在前世紀中慢慢形成的，還有德國的反猶太運動。工人當中沒有猶太人，給某種份子一個機會，將勞工和中級社會的不滿，從「資本主義」身上移到猶太人的自私經營上面去，自從一九一八年以後，整百萬的猶太人，單獨被挑出來作為失望的軍國主義，君國主義和反馬克

斯主義團體的犧牲品。

德國統一以後，漸漸注意到曾經移居國外的德意志人，設法使他們在文化上與祖國保持聯絡。大戰的結果，使許多少數的德意志人雜居在鄰國的領土中，更加重一般人對於東歐有德意志人的居留地的感覺。在國外有一個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立足點的願望，使他們重新注重到海外德意志人的栽培。

最足激起德國國家情感發展的一種勢力，是外國對德意志政事的干涉。在相當範圍內，宗教改革就是反抗教皇和他的代表在德國勢力的運動。稍後，法國人對德意志各邦事務的干涉與陰謀，成了暴烈的情感的對象。凡爾賽條約所造成的損失，德國很明顯的要屈服在外國軍事控制和賠款的條件之下，是大戰以來長期的刺激物。雖然國內有為外交上與商業上的關係而親俄的傾向，上級社會深怕蘇維埃的勢力，侵入工人當中。

在國家主義和解放份子早年與專制主義的爭持中，報紙頗為前者所重視。資產階級在政府的地位改變以後，報紙成了維持現狀的主要工具。

無線電被用作宣傳國家團結的工具，係靠一種對文化上成績的宣揚而不注重政治上的差別。電影曾經公開的被用來作贊成君主政體的人反對共和宣傳的媒介，可是電影的影響，也和其他宣傳的媒介一樣，大部份是擁護國家的。

反抗封建主義的爭鬥，以自由和國家的象徵作中心。當資產階級達到他們目標時候，他們的自身反盡忠於接受了國家主義的君主政體。現時狀態的特徵，是資產階級與藉無產階級的名義向現有制度挑戰的象徵相持，

這種掙扎中含有一種強烈的國家主義。

我們不要忘卻所有這些爲增強國家主義和公民忠誠而工作的勢力，政府和各方面私人組織都同樣的要培植。可是雖在私人的工作中，政府的影響是時常存在的。他們設法使幾乎全體有組織的私人活動都與政府機構發生關係；將這些私人組織變成半官式的團體，給牠們津貼，使牠們在顧問的地位參加政府的活動，或和牠們成立其他有效的協定。換句話說，政府縱然不是萬能，也是無所不在。

現時留下的問題是：公民的和國家的訓練，在德國曾經發生多少效力？這種訓練在發揚對國家資產階級政體的忠誠上效力如何？在大戰以前，社會民主黨勢力的發展，至一九一四年已達到獲得全國投票人三分之一擁戴的程度。這表示擁護政府的勢力，其直接控制的能力已經逐漸減少。不過，公民訓練在實際上的成功，比從表面上看來較大，因爲當大戰爆發的時候，各方對德意志國家的忠誠，有充份的表現。戰爭的時期，特別是戰後的期間，使共產黨運動得以形成，破壞對國家資產階級政體的工作更有系統，收效更大，同時發揚一種對國際無產階級的忠誠，將蘇聯當作勞工階級的祖國。這樣戰後的公民與國家的宣傳雖然較爲加緊，但不特不能博得全部中下階級的忠心，而且選舉的結果，表示這時期內經濟，社會，與政治的危機日迫，使原來對現有政體盡忠的人當中轉向共產黨的漸多。這次戰後的危機，同時還影響到中級社會。他們對現有政體——議會式的共和——的忠心漸漸失去。可是他們的忠心，因爲得了國社黨的領導，還不至離本來的對象太遠。國社黨將反叛的精神領導到極端國家主義的路上去，現在看來已經有相當的成效。

戰後的發展，會因此而將公民訓練的問題很明白的表露出來。公民訓練問題的嚴重性，更隨着危機的緊張程度和資產階級政府與資產階級社會的瀕於崩潰而加強。因此加緊愛國訓練的運動的發展，不只是一種「學術」上的運動，目的不僅要推進公民的理想和特別推進德意志的國家主義。這是一種真正的掙扎，一個正要崩潰的社會和失去人心的政府在破壞勢力當前爲本身生存的掙扎。公民訓練和國家的理想以前原是勃興的資產階級用以進攻一個正要潰敗的封建制度的利器，現時卻變成一個政府和社會在無產階級的攻擊之下，用來自衛的利器。

希特拉與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已經勝利了！國社黨已經取攻勢，要攫得政府的機構和制止無產階級的抨擊。一種超常的國家主義的公民訓練，積數十年的結果所造成的，就是今日的制度。這種訓練的效力如何，要看到底國社黨能否解決他們所賴以得勢的經濟危機。若是他們能夠完滿的解決目前難關，那就最好不過了。假如他們做不到，他們便要受被壓止的一切社會革命勢力聯合戰線的攻擊了。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德国公民教育

作者 = 王云五 韦恂主编 可索克著 金澍荣 黄觉民
译

页数 = 330

S S 号 = 11311225

出版日期 = 1937年06月第1版

出版社 = 商务印书馆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编	主要的社会与经济的分界
第一章	资产阶级
第二章	工业中的无产阶级
第三章	中产阶级
第四章	拥有地产的贵族
第五章	农业界中的无产者
第六章	农民
第二编	政府
第七章	政党
第八章	行政人员
第九章	军队
第十章	学校
第三编	政府以外的组织和份子
第十一章	教会
第十二章	青年运动
第十三章	地方主义与区域主义
第十四章	日耳曼人与非日耳曼人
第十五章	报纸无线电与电影
第十六章	国家的象征主义 (Isidor Gin
s b u r g 原著)	
第十七章	结论